

史与政治。从“五四”萌芽的士人心态与政  
治的关联，到“五四”后各种思想观念、行为  
取向和政治参与，到国共合作、战争，以及这些观念  
在革命中的实践，包括文学、文艺、新闻等文化  
现象与政治的关联，以及北伐战争与军政体  
制的确立。

# 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 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

罗志田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目 录

## 自序

### 引论 希望与失望的转折：五四运动前一年

1. 公理战胜的乐观
2. 新纪元和新潮流
3. 对文治的憧憬
4. 对共和体制的失望
5. 余论：局势和情绪的逆转

### 上编：“五四”后的士人与政治

#### 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认识

1. 倒放电影的争论起因
2. 因相近而区分
3. 胡适的思路及他人最初的因应
4. 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
5. 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
6. 余论：走向“行动的时代”

#### “五四”到北伐期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

1. “好政府主义”
2. 胡适与中共的观念歧异（对内）
3. 胡适与中共的观念歧异（对外）
4. 中共的“联合战线”与胡适
5. 胡适与中共“舌战”莫斯科

### 下编：北伐前的军政格局

#### 北伐前南北军政格局的演变，1924—1926

1. 北洋军阀的新陈代谢
2. 边缘挑战中央的地理态势
3. 反赤旗帜下北方军政的整合尝试
4. “教而后战”：北伐前夕的南方军事整合
5. “有道伐无道”的形成：南方的军事整合及南北攻守势易

#### 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

1. 引言：从狭义到广义的土客矛盾

- [2. 1925年广东军事的新陈代谢](#)
- [3. 中山舰事件前的广州政治权势竞争](#)
- [4. 中山舰事件后的广州政局](#)
- [5. 结语](#)

[外编：条约体系的演进](#)

[帝国主义在中国：条约体系的文化认知](#)

- [1. 帝国主义间接控制：条约体系的文化解读](#)
- [2. 华盛顿会议后中国内争与外力的纠结互动](#)

[李锦纶使美与中美双方促进南北合作谈判修约的尝试，1927—1928](#)

- [1. 引言](#)
- [2. 李锦纶使美](#)
- [3. 国民党内争与中美关系](#)
- [4. 余论：人物及相关因素](#)

## 内容简介

---

本书讨论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这一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五四”前夕的士人心态与政治的关联，到“五四”后各种思想观念、行为取向和政治势力之间的竞争，以及这些因素在竞争中的互动，并从区域、文武、新旧等文化因素与政治斗争的纠结考察北伐前数年军政格局的演变。全书所再现的“历史现象”与既存认知有相当距离，或更贴近这一时段中国思想、政治领域那种异常丰富、曲折而活跃的动态场景。

# 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 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

罗志田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罗志田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  
ISBN 978-7-301-11011-9

I. 激... II. 罗... III. 中国—近代史—文集 IV. 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00388号

书 名：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  
著作责任者：罗志田 著  
责任编辑：刘 方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1011-9/K·045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mailto: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出版部62754962  
编辑部62752025  
印 刷 者：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22.25印张 300千字  
2006年9月第1版 2007年11月第2次印刷  
定 价：36.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自序

闻一多在1923年曾说出一段很像狄更斯《双城记》里的话：“20世纪是个悲哀与奋兴底世纪。20世纪是黑暗的世界，但这黑暗是先行黎明的黑暗。20世纪是死的世界，但这死是预言更生的死。这样便是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底中国。”<sup>[1]</sup>对身处中国的读书人来说，20世纪是一个充满矛盾和紧张的时代，许多人正是在各式各样的希望和失望伴随下蹒跚前行，与时俱进；还有人带着类似的经验走过了那一世纪，又走进了新的世纪。

在20世纪之中，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的十余年，又是一个激变的时代，那时的世局几乎可以说是年年翻新，一年一个样。其间的五四学生运动确有些像是一个分水岭，将此前和此后的时代潮流大致区隔。时在中国的杜威描述进行中的五四运动说：“我们正目睹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而出生总是艰难的。”<sup>[2]</sup>

这大概是那时比较“亲中国”的在华外人的共识，据当年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回忆，法国公使在五四运动之后即说：“我们正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最令人惊异的重要现象，即中国为积极行动而形成了一种全国性的舆论。”芮恩施自己也认为：“中国人民从巴黎决议的不幸中产生出一种令人鼓舞的民族觉醒，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而结合成一个整体。”<sup>[3]</sup>他们的言论中隐含着中国此前尚非一个“民族/国家”的意思，这且不论；但这些观察者都看出中国正在发生一个带根本性的变化，却大致不差。

在差不多同时，北大学生傅斯年远不如这些外国人那么乐观，在他看来，中国当时不仅有严重的城乡疏离，且“大城市的一般社会”也以“互不接触”为特征；“职业一有不同，生活上便生差异，思想上必不统一。在一个大城里，异样的社会，很少社交的关系。至于联合起来，而营社会的共同生活，造出一个团结的组织，又就着这组织活动去，更是谈不到的”。但傅斯年也从五四运动看到了希望，断言“从五月四日以后，中国算有了‘社会’了”。<sup>[4]</sup>

基本上，“五四”后出现一个具有谗论意味的现象：一方面很多人因为对政府甚至政治的整体失望，而如梁启超所说“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进而探索“文化”方面的深层变革；<sup>[5]</sup>另一方面，学生运动又使此前大受青睐的“个人”开始淡出，思想和行动都转而朝着强调群体的方向发展，不少知识精英关注的重心开始由文化向政治转移，并在新的意义上“再发现”了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旧说。<sup>[6]</sup>

这期间一个显著倾向是“社会”的改造一度大受关注，梁启超总结的近代士人“觉悟”由器物到政制再到文化的阶段性演变常为人引用，<sup>[7]</sup>而傅斯年则认为“社会”是文化之后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他在1919年说：“中国人从发明世界以后，这觉悟是一串的：第一层是国力的觉悟；第二层是政治的觉悟；现在是文化的觉悟，将来是社会的觉悟。”<sup>[8]</sup>傅氏心目中的“社会”有其特定的含义，<sup>[9]</sup>在这四层递进演变中，前两层和后两层又相对接近，多少体现出梁启超所说的“社会文化是整套的”，也分享着一些时人对政治的排拒。

傅斯年明言：“凡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社会，都不免有几分专制的臭味；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才算有彻底的觉悟了。”可知其所认知的“政治”与“社会”有着上下的对应关系，且隐约可见今人喜欢挂在口上的“国家”之身影。<sup>[10]</sup>郑振铎等人那时组织了一个“社会实进会”，要“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他们也强调其“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要“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起来”。<sup>[11]</sup>

“德莫克拉西”一语点出了这类“自下而上”变革观的西来渊源，此实滥觞于清季。熊十力后来回忆说，他少时读严复所译《群学肄言》，曾引发“一个重大的感想”，即“感觉中西政治思想根本不同”：中国自古以来“论治，通同是主张‘自上而下’的”；而《群学肄言》表现的“西人言治，是‘自下而上’的”。他当初“极端赞成西洋的思想”，所以曾参与革命。辛亥后发现革命党“新官僚气味重得骇人”，比袁世凯也强不了多少，“一时舆论都感觉革命只是换招牌”，于是退而独善其身。到“九一八”之后，眼看“一天大乱一天，极于今而有亡国灭种之惧”，终“感到中国自上而下的主张确有其不可颠扑的真理”。<sup>[12]</sup>

这样的“后见之明”不一定为多数人所分享，但类似的反省心态可能是“九一八”之后相当一些尊西趋新的知识精英开始鼓吹“独裁”的心理基础，与稍后的“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一类争论大致同属一个“时代”，那是后话了。至少在“五四”到北伐期间，“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观还是更占上风。不过，对相当一些人而言，“社会改造”之所以受到青睐或许恰因“社会”带有调和或综合政治和文化两趋向的意味，它既不那么政治化，又比文化和思想更具体实在，同时还常能包容个人与群体两方面。<sup>[13]</sup>

胡适后来说，中国现代思想的分期约以1923年为界分成两段，前一段多“侧重个人的解放”，后一段则属于反个人主义的“集团主义时期”。<sup>[14]</sup>若仔细考察，重群体的倾向在“五四”当年已开始兴起，或可将1919—1925年间看作两种倾向并存而竞争的时期，即瞿秋白所说的“新文化思想”与鼓吹社会主义、研究劳



动社会问题两造的“混流并进”；<sup>[15]</sup>虽然是并存并进，毕竟“集体”渐占上风，到“五卅”后，“个人”基本丧失竞争力，终不得不让位于“集团主义”。<sup>[16]</sup>北伐的突飞猛进，多少也借此思想的东风。<sup>[17]</sup>

在个人与集体混流并进的同时，侧重文化和政治的两种倾向也在冲突竞争中互动。老革命党人张继在“五四”前夕给《新潮》杂志写信说，民国代清后，“中国的国门，只换了一块招牌，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依据“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的见解，中国政体虽变，“戏剧文学仍照满清帝政时代的样子”，可知其“思想仍是历史传来的家庭个人主义”；而“风俗如婚宴丧祭，与非洲的土人相去不远”。这样的思想风俗难以产出“共和政治”，故他认为，《新潮》诸君“主张广义的文学革命，即是思想革命，真是救中国的根本方法”；只要得着“多数有知识的人赞成，我们这个民国的招牌可望保得住”。<sup>[18]</sup>

《新潮》社的罗家伦在“五四”后几个月复信说，他“极力赞同”张继的见解，并“认定中国现在政治社会的不良，就是人民的思想不曾变换”。他以为，袁世凯等也是“中国的社会害他们的”；若其生在美国，而“中国的人民有美国的人民那种觉悟”，或不敢有做皇帝的梦。如果“大家的思想不从速受过一番革命的洗礼，则正如先生所谓，‘民国的招牌’是保不稳的”。罗家伦申论张继的见解说：“文学革命不过是我们的工具，思想革命乃是我们的目的。”<sup>[19]</sup>

类似见解那时为不少人分享，新文化运动之外的梁济和徐世昌都表示过类似的主张。希望以殉清而警醒世人的梁济提出“救亡之策，必以正心为先”；总统徐世昌也认为，对不良政治的“箴救之道，首在转移风气，使国中聪明才智之士，从事于社会经济实业教育，以挽此政争狂热之潮流”。两人的思虑相通，他们都同意政治上治乱的源头在思想社会，也当从思想社会着手解决。<sup>[20]</sup>

这也是罗家伦那段时间的一贯思想，他特别强调，“思想不革命，行为是不能革命的”；为保持行为的革命性，更需要思想方面的努力。盖“‘五四’、‘六三’的结果，只是把全国的人弄‘动’了”。由于“动的影响”，群众运动的主体“群众”本身已感觉到“知识的饥荒”，要“赶快接济他们知识的粮草”。重要的是，“中国的存亡”可能“正在这一‘动’”，如果知识的粮草“接济得好，这一动就成了永久的活动；接济得不好，这一动就成了暂时的冲动”。<sup>[21]</sup>

罗氏对五四运动带来的转折有切身感受：“五四以前，我们受了多少压迫，经了多少苦战，仅得保持不败，已经觉得是很危险的；五四以后，形势大变，只听得这处也谈新思潮，那处也谈新思潮，这处也看见新出版品，那处也看见新出版品。”不过，“对于这种蓬蓬勃勃的气象”不能太乐观，中国在世界学术界的“失语”现象是明显的。故“中国的社会固然是毁坏学者”，那种“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的学生运动，“也是同样的毁坏学者”。学生们应据性之所近有所“分工”，一些人不妨继续街头行动，另一些人则可转而侧重于“文化运动”。<sup>[22]</sup>

这样，在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辈选择出国留学之路的同时，一些老师辈反逐渐关注政治，胡适就是其中之一。这两种倾向都有时人感到失望：杨鸿烈对那些“了解文化运动真意义的人大多数出外留学，这样就丢下了他们未竟的工作”很为不满。<sup>[23]</sup>孙伏园则认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从大多数没有知识的人，决不能产生什么好政治”。他强调，“胡适之”三字的可贵，“全在先生的革新方法能在思想方面下手，与从前许多革新家不同”，并希望把“已被政治史夺去了的”胡适“替文化史争回来”。<sup>[24]</sup>

从新文化运动初期读书人不议政不为官的普遍主张，到1922—1923年好人政治和好人政府观念的提出，是民初思想界的一大转折；两者几乎完全背道而驰，而胡适等知识精英两次都是倡导和参与者。对胡适而言，除了社会政治大背景的转变，也有一些个人的推动因素。在1921年夏秋，从他的老师杜威到美国名记者索克思（George E. Sokolsky），以及访华的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狄雷（James Q. Dealey），都共同责备中国读书人没有尽到知识分子应尽的“社会良心”之责，终使胡适产生了同感。所以，针对孙伏园的质疑，胡适解之以“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也不应“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sup>[25]</sup>

但精英取向的“好人政治”不久即宣告失败，此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传统观念可见明显的复兴（这对反传统的五四人实具讽刺意味）。对许多边缘知识青年来说，天下要担负在他们肩上是个体非常直接的感觉。不仅学生辈的王光祈宣布：“要想适应世界的新潮流，全靠我们青年”；<sup>[26]</sup>老师辈的北大教授陈启修在1923年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五四纪念会”上演说，也主张打倒军阀和国民外交“这种政治事业，在中国全靠学生来担任”。<sup>[27]</sup>

到五卅运动之后，此前处于竞争中的各倾向基本有了结果：群体压倒个人，政治压倒文化，行动压倒言论，可以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西来的“到民间去”的口号在“五四”前后已开始在中国传播，此时有了更明确而直接的意蕴，国共两党的工农运动以及“村治”派的出现等都可视为这一大趋势的不同侧面。更直接的政治变动，当然是国民党领导的北伐战争。所以，国民革命不仅有其自同盟会以来的内在思想理路，也呼应着民初思想社会的演变。

在前引闻一多文中，他也说到“20世纪是个动的世纪”。<sup>[28]</sup>二十多年后，朱自清描述当时的社会说：“这是一个动乱时代。一切都在摇荡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随时变化之中。”<sup>[29]</sup>这话大体适用于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这一激变时代，不过两个时段还是有着较大的差异：在连年征战之后的40年代后半段，“动乱”确已深入老百姓社会生活的基层；而在北伐特别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因为长期没有较大规模的战争发生，“摇荡不定”的特征更多体现在相对上层的思想文化和政治领域，那时读书人眼中的“民不聊生”，其实颇具构建的成分。



然而即使对这样的“动乱”，读书人的反应也很主动。闻一多便说：“20世纪是个反抗的世纪。‘自由’底伸张给了我们一个对待威权的利器，因此革命流血成了现代文明底一个特色了。”<sup>[30]</sup>他说这话是在1923年，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真正厉害的“革命流血”还没开始，这一表述或更多是“预言”而已。不过，因向往自由而反抗威权乃是当时读书人的基本心态，尽管他们认知中的“自由”和“威权”都不免带有几分想像的色彩。而一步步走向“革命流血”也的确是北伐前的时代特征。

本书就是讨论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这一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引论处理“五四”前夕的士人心态与政治的关联，以对认识后“五四”时期的政治走向稍作铺垫。正文分为三部分，上编探讨“五四”后士人与政治的互动，凸显当时思想界异常丰富而活跃的动态。下编论述北伐前数年的军政格局，侧重于政治军事的演变，尤注重区域（包括中外）、文武、新旧等文化因素与政治竞争的纠结。最后两文的时代断限有超出前文范围者，故置入外编，立足于帝国主义侵略所及的中国领土的当地条件，从文化视角考察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形成及其对后来中外关系的影响和制约。

各文写作机缘不一，也并不系统，甚至不妨说是零散的碎片；然而这些碎片之间并无清晰的边界，也少见明显的断裂，反呈现出相当密切的关联，即都在探讨这一时段里各种思想观念、行为取向和政治势力之间的竞争，以及这些因素在竞争中的互动。所谓竞争，既包括文化和政治领域里的权势和控制之争，也涵盖士人为寻求中国出路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上下求索。尽管所涉及的时段不过数年，各文基本仍是一种尽量压缩之后的“通论”，其中可以仔细探索申论之处尚有许多。除个别篇章外，本书在“写法”上与我其他专题论文稍不同，更偏重于叙事，虽然仍是一种分析的叙述。

过去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多体现其抗议和反抗的一面。其实没有什么重大政治变革的“五四”前一年，对许多时人来说却曾充满了希望：既有“公理战胜”的乐观，也有对“文治”及和平的憧憬。学生参与校外活动受到鼓励，大型欢庆活动至少在方式上为五四运动进行了预备。当时政治和思想走向呈现出特别明显的内外缠结特点，不少人以为人类新纪元从此开始，希望借欧洲战胜的东风，由外及内，一举解决中国的全部问题，进入世界大同境界。巴黎和会与南北和会代表着以会谈方式解决困局的尝试，两者的失败预示着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和缓取向的艰难。希望和失望都来得有些意外，举国的失落感强化了士人心态的激进。

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最能体现文化与政治的关联，而“问题与主义”之争恰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件。那次争论为时不长，却触及到一些时代关注的焦点，反映出“五四”前后各种流派混杂难分、阵线混淆的重要特征。包括安福系在内的朝野各方都以为“社会”的革命或改良不可避免，这样的朝野相似性使“新舆论界”一方希望有所“区分”，以确立自身的特性。简言之，那时的中国思想界远比我们过去认知的更为丰富、活跃。

有些后来以为冲突的观念，对当时当地的当事人而言，未必就那样对立，反有相通之处。例如，中国社会改造是局部解决还是整体解决的问题，就是一个时代关注的焦点，它所涉及的面向远比既存研究所论述的更为宽广。当时倾向于整体或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人相当普遍，其中不少人并不激进；而在主张根本解决的人中间，也有反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整体或局部解决两种取向未必势不两立，反可能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且“根本解决”也不一定意味着革命，而革命倒可能是走向根本改造的第一步。

另一个时代关注的焦点，则是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其中既有读书人在学理方面的探讨，也有革命党人实践中的困扰和因应。争论各方都承认中西社会的歧异，并从世界角度思考中国问题的解决。需要注意的是，胡适关于输入外来“主义”应该考虑适合中国国情的观念，在中共党人探索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问题时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呼应。基本上，胡适和李大钊关于“问题和主义”的言论在一段时间里共同成为年轻一辈的思想资源，提示着这一争论未必像后来认知的那样意味着新文化人的“分裂”，或即使“分裂”也不到既存研究所论述的程度。

胡适这段时间与中共的关系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表征，这与中共当年试图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一政策相关。双方当年在对内对外的政治主张上皆有不少歧异，这些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胡适与中共的关系，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双方“求同”的愿望。真正导致中共不那么重视胡适及其政治派别的，应是国共合作及1925年五卅运动后，其“革命工作”已日益进入具体的工农运动甚至武装斗争阶段。尽管中共仍有“争取”胡适的努力，也相当欣赏胡适稍后对苏俄的公开赞颂，但双方在基本政治立场上的对立仍未能调和。

与这一系列思想争论相关的一个后续发展，是“空谈”成风导致“实行”的凸显。一旦实干成为主导的倾向，思想和知识都可能退居二线，甚至连“知识”本身的含义都可能转变。这样一种双重的转变可能意味着读书人在整个社会中地位的下降，那些欲追赶时代的读书人或不得不进行某种程度的自我约束，甚至自我否定；另一个选择是“参与”，对其中不少边缘知识青年来说，“到黄埔去”曾是一个相当吸引人的出路，最能落实从“坐而言”到“起而行”的转移。

在实际政治中，北伐前两三年间南北军政格局的演化非常曲折复杂，北洋体系之新陈代谢造成的权势更迭相当快速激烈，从地缘分布的视角可以看到北洋体系中边缘挑战中心的态势，两者均揭示出北洋体系正统衰落、边缘兴起的趋势。第二次直奉战争因冯玉祥倒戈促成直系垮台，吴佩孚稍后复出，却挽救不了直系的崩解；段祺瑞虽出山，皖系也未能再起；北洋系统中原本较边缘的西北各军和阎锡山的晋军应运而出，一度颇能影响国是，而后起的奉系和新兴的国民军成为大主角。北伐结束后还能长期存在的北方军事

力量正是北洋系统内非正统的东北军、西北军和晋军三部分，故后来的北方军事格局或可说先已奠定。

同时，南方的局势也发生较大变化。唐生智武装盘踞湘南，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成功控制广西；两省军事整合的一个共同倾向，即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主而层次相对偏低的新兴少壮军人取代偏“旧”的既存上层势力。面目一新的广西进而与刚获统一的广东实行两广结合，复与湘南一起联合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形成一个国民政府治下的数省势力范围，提示出武装统一全国的可能性，对久乱思安定的中国社会颇具吸引力。适逢北洋政府表现出明显的“失道”现象，反衬出国民革命的合道性，遂为北伐的取胜打下了基础。

在广东，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意味着国民党革命事业之孙中山时代的结束，广州政权在不长的时期里进行了带根本性的权力重组，确立了以孙中山的少壮幕僚和家属为核心的派系在党和政府中的领导地位，开启了蒋介石时代。过去对这段时间权势竞争的研究多侧重国共之争和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当时广东各类“土客矛盾”相当严重，从英、俄两国到众多“客军”等饱含冲突对立的外国和外省新老因素聚集于广东一隅并相互缠斗，复与原处竞争中的各类新旧本土成分竞争，地方意识和国际冲突的奇特结合使广州政局的纠葛至为错综复杂。各方的矛盾显然更多是实际利益的冲突，但权势争夺的表述却往往回避实质性内容，而诉诸民族主义等更为高远的政治理念。

这既是当时政治运作的一个特色，也提示出外国在华存在的实质影响，致使中国问题的解决不能不与外国因素相牵连。这就需要进而考察自西潮入侵以来的中外格局，特别是不平等条约体系形成后对中外关系和中国政治的影响和制约。怎样认识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侵略是曾经论述较多而近年相对淡出的议题，过去的研究明显侧重于实施侵略一方，而相对忽视侵略行为实施的场域以及侵略在当地的实施（通常述及的是被侵略地区特定的“反帝”活动）。

实际上，正是帝国主义实施侵华行为的中国当地条件制约了侵略的方式和特性。外来侵略者通过条约体系内化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又依“例外法则”在中国形成一套与西方基本价值时相冲突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故这些西方代表在中国表述着“西方”却又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列强既要中国实行改革以维持西方标准的“正常”秩序，其自身又是与西方标准相异的中国秩序之构建者和维护者，扮演着改革推动者和既存秩序维护者的双重角色。从文化视角考察帝国主义侵略所及区域的内部因素，兼及其与外部因素的关联互动，可以增进对近代中外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这样一种中外关系的认识框架，有利于认识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内争与外力在中国的纠结互动。1927年秋，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派遣政务司长李锦纶作为政府代表使美。李氏在“非正式”的名义下与美国国务院官员频繁会谈，实际开启了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在华盛顿的官方接触，并推动了一项包括中国南北政府和美国三方共同参与的努力，试图组成一个南北联合的中国代表团与美国谈判条约修订。这一努力虽然为时不长也未获成功，但仍揭示出当年中国政治、外交和中美关系一些微妙的面相。

参与此事的核心人物是伍朝枢、李锦纶和韦慤，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意识形态，更多的是外国读书的共同经历和同为广东人的地方认同。其中伍朝枢是国民党右派而韦慤是左派（他从1925年起已秘密加入中共），出生在外国的李锦纶基本是个温和的技术型官僚，政治上或属中派，但与左右派的关系都不错。他和广东籍的中共要人苏兆征保持着联系，后来在中共策划广州暴动时，正是他向韦慤转达了苏氏要他返回广州的信息。共产党员韦慤在国民党“清党”中已成为整肃的对象，却在“清党”主要发起者之一的蔡元培帮助下出逃美国，更在那里代表国民政府和美国人洽谈。

在中美关系史和民国政治史都基本不怎么提及的这一小小事例中，不同人物的相关经历说明，意识形态和政治派别之分在当年未必高于一切，有时地方认同会弥合政治派别的歧异，有时同事之谊也能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至少，在涉及对外交往时，内部的政治纷争可能暂时退让，使大家能够“一致对外”。而在中美谈判之中，文化层面的考量有时也超过实际的国家利益，成为双方争执的要点。这些都提示着当年文化与政治的关联互动程度超过我们已有的认识。

自清季中国新史学提倡“民史”以来，以“君史”为表征的政治史至少在意识层面曾被拒斥。梁启超在1922年提出，当时中学国史教科书及教授法的主要缺点，是其内容“全属政治史性质”，而将“社会及文化事项”视为附庸。其实，不仅“政治史不能赅历史之全部”，根本是“旧式的政治史专注重朝代兴亡及战争，并政治趋势之变迁亦不能说明”。他明确提出“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的建议，拟将全部中国史纵断为六部，即年代、地理、民族、政治、社会及经济、文化。其中后两部的篇幅占全书之半，而政治仅占约六分之一。<sup>[31]</sup>

这里的“文化”本身兼有广狭两义，狭义的文化即作为六部类之一但又占据较多篇幅的文化史；还有一种广义的文化是包括政治的。

后者是一些时人的共识，胡适在大约同时也提出一种“专史式的”整理国故方式，主张“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他进而将系统的“中国文化史”具体分为十种专史，其中就包括经济史、政治史和国际交通史。<sup>[32]</sup>

梁启超把“现行教科书中所述朝代兴亡事项”全部纳入“年代之部”中，由于“一姓之篡夺兴仆，以今世史眼观之，殆可谓全无关系”，故这一部分“所占篇幅不及全部二十分之一”。从今日眼光看这应算是“政治史”。他另外还为政治史留了一点余地，即在其设计的占六分之一的“民族之部”里，“专记述中华民族之成立及扩大，其异族之侵入及同化，实即本族扩大之一阶段也，故应稍为详叙；而彼我交涉之迹，亦即形成政



治史中一重要部分”。<sup>[33]</sup>民族间的人我关系以及中外“彼我交涉之迹”，确为不论哪种意义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中一项特别重要的内容，其所占比重也反映出民初史学所受西方治史那“四裔”倾向的影响。<sup>[34]</sup>

在已经缩微的政治部分里，梁启超主张“对于一时君相之功业及罪恶，皆从略”；而“专纪政制变迁之各大节目，令学生于二千年政象，得抽象的概念”。这虽是针对中学生的有意省略，且有明显的道德考虑（即淡化传统政治中“机诈黑暗”的成分），然矫枉过正的倾向性仍太强。试想一部全无“君相之功业及罪恶”的中国政治史，的确也只剩一些“抽象的概念”，恐怕难以达到梁氏希望使学生产生兴趣的目的。把上述内容加起来，政治史在整体史学中所占的比重也低于四分之一，的确是面目一新的通史。

不过，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民史”倾向是说得多做得少，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包括近代史在内的中国史仍以政治史（逐渐包括经济史）见长。只是到了近一二十年，关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史学论著开始减少，而以思想、社会和学术为主的专门史逐渐兴起。这里既有学者的自觉努力（即有意弥补过去所忽略者），也受到海外学术发展的影响，可能还隐伏着传统的某种再现。<sup>[35]</sup>

在政治史几乎成为史学“普通话”的年代，各专门史在保全各自的“方言”层面多少带点“草间苟活”的意味；今日政治史雄风不再，即使研究政治的也往往掺和着一些专门史的“方言”风味，多把政治放在文化与社会的大框架中进行论证分析。我以为这是一个好现象，盖任何“新”领域的探索都可能使学者对一些滑向边缘的既存领域产生新的认识；部分因为葛兰西的影响，权力意识已有力而深入地被引入各专门史之中

（在性别、族群等新兴专门史中尤其明显），这些专史所提供的新权势关系很可能改变我们对“政治”的观念，从而导致政治史这一过去积累丰厚的领域之“复兴”。

其实近年政治、外交等专史的淡出多少也因为一些学人的边界和门户意识太强，非此即彼，不免存在西人所说倒洗澡水连同小孩一起倒掉的倾向，而忽略了文化、社会、思想、学术等与政治之间那千丝万缕的关联。尤其中国士人重视政治的传统在近代不仅没有减弱，甚至有所增强：从头发到脚的身体处理一直未曾离开政治的青睐，常呈现出泛政治化的倾向；就连“读经”和讲授“国学”这类看似“迂远”之事也每次“出现”都受到相当广泛的社会关注，引起许多争辩，往往牵连到国家民族的发展走向等重大问题。可知近代中国能“脱离政治”的课题其实不多，若没有坚实的政治史基础，治其他专史也很难深入。

不论史学各子学科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边界明晰的学科认同原非治史的先决条件，各科的“边界”多是人为造成并被人强化的。史学本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学科，治史取径尤其应该趋向多元；最好还是不必画地为牢，株守各专史的藩篱。《淮南子·汜论训》所说的“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唯无所向者，则无所不通”一语，最能揭示思路和视角“定于一”的弊端，也最能喻解开放视野可能带来的收获。梁启超和胡适当年“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的设想虽未免有些矫枉过正，至少也提示了一种结合文化视角考察分析政治的取向。

下面一段话已多次出现在拙作的序言之中，仍愿重复一遍：本书倘幸有所得，都建立在继承、借鉴和发展既存研究的基础之上。由于现行图书发行方式使穷尽已刊研究成果成为一件非常困难之事，对相关题目的既存论著，个人虽已尽力搜求，难保不无遗漏。同时，因论著多而参阅时间不一，有时看了别人的文章著作，实受影响而自以为已出者，恐亦难免。故在向既存研究的作者致谢之同时，我愿意申明：凡属观点相近相同，而别处有论著先提及者，其“专利”自属发表在前者，均请视为个人学术规范不严，利用他人成果而未及注明，请读者和同人见谅。

本书参考和所使用的一些资料，承谢国兴、汪朝光、王汎森、陈力、杨奎松、王奇生、冯筱才先生和李杨女士指点，特致谢忱！也非常感谢国家图书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特别是万仁元馆长）、台北国史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特别是庄素华小姐）、中研院史语所图书档案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档案馆（特别是馆长马若孟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档案手稿图书馆（Seeley G. Mudd Library）的热情帮助！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张淑雅教授的助理林志菁小姐、中研院谢国兴教授的助理黄申如先生、四川大学图书馆的何艳艳小姐、国家图书馆的窦红玉小姐、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季宵瑶、潘颖同学、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波同学等曾代为查核、影印材料，谨此一并致谢！四川大学的徐亮工兄和北京大学的鲁萍同学在酷暑期间拨冗核看全稿，减少了若干讹误和重复，特致谢忱！也要感谢《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史林》、《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各刊惠允将曾经刊发于该刊的拙文收入本书！

尽管本书各文尚不成熟，恐怕会有辱师教，但我仍愿意在此衷心感谢成都地质学院子弟小学、成都五中（烈五中学）、四川大学、新墨西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各位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以及这些年来我所私淑的各位老师。他们在我修业问学的各个阶段中都曾给我以热诚的关怀和第一流的教诲，在我毕业之后继续为我师表，诲我不倦，这或许是我比一些同辈学人更为幸运之处吧！本书各文若幸有所获，悉来自各师的教导。当然，所有谬误之处，皆由我个人负责。

# 引论 希望与失望的转折：五四运动前一年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而结束。中国虽号称参战，其实只派出一些劳工，却因此而成了战胜国，国人颇有些喜从天降的感觉。北大文科讲师崔适当月赋诗志庆，其中一首说：“重瀛西去有威风，不费饕餮粮不折弓。战胜居然吾国与，大勋成自段新丰。”<sup>[36]</sup>梁启超当时也观察到，自欧战告终“喜报传达以来，官署放假，学校放假，商店工场放假，举国人居然得自附于战胜国之末，随班逐队，欢呼万岁，采烈兴高，熙如春酿”。<sup>[37]</sup>两人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居然”一词，特别能表述时人那种不战而胜的意外惊喜。

曾因鼓吹参战而被政敌诟骂的梁启超并不特别分享这“熙如春酿”的陶醉状态，他相当精准地指出，这一次“普天同庆的祝贺”，不过是“因为我们的敌国德意志打败仗”；<sup>[38]</sup>换言之，敌国被他人打败未必即中国真正战胜。但朝野放假欢庆的场面是实在的，很多人显然是真正地兴奋起来了。当时的北大学生许德珩晚年还记得那时“公理战胜强权”等口号“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的翻身了”。从1918年11月到1919年4月，“这一期间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而各种“名流们也勤于讲演”。<sup>[39]</sup>

胡适就是其中一位参加讲演的名流，他有着与许德珩相类的记忆。胡适说，当1918年11月11日“停战的电报传出之夜，全世界都发狂了，中国也传染着了一点狂热”，他自己也是那些狂热者中间的一个。<sup>[40]</sup>然而高兴的时间不长，如许德珩所说，“大家眼巴巴地企望着巴黎和会能够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哪晓得奢望的结果是失望”；绝望的后果则是众所周知的五四运动。<sup>[41]</sup>在胡适看来，“正因为有了那六个月的乐观与奢望，所以那四五月间的大失望能引起有热力的反动”；学生的行动固然是因为“大家都深刻的感觉那六个月的乐观的幻灭”，但“若没有那种乐观，青年不会有信心，也决不会有‘五四’、‘六三’的壮烈运动起来”。<sup>[42]</sup>

两位北大师生共同指出了兴奋或乐观的期间大约有六个月，也同样使用了“奢望”一词来指陈那狂热甚至疯狂情绪背后的期盼。尽管那时一般人很少看到青年的“信心”，胡适对那一系列活动的回忆在细节上也稍有小误，但他的事后分析是有所见的：如果没有前一阶段的奢望，后一阶段的绝望和幻灭感不会那样强烈。

对北伐前的民国而言，五四运动像是一个分水岭，将此前和此后的时代潮流大致区隔。过去较多注重“五四”带来的变化，但“五四”前夕中国社会各界从希望到失望的急剧转折，揭示了不少影响深远的面相。当时的政治和思想走向呈现出特别明显的内外缠结、由外及内的倾向，朝野新旧共同感觉到世界新潮流排山倒海般激荡而来，“过激主义”的流行伴随着上层知识精英的激进，以会议方式解决问题的尝试最终失败，学生作为一个社群在政治生活中逐渐兴起，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政治取向和政治行为，还可以进一步探索。<sup>[43]</sup>

本文侧重考察当时的读书人群体，拟采“见之于行事”的方式，希望如陈寅恪所云，在研求史料文本时“旁采史实人情，以为参证”；<sup>[44]</sup>即不仅写实，亦兼写意，在史事重建的同时，更从情绪和心态视角截取时人关注的重点，特别是那些带有倾向性而又往往为我们既存史学言说所忽略的面相，试呈现史事神韵之一二，<sup>[45]</sup>期对认识后“五四”时期的政治走向稍作铺垫。

## 1. 公理战胜的乐观

前引梁启超使用的“普天同庆”一语，相当传神地表述出大战结束后北京的欢庆场面。陈独秀眼中“万众欢愉”的场面是“旌旗满街，电影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东交民巷以及天安门左近，游人拥挤不堪”。<sup>[46]</sup>

北大学生张厚载看到“连日各方面欢呼庆祝，一片歌舞承平之声浪”；他自己“躬逢其盛”，也感到“莫大之光荣”。<sup>[47]</sup>而且这是一次民间推动、政府参与并与民间热情及时互动的庆贺活动。从11月14日起，教育部特令京中各校放假庆祝，由半天而延长到数天；中央政府本身也不落后，在总统府开大会庆祝，并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式。<sup>[48]</sup>

先是世界性的欧战协济会发起全球募捐，以解决军人和劳工的善后问题，并请中国参与。中国方面旋即由“有势力之中国士夫”组成欧战协济会中国委员会，以协和医学院的顾林（Roger S. Greene，中文名又作顾临）为会长。其《劝捐缘起》说，中国“对于欧战，迄未能大有力之处”，而此等捐助与派兵派工人等相类，“均足使外邦视中国民族，同起敬爱之心；且于和会时讨论关于中国所有利益问题，亦足以增加其民族代表之尊严”；故不仅乐善好施所当为，“中国为自谋起见，亦应慷慨输将”，对此捐助“倍加尽力”。<sup>[49]</sup>

在顾林和基督教青年会步济时（John S. Burgess）的具体推动下，北京学界定于11月14日（星期四）下午举行游街大会，“以助欧战协济会庆典”。这一本是捐款的行为实际变成中国方面庆祝战胜的一项活动，得到教育部大力支持，教育总长特允各公立学校放假半天以参加游街会，并在天安门附近搭建一高台，供检阅和演讲之用。而北大主动将放假时间延长为一整天，要求学生与会时“一律身著乙种礼服（袍子马



褂），以示整齐”。<sup>[50]</sup>

由于会议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北大决定延长停课，“要求教育部把此临时讲台，借给北大师生，继续演讲”两天。故15和16日两天，北大在天安门外单独举行了演讲大会。校长蔡元培两日均有演讲，而文理科学长等教授也都有演讲。据胡适的回忆，“演讲时间，每人限以五分钟；其实，每人亦只能讲五分钟，因为彼时风吹剧烈，不到五分钟，讲员的喉咙，已发哑声，虽欲继续，亦无能为力了”。由于演讲“大受听者欢迎”，北大进而决定利用政府和教育部当月28—30日举行庆典的机会，再次停课三天，参加中央公园举行第二次演讲大会，各科教职员和学生均可加入演讲。<sup>[51]</sup>

中央政府定于11月28日在总统府举行欧战胜利庆典，并在天安门行阅兵式。教育部大概也感觉前次游街大会效果甚佳，故决定各校派学生200人参与28日的庆典，而全体学生都参加30日的提灯大会。据说参加庆典游行的学校有60余所，至少上万人，是历来“得未曾有之盛况”。总统徐世昌马车入天安门时，围观之“商民及各校学生鼓掌欢呼，声如雷动”。28日晚中央公园所开演讲大会，“环绕会场者何止万人”，由众议院院长王揖唐主持，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代表徐世昌演说，总理钱能训和参战督办段祺瑞等要人也都有演说，尤其后者“引人奋发欢呼”到“其势若狂，此殆从来所仅见之景象”。<sup>[52]</sup>

北大对此活动的具体规定颇有意思：凡因参与阅兵式和提灯大会之筹备、演习者，缺课均“不记旷课”；而不参与提灯会演习者，则反“以旷课论”。<sup>[53]</sup>这类稍显反常的规定，与一再停课之举措，既体现出学界对“战胜”的兴奋和热情，也显露出因好消息来得突然而有些不知所措，甚或反映出某种因过去“参战”不力而急于对世界局势做出更多贡献的弥补心态。<sup>[54]</sup>积极参加庆贺的李大钊便在反思“学界举行提灯，政界举行祝典”的活动，多少有些“强颜取媚，拿人家的欢笑当自己的欢笑，把人家的光荣做自己的光荣”。<sup>[55]</sup>而陈独秀则明言不欲参加活动，因为他“觉得此次协约战胜德国，我中国毫未尽力，不便厚着脸来参与这庆祝盛典”。<sup>[56]</sup>

但多数人显然是喜出望外的，11月中下旬的北京已近严冬，在凛冽的寒风中站立高台之上，又没有今日的音响设备，还要让尽量多的听众实有所闻，的确会在短时间内就声嘶力竭。以每人五分钟的时间而能连续两次演讲数天，参与者的踊跃可以想象。如果胡适的回忆不错，当时蔡元培“兴致最高”，他“最热心、也最乐观”，正是他“向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约我们一班教授做了一天的对民众的‘演说大会’”，体现出这些知识精英“政治兴趣的爆发”。<sup>[57]</sup>

蔡氏为演讲定调说：“我们为什么开这个演说大会？因为大学职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点大学的教育，在外国叫做平民大学。这一回的演说会，就是我国平民大学的起点。”<sup>[58]</sup>胡适注意到，“这是他第一次借机会把北京大学的使命扩大到研究学术的范围以外”；从此“北京大学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带着我们都不能脱离政治的努力了”。

两周后蔡元培以校长身份解释北大何以用“连坐”方式惩戒缺席提灯会的学生时说：人是群性动物，不能孤立生存。像学校这样的小群，“不能外于较大之群之国家，尤不能外于最大之群之世界。世界之休戚，国家之休戚随之；国家之休戚，学校之休戚随之；学校之休戚，学生之休戚随之”。校外活动“无形之训练”，比三天的校内课程更重要，可使参与者“得以放开世界眼光，促起国家观念”。<sup>[59]</sup>这与那个一再强调大学仅是研究高深学术机关的蔡元培，显然有不小的差异。

北大校长这样公开号召学生走出校园，和国家、世界休戚与共，对后来的事态发展应有不小的推动。当时这些知识精英已相当激进，用北伐后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左倾”。在11月16日的演讲中，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并宣布：“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sup>[60]</sup>约两周后，李大钊在中央公园的演讲中重申“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他希望顺应世界潮流，“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sup>[61]</sup>

当然，在庆祝“战胜”时劳工地位的提升与中国参战者惟劳工这一事实直接相关，连康有为那时也说，“吾国参战之功，惟工人最大；则我国所争议之事，应以保护华工为最大事”。<sup>[62]</sup>但“劳工神圣”出自于蔡元培之口，仍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和影响力。<sup>[63]</sup>如胡适所说：“那‘普天同庆’的乐观是有感动人的热力与传染性的。这种乐观是民国八年以后中国忽然呈现生气的一个根苗，而蔡先生就是散布那根苗的伟大领袖。”<sup>[64]</sup>

胡适后来说，“这样热烈的庆祝协约国的胜利”，不一定意味着“我们真相信‘公理战胜强权’”。其实“我们大家都不满意于国内的政治和国际的现状，都渴望起一种变化，都渴望有一个推动现状的机会”。大战结局似为“一个世界大变局的起点”，我们“也想抓住它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起点”。这样的分析或不免稍过理性，而低估了时人那种由衷的欢欣鼓舞；但他反复说出的“渴望”却很能代表时人的感觉，毕竟他们“不免都受了威尔逊大总统的‘十四原则’的麻醉，也都期望这个新世界可以使民主政治过平安日子”。

乐观、兴奋甚至反常后面隐伏着对未来的无限希望，对多数人而言，“新世界”不仅指国外，他们也期待着国内局势随之好转。这些愿望表现在当时一系列的“新”名称之上，如新生命、新时代、新纪元等，具体说得最多的可能是新潮流，总起来当然就是“新希望”。

## 2. 新纪元和新潮流

“渴望起一种变化”的心情对近代中国士人来说可能太熟悉了，而世界大战的确提示了这样的可能性。严复早在1915年就预言说：“欧战告终之后，不但列国之局将大变更，乃至哲学、政法、理财、国际、宗教、教育，皆将大受影响。”<sup>[65]</sup>到战争真要结束时，类似的见解已相当普遍了。张东荪即说：“欧战将了，世界潮流一新，吾国之地位，亦渐由不确定而入于确定，是世界易一新生命，吾民族亦必易一新生命。”不过他审慎地表明，所谓“新生命”不过进化之一变相，并不“含可喜之意于其中”。<sup>[66]</sup>

同样持审慎态度的还有《晨报》社，该报以为，1918年可能是民国“开国以来最不祥之年”，其间“外忧内患，更起迭乘”，几无一事“足以稍慰吾人之希望”。但转折也已出现：“世界大战既终，国内争斗亦息，平和之声，弥漫大地。由此而新思想、新潮流、新团体、新事业风起云涌，气象万千；在世界开一新纪元，在吾国辟一新生命。果能顺应时变，力图自新，则起死回生之机，又未必不在今日。”当然，这么多的“新”不能是表面刷新而内容不变，更须防止“以新名目以行旧罪恶，以新手段达旧目的”。故“吾人之新希望”是“一洗从来旧染，实行表里革新”。<sup>[67]</sup>

“新希望”的基础何在？《晨报》的梁秋水可能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他说，“世界大战告终，和平会议开幕”，从欧洲到远东的“一切国际问题，胥将由此会议而解决之”。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国际平等、各民族自主等正大光明之宣言，“际兹千载一时，世界无论何种民族，皆得表示其民族之希望；我中华民族，抑何独不然。故吾人对于此空前绝后之和平会议，自不能不有相当希望”。他期待着“从此将入国际历史之新时代”。<sup>[68]</sup>与胡适等人一样，梁氏的希望与威尔逊相关联。

这一“新时代”显然更多是外在的或外来的，至少是时人所谓“世界”的。梁启超提出，“互助之精神，将为世界之新精神；世界文化，将由此辟一新纪元”。且这是一种与前不同的新互助，“非为私利，非为权力，而为自由平等博爱之协约与联合，为爱和平重公理之民族之协约与联合，诚人类互助之大进化也”。<sup>[69]</sup>

很多人从德国武力主义的失败看到中国国内和平的可能（详后），还有不少人从新纪元中看到了世界“大同”的希望。

蔡元培前述演讲中证明黑暗与光明消长的一个例子就是“种族偏见消灭，大同主义发展”。协约国一方为战争尽力的包括各色人种，因“义务平等，所以权利也渐渐平等”。而“美总统所提出的民族自决主义”已占胜利，最体现“大同主义发展的机会”。<sup>[70]</sup>与大同最接近的，即是拟议中的“国际大同盟”。梁启超“信其必为20世纪中最有光荣之产物”，<sup>[71]</sup>盖其“足以抑止强大国对于弱小国之政治的野心”，中国“自应表示赞成”并促成之，以“托于大国家团体之下，保其地位，图其发达，以求效用于人类社会也”。<sup>[72]</sup>他特别指出，国际大同盟既是“目前最有价值之新问题，而亦多年最有兴味之宿题”。<sup>[73]</sup>

“宿题”一词带出了与往昔的关联，梁启超说，“我国人向来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而谓必须有更高级之团体焉，为一切国家所宗主，即所谓天下”。故中国思想中所谓政治，“非以一国之安宁幸福为究竟目的，而实以人类全体之安宁幸福为究竟目的。此种广博的世界主义，实我数千年来政治论之中坚”。他乐观地指出：“论文明之极致，必以我国古代所谓大同主义为究竟。一切历史，无非向此极修远崇高之前路，节节进行。”欧战证明，“以武力消灭群小，使成一大”的手段已最后失败；则大同之实现，只能“以‘民约’的精神扩而大之，使各国由联合而渐成为化合”。所以，梁氏对“大同”的新解即是“人类全体大结合共同活动”。<sup>[74]</sup>

这样理解“大同”或更多是所谓“现代诠释”，他的老师康有为未必同意。但康氏那时也从国际大同盟看到了实现大同之可能，他兴奋地说：“此次议和，外之为地球大同之渐，内之为中国自由之机，天下古今大事，未有比于此次和议者也。吾昔二十七岁著《大同书》，期世界之大同，三十余年矣。不意今美总统威尔逊倡国际大会，欲令各国平等自由，以致天下太平，竟见实行之一日，欢喜距跃，不能言状。”<sup>[75]</sup>

康有为指出：“孔子立太平大同之义，轻于言治国，而重于言天下。”他以公羊三世说解释国际关系进程说，“内其国而外诸夏”的乱世讲究“国家学”，即“以己国为亲而视异国为仇，故日争夺异国之权利而杀刈异国之人民”；若欧美通过“国际联盟以求列国之和平”，则是“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升平世，然其对“教化未立”的野蛮小国，仍“不能一视同仁而欺凌之”；只有“今美总统威尔逊发国际大同盟之议，求世界之和平，令天下各国，无大无小，平等自由；此真太平之实事，大同之始基”。这才是没有夷狄、天下内外大小若一的太平世。他乐观地推测此“国际大会必成，而世界永久和平，可望至矣”。<sup>[76]</sup>

但康氏的乐观是有保留的，他区分升平世和太平世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于是否存在“夷狄”：凡因教化、政制等因素视他人（the other）为“夷狄”者，仍只是升平世而非太平世。故若“一国交涉之中有不能平等自由者，则必含愤蓄谋，以求必至于平等自由；若不得至，则不憚磨刀枕戈，以求其必至。若是，则和平裂矣”。其具体所指，即“欲救天下百国，先宜救吾中国”。原因很简单：“中国受列强侵凌，其不平等自由，盖亦甚矣！吾国人之深怒大愤，盖亦久矣！”若“吾国中有一事不平等自由者，则国际永久之和平必不得成”。

在这一点上，李大钊和康有为观念接近，他认为：“今日的Democracy，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组织，乃是世界的组织；这Democracy不是仅在人类生活史中一个点，乃是一步一步的向世界大同进行的一个全路程。”且“现在全世界的生活关系，已竟是脉络相通”：从前是德国的军国主义影响世界民主政治，今后亚洲若有一国行军国主义，“中国的民主政治，总不安宁”；反之，“我们的政局若是长此扰乱，世界各国都受影响”。<sup>[77]</sup>

因此，拥护民主政治的人，不能只管自己国内的事，“必要把世界作活动的舞台，把自国的Democracy



作世界的Democracy一部分去活动，才能有成功的希望”。他相信国际大同盟可以“蜕化而成”将来的世界联邦，具体即各国各洲先逐步改组成联邦，再进一步“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只有“把那受屈枉的个性都解放了，把那逞强的势力都摧除了，把那不正当的制度都改正了，一步一步的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才算贯彻了Democracy的真义”。

由小及大逐步形成“世界大同”是李大钊那段时间反复申论的主题，他也曾主张中国各阶层各社群先组成横的联合，直至“各行各业都有联合，乃至超越国界种界而加入世界的大联合，合全世界而为一大横的联合。在此一大横的联合中，各个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爱助，就是大同的景运”。<sup>[78]</sup>与此相应的新道德也趋向大同：“这次的世界大战，是从前遗留下的一些不能适应现在新生活新社会的旧物的总崩颓。由今以后的新生活新社会，应是一种内容扩大的生活和社会——就是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我们所要求的新道德，就是适应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之道德。”亦即“美化的道德、实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创造的道德”。<sup>[79]</sup>

其他一些人也思及大同，但没有康、梁、李那样乐观。陈独秀说，“现在纵然不说大同主义，不说弭兵主义，照德国战败的情形看起来，就算将来战争仍不能免，也不是军国主义军阀执政的国家能得最终胜利的”；盖“用兵力侵略土地镇压人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sup>[80]</sup>而国民外交协会干事陈介也认为，自欧洲会议提倡国际联盟，“此后虽非世界大同，而于国家与民族之区别，已不似前此之严”。<sup>[81]</sup>他们的具体关注各异，也不那么乐观，但都把大同视为一个未来的目标。

至少梁启超所说的以“互助”为基础的“新纪元”是那时不少人分享的观念。李大钊就说，1919年后的时代是“人类生活中的新纪元”，世界大战和俄、德革命的血好比一场大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1914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从前都说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现在“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今后更“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线如能打破，人类都得一个机会同去作工，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sup>[82]</sup>

李大钊眼中的“人心渐渐觉醒”与“世界革命”相关，取代战争的是“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以罢工为武器“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这“新纪元的曙光”表现为“要求人民的平和，不要皇帝，不要常备兵，不要秘密外交，要民族自决，要欧洲联邦做世界联邦的基础”。他断言：“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对“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而言，这曙光就像“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不过李大钊虽注意到革命的流血，他所说的“革命”基本是非暴力的“无血的社会革命”（详后）。

时人并不讳言革命，蔡元培在天安门首次演说中即提出，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把国内政治上一切不平等黑暗主义都消灭了；现在世界大战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他”<sup>[83]</sup>。总统徐世昌也有类似的想法，他认为协约国在这次战争中付出巨大代价，“所博得者，实不外一切思想之更新”。就像“法国革命以后，而自由平等之说大兴”一样，他预料“今后欧美学术言论，恐必有振辟突进之观”。中国也要引进西方“高尚优美之言论”，以“思想界之更新”而“为国运兴隆之左券”。<sup>[84]</sup>

两位晚清的翰林都提到法国革命，而北大学生罗家伦则看到“一股浩浩荡荡的世界新潮”正由西向东，“进太平洋而来黄海、日本海”，其“一定要到远东是确切不移的”。他明言，1917年的“俄国革命就是20世纪的世界新潮”。在此新潮冲击下，“现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凡所谓“潮”都是阻挡不住的，中国迟早会被“世界的新潮卷去”。<sup>[85]</sup>

罗家伦关于西来潮流不可拒的说法不必是他自己的创造，梁启超在清末论述“中国改革之动力，非发自内而发自外”时，就说“世界之风潮，由西而东，愈接愈厉。十八九世纪所演于欧美之壮剧，势必趋而集于亚东”。利而导之，则功成名立国家安；逆而拂之则身败名裂国家危。<sup>[86]</sup>李大钊稍后也说，德国人和日本人已经在讨论那不可阻挡的“社会革命的潮流”。这一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西方有宪政经验的国家，对此已早做准备。但他们“不是准备逆着这个潮流去抵抗他，乃是准备顺着这个潮流去迎合他”，尝试以“无血的社会革命”来避免“有血的社会革命”。<sup>[87]</sup>

罗家伦和李大钊的表述很有影响力，傅斯年就曾特别赞赏朝鲜独立运动那种“非武器的革命”：由于日本不许朝鲜人家藏武器，他们“只能发宣言书，开大会；口咬日本警察”。这精神“看起来好像愚不可及”，然而只要“世界的革命未已，这精神自必继续下去”；且“顺着这世界的潮流，必得最后的胜利”。<sup>[88]</sup>在湖南的毛泽东稍后一面欢呼“世界的大潮卷的更急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一面又“主张群众联合，向强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和‘无血革命’，以避免‘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sup>[89]</sup>

蔡元培先已说，“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决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只能“随大势而趋”。<sup>[90]</sup>类此关于世界新潮流只能顺而因应、不能逆反的主张也为很多人分享，《晨报》一位专栏作者说，“大战既终，19世纪文明告一段落，而20世纪文明方从兹发展。换言之，即世界由旧时代移入于新时代”。中



国“果欲为适应时势之国，我国民果欲为适应时势之国民，第一须求得有方针之教育，第二须其方针无背于世界之新潮，否则惟有自归淘汰而已”。<sup>[91]</sup>陈博生也认为，“自俄德革命以来，社会思潮为之一变”。他借日本人之口说：现代世界日趋民主这一“潮流行将波及东亚，大势所至，无可幸免。吾人不独顺受之，当进而欢迎之”。<sup>[92]</sup>

不过也有人试图抵御，陈氏稍后注意到，“近来‘危险思想’四个大字，忽然大流行起来。政府天天在那儿办防堵的事情，弄得满城风雨，大有不可终日之样子”。<sup>[93]</sup>时在成都高师读书的张秀熟后来回忆说，该校保守教员就对新潮流“如临大敌”，他们“天天叫嚷洪水猛兽，教课时间也要来个政治附加，做到他们的‘辞而辟之’。我班的主任教师龚煦春，给我们出了一道‘新潮流之捍御策’的作文题，要我们捍御”。<sup>[94]</sup>老先生在上课时不忘“捍御”，提示着其暗中或也阅读新杂志，反从一个侧面提示出新潮流的影响力。

西来的新潮流不仅在思想方面，黄郛和梁启超等人一直从不同角度提示国人，一旦欧战结束，原来无暇东顾的列强会将注意力东移到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形成难以逆转的实质性影响。另一方面，毕竟新潮流是西来的，一些知识精英试图溯流而上，到欧洲考察新思想；而巴黎和会对中国可说是命运攸关，很多人担忧中国被排斥于正在进行大改造的“世界”之外，欲顺应“国民外交”这一世界新潮而群趋巴黎，外交问题导致政治重心一度外移。故在列强注意力可能东移之时，不少中国人的注意力却在西移（这些内容当另文探讨）。

而新纪元所包含的一个主题，可能是时人最关注也最为后之研究者忽视的，就是梁启超等大力提倡的弭兵。据那时进入开封二中读书的郭廷以回忆，1918年“使我们学生很兴奋”并使“全国上下对国家前途都抱着莫大的希望”的事不止欧战告终，还有“徐世昌当了总统”。中学生们虽“不知徐世昌是何许人也，但知道他是翰林，是文人；美国总统大多是文人，现在中国文人居然也可以做总统，当然是可喜的现象”。而“文人总统当然是主张和平的，因此我们对徐世昌印象好极了”。<sup>[95]</sup>这又一次“居然”的使用凸显出1918年确实有些特别，也很能表现尚武时代“文治”的不易，文治的可能与对和平的企盼是相互关联的，确曾给不少人带来希望。

### 3. 对文治的憧憬

先是1918年夏，处于南北战争最前线的吴佩孚主动与对面的湘军联络，确立了局部妥协。不久吴氏更连续通电，反对段祺瑞提倡的武力统一，而赞成南北和议。在南北军事对抗之时，相对少壮的北洋军人吴佩孚公开反段，其实际意义和象征意义都不小。<sup>[96]</sup>其间的背景虽复杂，一个重要原因是直系冯国璋的代总统任期将满，因皖系反对而继任的可能性不大；而以声望和势力最可能继任的段祺瑞又遭到直系的强力反对，也难上任。两强对峙的局面最终导致双方都可接受的北洋老文人徐世昌出任总统，开启北洋时期一个特殊的阶段。

作文治总统的困难是明显的，徐世昌先是通电推辞，在各方劝进后于9月11日通电宣布同意就任。梁启超当即上书献策，其基本建议为二，一是旗帜鲜明地宣示裁兵，以因应“今日全国人所痛心疾首者”；二是从政治到借债的外交重心应由日本转向英、美、法。他提出，“古今成大业者，在善察群众心理而利用之”，盖“群众心理，政治家之空气也，可御之而不可婴”，而此时“察国内之空气既甚要，察国外之空气尤要”。<sup>[97]</sup>

梁氏分析说，当时“南北问题，战不能战，和不能和，形势已洞若观火”。徐之通电“于此不落边际，深为得窍”。但这还不够，必须有自己的主张“以新天下之耳目，系天下之希望”。最好“勿遽谋统一全国，先谋统一北洋”，此其“下手第一要着”；只要“能统一北洋，全国之统一可立而待也”。而统一北洋的方法在“能御之而不为所御”，具体即提出裁兵。“有此倡议，则空气一变；变而后可以有所乘”；若“不设法造成一种可御之空气，则坐成涸鲋而已”。

在梁启超看来，对拥兵自重的军阀，要像贾谊对付汉之诸侯王的建议，只能以“权势法制”处置，不宜再加以“仁义恩厚”。只有正式提出裁兵，“堂堂旗鼓播之于天下，以慑南北群雄之气而杜其口”，然后有调和可言。“必义正词严，示以非如此则吾不能为若辈主。阳刚之气一伸，或有所慑而就范”。且公开“宣明主义”，可“博中外之同情”，使“举国輿望增高十倍”；那些“跋扈将军，虽中或不悻，断不敢反唇相稽”。若其公然对抗，徐即不就职，彼亦难有人代。他强调，“此着实国家存亡、我公荣辱成败之绝大关键”。

且“自今夏西战场战胜后，世界形势大变”；今后外交形势，“非博英、美、法之信用，则国决无以自存”。一方面，“裁兵之举，我不倡之，欧战终后，各国必越俎为我行之，此无可逃避者也。不自动而被动，国不国矣”；另一方面，“今后财政仍非借债不办”，借债而“仍欲如一年来以东邻为外府”，也决不可行。曾任段祺瑞派内阁阁员的梁启超常被人视为亲日，但这次他显然看到了“世界形势大变”带来的新选择。

也曾提倡“尚武”的梁启超稍后公开反省说：中国人本以“爱和平、轻武力”著称，但“前清之末，鉴于他国武力之发达，亦思效之，而有练新兵之举。民国以来，益添增军队，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也”。后来发现“武力主义终不适合中国之国情”，故“今日中国人之所渴望者，为恢复其数千年偃武修文之旧主义”。欧战

结局提供了契机，“德国之武力主义完全失败，武力主义从此不适用；世界人心，皆已悔悟；今后各国，皆将偃武修文；中国毋庸恐惧，可以实行其主义矣”。<sup>[98]</sup>

他进而明言，过去“眩于德国、日本之骤强，欲效其轍”，致使强国这一“名义为武人所利用”，是“一切倣效之根原”。故“现在拥兵弄兵之人及将来谋拥兵弄兵之人，实我国民公敌，其运命与国家之运命不能并存”。如今“欧战将终，世界思潮剧变，即彼真正有力之军国主义，亦已为世界所不容”，中国那些“窃取名号以营其私”的“伪军国主义”更不在话下。“武人运命终必随欧战完结而消灭”已无疑问，问题在于“我国人自消灭之耶？抑外人代我消灭之耶？”<sup>[99]</sup>也就是他曾对徐世昌所说的“自动”或“被动”的选择。

胡适在天安门演讲的内容也是“弭兵”，他强调，这次协约国的大胜，“不是‘武力解决’的功效，乃是‘解决武力’的功效”。前者以为“武力强权可以解决一切争端。德国就是打这个主意的，我们中国也有许多人是打这个主意的”；后者则认“武力是极危险的东西，是一切战争兵祸的根苗”。现在各国主张的对付办法是“把各国私有的武力，变成世界公有的武力”；具体即各国“组织一个和平大同盟”，公举一个大法庭，“各国有关争论的问题，不许用武力解决”，而是送请此大法庭审判。如有不听法庭判决者，“由同盟各国联合武力去惩罚他”。<sup>[100]</sup>这类半带想象的表述那时相当流行，且均从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看中国军阀的末路，颇能反映社会的企盼。

徐世昌于10月10日就大总统职，前引梁启超的分析和建议既凸显了他将要面对的困难，也揭示了他眼前的机遇。当月25日徐就借助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建议发布了和平命令。11月欧战结束，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让全世界看到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希望。南北和议在各方推促下迅速进入实际操作阶段，终于次年2月20日在上海开幕。尽管“跋扈将军”的势力并不那么容易应对，外交重心由日本转向英、美、法更不简单，但中外两个和会的出现还是让很多人充满了希望。

徐世昌在见人谈话时，常不忘表示自己也曾“投身军务，历有年所”，早年就是“军界”之一员。<sup>[101]</sup>同时他更尽量建树自身的“文治”认同。

徐家的世交子弟张达骘后来回忆说，“徐为了迎合人民的心理，标榜自己是文治派，以区别于北洋军阀”。他定期与名流饮酒赋诗，研究书画，<sup>[102]</sup>也注意到新闻界这一近代新兴因素的力量。

用徐自己的话说，“戊戌以来，每次政治上变革之功，咸归于报章鼓吹之力”；当时“报纸在社会上之权威，颇有凌驾官吏之趋向”。<sup>[103]</sup>这并不全是面对新闻记者所说的客气话，这位文治总统确实希望动员和凝聚各种可能的社会资源来增强自己的力量。报纸当时就注意到，“东海就任以来，对于新闻记者异常注意”。先邀请京沪报界代表谈话，以示“尊重舆论之诚意”。又在总统府“特设接待新闻记者之机关，订于每星期二、五两日派专员接待各报记者”。<sup>[104]</sup>

新总统也多次利用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自己的政见，他提请记者注意战后即将召开的和平会议，因为“历来国际上种种悬案，其解决挽救，胥于此会议是赖”。虽“折冲之责”在政府，但舆论是“外交最大之后援；樽俎应付之所穷，端赖笔舌以为救济”。尤其“战后民族自决主义既已盛行”，他希望各记者能“提撕警觉我国民，劝勉扶持我政府，以贯彻吾国力保权利之主张”。<sup>[105]</sup>

徐世昌以为，“战后西洋社会之经济，必大有变迁”。各国会将原用于战事的资本“移以扩充社会，故战后社会主义之经济，必日见发舒”。这是中国的机会，“以吾国劳动之众多，原料之盈足，农产之丰饶，苟能使教育普及，常识日充，从致富强，宁云难事”。<sup>[106]</sup>在次年2月接见外国记者时，他强调，“余之目的乃欲特别注重实业及人民生计之发展；一俟实业振兴，则财政自必大有起色”。借欧洲、国内两个和平会议之东风，“中国国家必能重新改造，求得稳善地位，财政必能恢复原状。此为余之最大希望”。<sup>[107]</sup>

这样的政见的确表现出文治的特色，而新总统注重新闻界、研究书画的举措也具有正面象征；彼时作为道统代表的北大正有着新闻学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组织，都曾得到校长蔡元培的鼓励。<sup>[108]</sup>《晨报》在评论西人对徐世昌的观感时说，“中国文官为总统者，徐氏为第一人。徐氏生平服膺孔训，待人接物，和易近人”。虽其“短处在小心过甚，宽大失度，乏坚决之力”；然“喜纳人言，素不固执”，且“待友忠善，御下宽和，能与新旧两派人融洽，如欧美日留学生皆能与之结交”。<sup>[109]</sup>

不少人对徐的期许态度也正基于这“文官为总统之第一人”，据沈亦云回忆，当这位“提倡文治”的总统想借重其夫黄郛撰写《欧战后之中国》一书时，黄颇踌躇。严修对他说，徐“东海是民国第一次文人当政，无论如何他不至于主战，宜多输以新知识，促成其文治主张”。黄乃往北京助徐完成该书。<sup>[110]</sup>陈独秀也曾对“文治主义”有所期望，他说，“现时东洋各国的当局，像中国的徐总统，像日本的原内阁，都从文人出身，总算是东洋和平的一线光明，也就是东洋各国国民的真正亲善种子”。但若有“军阀出头推翻文治主义的当局，那时国民的亲善，东洋的和平，便成画饼了”。<sup>[111]</sup>

而且，这次文人政治的出现是在帝制尝试和“复辟”失败之后不久，对文治的憧憬可能依稀带回一些“民国”刚取代清廷时的那种积极向上的记忆，也可能唤起一些曾经的期待。彼时上层知内幕者或感觉新总统不过挣扎着尽量不作军人傀儡，不少研究者也凭借后见之明做出类似的分析；而下面一般人则对文人当政这一形式非常看重，也对文人总统可能起到的作用寄予厚望。

前引郭廷以的回忆就很能反映下层读书人的期待，他并说，“我们最不喜欢看到国家分裂，不喜欢内战，而徐世昌是反对南北战争的”。文人总统的和平命令印证了知识青年的愿望，在开封庆祝徐任总统的大会上，他们心里“充满了快乐”。随后欧战告终，“学生们又大为高兴，彼此大谈公理战胜强权，大谈威尔逊



如何如何主张，这一来世界各国可以平等了，至少我国可与日本平等了，不受日本人的气了，而世界也将保持永久的和平”。再加上南北即将和谈，“不仅国与国间没有战争，眼看国内也将和平统一，全国上下对国家前途都抱着莫大的希望”。<sup>[112]</sup>

这类“充满了快乐”的心情与北京庆祝“战胜”的愉悦遥相呼应，一般读书做官者的心态似乎也较宽松。在清代和民国长期为官的何刚德那时观察到，“近年景德镇瓷器盛行，大花瓶、大鱼缸尤为人所争购”。他感觉对这些人“无理可喻”，只能警告说：你们“买许多大瓷器，要想到革命时如何搬运”。<sup>[113]</sup>通常是乱世蓄黄金，盛世才玩器物。可知何氏虽不那么轻松，当时一般人感觉尚不错。

当然看到问题的也还有人在，李大钊较早就曾表示对“文治”的失望，他揶揄说：“武人专制的政治——也可以叫作武乱——已经把我们害得很苦。好容易有一位文治派的总统出来，挂了文治主义的招牌，吾侪小民以为一定可以有点希望了，一定可以免‘武乱’的痛苦，享‘文治’的幸福了。但是盼到如今，只看见了两件大事，就是秋丁祭孔，国庆日不阅兵。大概文治主义作到这样，也算是尽其能事了！”<sup>[114]</sup>但这只是小不满，且还是先有希望之后的失望。

真正损毁了“文治”形象的，仍与“新思潮”相关。在以蔡元培和林纾辩论为表征的新旧之争中，因教育总长傅增湘对北大师生鼓吹“离经叛道”过问不力，乃有参议员张元奇以对教育部提起弹劾案相威胁，一时盛传要封闭《新潮》杂志、驱逐北大的趋新教员等。<sup>[115]</sup>陈独秀先是引《中华新报》之语说：“大学校非所谓神圣之学府乎？今之当局者非以文治号召中外者乎？其待士也如此，呜呼！我有以知其前途矣。”继而他自己更指责说：“在段内阁武治时代，大学倒安然无事。现在却因为新旧冲突，居然要驱逐人员了。哈哈！文治主义原来如此！”<sup>[116]</sup>

文治主义而待士尚不如武治时代，“文治”的正当性就此大打折扣。章太炎先就表示对局势不乐观，他致某人函说：自己其实也希望“国事清爽，南北衡势”，但当时“论大法则不可言和，论人材则不可言战”。南北双方皆“一丘之貉”，若“中土果有人材能戡除祸乱者，最近当待十年以后，非今日所敢望也”。<sup>[117]</sup>可见太炎已看出徐世昌之才尚不足以“戡除祸乱”。还有更悲观者在，即前清京官梁济在大家最快乐的前夕以自杀警示国人。按梁济在清末曾得到徐世昌的赏识，而他在徐就任一个月后自杀，似表出他对新总统的文治不抱很大希望，至少此事未改变他对世道人心的失望。<sup>[118]</sup>

## 4. 对共和体制的失望

梁济自杀一事过去也曾为一些学者所论及，然多据《新青年》上陈独秀节录的梁济遗文抒发议论，林毓生是少数认真研读梁济文字的学者之一，他从中看到了“五四”时期道德保守主义内在的难局。艾恺（Guy Alitto）对梁济的讨论或最详细，然也略有误解。<sup>[119]</sup>因为梁济明言自己“系殉清朝而死”，当时和多数后来人大都由此认知其行为。不过，梁氏曾用了数年的时间来计划和安排他自己的弃世，他显然希望世人按照他之所设计来认识他的自杀，故应比过去更仔细地考察梁济遗言中想要表达的意思。从他反复的申述看，一个非常明确的主题是他对共和体制的绝望。

梁济一开始就说明，他“系殉清朝而死”，但又并非“以清朝为本位”，而是以其所学之先圣纲常和家传遗教为核心的“义”为本位。他进而说，“效忠于一家一姓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忠于世界”。换言之，他的自杀既是殉清又不止是殉清。这至少在技术层面是需要说明的，因为清非此时而亡，梁济自问“殉节之事，何以迟至数年”？又自己解释说，当初若死，“纯然为清朝亡国，目的太小”；他不能“糊糊涂涂牺牲此身”，要“看明世局弊害”，特别是“观察明白民国是何景象”，而后有所行动。<sup>[120]</sup>

最后一语才是关键。本来“中华改为民主共和，系由清廷禅授而来”。清之兵力非不能战，以不忍民生涂炭，乃“以统治权移转于民国。原谓此为最良政体，俾全国人民共得义安也”。假如“因禅让而得民安，则千古美谈，自与前代亡国有异”，似乎也可以不必殉节；倘若“徒禅让而民不安”，则“清朝即亡于权奸乱民之手”，就不能不殉了。梁氏七年来观察到的现象是，“南北因争战而大局分崩，民生因负担而困穷憔悴，民德因倡导而堕落卑污，全与逊让之本心相反”，故其结论是“清朝亡于权奸卖国”。<sup>[121]</sup>

在辛亥革命之前，梁济已看到“近十年来，朝野上下人心风俗败坏流失，至于不可殫述”。当时的的问题是“人敝”而非“法敝”，后者可更改制度以救治，前者只能“从品行心术上认真砥砺，使天下回心向善”。故“救亡之策，必以正心为先”。<sup>[122]</sup>正是在此基础上，他一度以为“革命更新，机会难得”，可借机舒缓社会矛盾。<sup>[123]</sup>虽说“国粹莫大于伦常”，不能轻易更改；但若使“全国人民真得出苦厄而就安舒”，则价值相抵，可以“不惜牺牲伦常以为变通之策”。这样，“辛亥革命如果真换得人民安泰，开千古未有之奇，则抛弃固有之纲常，而应世界之潮流，亦可谓变通之举”。<sup>[124]</sup>

他强调，共和与专制应该是平等竞争的关系，“因乎时世，各就其宜而用之”；而不必“作仇敌之势，互相嫉忌”。民国代清，“吾国开天辟地之新共和”乃是“数千年一改革之好机会”，若当政者能利用之以“为民造福”，便不“辜负清廷因爱民而牺牲大位之心”；反之，则“此番大举动”实得不偿失。<sup>[125]</sup>且“以本无共和程度之国，既已改建共和，不能反汗，惟有抱定不忍妨害社会共同生活之心”，视此“数千年改革之大机

会”为“可重可珍”，据“以民为主”的“共和之原理”，尽可能“稍分人民之痛苦，减轻人民之愤怒，勿授人民以革命之口实”，或“可以杜再来革命流血惨祸”。<sup>[126]</sup>

最重要的是，清廷之上还有更为根本的“中国”在；清既禅让，就是民国在代表中国。故“清国者，数百年一改之国也；民国者，我三古遗传万年不改之国也”。此语的确表述得不是特别清晰，<sup>[127]</sup>然意思还是很容易理解的。梁济以为，国之长远存在，必赖有立国之道，即“抔掬国民使不离析之一种信条”以维系之。从“中国立国之本根”看，曾经“断送清国”者，也“可以断送民国”。今“清国已亡，无须恋惜；民国未亡，若不重此立国之道，促使其国不国，岂不大可痛乎！”<sup>[128]</sup>

这里最后所说可能不国之“国”，就是超越于政治体制和统治实体变更之上的“中国”。或许梁济有着比同时代许多人更清醒的国家意识，下面引其文字中所说的“国”，很多时候是指这“三古遗传万年不改之国”，有时又是指此“中国”在那前后的阶段性表现实体“清朝”或“民国”，解读之时可能需要注意区分，只要不是特别不清晰，不再特别说明。

梁济以为，“欲使国成为稳固之国，必先使人成为良好之人”。<sup>[129]</sup>正义、真诚、良心、公道等“吾国固有之性，皆立国之根本”。他承认“清季秕政酝酿，风俗日媮”；若民国“有人提倡正义，注重民生，渐渐向好处做去，则世道有人补救维持，不至于黑暗灭绝”，他或可不死。“无奈民国以来，专尚诡谋，不由正义，自上下下，全国风行，将使天理民彝丧失净尽”，至“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若“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只有以身作则，“以诚实之心对已往之国”，望世人亦“以诚实之心对方来之国”。故其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唤新国之人尚正义而贱诡谋，然后旧国性保存一二”。此虽“可以谓之殉清，亦可以谓之殉中国”。<sup>[130]</sup>

梁济的弃世经过长时间的预备，他也预测了世人可能的各种反应，如“极端立新”的陈独秀等，必然会大骂他“头脑太旧、眼界不高、奴性太深、不知世界大势”等，惟因新旧“各有是非，我自甘心受之”；而他“最感激”的，是“中下级商贾乡农劳动穷苦诸色人等”，大多会“极口夸奖”其忠于清廷，其实“未知我心”；只有那些“注重须先有良好人民而后国可以立，不专靠死板法律以为治者”，才是“真能知我心者”。<sup>[131]</sup>

从其预测中“大骂”和“极口夸奖”这最为对立的两群体看，至少在梁济心中，当时趋新知识精英和大众仍疏隔甚远。上引最后一语则反映出梁氏对社会问题的观察相当深入，远过常人。他曾指出：“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攘利争名，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盖由自幼不闻礼义之故。子弟对于父兄，又多持打破家族主义之说者，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而云恃社会互相监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sup>[132]</sup>

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观察，“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的现象说明清季兴起的“打破家族主义之说”至少在城市趋新社群中已形成某种思想霸权，并衍化为有力的社会约束和自我禁抑，使督责子女成为“政治不正确”的行为，<sup>[133]</sup>而拱手将教育的责任委诸社会。在社会责任大增之日，却适逢思想和行为的“解放”大受提倡之时；社会本身或表述出的“社会舆论”似乎也不便太多干预所谓“私人行为”，于是约束的职责又让位于法律。如梁济所见，“今高谈法治，先使人放荡不加拘束，专恃法律万能，且曰自入轨道，即成大治”；与“先圣治国，必先使人有良心，又敬慎而成事业，所以纳民于轨物”的方式大相径庭。<sup>[134]</sup>

这样一种将培养教育“人”的职责一层层向外推移的走向，或始于清季的“毁家”之说，使“家庭”或“家族”成为代表“旧”的主要负面象征之一，形成中国“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大差异（这却不一定是受西潮影响，盖彼时西方社会中家庭并非负面象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现象，也产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法律即使在最理想的状态，也并无责任和能力来处理那些不到“作奸犯科”程度的社会问题。在民初“自我”得到大力揄扬的时代，却又实际流行着这样一种外向的逃避责任取向，不识者固安然无忧，看到问题所在的梁济却难得安宁，只好带着“世界会好吗”的疑问告别人世。<sup>[135]</sup>

从后见之明看，梁济弃世的时机选择实在不佳，几天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而结束。他的弃世并未达到其警世目的，甚至没能影响到多数人的愉快心情。但在多数人普遍乐观之时，也不应忘记还有一些人具有相当不同的心情。

其实从一开始报纸上就曾有一些相当审慎的言论，劝告国人不要抱过高的希望。<sup>[136]</sup>然而有时思想之禁抑不必皆来自高压，一片乐观之声无形中也删略了不那么如意的消息。2月间《晨报》一位署名作者讨论“威尔逊主义之胜利”，该文连载三日，而无一语涉及中国事，已是不妙的兆头。<sup>[137]</sup>3月中张东荪说他已经“好几天不评论时局了，实在是因为‘无可说’：说他太高，他不能如我的期望；说他太低，又似乎绝之过甚”，故不如不说。<sup>[138]</sup>与此同时，报纸也开始追索和声讨“卖国贼”（详另文）。这些都反映出部分人的感觉已逐渐向不妙过渡，但似未曾引起足够的注意，多数人还是充满了希望。

## 5. 余论：局势和情绪的逆转

可以说，即使在身历者的认知中，“五四”前一年所意味的实有相当大的差异。尽管章太炎早就不乐观，而梁济更看出了社会潜存的大问题，那一年的“民国”在不少方面看起来仍给人以企盼和憧憬的余地。正因前景似乎不错，更多人还是宁愿看到希望并寄予了希望，于是有次年的大失望。



在当时的中学生郭廷以记忆中，“民国七年年底，思想界仿佛在动了”。在《新青年》发行三年的基础上，“曾琦等筹办《救国日报》，言论激烈，影响青年颇大”；同年稍后《每周评论》出刊，其言论较《新青年》更激烈，“煽动性大极了”。<sup>[139]</sup>而当年还有一个正逐渐浮出水面的新动向，即学生辈的兴起。1918年初，傅斯年和罗家伦以北大“文科学生”的身份在《新青年》4卷1号分别发表《文学革新申义》和《青年学生》，显示出学生一辈不论思想和学养或皆不在老师辈之下，而行文之流畅似尚过之。

同年秋，与欢庆“战胜”和憧憬“文治”约略同时，傅斯年等开始筹办学生自己的刊物《新潮》，于1919年出版。<sup>[140]</sup>这份刊物再次表明弟子不必不如师，江南一位青年学生施存统便认为，当年风行的文学革命，“《新青年》虽早已在那里鼓吹，注意的人还不多”，这块“招牌也是有了贵志才竖得稳固的”。在他眼里，“民国八年有一件极好的现象，就是出了许多新的东西；这个新的东西，是实行一切革命的基础”。其中当然包括《新潮》，“唤起多少同学的觉悟，这真是你们莫大之功”。他把这一年看作“上学的时代”，各处同学“一天进步一天，这真是中华民国的大希望”。<sup>[141]</sup>

与青少年的充满希望相比较，成年人的乐观要审慎一些，《晨报》一开始就对“举国上下，方且嬉嬉昏昏于贺战胜、讲和平之空气中，以为从此无事，可以偃然各安其私”的现象提出警告：在外交上，中国此前“借以苟息于国际”的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这个局面“是否可以恢复不变？”在思想方面，欧洲“军国主义覆而社会主义大张”的趋势所向披靡，“吾国民之思想能力，是否能与之因应而受其益？”两者皆无把握。不过，尽管过去常有失望的经历，“希望之心，人情所不能自己”，且1918年末可望者“犹有几希之尚存”，故仍希望中国能从此“一洗从来旧染”。<sup>[142]</sup>

审慎者的希望已是这样的根本性大转变，很能体现时人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态。结果，如郭廷以所回忆：“巴黎和会有关山东问题的决定对满怀希望的国人不啻泼了一盆冷水。”曾经高兴的“学生们十分愤慨”，大家争看言论最激进的报纸，“每当一件不幸的消息传来后，我们同学就在操场三三五五、议论纷纷，大谈国家大事”，终随北京学潮而“动起来了”。操场既成“交换情报和意见的场所”，聚在那里的学生之心思自渐疏离于课业。信如郭氏所言，“五四运动实在不是偶然的”。<sup>[143]</sup>

以前梁启超曾自感情绪过热而思“饮冰”以降之，这次的“一盆冷水”则是外来的，且因乐观太甚而显得突然。前引许德珩所说“大家眼巴巴地企望着巴黎和会能够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是非常传神的描述。胡适后来也说，当年陈独秀和蔡元培这些“威尔逊主义麻醉之下的乐观者”带动“一般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也跟着他们渴望那奇迹的来临”。一旦坏消息传来，“这个大打击是青年人受不住的。他们的热血喷涌了”，结果是“一个壮烈的爱国运动”。<sup>[144]</sup>

梁启超次年反思道：“我们中国人一年以前期望国际联盟未免太奢了，到了如今，对于他的失望又未免太甚了。”当初“威尔逊一班人调子唱得太高，我们听着了，以为理想的正义人道霎时可以涌现，以为国际联盟这个东西就有锄强扶弱的万能力，不独将来的和平靠他保障，便是从前的冤抑也靠他伸理。其实天下那里有怎么速成的事”。<sup>[145]</sup>

希望霎时解决将来和从前的所有问题，正是那时很多人的共同心态。而“毕其功于一役”还不仅体现在时间的“速成”之上，时人根本是希望借欧洲战胜的东风，由外及内，一举解决中国的全部问题，从此进入大同境界。<sup>[146]</sup>这揭示出“五四”前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特点，即内外缠结：先是朝野群趋巴黎，思想、政治的重心外倾，旋由外转回内，舆论开始追索“卖国贼”，便是一个明显的转折。

由于乐观和兴奋更多是外来的，国内的希望也因外在因素而消逝。4月下旬南北众多军人通电反对军人干政，本显露出“文治”的一线光明，巴黎传来的消息旋即促起“五四”学潮，南北和议随后正式破裂。本来“外事”和“南方”两因素都是文人总统应付北洋实力派军人的有利武器，两皆不成功，其政治独立性乃大为缩减。或可以说，巴黎的噩耗连带着打破了对文治的希望，社会或舆论其实没给文治者多少表现的机会。

徐世昌先曾指出，中国不安宁的原因是“道德隳丧”，使“夺权竞利，视为固然；举国皇皇，嗜言政争”。若“乱象蕴酿，积久愈增”而形成大乱，致“民弃其业，乃益疾首于政治之不良，寝假遂有自主自为之念”。<sup>[147]</sup>尽管乱局尚未到严重影响民生的程度，更为敏感的读书人对内外两和议的不如人愿已有强烈的反应：整体上表现为对政府甚至政治的失望，学生运动使前此一度大受关注的“个人”开始淡出，转朝强调群体的方向发展；同时，一些人进而探索“文化”方面的深层变革，一些人则转而面向“社会”的改造。<sup>[148]</sup>这些倾向之间不是没有紧张，更多或是在冲突中互动，开启了后来许多变化。

梁启超稍后总结说，时人因民国以来“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旧心理决不能适应新制度，乃“要求全人格的觉悟”。<sup>[149]</sup>徐世昌当时就主张，对不良政治的“箴救之道，首在转移风气，使国中聪明才智之士，从事于社会经济实业教育，以挽此政争狂热之潮流”。<sup>[150]</sup>这一分析与梁济的思虑相通，即政治的乱源在思想社会，也当从思想社会着手解决。

傅斯年那时也指出，民国“政治上已成‘水穷山尽’的地步”，正因“思想不变，政体变了，以旧思想运用新政体，自然弄得不成一件事”。现在应有“根本的觉悟”，即政治“形式的革新”是不中用的，必须先有“精神上的革新”。他断言，“物质的革命失败了，政治的革命失败了”，只能让位于思想革命。只有“以新思想夹在新文学里”，才能刺激、感动民众，故“未来的真正中华民国，还须借着文学革命的力量造成”。那时他心中的楷模正是“以文人做肥料去培养的”俄国革命。<sup>[151]</sup>

这一反思是在“五四”前夕，随后的学生运动可能改变一些人的思想，而倾向于思想以外的努力。值得

注意的是傅斯年把民国“政治昏乱，四方割据”的现象归咎于孙中山、章太炎和梁启超这些过去“革新的主动人物”一直在用历史上的“遗传思想”来造民国。这里的潜台词是明确的：时代变了，那一代人已经落伍。学生辈的兴起伴随着充分的自信，当时相当活跃的王光祈宣布：“世界的新潮流已经崩山倒海的来了，要想适应这新潮流，自然是全靠我们青年。”<sup>[152]</sup>

从这一视角看，蔡元培在兴奋之余一反常态地公开号召学生走出校园，去和国家、世界休戚与共，对学生的外向性活跃应有不小的推动。欢庆战胜这样一种大型的学生活动，在许多方面为后来的五四运动进行了预备。胡适已指出：“数万学生结队游行，……手执红灯，高呼口号，不可谓非中国教育界第一创举。影响所及，遂为以后的五四运动下一种子；故虽谓五四运动直接发源于此次五六万人的轰轰烈烈的大游行，亦无不可。”<sup>[153]</sup>此言不无所见，至少在组织公众演讲和游行等方式上，此次活动可为后来的学生运动所借鉴。

北大学生对示威游行当然不陌生，1918年5月，北大等学校学生两千多人因抗议中日秘密军事协定而有示威游行，许德珩认为其在组织不同学校学生形成联合阵线方面积累了经验，是“中国学生第一次的游行请愿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前奏”。<sup>[154]</sup>周策纵在其关于五四运动的书中专列一节来讨论这次两千人的游行，而仅用一段文字简略提及了11月那次他说有六万人参加的游行，可见他更赞同许德珩之说。<sup>[155]</sup>

三次活动互有异同，两次5月游行的共性是抗议，然规模则相去较远（“五四”当天虽也不过数千人，然运动是在持续中扩展的）；1919年的学生运动与前一年11月的学生游行规模和方式相近，且同与世界大战的结束相关，但情绪却截然相反：前次对“公理战胜”充满了希望，后来则出于对巴黎和会的极度失望，反映出时人对“公理战胜”的虚幻意味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sup>[156]</sup>

大失望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西方的分裂”，最明显的是以前的尊西先锋梁启超突然质疑西方文明；这里未立刻引起根本的转变，但此后所有说西方好的人不能不有所界定，有所选择，不能不略示保留。<sup>[157]</sup>起初中国人对西方的分化不甚了然，但张奚若看出了差别，他提醒胡适说，中国“官府人民一齐庆祝联军胜利，令人赧颜”。尤其《新青年》等“谓公理战胜强权，以后世界将永远太平，令人叹其看事太不critical。德、奥之败，谓败于Bolsheviki之公理或威尔逊之公理则可，谓败于英、法、日、意之公理则不可，以英、法、日、意之公理与德、奥之公理无大别也”。<sup>[158]</sup>

的确，威尔逊和列宁各自提出了国际秩序新观念，在不同程度上都反对既存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威尔逊的“背叛”基本结束了美国在华前所未有的美好时光，时在中国的杜威有深切体味，他在6月初说，“余此次来京，适逢学界学潮扩大之际，不能充分讲演，起初不免寂寞，但现在深觉中国学生不特能教训自己，并且能教训他人，实在可以不必我多讲演了”。<sup>[159]</sup>这话恐怕语带双关，既表述了对学生的支持，也认识到学生那越来越强的“自主”意识，并预示了他自己和稍后来华的罗素要挽回英美影响的困难。

那些实际形成中国“舆论”的读书人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困境：美国的背叛凸显了“公理战胜”的虚幻，对山东的处置则是“实际”而短期内无法挽回的；日本基本已成潜在的敌人，英国在退缩，法国时常独立，有着特别吸引力的新俄简直不容你不接近。新俄所奉行的“主义”本来自西方，在很大程度上又表现出对西方文明的否定，这样的思想最符合西方分裂后中国思想界的民族主义情绪，遂出现“从威尔逊到列宁”的转变；<sup>[160]</sup>这既是一个直接的象征，也有明显的政治后果（如“反帝”越来越成为中国权势竞争中“政治正当性”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其带来的深层心态变化更加广泛持久。

在巴黎和会之前，与法国大革命并论的多是协约国战胜，前引蔡元培、徐世昌的演说可为例证；“五四”以后，与法国大革命并论的基本是苏俄的革命，且多认为后者更代表世界新潮。<sup>[161]</sup>更重要的是，1919年初报纸可见两大主题，一欧洲和会，一南北议和；两皆尝试以会议谈判方式解决困局，最后两皆失败。故不仅在思想上“公理战胜”已成幻影，在行为方式上“开会讲道理”一途也被证明行不通，终以力量和行动的取向胜出。会谈不能解决问题的认知在新的层面上强化了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旧说，<sup>[162]</sup>对时人的影响相当长远。

在大同和互助同为时人所憧憬之时，激进与和缓两途本是个竞争的局面，若和缓一途可以有效，固为人所乐从。《晨报》一位署名评论人论大战后欧洲复辟、过激与温和三种思想之竞争说：与新潮对立的复辟派且不论，从效果言，则“推翻旧来之思想习惯，打破目前之一切现状，使国民共向于觉醒之途，非过激派不为功”；但“其主张过倾于理想，于多数心理、社会习惯、国家利害多不适合”。若温和派，则“其主义必为进步的，其手段又必为秩序的，非如复辟派之不适于新潮，又非若过激派之过远于事实，为最易于吸取同情以收拾时局”，并“依据新主义以建设新国家”。<sup>[163]</sup>

刘勉己也特别推崇德国那种由国家来“奖励劳工，集中资本，以救民生之困穷，而资商战之准备”的“稳健的社会主义”，盖其“与列宁倡道之国际社会主义不同，而与英美式之社会主义亦又有别”；既不致复演“法兰西百年间革命之惨剧”，也可避免因自由竞争而“致资本阶级之跋扈”。<sup>[164]</sup>上海某西报评论说，“以中国今日之现象而论，国人于军阀派外，似有任得一替代之者而不遑分辨之势”。然而，本来苏俄“过激派之鼓吹运动，最易普及于被压迫之人民”，更因“北京军人派之压制”，则苏俄过激思想很可能迅速在中国蔓延。<sup>[165]</sup>

陈独秀当时的《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颇具象征意义，他说，国内的南北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而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公理、永久和平及威尔逊的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



话”。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让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是靠不住的，“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sup>[166]</sup>

很明显，对内对外的同时失望是走向“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的重要原因。稍后毛泽东也提出，国外“各种‘同盟’、‘协约’，为国际强权者的联合”；中国“什么‘北洋派’‘西南派’”等，是“国内强权者的联合”；这类“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使“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不能不以“民众的大联合”来改革和反抗。<sup>[167]</sup>两人此时或尚无明确的暴力革命意识，但也为时不远了。

鲁迅曾回忆起民元之时的光明，那时他“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但到民国二年之后事情“即渐渐坏下去”。傅斯年也形象地描述了“民国元二年间像唐花一般的‘怒发’，和民国三四年间像冰雹一般的摧残”。

<sup>[168]</sup>可知民国代清不过两三年，就曾引起士人的失望。对于帝制甚或“复辟”的尝试，或许提示出一种向传统寻求思想资源的倾向，而“复辟”的失败恐怕也连带着影响了传统在此后的命运和作用。前面说过，对文治的憧憬可能依稀带回一些“民国”代清时那种积极向上的记忆，唤起一些曾经的期待，而随后的内外大失望很可能意味着对民国整体失望的进一步强化。

恽代英在1919年国庆日承认，人们脑海中对民国“装满了不良的映象”，遂有人以为时局糟糕是革命引起的，其实这是妄想太过后的失望，盖许多人过去“以为只要光复，只要民主，便可以糖馒头从天而降”。

<sup>[169]</sup>傅斯年在“五四”周年时也说，以前听到威尔逊的十四条里有民族自决一项，“以为真是世界光明的日子到了，谁知后来一大失望”。他撰写该文时“说不出心理有多少头绪，越想越难过”。<sup>[170]</sup>他的同学吴康发现，人人都“时时觉得他四围的环境”呈出“一种不满人意的现状，这种不满意的心理就是要求改造的原动力”。<sup>[171]</sup>

徐志摩稍后慨叹道，“这年头，这世界也够叫人挫气！”好容易从“冷落极了的梦底里捞起了一半轮的希望”，就像从山谷里采得了百合花，周围却“没有安希望的瓶子，也没有养希望的净水；眼看这鲜花在你自己的手上变了颜色，一瓣瓣的往下萎，黄了，焦了，枯了，吊了，结果只是伤惨！”<sup>[172]</sup>他所使用的“世界”与梁济相类，基本不是地理意义的，大致或是社会或世间的同义词，但很多中国人在很长的时间里的确是把“世界”理解为“非中国”的，它在很多时候就是“西方”的代名词，至少也是以西方为核心的“非中国”区域。

“五四”前夕这一期间可能是“海通”以来中国人最把自己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而巴黎和会的结果告诉他们，“世界”的确是一个外在的区域：在中国以外的“世界”，特别是与西方关联密切的部分，公理战胜大体还有明显的体现；而中国仍是国际政治中一个特殊的“例外”，亦即入江昭（Akira Iriye）所说的“世界政治中远东的隔绝”。<sup>[173]</sup>如果多少存在着正义和公理的那个“世界”不包括中国，中国就不能不寻求接近甚或建立一个新的共同体，且可能是一个否定当前“世界”的新世界。

对世界的新认识与心绪转变直接相关，从希望中的轻快逆转为失望后的沉重，即属陈寅恪所说可“旁采”以为参证的“人情”。前所未有的意外惊喜使很多人产生了名副其实的奢望，尤其一些知识精英的举措一反常态，推动和促进了他人无根的乐观，于是有接下来的极度失望以及因此而起的激烈行为。后来心绪较平静的胡适说，“今日最悲观的人，实在都是当初太乐观了的人。他们当初就根本没有了解他们所期望的东西的性质”，却“以为可以在短时期中就做到那种梦想的境界”。一旦“奇迹”并不降临，“他们的信心动摇了，他们的极度乐观变成极度悲观了”。<sup>[174]</sup>

自清末以来，这样一种从希望到失望的急剧转折持续而重复，曾经考验了许多中国士人的承受力。蒋廷黻在“九一八”之后说：“在戊戌、民元、民十六诸年，我们都曾过了短期的改革蜜月，好像新天新地已在目前。现在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海上蜃楼。……我们革命疲了，战争疲了，失望疲了。”<sup>[175]</sup>连“失望”都疲了！这是何等沉重而无奈的慨叹。蒋氏那时意在政治，常代政府立言，故所谈不及五四运动。其实“五四”前一年虽没有类似戊戌、辛亥和北伐这样的政治变革，士人“奢望”的程度却决不弱于那几次，复因历时甚短而失望来得突然，其后的幻灭感或更强烈。

陈寅恪曾说：“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sup>[176]</sup>其实不仅学术影响世局转移，人情心态亦然，且其造成的变化未必出自参与者的主动。杜威在1928年游俄时，就特别重视俄国革命的心灵和道德层面，强调革命所解放出的活力、勇气和自信，或并非参与者努力所致，也远超出他们起初所能想见和希望的。<sup>[177]</sup>他的学生冯友兰后来说，“历史上一个大运动之发生，主持的人，对于他所主持者是怎么一件事，往往有不自觉的”；主事者或为环境所迫而不得不如此，事后回想，才发现“我们原来作了这们一事情”。<sup>[178]</sup>

“五四”前一年士人的心态变化及“五四”本身所促动的世局转移，或当从此观察。不过，特定时空的失望和不满在多大程度上是实际的，在多大程度上是“想象”的，还很值得考究。有时要经过比较才有更真切的认识：<sup>[179]</sup>很多读书人可能要到北伐后领略了国民党“党治”下的“训政”，才慢慢知道北洋时期的统治还是相对宽容的。国人此后的希望和失望仍在继续，然似乎少见士人回忆1918那曾经充满希望的年代，不知他们是否意识到后来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己推动、支持而造成的，也许这就是致使他们“不想”回忆的下意识？



## 注 释

- [1]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1923年6月），《闻一多全集》（2），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14—115页。
- [2] "John Dewey from Peking," June 1, 1919, in John Dewey and Alice C. Dewey, 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 ed. by Evelyn Dewey, New York, 1920, p. 209.
- [3] Paul S.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22, p. 373. 徐中约显然同意杜威等的看法，他以为五四运动标志着作为一种“新力量”的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出现”。Immanuel C. Y. 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605.
- [4] 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约1919），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承王汎森所长惠允使用（此文早期整理稿曾刊发于《中国文化》第14期，196—201页，有缺漏）。
- [5]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3年2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45页。
- [6] 参见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43—45页。
- [7] 冯友兰当时区分新学生与旧学生的标准颇能体现这类倾向，他认为“新学生之生活为群众的，旧学生之生活为单独的”；且“新学生注重实际，旧学生注重空谈”。冯友兰：《新学生与旧学生》（1918年9月），《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卷，621—662页。并参见本书《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认识》中关于“行动的时代”之讨论。
- [8] 本段与下段，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约1919）。
- [9] 参见王汎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中国文化》第14期（1996年12月）。
- [10] 前人之“国家”观较严，梁启超在清季便曾区分朝廷与国家，而民初人也常区分政府与国家；而今人则放得甚宽，乡村中包揽税收者颇近往昔之夫役，也多被视为国家代表。
- [11] 郑振铎：《〈新社会〉发刊词》（1919年11月），《郑振铎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3—4页。
- [12] 熊十力：《英雄造时势》，《独立评论》第104号（1934年6月10日），11页。
- [13] 时人的相关思考可参见吴康：《从思想改造到社会改造》（1921年1月），《新潮》3卷1号（1921年10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25—52页。
- [14] 《胡适日记全编》（以下简作《胡适日记》），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933年12月22日，第6册，256—257页。
- [15] 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1926年1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460页。
- [16] 参见鲁萍：《“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的关怀——从“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运动时期道德革命的走向》，《历史研究》2006年1期。
- [17] 关于北伐，可参阅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新史学》5卷1期（1994年3月）。
- [18] 张继致《新潮》杂志，1919年4月29日，《新潮》，2卷2号（1919年年12月），366页。
- [19] 罗家伦复张继，1919年11月8日，《新潮》，2卷2号（1919年12月），366—367页。
- [20] 参见本书引论。
- [21] 罗家伦致张东荪，1919年9月30日，《时事新报》，1919年10月4日，3张4版。按原信未署年月，此据报纸时间及信中说“现在大学已开学”推断。
- [22]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采取的方针》（1920年5月1日），《新潮》2卷4号（1920年5月），858—861页。
- [23] 杨鸿烈：《为新青年社的老同志进一解》，《晨报副刊》1924年2月4日，1版。
- [24] 孙逊收入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适文集》（以下径引书名），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册，361—362页。
- [25] 《胡适日记》，1921年6月30日、6月25日，第3册，346、334页；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集》，第3册，366页。
- [26] 若愚：《学生与劳动（四）》，《晨报》，1919年2月28日，7版。
- [27] 《北京之五四纪念会》，《教育杂志》15卷5号（1923年5月20日），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影印，21693页（原杂志每期末统一编页）。
- [28]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闻一多全集》（2），110页。
- [29] 朱自清：《动乱时代》（1946年7月），《朱自清全集》（3），朱乔森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115页。
- [30]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闻一多全集》（2），111页。
- [31] 梁启超：《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1922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26—27页。
- [32]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1923年），《胡适文集》，第3册，14—15页。
- [33] 本段与下段，梁启超：《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27页。
- [34] 章太炎1924年指出当时史学的五项弊端之中，就有一项是“审边塞而遗内治”，说详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4期。
- [35] 思想史和社会史在今日西方均已呈衰落之势（关于社会史可参见周锡瑞：《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20世纪中国史》，《中国学术》第1辑，2000年春），而学术史似从未成为西方史学的重要门类，故学术史在中国兴起的动因恐怕更多要从内部寻找，且不排除其体现着对民国代清以后经学被摈弃的某种反动，虽然未必是有意识的。
- [36] 崔适：《协约战胜志庆诗四首》之三，《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5日，4版。
- [37] 梁启超：《对德宣战回顾谈》（1918年），《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夏晓虹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30页。
- [38] 梁启超：《欧战结局之教训》（1918年），《饮冰室合集·集外文》，756页。
- [39] 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19页。
- [40] 胡适：《纪念“五四”》（1935年4月29日），《胡适文集》，第11册，576页。
- [41] 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我所用的是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合订本，下同），第61辑，19页。
- [42] 胡适：《纪念“五四”》，《胡适文集》（11），578页。
- [43] 追溯“五四”渊源的研究其实已经不少，各种五四运动史都涉及之，而最直接的有陈万雄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然对这一“近因”多点到为止，仅彭明的《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所述稍详（244—250页，其中还有两页是讨论威尔逊的“十四条”主张），更具体的论述似尚不多见。徐国琦关于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关系的新著有专章讨论巴黎和会及中国人对新世界秩序的探寻，参见Xu Guoqi,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44-77. 卫金桂的《欧战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研究》（香港拓文出版社，2003年）专论一战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此书虽是据作者2001年毕业的博士论文改写，然表述风格相当独出心裁，全书与既存研究基本不发生关系，除转引史料外几乎未见引用近二三十年的论著，连列在参考书目中作者导师的相关论文也未见一引。
- [44] 陈寅恪：《“蓊丘之植，植于汶澶”之最简易解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62页。
- [45] 金毓黻曾说，“论学首贵析理”，而论事则“需兼及情与势；情淡而势合，施之于事，无不允当也”。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20年3月18日，辽沈书社，1993年，第1册，11页。

[46] 陈独秀：《克林德碑》（1918年），《陈独秀著作选》（以下径引书名），任建树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卷，409页。

[47] 廖子：《最近北京剧界之乐观》，《晨报》，1918年12月1日，7版。

[48] 《连日庆祝战捷之盛况》，《晨报》，1918年12月1日，3版。庆贺当然不止在北京，如“开封举行庆祝世界和平大会，参加的学生兵士有三千多人”，会场上不乏“重见青天，载歌载舞；奠世界和平于万年”一类非常乐观的祝词。参见张朋园等：《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以下径引书名），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7年，83页。

[49] 《欧战协济会劝捐缘起》，《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12日，2—3版。

[50] 参见《顾、步二君为欧战协济会事致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13日，4版；《本校布告》，《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13日，1版。

[51] 胡适：《五四运动纪念》（1928年5月4日），《胡适文集》（12），1998年，724—725页；《本校将举行第二次演讲大会》，《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2—3版；《本校特别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1版。

[52] 按参加人数各说不一，《晨报》说约万人，《大公报》说约三万人，还有说达五六万人者。见《北京学界游行会志盛》，《大公报》，1918年11月15日，1张；《庆贺协约国战胜大会参观记》，《大公报》，1918年11月30日，1张；《中央公园之国民庆祝大会》，《大公报》，1918年11月30日，1张；《连日庆祝战捷之盛况》，《晨报》，1918年12月1日，3版。

[53] 《未来之庆贺协约国战胜大会》，《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2日，3—4版；《本校布告》（数件），《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1版。而且，北大对学生缺席以“连坐”方式惩戒之，即并不点名，“仅记何班是否全到。苟有规避不到者，请本班同学自检举之，然后施以相当之惩戒”。参见蔡元培：《对北大学生全体参与庆祝协约国战胜提灯会之说明》（1918年11月），《蔡元培全集》（3），高平叔编（以下径引书名），中华书局，1984年，224页。

[54] 中国朝野稍早对于是否“参战”曾较大的争议，那固然受国内政争的影响，但也表现出一种相对隔膜的心态；今日表述为“世界大战”的这一战事，在当年基本是以“欧战”呼之，显然更多视为“他人之事”。在这段时间中，一些人已开始用“世界大战”来取代“欧战”。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说，这次“战胜居然吾国与”拉近了中国与“世界”事务的距离。

[55]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2月），《李大钊文集》（2），李大钊研究会编（以下径引书名），人民出版社，1999年，241页。

[56] 陈独秀：《克林德碑》（1918年），《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409页。

[57] 本段与下段，胡适：《纪念“五四”》，《胡适文集》（11），576—578页。

[58] 蔡元培：《黑暗与光明的消长》（1918年11月），《蔡元培全集》（3），215页。

[59] 蔡元培：《对北大学生全体参与庆祝协约国战胜提灯会之说明》，《蔡元培全集》（3），223—224页。

[60] 蔡元培：《劳工神圣》（1918年11月），《蔡元培全集》（3），219页。

[61]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1918年11月），《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6日，4—5版。

[62] 《康有为致陆徵祥书》，《康南海最近之言论》，《晨报》，1919年1月9日，3版。按李永昌已指出“劳工神圣”口号与参战劳工的关联，参见其《觉醒前的狂热——论“公理战胜”和“劳工神圣”两个口号》，《近代史研究》1996年4期。

[63] 许德珩便很记得“蔡元培校长也在天安门前广场搭起台来，讲演‘劳工神圣’”。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19页。

[64] 本段与下段，胡适：《纪念“五四”》，《胡适文集》（11），576—578页。

[65] 严复：《与熊纯如书》（1915年3月4日），《严复集》，王栻主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3册，619页。

[66] 张东荪：《新生命》，《时事新报》，1918年11月7日，1张1版。

[67] 《送岁词》，《晨报》，1918年12月31日，2版；《祝新》，《晨报》，1919年1月5日，2版。

[68] 梁秋水：《庚子赔款问题（一）》，《晨报》，1918年12月1日，2版。

[69] 梁启超：《在协约国民协会之演说词》（1918年），《饮冰室合集·集外文》，799页。

[70] 蔡元培：《黑暗与光明的消长》，《蔡元培全集》（3），218页。

[71] 梁启超：《为请求列席平和会议敬告我友邦》（1918年），《饮冰室合集·集外文》，725页。

[72] 梁启超：《欧战议和之感想》（1918年），《饮冰室合集·集外文》，728页。

[73] 梁启超：《国际联盟与中国》（1918年），《饮冰室合集·集外文》，742页。

[74] 梁启超：《国际联盟与中国》，《饮冰室合集·集外文》，743—744页。

[75] 本段与下两段，《康有为致陆徵祥书》，《康南海最近之言论》，《晨报》，1919年1月9日，3版；《康南海最近之言论（二）》，《晨报》，1919年1月12日，6版。

[76] 按康氏口中的“国际联盟”当为一般所说的“协约国”，而其所谓“国际大同盟”才是另一些人所说的“国际联盟”。

[77] 本段与下段，李大钊：《〈国体与青年〉跋》（1918年12月），《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1919年2月），《李大钊文集》（2），248、269页。

[78] 李大钊：《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1920年1月），《李大钊文集》（3），165页。

[79] 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12月），《李大钊文集》（3），116页。

[80] 陈独秀：《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1918年12月），《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431页。

[81] 《国民外交协会讲演会补志》，《晨报》，1919年3月8日，6版。

[82] 本段与下段，李大钊：《新纪元》（1918年12月），《李大钊文集》（2），249—251页。类似观点他至少坚持了半年，参见其《阶级竞争与互助》（1919年7月），《李大钊文集》（2），335—337页。

[83] 蔡元培：《黑暗与光明的消长》，《蔡元培全集》（3），216页。

[84] 《总统对新闻界演说（续昨）》，《晨报》，1918年12月2日，3版。

[85] 罗家伦：《今日之世界新潮》（1918年11月），《新潮》1卷1号（1919年1月），19—23页。

[86] 梁启超：《敬告当道者》（1902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29页。

[87] 李大钊：《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1919年2月），《李大钊文集》（2），270—273页。

[88] 傅斯年：《朝鲜独立运动中之新教训》（1919年），《新潮》，1卷4号（1919年4月），687—688页。

[89] 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湖南出版社，1990年，292—295页。

[90] 蔡元培：《黑暗与光明的消长》，《蔡元培全集》（3），218页。

[91] 以芬：《欧战杂感（六）》，《晨报》，1918年12月23日，2版。

[92] 渊泉（陈博生）：《警告守旧党》，《晨报》，1919年3月30日，3版。

[93] 渊泉：《什么叫做危险思想？》，《晨报》，1919年6月29日，3版。

[94] 张秀熟：《二声集》，巴蜀书社，1992年，409页。

[95] 《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82页。

[96] 参见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年，47—48页。

[97] 本段与下三段，《梁启超上徐世昌呈并函》，1918年9月15日，收入郭长久主编：《梁启超与饮冰室》，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65—67页。按该文由林开明点校，汤志钧复核，然仍有误：其63—64页有影印原文，惟画面极小而看不甚清，据以改数字。薛刚的硕士论文《梁启超与五四运动》（清华大学历史系，2005年）先引用了此文。

[98] 梁启超：《在协约国民协会之演说词》，《饮冰室合集·集外文》，799—802页。

[99] 梁启超：《与〈国民公报〉记者问答纪》（1918年10月），《饮冰室合集·集外文》，722—723页。

[100] 胡适：《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1918年11月16日），《胡适文集》（12），711—713页。

- [101] 《总统对外国记者之谈话》，《晨报》，1919年3月3日，2版。《补志山东代表见大总统详情》，《晨报》，1919年6月26日，6版。
- [102] 张达骥：《我所知道的徐世昌》，《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232页。
- [103] 《昨日怀仁堂盛会》，《晨报》，1918年12月1日，6版；《总统对新闻界演说（续昨）》，《晨报》，1918年12月2日，3版。
- [104] 《府中设新闻记者处》，《晨报》，1918年12月11日，3版。
- [105] 《昨日怀仁堂盛会》，《晨报》，1918年12月1日，6版。
- [106] 《总统对新闻界演说（续昨）》，《晨报》，1918年12月2日，3版。
- [107] 《总统对外国记者之谈话》，《晨报》，1919年3月3日，2版。
- [108] 参见蔡元培：《北大画法研究会旨趣书》（1918年4月）、《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演说词》（1918年10月），《蔡元培全集》（3），156—157、198—199页。
- [109] 《西人之徐东海观》，《晨报》，1919年3月11日，6版。
- [110] 沈亦云：《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155—156页。
- [111] 陈独秀：《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1918年12月），《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432页。
- [112] 《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82—83页。国内和平的希望也体现在4月下旬颇多南北军人自身通电提倡军人不干政。参见陈独秀：《干政的军人反对军人干政》（1919年4月），《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529页；《人云亦云之军人不干政电》，《晨报》1919年5月8日，6版。
- [113] 何刚德：《客座偶谈》，收入其《春明梦录·客座偶谈》，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卷四，页11B。按此书序署1922年，据此则这一条大约作于稍前。
- [114] 李大钊：《文治国庆》（1919年10月），《李大钊文集》（3），64页。
- [115] 《北京大学谣言之无根》，《晨报》，1919年3月10日，2版；《异哉弹劾教育总长之传说》，《晨报》，1919年3月29日，2版；渊泉：《警告守旧党》，《晨报》，1919年3月30日，3版。参见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历史研究》1995年5期。
- [116] 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1919年3月）、《文治主义原来如此》（1919年4月），《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503、519页。
- [117] 《章太炎之言论》，《晨报》，1918年12月5日，3版。
- [118] 梁济在清末曾被徐世昌奏调入其主持的巡警部，他的遗言之一即希望时任警察总监的旧同事吴炳湘向徐世昌解释自己为什么始终未到徐私宅干谒，希望徐谅解。在他留给袁珏生等五友人的遗书中，也希望吴炳湘代向徐总统举荐天津人林墨青，是知他对徐世昌也还有所希望。参见梁济致赵秉钧书后附页、梁济致袁珏生等五人书，《桂林梁先生遗书》（以下径引书名），梁焕鼎、梁焕鼎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59—160、170—171页。
- [119] 林毓生：《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一个道德保守主义含混性的实例》，收入其《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205—226页；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中译本，王宗昱、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0—47页。
- [120] 梁济：《戊午敬告世人书》、《甲寅敬告世人书》，《桂林梁先生遗书》，81—83、85、92—93、105页。按梁氏口中的“世界”多是世道、社会之同义语，未必是地理意义的。
- [121] 梁济：《戊午敬告世人书》，《桂林梁先生遗书》，86—89页。
- [122] 梁济：《拟呈民政部长官请代递疏稿》，《桂林梁先生遗书》，290页。
- [123] 梁济：《别竹辞花记》，《桂林梁先生遗书》，438页。
- [124] 梁济：《〈上内务部恳准退职书〉书后》，《桂林梁先生遗书》，343—344页。
- [125] 梁济：《戊午敬告世人书》、《甲寅敬告世人书》，《桂林梁先生遗书》，91—92，112—113页。
- [126] 梁济：《甲寅敬告世人书（1918年补写部分）》，《桂林梁先生遗书》，117—121页。
- [127] 按梁济在其遗书中曾数次说自己不长于表述，梁漱溟也说他父亲“天资不高，所见未免着重事物，稍涉虚渺处即不能知之，于是所见者皆甚简单”，或不长于理论思考。参见梁漱溟：《自述》（1934年），《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5—6页。但从下文可知，梁济的表述能力虽不能算太高，而其对社会的认识和思考有时则相当深入，超过一般的时人。
- [128] 梁济：《甲寅敬告世人书》，《桂林梁先生遗书》，109—112页。
- [129] 梁济：《戊午敬告世人书》，《桂林梁先生遗书》，86页。
- [130] 梁济：《戊午敬告世人书》、《留示儿女书》、《甲寅敬告世人书》，《桂林梁先生遗书》，85—86、96、194—201、112页。
- [131] 梁济：《戊午敬告世人书》，《桂林梁先生遗书》，95—96页。
- [132] 梁济：《别竹辞花记》，《桂林梁先生遗书》，442页。
- [133] 梁漱溟似乎不知父亲心中这一层自我约束，在他记忆中，父亲对他“完全是宽放”的，甚至“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他“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他自己则“一次亦没有过”。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1942年），《梁漱溟全集》，第2卷，664页。
- [134] 梁济：《戊午敬告世人书》，《桂林梁先生遗书》，93页。
- [135] 梁漱溟：《自述》，《梁漱溟全集》，第2卷，18页。
- [136] 参见张东荪：《新生命》，《时事新报》，1918年11月7—9日，皆1张1版；《发刊词》，《晨报》，1918年12月1日，2版（按该报曾一度停刊，这是重新出版时的发刊词）；《送岁词》，《晨报》，1918年12月31日，2版；《祝新》，《晨报》，1919年1月5日，2版。
- [137] 某公法家：《威尔逊主义之胜利》，《晨报》，1919年2月21—23日，均6版。
- [138] 东荪：《虚伪与冲动》，《晨报》，1919年3月17日，3版。
- [139] 《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81页。按郭廷以的回忆很能印证萧纯锦稍后所说，言论“愈激烈愈足以耸观听”。见萧纯锦：《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学衡》1卷1期（1922年1月），1页（文页）。
- [140] 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82—85页。
- [141] 施存统：《致〈新潮〉杂志》（1919年），《新潮》，2卷2号（1919年12月），368页。
- [142] 《发刊词》（按该报曾停，此时重新出版），《晨报》，1918年12月1日，2版；《祝新》，《晨报》，1919年1月5日，2版。
- [143] 《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83页。
- [144] 胡适：《纪念“五四”》，《胡适文集》（11），579页。
- [145]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三》，149页。
- [146] 陈廷湘近日提出，当时国人对于威尔逊的主张，也是从传统大同理想的意蕴去体味，希望人类一家可自然解除中国过去所受一切不公正对待，这即是当时空前乐观的心理依据。参见其《1920年前后两次争国权运动的异常形态及形成原因》，《近代史研究》2005年2期。
- [147] 《总统对新闻界演说（续昨）》，《晨报》，1918年12月2日，3版。
- [148] 注意这里的“社会”有着明显的对应于“国家”的意味；同时，“社会”或许也是政治和文化两者的调和或综合，它既不那么政治化，但又比文化和思想更具体实在。时人的相关思考可参见吴康：《从思想改造到社会改造》（1921年1月），《新潮》3卷1号（1921年10月），25—52页。
- [149]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45页。
- [150] 《总统对新闻界演说（续昨）》，《晨报》，1918年12月2日，3版。
- [151] 本段与下段，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1919年4月），《新潮》，1卷5号（1919年5月），917—918页。
- [152] 若愚：《学生与劳动（四）》，《晨报》，1919年2月28日，7版。
- [153] 胡适：《五四运动纪念》，《胡适文集》（12），724页。白永瑞也曾简略论及两者间的关联，参见其《从庆典到反抗：“五



四”时期天安门集会的由来》，收入《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文学院编印，1999年，5—7页。

[154] 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12页。

[155]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77—83, 85. 这里不能排除胜利者的记忆无形中“改写”了历史，身在美国的周策纵写作时与胡适本人有过从，他对11月那次游行的参加人数多半是从胡适而来（前引报纸所说的人数要低不少），则他能有这样的选择性叙述尤其发人深省。

[156] 另一方面，一些人的希望也还在持续。余家菊回忆说，他1922年出国留学时，国人仍“醉心于世界和平”，对威尔逊十四条在凡尔赛和会的失败，“世人终觉其为偶尔小挫，难阻进化潮”。而他自己对“公理战胜”的梦想也至少持续到1921年，那年4月他女儿出生，取名传弭，其年谱说，“时欧战初息，人怀和平之想，因锡以弭字，寓弭兵之意焉”。待他至欧洲后才观感大变：“我到欧洲以后，和平的幻想，大同的梦想，都粉碎了。我亲眼看见弱小民族的困苦，亲眼看见各国民性的差异，亲眼看见各国国民意识之发扬，亲眼看见各国之剑拔弩张。……我感觉到中国国民必须树立自尊心，中国国家必须强盛才能自保，中国的党派斗争必须无损于国家。我心中的火燃烧起来了！我为我们的国家着急！我为来日的大难紧张”。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220、261、136页。

[157] 参见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3期。

[158] 张奚若致胡适，1919年3月1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年，上册，31—32页。

[159] 《杜威博士之近况》，《晨报》1919年6月10日，2版。

[160] 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327—332页。

[161] 更激进的青年如罗家伦在“五四”前已如此说，但多数人则是在此。孙中山稍后即说，法国革命仅是政治革命，而俄国则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同时并举”。参见其《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1921年12月），《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26—28页。

[162] 如瞿秋白就批评中国人往往“坐着说不站起来做”，而提出“打起精神，往前干去”的主张。瞿秋白：《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1919年11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6页。

[163] 以芬：《欧战杂感（八）》，《晨报》，1918年12月29日，2版。

[164] 勉已〔己〕：《新德意志之将来》，《晨报》，1919年2月21日，2版。

[165] 转引自《过激派与我国》，《晨报》，1919年3月10日，3版。

[166] 陈独秀：《两个和会都无用》（1919年5月），《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1—2页。

[167]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1919年7月），《毛泽东早期文稿》，338—339页。

[168] 鲁迅致许广平（1925年3月31日），《鲁迅全集》（1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31页；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新潮》，1卷5号，918页。

[169] 恽代英：《革命的价值》（1920年10月），《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上卷，224页。

[170] 傅斯年：《青年的两件事》（1920年5月5日），《晨报》1920年7月5日，5版。

[171] 吴康：《从思想改造到社会改造》（1921年1月4日），《新潮》3卷1号（1921年），26页。

[172] 徐志摩：《〈剧刊〉始业》（1926年6月），《徐志摩全集》，赵遐秋等编，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卷4，526—527页。

[173] Akira Iriye,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88.

[174] 胡适：《悲观声浪里的乐观》，《独立评论》第123号（1934年10月21日），15页。按胡适此语非针对此事而言。

[175] 蒋廷黻：《南京的机会》，《独立评论》第31号（1932年12月18日），2页。

[176] 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44页。

[177] John Dewey, "Leningrad Gives the Clue," in idem, *The Later Works, 1925-1953*, Vol. 3 (1927-28), ed. by Jo Ann Boydston, Carbondale &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04.

[178] 芝生：《乡村运动之政治的意义》，《独立评论》第60号（1933年7月23日），7—8页。

[179] 《晨报》编者在观察了各地处置学生运动的方式后说，对这次的全国性运动，“我们在北京的人自然觉得北京军警的对付手段不但荒〔唐〕，实在是笨拙可笑。但是这几天看上海南京汉口武昌的报告，才知道各处的长官军警真是野蛮可恨，比较起来，北京军警要算是顶‘文明’的了”。《〈陆规亮致江苏省长书〉编者按语》，《晨报》，1919年6月17日，6版。

## 上 编

### “五四”后的士人与政治

## 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认识\*

1919年，在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主要参与者之间曾发生了著名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这一事件长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一般情形下，党史、革命史学界和非党史学界各自关注的问题不甚相同，相互的对话也不充分，但这一争论却是同时得到双方关注并时有“对话交流”的少数事件之一。关于这一论争的研究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即主要的论述出自通史或类似通史的著作，而多数相关专题论文则倾向于定性的“评价”，其引证的史料反不如上述著作，这在历史研究中是少见的。

自20世纪50年代批判胡适以后的几十年间，学界一以贯之的常见看法，或可称为“传统”观点，是强调这一争论的对抗性，视其为自由主义或别的什么资产阶级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次重要斗争。彭明的观点可能比较典型，其《五四运动史》有专章讨论“问题和主义之争”，其副标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论战”。<sup>[1]</sup>萧超然到1995年仍持类似看法，认为“这场大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一次激烈的较量；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翼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的一次不可调和的斗争。”<sup>[2]</sup>

从80年代开始，修正上述看法的研究开始出现。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伟大的开端》一书提出：这次论战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终，“通过论战，双方都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使改造社会中的两种不同主张，旗帜更加鲜明，并都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明显地胜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从该书所引的材料及当时的相关文献看，这一结论基本可立。<sup>[3]</sup>进入90年代，李林、李良玉、马以鑫等皆进一步论证胡适当年锋芒所指并非马克思主义。<sup>[4]</sup>

到2001年，胡绳关于1919—1949年间历史的系列谈话及根据其谈话集体撰写的新现代史的部分章节出版，<sup>[5]</sup>几乎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问题的看法。胡绳的谈话从1995年就开始了，但公布较晚。他明确指出：“胡适与李钊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事实上还是朋友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胡适的意思无非是主张改良，不赞成革命。后来胡适提倡好政府主义，李大钊也参加在宣言上签了名，不能说李大钊是犯了错误。……对这种主张可以批评，但说它如何反动显然是不对的。”<sup>[6]</sup>

依据胡绳的这一主张，“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以下简称“胡绳课题组”）对此次论争的结论是：“这场为时短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民主阵线内部发生的一场争论。争论的方式是商讨式的，直率而温和，并没有剑拔弩张。争论之时，胡适与李钊之间，友谊依旧。争论过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也并没有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迥异而反目为仇。”当然，“他们中间存在着许多政见上的分歧”，其要点在于“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以求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对此“胡绳课题组”进行了较详尽的论述。“总的看来，在20年代的民主运动中，他们还是相互信任和相互支持的”。<sup>[7]</sup>

不过，也有相当一些人坚持原来的观点，到1999年，仍有学者认为“胡、李的争论是中国思想史上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争论，也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两条社会道路的原则争论”。<sup>[8]</sup>再到2003年，还有人坚持：五四运动中，既“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共同反对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也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如问题与主义之争，就属于后者”。<sup>[9]</sup>

学术观点本不必非“求同”不可，对具体史事的认识存在歧异不仅正常，有时甚至可说是理想的状态。但关于此事的歧见似与前述研究特点相关：主要的“拨乱反正”论述同样出自通史或类似通史的著作，这些著作本不要求对特定具体问题做深入细致的研究；<sup>[10]</sup>而不论支持或反驳“传统”观点的论文，仍多倾向于定性的“评价”，却少见对所涉史料和史事进行相对深入的探索者。<sup>[11]</sup>

也许这些学者以为这一事件本非“大事”，具体事实也较“清楚”，故没有多少可深入之处。其实“问题与主义”之争时间虽短暂，却触及了所处时代认知的焦点，其反映出的关怀是广泛而持续的。例如，关于中国问题是局部解决还是整体解决，以及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就长期困扰着中国思想界；前者多为既存研究所注意，后者本是胡适的一个主要出发点，却基本被忽略。重要的是，胡适这两项主张不但当时颇有人赞同，几年后仍得到呼应，其中也包括一些中共党人，这一点似较少有人注意到。

对胡适个人而言，“问题与主义”之争应置于他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谈政治”的一系列有关政治的言论和行动中考察，<sup>[12]</sup>并当注意那段时间中国思想界对社会、社会主义和社会改造的普遍关注和思考。<sup>[13]</sup>就是当年争论的具体文本，包括最直接的胡适、李大钊和蓝公武三人的论述，以及三人之外的许多相关讨论文字，也都还值得深入解读，不过本文暂不及此，主要就一些相关的问题做些外围的探索。

### 1. 倒放电影的争论起因

民初的中国，“主义的兴起”是一个显著的现象。平民教育派的周德之曾描述说：“自从‘主义’二字来到中国以后，中国人无日不在‘主义’中颠倒。开口是‘主义’，闭口是‘主义’，甚至于吃饭睡觉都离不掉‘主义’！眼前的中国，是充满‘主义’的中国；眼前的中国民，是迷信‘主义’的中国民。”马君武则菲薄其为“主义癖”，

而陈炯明更斥之为“主义毒”。<sup>[14]</sup>这些言论虽出自北伐前后，但也大体适用于新文化运动期间。

如傅斯年在“五四”前就指责国人因“心气薄弱”而缺乏“主义”，往往“随风倒、任水飘”，既“没有独立的心思”，也“没有独立的见解”。故“没主义的人，不能做事”，也“不配发议论”。他甚至把“主义”的有无上升到人禽之别的程度，以为“没主义的不是人”。傅氏问道：“中国的政治有主义吗？中国一次一次的革命，是有主义的革命吗？中国的政党是有主义的吗？中国人有主义的有多少？中国人一切的新组织、新结合，有主义的有多少？”答案当然是负面的，所以他干脆说，“任凭他是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主义好。就是他的主义是辜汤生、梁巨川、张勋……都可以，总比见风倒的好”。<sup>[15]</sup>

这样一种对“主义”的普遍推崇，是理解“问题与主义”之争的重要背景，此不赘，下面想要探讨的是这一争论的具体起因。在这方面，最有意思的是胡适自己后来的陈述也带有较强的倒放电影倾向，且表述的时间愈晚，其见解愈类似于马克思主义革命史研究者；虽然双方遣词用字不甚同，这样惊人的“一致”客观上“配合”了胡适批判者及后来不少革命史研究者的观点。

胡适最早的回忆是在1922年，他在解释自己何以要谈政治时说，1919年陈独秀被捕，他接办《每周评论》，不能不谈政治。“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并在《每周评论》上“提出我的政论的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该文“引起了无数的抗议：北方的社会主义者驳我，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痛骂我”。<sup>[16]</sup>

到1930年5月，胡适在为汤尔和的译作《到田间去》作序时写道：“我在十多年前便提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意见，希望引起一班爱谈大道理的人的觉悟。十多年以来，谈主义的人更多了，而具体的问题仍旧没有人过问。只看见无数抽象名词在纸上炫人眼睛、迷人心智，而事实上却仍旧是一事无成，一事不办。”<sup>[17]</sup>两者大体都是实录性的回忆，后一次的“抽象名词”，多少与那时他与周谷城关于“封建”这一名词的争议有关。<sup>[18]</sup>

同年11月，胡适开始强调他所主张的实验主义和陈独秀代表的辩证唯物史观不可能如陈氏曾希望的那样“合作一条联合战线”，因为“辩证法出于海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从达尔文主义出发的实验主义“只能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而再造中国文明的途径也“全靠研究一个个的具体问题”。<sup>[19]</sup>

也许因为这里牵涉到政治表态，或者因为此文是专写给“少年朋友”看的，胡适的回忆也有些改变，他在谈到自己的主张当初“最不能得各方面的了解”时说，五四运动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故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警告”。时隔十几年，“这些话字字句句都还可以应用到今日思想界的现状。十几年前我所预料的种种危险——‘目的热’而‘方法盲’，迷信抽象名词，把主义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一一都显现在眼前了”。

这里一个明显的转变是从被动的“忍不住”改为主动的“预料”，到50年代胡适做口述自传时进而说，他在1919年“已经觉察到”，新文化运动中提倡输入学理的一面已出现“走向教条主义的危险”。虽然胡适所说当年与他冲突的包括“相信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教条主义者”，但却强调共产主义者是“我的主要反对派”。<sup>[20]</sup>所谓“已经觉察”正是早年“预料”的翻版，而马克思主义者上升为“我的主要反对派”，却有着新的“今典”。

当时中共正对胡适进行全面的批判，胡适的情绪显然受到影响，故以为早年的争论使共产党“对我难忘旧恨，……乃重翻旧案，发动了大规模运动来清算我的思想”。这一自述提示出胡适新说的触发点：“他们总是征引我在1919年所写的那些早年著述，作为他们所谓我一切学术著作背后隐藏着的阴险动机的铁证！他们说我在1919年所作的整个有关讨论，不止是辩难，而是对我的同事李大钊和他的朋友们那时正在发起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一种攻击。”<sup>[21]</sup>

这段话若反过来读，恰意味着当年的讨论不是攻击，而是辩难。但胡适被批判后心绪已不宁静，不免跟着倒放电影，也认为那时的共产主义者是“我的主要反对派”，并对他“难忘旧恨”，无意中恰“配合”了他的批判者。其实在1919年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胡适有意与马克思主义者冲突，<sup>[22]</sup>本来那时的中国实无多少明确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对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介绍虽稍早，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却是在胡适的文章刊发后才明确表示出来。而稍后出版的《新青年》6卷5号即是“马克思研究号”，<sup>[23]</sup>提示着这一争论似乎还推动了《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详后）。

更重要的是，陈独秀、李大钊都是胡适的好友，且胡适是因陈独秀被捕、李大钊走避乡间而不得不接办《每周评论》，本带有义不容辞的“前赴后继”意味；当时局面如何发展难以逆料，若在此时发表攻击同人的文章，岂不成了京师警察厅的战友了么！李大钊那篇与胡适讨论的文章（该文本是通信，恐怕连题目都是任编辑的胡适所加），大概同样带有支持其“前赴后继”的意思。在刊物本身受到警察厅威胁之时（不久终被查封），同人们却主动互相“攻击”，实在不合情理。

其实胡适将其撰文的意图表述得非常清楚，似应予以更进一步的重视；而其观点也反映出当时思想界的一些倾向，或可作为探索争论缘起的又一个方向。



## 2. 因相近而区分

五四学生运动前后的思想界的确存在各种“主义”间的对立和竞争，但思想界的主要特征毋宁说是各种流派的混杂难分；甚至时人特别看重的新旧之间的对立，也没有既存研究所陈述的那样强烈。<sup>[24]</sup>民初的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就世界范围言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域。<sup>[25]</sup>试举一个体现“特殊”的例子：五四运动几年后，身为内阁总长的章士钊同时自办刊物《甲寅》议政。他在言说中仍以士人自居，把吴承仕担任司法部金事视为“沉沦下僚”；更在其致吴的公开信中攻击政府学务，说当时“士习日坏，学殖全荒。国家设学，且惟摧毁国学是务”。<sup>[26]</sup>

那时章士钊自己就担任教育总长，以中央政府负责教育的部长在自办刊物上攻击“国家设学”，这样的行为，在没有杂志的古代中国自不可能，在所谓现代政治中也相当特殊。这类“道统”和“政统”互渗的局面在“五四”当年似较显著，那时朝野间常常分享着共同的思想资源，并具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即关怀和思考的问题呈现出一致性）。大约在1919年6月初军警大量抓捕学生后，朝野间的对立趋于明晰，进行“区分”的必要也更加凸显，至少“民间”一面有这样的感觉。

先看双方相近相通的一面。我在十年前曾提出，参与“问题与主义”论战的各方有其共同之处，比较接近的大致有两点：一是中国必须借重西方的主义或学理，但却不能照搬，尤其是不能照搬资本主义；二是中国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也就是民生问题。观论战各方所提的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案，虽然出发点和所用的标签不尽同，具体的措施也不一样，但均对资本主义持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而倾向于某种社会的解决。<sup>[27]</sup>

这样的共同之处也体现在当时主导北京政局之安福系的思想，该系报纸《公言报》曾发表留学日本的白坚撰写的社论，提出以实行“社会主义”来抵御马克思派“共产主义”的主张。社论说，共产主义“起于马克思之《资本论》，盖痛愤于〔西方社会〕资产分配之不均”，而“思有以革易之”。而中国“自来重农轻工商，工商之业，较之欧美及东邻，无足比数”，亦无相应之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故“欧美及日本资本家与劳动者之轧轹不平，无由而生于我国。即偶有之，亦不过少数者耳，无影响于大局也”。<sup>[28]</sup>

尽管如此，“五四”学生运动“不旬日，而罢市罢工之风几遍全国，则其潜势之不可侮可知”。盖当时中国“频年内乱无已，纲纪为摧，四民失业，人无宁处”；“朝野上下，无往非失业失所之民。巨猾神奸，欲有所为，每假欧美学说以为攻夺政权之利器。而此学说足为彼之利器者，必有适合于多数失业失所者之心；或且以为足矫方今之失，而开将来之正，务助其澜扬其波”。换言之，中国虽少见欧美日本那样的劳资冲突，民生问题却已相当严重，使“所谓危险思潮者，乘虚而入”，决非以严刑峻法条文吓唬可以解决。

不久王揖唐在安福俱乐部全体议员会上演说“本部之政纲”，也认为“所谓过激派，原由大地主及资本家垄断资财、奴隶劳动所激成。其实此种学说吾国数千年前早有倡者，即如许行之学说，自食其力，均田均耕，与近世之共产主义相近。惟在彼时已有认为此种学说与中国不适者，即孟子是也。孟子虽反对许行之学说，然亦主张社会主义者”。如孟子提倡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从人民生计上着想”的学说。<sup>[29]</sup>

陈独秀在稍后《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也指出“中国工商业不进化”，其“好的方面”即“没有造成像欧洲那样的资产阶级和军国主义；而且自古以来，就有许行的‘并耕’，孔子的‘均无贫’种种高远理想”，这表明“我们的国民性里面，确实含着许多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的成分”。<sup>[30]</sup>尽管具体的归类或不同，陈独秀和安福系同样注意到中国工商业不发达所造成的与西方社会的差异，也同样从传统中找到许行等的思想。

而且，陈独秀的侧重点也与安福系类似，他说，“最进步的政治，必是把社会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别的都是闲文”，盖“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若比较陈独秀三年前所说的“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sup>[31]</sup>即可见其观念的明显转变。关注社会大致已成当时新文化人的共识，胡适在大约同时也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应该是注重研究人生社会的切要问题。”<sup>[32]</sup>

对安福系而言，既然“危险思潮”已风靡中国，又非严刑峻法所能“遏抑防阻”，白坚提出了几条因应措施，第一条便是“为政者与将帅宜究心社会主义”。他说：“凡一主义能得多数信从者，必其有可信从之真际。能得其真际所在，则自有因应之方。不然，则睽隔而不通。”若“以其有异吾素所执也，闻其声，徒有畏恶之情。畏之恶之，无当也。畏恶则益疏远，疏远则相背驰”。故“为政者而与多数国民相背驰，则祸之作必矣。谓宜人究其书，乃可言取舍，乃可言因应也”。<sup>[33]</sup>

这倒像是采纳了李大钊的主张，李在同月稍早的《每周评论》中提出：“说某种主义学说是异端邪说的人，第一要知道他自己所排斥的主义学说是什么东西，然后把这种主义学说的真相尽量传播，使人人都能认识他是异端学说，大家自然不去信他，不至于受他的害。若是自己未曾认清，只是强行禁止，就犯了泯没真实的罪恶。”<sup>[34]</sup>《公言报》社论提出的，正是先“认识”再“排斥”的因应方策，即使不是安福系有意采纳李大钊的看法，也说明双方无意中所见颇相接近。

白坚提出的第二条措施是“为政者与将帅宜凛然痛自革易”，以消除财富不均现象。他不讳言“今日之将

帅及为政者，坐拥数十万数百万或数千万之金者，指不胜屈也；民生则益困穷，士卒则多冻馁。祸机一发，左右麾下之人，尽勦敌矣”。故既得利益者“痛自改革，即所以撤敌人目标之一道也”。而最后一条措施则是“逐次推行社会政策”，即贯彻他所认知的“社会主义”。在白坚看来，“社会主义之本旨，在哀多益寡，以厚人之生；使天下之人，各尽其能，各取所需。上无侵夺人之事，则下自无侵夺人之心；危险思想，无从而生，此社会主义之成也”。社论最后说，“无政府主义、均产主义与[中国]数千年习惯相异，倪欲急行，或诚危险也哉。惟社会政策，则毫无危险。今为政诸子，诚能自克而行社会政策，则危险思潮及今犹可矫易。不然，则恐祸至无日也”。<sup>[35]</sup>

王揖唐也提出，中国“屡经兵燹，人民之痛苦已水深火热，替人民直接谋生存，责任在政府；然间接替人民谋幸福及生存者，责任实在政党。吾党既以保育民生为政纲，且居国会之多数党，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拟在本部特别组织研究会”以探讨民生主义。安福俱乐部议员对此“全体均赞成，即嘱干事部着手组织”。《公言报》报道的提要称之为“社会主义研究之组织”。<sup>[36]</sup>

那时安福系并不仅仅是在因应国内问题，他们显然感受到了外来思想的冲击。王揖唐即说，“自世界潮流播及后，民生主义为不可再缓之图”。<sup>[37]</sup>而白坚更承认，以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为代表的“俄国过激派所倡导、所实行[的]一切破坏主义”这类危险思潮，已“使俄国土崩瓦解；德、奥二邦，亦行见为俄之续；英、法、意、美诸邦，无不见此主义之流行披猖、蕴蓄郁积；而日本及我邦处此，亦莫之能外”。更因中国政教之失已久，故“其来如疾风，当者为之披靡；其速也如流电，远迹无所不居；浩浩乎，滔滔乎，莫之能御”。<sup>[38]</sup>简言之，安福系正是因为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类“危险思潮”渐有风行之势，才要研究和实行某种社会主义，希望能收釜底抽薪之功。

相当数量的研究者常把安福系视为当时最“落伍”者，而其关于“世界潮流”的认识，看上去却类似趋新者罗家伦的见解。罗氏稍早曾描述“一股浩浩荡荡的世界新潮”正由西向东，经太平洋而到远东。这一“20世纪的世界新潮”就是俄国革命。与以前法国式的政治革命不同，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凡所谓“潮”都是阻挡不住的，中国迟早会被“世界的新潮卷去”。既然抵抗不住，“就不能不预先筹备应付这潮流的法子”。<sup>[39]</sup>

可以看出，安福系和罗家伦对于“世界潮流”的认知和想要预为因应的思考方式都是相当接近的，不过安福系想以实行“社会主义”来抵御马克思派“共产主义”，而罗家伦的因应方策则包括“与其崇拜雷竭奴 Richelieu 的理财，不如崇拜马克思 Karl Marx 的经济”这类相对激进的主张。但双方确有不少共同或相通之处，大致可见。

罗家伦的《新潮》同人傅斯年也对俄国革命寄予厚望，他在1918年6月就认为，“近世史之精神，全在思想自由”。自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思想自由“再现于政治革命”，即法国革命。此后“更待改革者何事乎？社会而已”；后者即体现在俄国革命之上。几个月后他更看到：“中欧各国起了社会革命了！俄国式的革命到了德意志了。从此法国式的革命——政治革命——大半成了过往的事；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俄国革命可能失败，但若“经数十年之试验，得一美满结果，人类进化更进一层矣”。俄国的现状虽不如意，但人类“将来无穷的希望，都靠着他做引子”。故“将来俄国于文明史上，非同等闲。德哲人尼采谓俄独有兼并一切之能力，吾则谓俄之兼并世界，将不在土地国权，而在思想也”。<sup>[40]</sup>

傅斯年对“革命”的青睐此后仍有表述，而且他比罗家伦更进一步，其眼中的“世界潮流”差不多就是“世界革命”。傅斯年在“五四”前夕评论朝鲜独立运动说，这一运动虽未见成功的可能，“但是就内里的精神看起来，实在可以算得‘开革命界之新纪元’”。盖其“对于未来的一切革命运动，有三层重要的教训：第一是非武器的革命。……第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革命。……第三是单纯的学生革命”。只要“世界的革命未已，这精神自必继续下去；这精神由现在看起来，好像愚不可及，然而顺着这世界的潮流，必得最后的胜利”。<sup>[41]</sup>

到五四学生运动后，罗家伦再次表明了对俄国革命的肯定。他对中国的辛亥革命和俄国革命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间“有一个大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国的革命，是以金钱权位运动军队来的；而俄国的革命，是以思想主义征服军队来的——其实不但是征服军队，并且征服一切平民。所以俄国革命愈革愈好，中国革命愈革愈坏”。<sup>[42]</sup>与傅斯年从俄国革命中看到“思想”的“兼并”能力相类，罗家伦也从中看到“思想主义”的“征服”能力，两人的思路 and 倾向性非常相近。

不少研究“问题与主义”之争者（包括一些试图为胡适“翻案”的作者）都将傅斯年、罗家伦为代表的《新潮》派归到胡适一边，往往指出其与马克思主义者或其他激进者的对立和冲突。其实李大钊与新潮社关系同样非常密切，<sup>[43]</sup>而此时罗家伦和傅斯年至少远比寄希望于英美式民治的陈独秀更激进，他们放眼未来，看重的是俄国式的社会革命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实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选择后者，傅斯年《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一文中便屡次用“试验”来表述法国和俄国革命，而罗家伦那时更常常强调实验主义关注“此时此地”的观念。<sup>[44]</sup>大致可以说，胡适和李大钊的主张都是五四学生一辈人的思想资源，他们并未从中看到太多的冲突和对立，反而更多看到其相通之处。

同时，社会主义和一些与其相关的“主义”也确有令人困惑处，在“民间”一边或“道统”之内稍早已出现“区分”的努力。1919年三四月间出版的《每周评论》第15号和18号上，即分别摘译刊登了倍倍尔的著作



《近代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区别》和王光祈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两文的共性是要“区别”各类不同的西方“主义”，尤其是与“社会主义”相关者。王光祈在介绍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之异同时，特别更正自己一个月前曾说俄罗斯的布尔扎维克自标其主义为无政府主义，“如今细考布尔扎维克的所为，似近于国家社会主义”，而非互助的无政府主义。<sup>[45]</sup>

前引罗家伦主张“崇拜马克思Karl Marx的经济”，也引起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黄凌霜表示他不但不“崇拜”马克思的“玄想的经济”，而且“极端反对马克思的集产社会主义”；他提出的理由非常符合时人尊奉的进化观念：在欧洲，“马克思的集产主义现在已不为多数社会党所信仰，近来万国社会党所取决的，实为共产主义”（具体指他们正在提倡的“无政府共产主义”）。<sup>[46]</sup>

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是安福系眼中的“危险思潮”，在不同程度上也都与俄国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安福系既不赞成以严刑峻法条文之吓唬来解决“危险思潮”，也不主张采取“畏之恶之”而“益疏远”的鸵鸟取向，他们自身要开展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并建议“为政者与将帅宜究心社会主义”。这样一种主动“介入”的愿望，似乎体现出“政统”意欲进入原来更多被“民间”占据的言说世界，以相近的议题来争夺对“道统”的掌控。或许就是这一点使“道统”方面警醒，并采取相应的防卫行动。

胡适那句“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表述出很强的警惕性，在许多人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时，胡适却感到这是“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他敏锐地觉察到，对于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和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研究会”的活动，与安福系相关的舆论机构采取了联合行动：“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这样一种呈现出“共谋”的举动，使他认为必须有所区分。<sup>[47]</sup>

胡适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大家都谈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我们今日当然知道那时各派所说的社会主义有相当大甚至是实质性的区别，但多少也有其共性，如《时事新报》一文所说：“今日之言社会革命者夥矣，而各人研究之学理及实行手段的趋向，亦因之而歧：有主张政治革命者，有主张社会集产革命者，又有主张无政府共产革命者。其主义虽互有差异，然所盼望改革社会成一完美之社会的愿望则均同。”<sup>[48]</sup>

不过，前引王光祈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修正自己的看法以及黄凌霜试图以“万国社会党”采纳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来“反对”苏俄共产党实行的“马克思的集产主义”，提示出当时人实在有些分不清这些“主义”的异同。罗家伦曾以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来解释这些同源观念的演变，他说，“同是马克思的学说，为什么到英国会变成Guild Socialism，到法国会变成Syndicalism，到俄国会变成Bolshivism，到美国会变成I.W.W.呢？这都是各有历史和他社会背景的缘故”。<sup>[49]</sup>

然而罗家伦眼中这些同源的“主义”又各自争斗不休，吴康稍后描述说，那些谈“社会改造”者，“你今日鼓吹一个马克思的主义，他明日主张一个蒲鲁东、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后日再出来一个个什么‘工团主义’（Syndicalism）、‘行社主义’（Guildism）”；大家“各捧着一个洋偶像”，“出奴入主，互相掎击，有如泥中斗兽，闹得个不亦乐乎”。<sup>[50]</sup>社会主义名词之下这样错综复杂的争斗与联合至少混淆了各自的主义认同，这即是胡适所针对的，故他首先要以一条线将安福系与所有的“新舆论家”划开。

李大钊在“五四”前已注意到：“世间有一种人物、主义、或是货品流行，就有混充他的牌号的，纷纷四起。……‘社会主义’流行，就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出现”，其实“都是‘混充牌号’”。<sup>[51]</sup>“五四”后他更观察到，“近来出了许多新鲜名词。例如日本的‘帝国社会主义’，‘皇家中心社会主义’，中国某君的‘军国民教育社会主义’”等。<sup>[52]</sup>一方面“近来有很多的印刷物，被政府用‘鼓吹共产主义’的罪名禁止了；可是政府举行的文官考试，却出了‘共产主义’的题目，给考试文官的人以大鼓吹而特鼓吹的权”。他特地指出：“有人说那是官家的共产主义、孔子的共产主义，毫不带着危险的性质，与你们小百姓们所研究的不同。我想这话也不错。”<sup>[53]</sup>

尽管做出了这样的区分，李大钊仍然对“我们谈主义罢，王揖唐也来谈主义；我们非主义罢，阎锡山又来非主义”这一现象感到无奈，并发出“究竟如何是好呢”这样的感叹。<sup>[54]</sup>他所描述的现象及其多少有些无奈的感叹既凸显出其希望有所“区分”的明显意图，也体现了朝野的某种“一致”。的确，包括安福系在内的一个时代共同点就是关注“社会”的革命或改良，不论是否发自内心的赞赏，各方都视之为一项不可避免的举措。然而意味深长的是，为什么那时掌权或接近掌权的一方总要仿效民间的言说？<sup>[55]</sup>

那时发生的一个插曲颇能提示各方关系的复杂：

自学生爱国运动发生以来，有人造出一种谣言，说北大的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去了。上海有一家大报的驻京访员竟把这种谣言用专电传出去！那些鱼行的通信社自然不消说了。近来有许多朋友写信来问究竟这事是真是假。我们正式回答他们：“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sup>[56]</sup>

这里以“我们”身份发言的就是胡适，发表的时间是1919年6月初。但或因发表此言论的刊物《每周评论》读者不够广泛，或由于“国中缺乏常识的人太多了，居然有人相信这种谣言，居然有许多通信社和报馆极力传播这种谣言”，致使胡适、李大钊等不得不于一个月后又在北京《晨报》上刊登一则《辟谣启事》，

重申傅、罗被安福俱乐部收买是“近来有人散布谣言”，而“我们心里不平，不能不替他们两位辩个清白”。《启事》再次以“十字街头”的口气宣布：“安福俱乐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这两位高洁的青年。”<sup>[57]</sup>

这样的“谣言”竟然可以不胫而走，广泛传播于京沪之间，多少可见当日世风之一斑。<sup>[58]</sup>那时的一个重要背景是6月初军警大量抓捕学生，使朝野对立趋于明晰。有人“散布谣言”的活动和胡适等想要“辩个清白”的努力，都非常能体现当时思想界阵线不甚清晰的状态，也反映出其间的一些倾向：

如果“散布”者就是安福系，则他们显然认识到北大清流的力量，希望与之有所关联；<sup>[59]</sup>或者“谣言”是想表示“学生”已被分化而非整体，也不排除暗示安福系对军警的行为有保留。<sup>[60]</sup>不论是哪一种，都别具深意。如果“谣言”的起源是新潮社在民间的竞争对手，则说明当时朝野的对立已非常显著，且民间已经公然不承认当局的统治正当性，故任何与政客官僚的“关联”，包括想象的或实际的，都可能使新潮社显得不够“高洁”和“清白”，从而毁损其言论信誉。<sup>[61]</sup>

从“许多通信社和报馆”共同参与“极力传播这种谣言”的活动看，舆论对此是非常关注的。而安福系以“各尽其能，各取所需”来界定其所提倡的“社会主义”，也的确很像后来不少人描绘共产主义的用语。<sup>[62]</sup>相差甚远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派别都聚集在相同的名词之下，很能提示“社会主义”这一标签在那时的吸引力，至少大家关怀和思考的问题是相通的。

或者正因这样一种有意无意的“混同”，使新文化人想要“区分”的努力变得更加明显。<sup>[63]</sup>“道统”一边对“政统”方面任何试图以其道来“正统”的努力，不论是想象的或实际的，都已相当警惕。胡适和李大钊都表述出类似的意思，其“区分”努力的最初一步就是划清与王揖唐或其他与“政统”相关联者的界限。在胡适看来，既然在“主义”方面已经到大家不太分得出彼此的程度，则回过头来研究具体“问题”或不失为一种选择。<sup>[64]</sup>

### 3. 胡适的思路及他人最初的因应

1918年3月，胡适把他正在写的《西洋哲学史大纲·导言》的一段提出来“供《新青年》的读者的讨论”，他在文章中指贵“如今的人，往往拿西洋的学说，来做自己的议论的护身符”；其实不同时代的西哲“各有他们不同的境遇时代。因为他们所处的时势、境遇、社会各不相同，所以他们怀抱的救世方法便也各不相同”；各人的“学说，都由个人的时势不同，才性不同，所受的教育又不同；所以他们的学说都有个性的区别，都有个性的限制；并不能施诸四海而皆准，也不能推诸万世而不悖，更不能胡乱供给中国今日的政客作言论的根据”。<sup>[65]</sup>

可知“中国政客”拿西洋的学说来自作自己“言论根据”的倾向先已存在，那时已成为胡适的攻击对象，则安福系后来试图“研究”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既存趋向的进一步发展。胡适进而批评一些国人“不去研究中国今日的现状应该用什么救济方法，却去引那些西洋学者的陈言来辩护自己的偏见”，这是“大错”；若“不管这些哲人和那些哲人是否可以相提并论，是否于中国今日的问题有可以引证的理由”而盲目引证，便是其所谓“奴性的逻辑”。

但胡适这些话似乎没引起什么注意，倒是李大钊很快有所反应，他在几个月后与高元辩论“强力与自由政治”时，强调其意在防止政治“枭雄”据“客卿”之西说以“伪造民意”；为支持自己的立论，他差不多把胡适上述说法全文引出，并进而引申说：“彼西洋学者，因其所处之时势、境遇、社会各不相同，则其著书立说，以为救济矫正之者，亦不能不从之而异。吾辈立言，不察中国今日之情形，不审西洋哲人之时境，甲引丙以驳乙，乙又引丁以驳甲，盲人瞎马，梦中说梦，殊虑犯胡适之先生所谓‘奴性逻辑’之嫌，此为今日立言之大忌。”<sup>[66]</sup>

不久李大钊即指出舆论界有空谈学理而回避中国事实的现象，他描述一些国人对“联治主义”的畏缩态度说，这些人“不是吞吞吐吐的说我是主张自治，避去联邦字样；就是空空洞洞的说我是单谈学理，不涉中国事实。”<sup>[67]</sup>稍后他在论及社会上流行“混充牌号”现象时更指出，“社会上有一二清流学者，很得大众的信仰，一班官僚帝孽，就想处处借他的名字作招牌”，也跟着谈社会主义。<sup>[68]</sup>可知那时确有空谈“不涉中国事实”之抽象学理及官僚“攀附”清流谈社会主义的倾向存在，不排除胡适稍后的表述还受到李大钊的影响。

或者因为前文反馈不足，胡适在1919年春夏间重申，“前几年有一般学者做文章时，往往引上许多英文德文法文的句子，末后加上无数的参考书目”。大家都引西洋名哲来驳斥对方，但是“二千三四百年前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和我们时代不同，事势不同，历史地理不同，他们的话是针对他们的时势说的，未必能应用于我们中国今日的时势”。当时的新人物反传统，“正因为‘诗云子曰’是两三千年前的议论，不能用到现在的情形。若是我们现在论中国的现势，却去引柏拉图和伯伦知理的话作根据，这岂不是西洋式的‘诗云子曰’吗？”<sup>[69]</sup>

胡适强调：“现在的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一倾向是新旧共有的，“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现时社会的需要；但是那些迷



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吗？”他因而提倡一种“学问上的研究和实地的考察”结合的取向，因为“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Isms，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在一般印象中，胡适可以说是当年尊西的象征，他在此时却一再提出引证西洋学说应该考虑适合于“中国今日的问题”；强调任何西哲的言论必须能够“应用于我们中国今日的时势”，否则就是“西洋式的‘诗云子曰’”。这是民初“西方分裂”之后出现的新问题，一方面，“你引柏拉图来驳我，我便引亚里士多德来驳你，你又引海智尔来驳我，我再引伯伦知理来驳你”的现象充分体现了西方理论“以中国为战场”的情形；<sup>[70]</sup>同时，究竟哪些外来学理和主义才适应“中国今日的时势”，逐渐成为一个长期而持续受到关注的问题，稍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与此是密切相关的。

胡适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时，一开头就引述了上面的议论，并再次强调：“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这样具有特定针对性的“具体主张”一旦成为“主义”，便已被简化为涵盖宽广的“抽象名词”，而后者却未必能够囊括这一名词所指谓的各种具体主张，遑论异地不同时的时空差异。因此，若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空谈“主义”，特别是空谈“外来进口的”和“偏向纸上的”主义，不仅无济于事，且有弊端。盖纸上的“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这在欧洲已有前科，“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sup>[71]</sup>

虽然知道“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胡适还是“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要“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而“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很明显，从文章开头提出安福部谈民生主义是“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到后面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注重区分的胡适表现出清晰的群体意识——“我们”和“同志”都与“新舆论”这一认同相关。

由于主要是针对“我们”和“同志”立说，胡适所举的反面例证也多出自“新舆论界”；或因其心里想着攻击安福系，仓促中不知不觉地使用了安福系方面的材料。结果，胡适文章中所挖苦抨击的不少“主义”，恰与安福系正在攻击者相近。如果不是他正面进攻安福系“政客”的文字明显，该文甚至可以说配合了安福系的倾向。对此胡适自己似有所觉察，他在文章结束时希望“读者不要误会”其意思，并特别说明，“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不过应作为观察的“工具”和参考的“材料”，而不是“挂在嘴上做招牌”。

胡适的文章引起迅速反应，蓝公武把胡适的文章转载在《国民公报》上，又在该报发表长篇驳论，分七次连载；李大钊与胡适讨论的文章是私人通信的形式，以当时人的习惯言，也不排除是为发表而撰写。蓝、李二人都不赞同胡适将“问题”和“主义”对立起来的主张。整体上，蓝公武的论述偏于理论，批驳的意味较强，也不无自相矛盾处；而曾经属于章士钊“逻辑文学”政论文派<sup>[72]</sup>的李大钊则思路更显清晰，也更能以“诠释”的方式处理他与胡适观念的歧异。

蓝公武认为“问题”和“主义”二者“不能截然区别”，不过是“同一事件”的不同方面，即“问题有一贯的中心，是问题之中有主义；主义常待研究解决，是主义之中有问题”。但他又说，“主义是一件事，实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其间虽有联属的关系，却不是必然不可分离的”。简言之，“方法与主义不过是目标与路径的关系”。在向着同一目标走的前提下，受环境和不同实行者利害关系的影响，“一个主义，可以有种种的实行方法，甚至可以互相冲突，绝不相容”。故“同一主义，在甲地成了某种现象，在乙地又成一种现象。乃至同在一地，信奉同一主义的人，因实行方法的不同，变成种种极不相容的党派”。<sup>[73]</sup>

李大钊也觉得“问题”与“主义”之间“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他同意任何“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方面”；把一个主义的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当特定主义被“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就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所以，“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不过，他在论述中再三强调以主义为“工具”进行“实验”的必要性，显然是在顺应胡适那些年的基本主张。<sup>[74]</sup>

实际上，胡适观察到的各种政治倾向很不相同的人却在谈论同一“主义”的现象，蓝、李二人也都承认存在，不过蓝公武以为这本是常态，而李大钊则愿意“研究”怎样使理想适用于所在的实境。对中国思想界这种阵线混淆的现象，蓝、李二人皆有所认识：蓝氏固说“中国今日的思想界，混沌已极，是个扶得东来西又倒的东西”；李也指出，“在这种浅薄无知的社会里，发言论事，简直是万难，东也不是，西也不是”。<sup>[75]</sup>可知三人都想要在混杂中有所区分，不过胡适倾向于转换阵地，而蓝、李二人则以为应进一步强化自身的主张。

蓝公武认为，胡适担心“纸上的主义”可能被政客用来害人，有些过虑。因为“主义”的接受者和信奉者“必定要问这主义的内容和他的影响结果，无耻政客决不能用来欺人的。……王揖唐讲社会主义，依然还是一个王揖唐主义，绝没有人去上他当的”。<sup>[76]</sup>李大钊也说，“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辞，很在社会上流行，就有安福派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这种假冒招牌的现象，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淆乱真实也诚然淆乱真实”；可是正牌不能因为有冒牌就自动歇业，“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的正义的宣传”。正“因为有假冒牌号的人，我们越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

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sup>[77]</sup>

蓝公武对“无耻政客”的断然蔑视固稍武断，但亦不无所见——至少在“新舆论界”的范围内，王揖唐恐怕不具多少“欺骗性”。对于更多的人，他则提出，“解决一种问题，全靠与这问题有关系的人，自动的起来解决，方有效果可言。若是有关系的人，毫无丝毫感觉这问题的重要，即便有人起来代劳，其效果不是零便是恶”。故“吾们要提出一种具体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必定先要鼓吹这问题的意义以及理论上根据，引起了一般人的反省，使成了问题，才能采纳吾们的方法”。<sup>[78]</sup>

李大钊进而说，“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若学者研究的社会问题与“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故“宣传理想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才可能形成“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也就有了“解决的希望”。因此，“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sup>[79]</sup>

可以看出，李大钊的不少观念其实与蓝公武相类，但所论多更周全严密，而且他几乎每次表明自己看法时都不忘以胡适习用的词汇呼应胡适的主张，有意凸显其与胡适属于同一营垒。而正是在胡适注重的群体意识上，蓝公武有着特别的忧虑。他在文章一开始就说，“胡君这篇议论，恐怕会得一个意想外的结果”；到文章结束时更明言：胡适的见解“有为人利用的危险。因为中国自来在因袭势力压迫之下，动不动就拿经验二字来压人。近一年来，新机日发，正有一日千里之势，他们那些经验派正在敢怒不敢言的时候，胡君这篇文章，若被他们利用了去，如何能保没反压的危险呢？”<sup>[80]</sup>

身为当时趋新一方象征人物的胡适，却似乎在反对“外来进口的”主义，这的确很容易被“因袭势力”利用以阻遏上升中的“新机”。在将蓝公武文章转载于《每周评论》时，胡适以“篇幅有限”的理由删去了一些“不很紧要的”段落，这最后一段话便在删除者之中。到他再次撰文进行讨论时，胡适对自己的主张进行了更清晰的表述，实际有所修正。他把“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修改为“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并明言“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sup>[81]</sup>

当然，胡适还有进一步的界定，即主义和学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用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但他到底说出，“主义本来都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法，但是一种问题的解决法，在大同小异的别国、别时代，往往可以借来作参考材料”；并进而提出：“我们应该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手，有什么病，下什么药。诊察的时候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临症须知’；开药方的时候也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验方新编’。”

由于李大钊那篇文章措辞相当客气，而胡适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写到李的部分有时不那么委婉，且偶有曲解，<sup>[82]</sup>也许略有后悔，特意补写《四论问题与主义》，专门谈李大钊所侧重的“输入学理”问题，实是正面呼应李的主张。且胡适具体讨论的，主要就是怎样认识和输入马克思主义。这与稍后《新青年》6卷5号成为“马克思研究号”，恐怕有些内在的关联。《四论》未及刊出而《每周评论》已被查封，胡适又将其送到上海的《太平洋》杂志发表，并收入次年出版的《胡适文存》，仍要让大家知道他还有这方面的见解。

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中，胡适首先申明“我虽不赞成现在的人空谈抽象的主义，但是我对于输入学说和思潮的事业，是极赞成的”。接下来他开始完善贯通自己前后的主张，提出“输入学说时应该注意那发生这种学说的时势情形。凡是有生命的学说，都是时代的产儿，都是当时的某种不满意的情形所发生的”。以治病为例，“当时不满意的时势情形便是病症，当时发生的各种学说便是各位医生拟的脉案和药方。……这些药方，有些是后来试验过的，有些是从来不曾试验过的。那些试验过的（或是大试，或是小试）药方，遇着别时别国大同小异的症状，也许可以适用，至少可以供一种参考；那些没有试验过的药方，功用还不能决定，至多只可以在大同小异的地方与时代，做一种参考的材料”。<sup>[83]</sup>

与他在《三论问题与主义》所说的“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手”相配合，这次胡适主要强调要先认识某种主义“发生的时势情形和社会政治的状态是个什么样子”，通过比较，然后可以判断那种主义“在何国何时是适用的，在何国何时是不适用的”。这样输入的主义，“都是活人对于活问题的解释与解决，一个个都有来历可考，都有效果可寻，……也许可以免去现在许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剥的主义的弊害”。

胡适在论述“应该注意‘论主’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学术影响”和“应该注意每种学说已经发生的效果”两点时，所举的例证基本是马克思主义。两三个月后，胡适又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把“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并列为“新思潮的手段”；该文第二节专门讨论这两方面，完全可以视为“五论问题与主义”。他特别把《新青年》的“易卜生号”和“马克思号”皆作为输入学理方面的代表，并指出：“研究问题的人，势不能专就问题本身讨论，不能不从那问题的意义上着想；但是问题引申到意义上去，便不能不靠许多学理做参考比较的材料；故学理的输入往往可以帮助问题的研究。”<sup>[84]</sup>

尽管胡适仍然更强调“研究问题”，反对“悬空介绍”专家学说（并以马克思的赢余价值论为例），他仍表示“可以在研究问题里面做点输入学理的事业，或用学理来解释问题的意义，或从学理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



法。用这种方法来输入学理，能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感受学理的影响”，也“最容易消除平常人对于学理的抗拒力”。将此表述与整个讨论进程结合考察，可以说胡适在坚持自己看法时，也试图尽量容纳“主义”一边的主张，有着继续向其示好的善意。<sup>[85]</sup>

罗家伦在当年稍后对胡适的观念有所申论，他主张在讨论和介绍外来说学时，要“注重他历史社会的背景”，只有“知道他未发生的情形是怎样，已发生后的效果是怎样；才可以知道何所选择，何所适应”；他并说，“谈主义而不能应用他到社会问题上去，则这种主义终归于贩卖的、舶来的、定[空]浮而无所依附的”，对于社会没有什么益处。但罗家伦也明言，“我主张主义当与问题并重”，因为若“没有主义，对于问题”便“没有基本的主见”。<sup>[86]</sup>可知他并不赞成把“主义”和“问题”对立起来，相对更接近李大钊的看法。

在几年后发布关于“好政府主义”的宣言时，胡适和李大钊都积极参与了那一活动。胡适在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时，决定以南北和会为下手的第一步，“自信这是最切实的主张”。这一选择颇体现出其思路的连续性，盖其在第一篇讨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中就提到应研究“南北议和”问题，而蓝公武在反驳文章中还指责他未曾说到要害。胡适自称该文做得很费力，半夜才完稿，当时忽然想到“此文颇可用为一个公开的宣言”，即“打电话与守常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家会议，邀几个‘好人’加入”。<sup>[87]</sup>

胡适是学了很多西洋规矩的人，又最客气，他能半夜给李大钊打电话，可见两人的交情及李大钊在胡适心目中的地位，也意味着此前的“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在双方之间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sup>[88]</sup>更可注意的是前引李大钊在他与胡适争论之后所说的“我们谈主义”和“我们非主义”的提法，<sup>[89]</sup>这里“谈主义”和“非主义”的都是“我们”（以区别于仿效跟进的安福系等“他们”），且显然有着某种时间的先后次序。不论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李大钊大体也赞同“非主义”的主张，他至少肯定“谈主义”和“非主义”的都在同一阵营之中，大致应即是胡适所说的“我们班新舆论家”。

有意思的是，胡适在1922年为证明他没有“变节”，曾公开辩称：“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sup>[90]</sup>其实他那次“谈政治”和“谈主义”有着直接的关联：他在1921年夏天为纠正“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时髦东西”这一“大错”，拟向年轻人呼吁：“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应谈有政府主义，应谈好政府主义。”<sup>[91]</sup>这一私下的表述揭示出胡适思想的一大变化，即他发现“谈主义”的趋势已难遏止，不得不采取“预流”的方式加入进去，以改变大家的“乱谈”及其所谈的具体“主义”。

不过，胡适这一行为的“变节”未必意味着他改变了自己的主张，反提示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发展确有些向着胡适忧虑的方向在发展。而胡适提出的两个重要议题，即中国的问题究竟需要整体改造还是一步步的具体改造，以及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仍在困扰着许多中国读书人。在他们的持续思考和辩论中，渐已明确其身份认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不少人，却多少分享着胡适的观念；这一事实与既存认知有些距离，故有必要简略考察一下五四学生运动后几年时人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辨进程。针对过去的研究，我会稍多考察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读书人所表述的看法。

## 4. 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

关于中国问题是局部解决还是整体解决的问题，既存研究皆已较关注，但其实际涉及的面向更为宽广，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社会构成和具体思路都相当复杂，难以简单的二分法涵盖之。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群体尚在形成之中，各自皆难看出系统一致的看法。前面说过，“五四”前后思想界的主要特征是各种流派的混杂难分。当时倾向于整体或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人相当普遍，其中不少人并不那么激进；而主张根本解决的人中间，也有反马克思主义者。

### 4.1 整体改造的普遍倾向

从清季开始就出现一种“中国传统负面整体化”的倾向，<sup>[92]</sup>到“五四”前后正广泛流传：蔡元培在日俄战争时便提出“要把老法子统统去掉”，<sup>[93]</sup>陈独秀1918年关于“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一说更为明显。那时陈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且这一言论发表时是他与胡适共同署名，说明胡适本人也曾接受这一见解。<sup>[94]</sup>到下一年，鲁迅以易卜生所说的“All or nothing”（他自己的翻译是“全部，或全无”）一语，相当形象地表述了时人认知中现代与传统、世界与中国的整体性对立。<sup>[95]</sup>

另一方面，在官方眼里“危险思潮”的范围之中，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便既主张根本解决却又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前引罗家伦关于“今日世界之新潮”的见解已相当激进，并预言“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但无政府主义者仍觉其不够彻底，自称“极端反对马克思”的黄凌霜在批评罗家伦时特别强调：“我们要晓得社会革命和科学革命不同，社会革命是将全社会的恶制度从根本上推翻，拿新的来替代了他；若是畏首畏尾，这简直是基督教的改良主义，还能算做社会革命么？”<sup>[96]</sup>

王光祈在1919年9月观察到，当时出现“两种相反的言论”，即主张“零碎解决——因时因地因事解决具



体的问题”和主张“总解决——根本改造”。前者的代表是杜威和胡适，这是多数既存研究都看到的。但后者的代表却并非什么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时事新报》记者”张东荪，[\[97\]](#)这一点是过去论及此问题的研究者很少注意的。

张东荪那时奉劝其“最敬爱的青年”说，“我们今天应该少管小事，留着精神去专管大事”；亦即“不要做零碎的牺牲，预备将来做个极大的牺牲”。因为救国就要牺牲，“但是小牺牲还不够用，非得大牺牲不可。好几次的小牺牲累积起来，也抵不过一个大牺牲。所以我们今天宜养精蓄锐，以备他日求一个总解决”。他强调，“没有总解决便等于不解决，那零碎解决是绝对不中用的”。张氏虽声明“不是主张绝对的不管小事”，然而“小事容易消磨大志”，故不可不有“总解决与大牺牲的预备与志愿”。[\[98\]](#)

当时南北间正推动和议，有一个“各界联合会”提出了五项和议前提，包括取消“二十一条”，取消新国会，罢免段祺瑞，惩办曹、陆、章和徐树铮，恢复“约法”上的各种自由权等。以今日的眼光看，这些条款已相当严厉，恐怕很难为当局所接受，但张东荪认为“这五项不能做为和议的前提，因为这还不是根本的解决。根本的解决只有二条：（一）所有军队全解散；（二）所有军官（督军在内）皆裁废”。在他看来，“国内一切的乱源都是军人，去了军人必定有办法”。[\[99\]](#)且不论张氏主张的空想意味，他想要获得某种“根本的解决”的心态是非常明确的。[\[100\]](#)

在“问题与主义”争论几年后，梁启超总结民初十年的演变说，辛亥鼎革后，国人“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101\]](#)这一概括大体适合于那一时段，可以说，“五四”前后几年间希望整体改变的倾向是普遍存在的，而较多的人的确更关注思想、文化方面的努力。也希望“根本改革”的傅斯年说：“二十年里的各种改革，弄到结果，总是‘葫芦题’，这都原于不是根本改革。放开思想去改革政治，自然是以暴易暴，没有丝毫长进。若是以思想的力量改造社会，再以社会的力量改造政治，便好得多了——这是根本改革。”[\[102\]](#)

而李大钊的特别之处在于能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论证“根本解决”的必要性，指出了“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故“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103\]](#)其关于“根本解决”的思路，与当时思想界的普遍倾向是相通的。

也许正是当时“根本解决”的风气太盛，出现流于空谈的倾向，掩盖了对许多具体问题的关注，所以胡适才觉得有必要站出来“反戈一击”，提倡从“抽象的名词”转向具体的“问题”。李大钊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104\]](#)他说话算话，不久便在《新生活》杂志上发表《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一文，提出20项需要研究和改良的社会“问题”，涉及税收监督、公共教育、贫民救助、妓女改造、道路交通、公共卫生等几个方面。文章最后说，“此外应加改良的事，必然还有许多，今天我只想起这些，其余的还要我们大家去想”。[\[105\]](#)

接着李大钊连续写出《被裁的兵士》、《归国的工人》和《青年厌世自杀问题》等文，指明这些需要关注的社群所面临的具体社会问题，如应该想到“裁兵后兵士的生活问题”，再加上欧战后被送回来的海外华工，“人数很是不少。这一大批失业的人，骤然散布在社会里，发生什么影响？应该怎样安插？很是一个大问题。我很盼望官僚式的政客、新闻记者先生们，破一点工夫来研究研究，不要单是摆着架子说什么‘隐忧’、‘隐患’、‘大乱之道’”。[\[106\]](#)他并说：“什么爱国咧，什么共和咧，什么政治改良咧，什么社会改造咧，口头上的话你们只管去说，吾侪小民，只是吃饭要紧。”[\[107\]](#)

可知他仍在实行其致胡适信中“誓向实际方面去作”的主张，且行文的口气也与胡适的相类。但李大钊也坚持了自己的基本主张，他分析青年自杀“问题”说：一方面，“自杀的情形因各个事件而有不同，我们不能够泛就自杀而下笼统的判断。我们应该分别自杀的种类，个别的论断他的是非”。另一方面，“自杀流行的社会，一定是一种苦恼烦闷的社会。自杀现象背后藏着的背景，一定有社会的缺陷存在”。故各种自杀“个别的原因虽然不同，而时代文明与社会制度的缺陷，实在是他们的根本原因、共同原因”。因此，“与其说自杀的行为是罪恶的行为，不如说自杀流行的社会，是罪恶的社会；与其责难自杀的人，不如补救促起自杀流行的社会缺陷”。[\[108\]](#)

持类似看法者尚有人在。罗家伦先就指出：北大学生林德扬的自杀，“原来不是自己杀自己，乃是社会杀了他”，是“处于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使优秀的青年，迫而自杀”。他说，“五四”以后，“我们青年的人生观上发生一种大大的觉悟，就是把以前的偶像，一律打破，事事发生一种怀疑的心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自然东望也不是，西望也不是。旧的人生观既然打破了，新的人生观这[还]没有确立，学问又可没有适当的人来作指导，于是消极的就流于自杀”。[\[109\]](#)

尽管罗家伦通常被列入偏向胡适的实验主义派，他在此文开头时也说林君的自杀“是社会上极重要的现象，我们哪能不研究呢”，颇体现出“研究问题”的意味；但如前文所述，罗氏此时多少也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若“社会一时不能彻底的改革，恐怕热心的青年，将要一个一个的自杀干净”。这样一种“社会杀青年”的结论和想要“彻底改革”社会的意愿出自所谓“实验主义派”，而李大钊此时又表现出特别关注各类实际社会“问题”的倾向，或提示着“问题与主义”之争未必像许多人后来认知的那样意味着新文化人的“分

裂”。

前引“胡绳课题组”的研究，已较多注意到李大钊和不久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陈独秀等与胡适观念接近的一面。<sup>[110]</sup>在陈、李之间，至少就本文所讨论的范围言，那段时间李大钊的观念与胡适似更接近，二人的思想互动也较多。而陈独秀大致是在争论之后才对相关问题较多关注，他在1920年初呼应胡适说，“我们中国人不注重实质上实际的运动，专喜欢在名词上打笔墨官司”。在他看来，“道理真实的名词，固然可以做群众运动底公同指针；但若是离开实际运动，口头上的名词无论说得如何好听，如何彻底，试问有什么用处？”他号召大家“努力在实际的解放运动上做工夫，不要多在名词上说空话”。因为“若要得到理想底实质，必须从实际的事业上一步一步的开步走，一件一件的创造出来”。<sup>[111]</sup>

但陈独秀并不完全赞同胡适的主张，他在大约同时也说：“胡适之先生不主张离开问题空谈学理，我以为拿学理来讨论问题固然极好，就是空谈学理，也比二十年前的《申报》和现在新出的《民心报》上毫无学理八股式的空论总好得多。”陈氏以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两书，都是“我们持论底榜样”。<sup>[112]</sup>几个月后他的见解有所改变，尽管他不欣赏“妄人的胡思乱想”，却觉得这样的“空空洞洞为害还小，只怕是东扯西拉弄得材料很丰富，一动笔便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培根、狄卡儿、马格斯、苦鲁巴特金等，牛头不对马嘴的横拉一阵，哪怕著书等身，终久是个没条贯的糊涂虫”。<sup>[113]</sup>

在整个1920年秋天，陈独秀连续发挥胡适的主张，先说“与其高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底实际运动；与其空谈女子解放，不如切切实实谋女子底教育和职业”；<sup>[114]</sup>继而又对广州青年说：“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底解决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当[原文如此]造通逃藪、安乐窝。”<sup>[115]</sup>当然，“改造社会”应该从大处着想，“应该在改革制度上努力”；但也要知道，“无论在何种制度之下，人类底幸福，社会底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他明确指出：那些“彻底”、“完全”、“根本改造”等想法，都是“懒惰的心理底表现”。<sup>[116]</sup>而“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sup>[117]</sup>

有一点应注意，上述言论的发表已在陈独秀到上海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后，那时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未必然，但至少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故陈氏这些言论以及前述李大钊“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的行动，再次表明当时争论双方的“对立”远不到一些既存研究所强调的程度。与陈独秀说“根本改造”的想法是“懒惰的心理底表现”相类，另一个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张申府也把“只道听涂说的瞎谈主义，绝不把实际的问题一加研究”的现象视为衰老民族惰性的体现。不过他仍指出：虽然“现成主义也可以为解决问题之妨碍”，但若“没有现成主义作指导，解决问题必至事倍而功半”。<sup>[118]</sup>

也许陈独秀自己也感觉他那样连续反对“根本改造”有些稍过，到1920年底，他又发表《主义与努力》一文，强调上面那些话是“专为空谈主义不去努力实行的人”说法，希望大家不要把他的意思“误会”为仅“主张办实事，不要谈什么主义什么制度”。其实，“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有可能。故“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但他这么说只是想避免产生“扶得东来西又倒”的效果，却并不否认自己确实“看见有许多青年只是把主义挂在口上不去做实际的努力”。<sup>[119]</sup>

## 4.2 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思考

既然陈独秀也观察到“许多青年”都在空谈主义，胡适的主张得到不少人赞同就不足为奇。不久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起初也是基本站在主张研究“问题”这一边的。他曾在湖南计划筹组一个“问题研究会”，并起草了章程，由邓中夏把它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章程》提出了需要研究的问题71项、140余个。目前尚未见湖南“问题研究会”的实际活动，但像那样重视“研究问题”并立刻开始筹备进行的，在当时仍不多见。<sup>[120]</sup>

当然，毛泽东也提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并具体列举了十种“特须注重研究之主义”。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这一态度或体现出在“问题”和“主义”之间的某种“调和”；不过，也很可能毛泽东那时并未看到或看重这两种取向间的对立。毛本人素有求实取向，早在1913年，他的《讲堂录》中就特别摘录了曾国藩日记中“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的话。<sup>[121]</sup>但他也早有兼顾“大本大源”和“枝节”的想法，且更重前者，主张通过探讨本源以获“一干竖立、枝叶扶疏”的效果。<sup>[122]</sup>

毛泽东在1920年2月感觉到“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尤其“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本来“很有研究的价值”，然而“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sup>[123]</sup>可以看出，这时他仍非常关注“问题研究”。但到同年3月中旬，他发现连黎锦熙这样的人也认为“中国现下全般局势”应该从“根本解决”下手，故觉得自己参与的“湖南建设问题”所提的改革主张，像“支支吾吾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颇有些不得已而为之的感觉。<sup>[124]</sup>

在1920年夏秋间，毛泽东数次强调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有“空架子”的特征，“太没有下层的组织”，缺



乏“真实的基础”。他说，“中国四千年来之政治，皆空架子、大规模、大办法”，就像“建层楼于沙渚，不待建成而楼已倒”。又说：“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sup>[125]</sup>

毛泽东认为，“有小的细胞，才有大的有机体；有分子的各个，才有团体”。故“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他说，“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现在尚不行。与“有些人所谓零碎解决实则是不痛不痒的解决”不同，实行“湖南完全自治”甚至“自立为国”，也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盖“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若“各省小组织好了，全国总组织不怕他不好”。<sup>[126]</sup>

那时毛泽东注意到列宁在俄国“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这一榜样，但显然认为中俄国情不同，故俄国能够“以国家促进地方”，中国却需要从“小地方”入手来解决“大国家”的问题。尽管如此，他仍从“俄国革命的成功”中特别注意到“有主义（布尔什维克斯姆）”的重要：“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若要在中国“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不仅“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湖南的新民学会也要从“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上升为“主义的结合”才好。

有了对“主义”的重视，毛泽东明确“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但他仍然“不反对零碎解决”。可是，不过几天，在获悉了蔡和森等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友辩论的内容后，部分也因为对其在湖南从事改革运动的失望，<sup>[127]</sup>毛泽东大幅度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最后确立了解决中国问题当采用俄式激烈方法的主张。

新民学会在法国的会友曾于1920年6月讨论到底是一举根本解决还是逐步渐进解决中国问题，参与讨论的李维汉回忆说：那次讨论“最主要的成绩是确定了新民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但会上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看法出现了分歧：一种意见是蔡和森提出的，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另一种意见是肖[萧]子升提出的，主张温和的革命，即无政府主义的蒲鲁东的方法，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sup>[128]</sup>

李维汉明言，对于“社会改造，我不敢赞成拢[笼]统的改造”；他主张“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因为“一个社会的病，自有他的特别的背景。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我很怀疑”。故对于“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但也不反对人家赞成他，或竟取法他”。<sup>[129]</sup>而蔡和森则认为，“凡社会上发生了种种问题，而现社会现制度不能解决他，那末革命是一定不能免的”。中国今日就是这样的状况，“所以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免”。<sup>[130]</sup>

毛泽东表示，他对李维汉的渐进主张，“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故明确表态不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sup>[131]</sup>到1921年初湖南新民学会讨论怎样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时，毛泽东倾向于陈独秀等主张的“改造”，而不支持梁启超等主张的“改良”。他以为，“改良是补缀办法”，而“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故“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具体方法，则极赞成采用俄式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且“用阶级专政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sup>[132]</sup>

法国会友的两项意见在湖南会友中也存在，但双方比例已较悬殊，最后进行的投票中，“赞成波尔失委克主义者十二人”，赞成“点滴改革”式的德谟克拉西者二人，赞成罗素式“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一人，未决定者三人。<sup>[133]</sup>这样，“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取向在新民学会里压倒了“零碎解决”取向，而且恰落实到俄国式道路这“一剂单方”之上，这与“五四”后中国思想界“从威尔逊到列宁”的转向大体吻合。<sup>[134]</sup>

那次新民学会的讨论可见“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明显影响，如主张“采革命的手段”的彭荫柏特别强调：“吾人有讲主义之必要，讲主义不是说空话。”主张学俄国的陈启民也指出：“言教育，言实业，须有主义，须用劳农主义。治病须从根本入手，一点一滴，功迟而小。”而周惇元虽同意“中国目下情形非破坏不行，惟于过激主义不无怀疑：束缚自由，非人所堪。宜从教育入手，逐渐进步，步步革新。吾人宜先事破坏，破坏后建设事业宜从下级及根本上着手”。这样既主张破坏，又希望步步革新，也要从根本着手的态度，看似犹疑，在那时却有一定的代表性（详后）。<sup>[135]</sup>

在讨论到会友怎样“研究学术”的问题时，毛泽东提出，“各种普通或专门学术，当让会友去自由研究，现会中所将要研究者，必为会友所共同注意且觉为现在急须的。主张单研究主义，如社会主义、实验主义等”。<sup>[136]</sup>实验主义虽然仍在“现在急须研究”的范围之中，却是作为讨论“研究学术”的一部分，与其论及“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的两派主张（即陈独秀等的改造和梁启超等的改良）相比，似乎已相对虚悬化。

略具诡论意味的是，对一些人而言，俄国式道路的可行性竟然还得到实验主义之助。陈启民在论证他何以“赞成俄国办法”时就说，这是因为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提出改造方法，只有俄国所采的办法可受试验的原故。其余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行会主义等，均不能普遍的见诸施行”。<sup>[137]</sup>把俄国的新型政治看作一种“试验”，是五四运动后一段时间里许多读书人的习惯用语，到北伐前后相当流行，<sup>[138]</sup>尤可见实验主义无形中对“新俄”象征的支援。

当不少关心国是的知识青年由“坐而言”转向“起而行”之时，社会“问题”与实验“主义”之间却产生了疏



离，或许是后者的影响日益限于学界的一个重要因素。施存统的看法或能印证这一尚属潜在的转移，他从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失败觉悟到，“要想在社会未改造以前试验新生活，是不可能的；要想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来改造社会底一部分，也是一样地不可能的”。其结论是：“改造社会，要用急进的激烈的方法，钻进社会里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sup>[139]</sup>“改造社会底一部分”和“试验新生活”都隐约可见实验主义的影响，但都被认为“不可能”，后者尤其被置于“社会改造”之后，显然有着缓不济急的意思。

大约同时，更具全国性的少年中国学会内也发生了与新民学会相类似的关于“主义和学理”的争论。“胡绳课题组”已注意到少年中国学会的讨论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关联，并认为王光祈的观点与胡适“颇有异曲同工味道”。<sup>[140]</sup>“异曲同工”是一个有分寸的断语，该学会中固有直接呼应胡适主张者，<sup>[141]</sup>但多数会员的讨论与胡适等人的侧重点还是有若即若离之感的。

## 4.3 少年中国学会的讨论

先是该会的上海同人正式致函北京同人，主张以后月刊中发表文字，“宜取极端慎重态度”。盖“现政界及社会普通人物，学识甚浅，不知审别，往往误认研究学术之叙述文字，以为会中之主张文字；又复不顾言论自由，竭其力之所至，横加摧残，甚或危及生命”。本来学会“对于政治及社会，纯取学术研究，尚未有主张”；即使以后确立“一定主义，亦在积极进行，无取张明旗帜，以召横祸”。何况“为叙述他人之主义而见残，殊不值也”。不如“暂时停止与学会存亡有关之言论，专从事于科学、哲学、人生观、群学等，以发阐之；则政治社会诸问题，不解自解，且较有根据矣”。简言之，即“多研究‘学理’，少叙述‘主义’，以求维持学会之巩固；即发阐主义，总注意毋危及学会存亡”。<sup>[142]</sup>

这样一种“不得不暂时忍辱”及先侧重学术的观念那时并不少见，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中就曾一再主张“取潜在进行态度”。<sup>[143]</sup>倒是蓝公武认为，以少谈主义来避祸也未必做得到：“在没有这些主义的时候，他们何尝少害了人呢。横竖吾们是他们眼中钉，有主义也罢，无主义也罢，总有一天拔去了，他们才痛快”。他希望趋新一边能“确立一种最信奉的主义，标明旗帜，和他们短兵相接”。<sup>[144]</sup>蓝氏的愿望正是少年中国学会此后数年间所致力者，学会最后也因此而消解，此不赘。但少年中国学会上海同人指出了当时一个较普遍的现象，即那些“研究学术之叙述文字”，其实也多不过是“叙述他人之主义”而已。

学会的北京同人复函表示“对于上海同志之建议，极表同情”。生活在“黑暗时代，发表言论，尤应慎重”。故主张“本会同人严守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之态度”。对于这一本会宗旨范围之内的活动，“同人自当互相与以积极之援助”；若有会员“对于政治兴味极浓，急欲登台一试；或对于社会组织有所不满，急欲从事社会革命”，本会“无论其成功失败，均不过问，听其自然”。只希望“个人在本会宗旨以外之活动，必不使其影响于团体”。<sup>[145]</sup>

但学会巴黎同人则认为，“学理主义，并非截然两事。所谓主义，实即学理之结论，学理即主义之原则。若主义而无学理的根据，不但宜少说，并宜摒除；若主义而根据学理，则吾人决不可因恐人误会及社会黑暗，遂隐忍不言”。他们所说的主义，是指“有学理上相当的根据，有将来具体的计划；并非求合于社会，实欲社会与之相合”。故“主义但当问其是不是，不当限制其多少。学理之研究，亦当切实有益于人生，不当与主义悬绝，徒尚空论”。实际上，社会的误会和黑暗，很可能即少数读书人“但研究学理不谈主义所致”，因其研究的结果与多数人无干，“使社会易于误会之习惯不能除，而社会之黑暗”也未见改善。为祛除误会、扫去黑暗，就要“多传述根据学理之主义，多研究有益实际之学术”。<sup>[146]</sup>

巴黎同人说，中国处此“近代空气之中，实有万不能不改善之势。而邦人积重难反”，故非“为根本的改造不可”。对这样的大事业，个人能力是有限的，只有“集成团体，内而互助，外而协力，庶几改造之业，能底于成”。在他们看来，“中国此时，处处皆是问题，方方皆宜着手。若从事于其间者，无一定之宗旨，自难收连贯主从之功，而有东扶西倒之病。故严格论之，即无主义不能作事”。必须有特定的“根本观念”来“指挥人生一切行为，若根本观念不改良，无论在何种空气之下，何种团体之中，皆无益处。故吾辈今后宜步步反省，步步改革，步步创造”。这里大体还可见胡适的影响，但巴黎会员也提出：“属于主义以下之分子，主义即其共同点，即系集合团结的唯一原因。分子应为主义而牺牲，主义不应为分子而动摇。”

这个在一定宗旨下步步行动的观念大致得到当时少年中国学会主要负责人王光祈的赞同，王氏注意到那时社会上正流传着“总解决——根本改造”和“零碎解决——因时因地因事解决具体的问题”两种相反的主张。他认为两种主张各有流弊，故“都不敢附和”。在他看来，“人都应该有一个理想目的，都应该有一个下手地方”；也就是“都应该有一个总解决的理想目的，都应该寻着一个下手地方——即对于与总解决有关之问题逐件解决”，以实现“总解决中的零碎解决”。<sup>[147]</sup>

若将此主张运用于“问题与主义”之上，即“主义便是我们的理想目的——总解决；关于这个主义的问题，我们应该逐件解决——零碎解决”。当时主张零碎解决的人，往往“见着小的，忘去大的”，虽“美其名曰研究问题”，实不啻“头痛医头、足痛医足”。而主张总解决的人，一方面对当时社会面临的各種具体问题“仍是不能忘情”，实“不能自圆其说”；同时又“只有理想目的，而无下手方法”。故王氏“对于现在一般‘纸上的社会主义家’，很抱有一种不安的态度”。既然“举世无一人可靠”，只有青年自己“拿出纯洁的思想、真的

知识，建立一个根本计划；然后再以热烈的情感、坚强的意志，一步一步的做去”。

《时事新报》的一篇文章也申论了类似的思路，该文认为：“改造的一种意义，是替换，不是修饰。千穿万洞的衣服，是补不好的，须得重做一件；东扶西倒的房屋，是糊不好的，须得重盖一所。”但文章又说，“改造的又一种意义，是建设，不是破坏。虽则改造行程中也不免有一段破坏工夫，但是他终极目的，仍在建设”。这样集整体“替换”和“建设”为一体的“改造”其实就是一种根本解决，但却落在局部改造之上：“凡是根基不好，根基上面的什么东西都不会好；局部不好，局部构成的全体也不会好。所以不去改造各界各地方的人，决不是个根本解决。”<sup>[148]</sup>这一取向与前引毛泽东“由分处下手”而“进于总解决”的主张颇为相近。

王光祈承认学会内“会员对于各种主义的态度，极不一致”，但大家还是“有一个共同的趋向，就是承认现在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无论在什么主义之下，都是不成功的。若要现在的中国人能有应用各种主义的能力，必先使中国人的思想习惯非彻底的改革一番不可，非经过一番预备工夫不可。少年中国学会的目的，就是努力从事这种预备工夫”，使将来的中国人“对于各种主义皆能运用自如”。其实各种主义“皆是一种人类的组织，而现在的中国人连作‘人’应该具备的性格和习惯都没有”，遑论去“从事‘人类’的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便是要想先将中国人个个都造成一个完全的‘人’，然后再讲什么主义”。<sup>[149]</sup>

以王氏当年好代人立言的风格，这未必真是大家“共同的趋向”。他自己就注意到，“大家心中，都有一个疑问：我们还是从政治下手吗？还是从社会下手？”强调先改造一个个的中国人这一主张，正体现出王光祈和巴黎会员之间的一个基本分歧，如郑伯奇稍后总结的，会员中对于“我们应该如何去实行我们所奉的主义”存在“两种趋向”：一种是“直接从事于社会改造事业的，想急进或缓进用革命来创造少年中国”；一种“可以说是用间接手段的，想由教育学术方面寻创造少年中国的路径”；前者“想先造少年中国的组织和国家”，后者则“想先造少年中国的人民和社会”。郑氏自己主张“要讲主义应从社会主义起码”，而“要研究主义，可以国民为对象而取一种实验的态度”，似乎偏于第二种。<sup>[150]</sup>

即使“以国民为对象”，也还有整体和个体之分，倾慕“新村精神”的周作人主张“改造社会，还要从改造个人做起”。<sup>[151]</sup>而胡适则明言“对于这个观念，根本上不能承认”。他说：“个人”并非“一个可以提到社会外去改造的东西”，而是“社会上种种势力的结果”，即每一个体的“我”都是“社会上无数势力所造成的”。因此，“改造社会的下手方法在于改良那些造成社会的种种势力——制度、习惯、思想、教育，等等。那些势力改良了，人也改良了”。他虽然强调“这种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而非“笼统的改造”，但这类“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的取向，多少也接近某种根本的解决。<sup>[152]</sup>

## 4.4 渐进的“根本解决”

在郑伯奇看来，主张根本解决和零碎解决者都有想要“改造”中国社会的共性。但不少时人也确实看到两者间的对立，胡适自己即是其中之一，他就认为“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他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sup>[153]</sup>丁守和、殷叙彝也注意到，和“问题与主义”之争相类的争论在其他许多社团和刊物中都发生过，在江西的改造社及其《新江西》月刊争论这一问题时，就有痛恨“空谈主义”并提倡多研究具体问题的表述。<sup>[154]</sup>

而郑伯奇观察到的“两种趋向”与前引毛泽东所见似不同，毛氏眼中较对立的“改造”和“改良”两派在郑氏看来皆属于“直接从事于社会改造事业”的一类。其实毛本人也曾倾向于先从一个个的国民下手，他在1920年曾说，“国民全体是以国民个人做基础，国民个人不健全，国民全体当然无健全之望”，故应通过改造个人来增进团体力量。不过他后来在新民学会巴黎会员的影响下转变了观念，渐倾向于其原本不认同的“以政治组织改良社会组织、以国家促进地方、以团体力量改造个人”的苏俄方式。<sup>[155]</sup>

有一点应注意，当年的立说者对于他们正在使用的“新名词”并未认真界定，一方面，不同名词可能指谓着同样的事物；另一方面，有时语汇的不同也未必意味着其主张有多大歧异。譬如毛泽东及许多新民学会会友所说的“改造”取向（以陈独秀为代表），今日恐怕更多会说成“革命”。而张东荪当时就指出两者的共性，他以一篇名为《各自改造》文章来提倡“各自革命”，并解释说，“我说的各自革命便是各自改造。因为革命是改造的第一步，所以我先提起革命。现在我因为‘革命’两个字人家容易误会，乃改用‘改造’两个字；其实革命是‘更新’的意思”，正与改造相通。<sup>[156]</sup>

那时不少人的确主张以点滴渐进方式“改造”中国社会，至少在词语上印证了郑伯奇的观察。如《新群》上的一篇文章就认为，“社会改造的事，是慢慢的做到的，不是一下子做到的；是零碎做到的，不是一举成功的”。故最好的办法是“按着一件一件的制度，去慢慢的求改革，才能达到改造社会之目的”。<sup>[157]</sup>在安徽办《微光》的韦丛芜等则表示：我们“不侈谈主义，只注重以浅显明了的理论，实地去宣传”；希望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和平民接洽，“使他们的思想渐渐转变，不知不觉渐入正轨，起社会思想之大革命”。<sup>[158]</sup>

张东荪也说，“从来政治上的改革家只主张大革命，所以革来革去，丝毫没有进步。因为他是改造屋顶，是不中用的。必定也把屋基拆了，重新改造一回方好”。而他所谓拆屋基，则是“各地方自己革自己的



命；在一地方内，各部分革各部分的命”。积“无数的小革命”以成“一个真正的大革命”。<sup>[159]</sup>这样的“各自革命”，与毛泽东“由分处下手”而“进于总解决”和王光祈从改造局部走向“根本解决”的主张相当接近，应能反映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

李大钊在1920年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说中指出，社会主义“须将现今制度完全改革”，并在生产和分配方面“寻出一种新方法，代替旧式之私竞的经济秩序及组织”。这当然是一种“根本的解决”，但他也说，社会主义实行的手段“各不相同”，包括“革命”的手段及用平和手段“渐渐进行的改革达到目的”者。<sup>[160]</sup>可知他此时至少承认有以平和手段“渐渐进行的改革”来实现根本解决的取向，且并未将其排斥在各种实行社会主义的“手段”之外。

另一位承认“劳动与阶级社会之大革命”必发生于将来社会的作者，也想要预“筹社会革命之正趋的方法，以弭猛潮，实行根本的解决，求相当之代替”。他提出了普及教育、团结劳动界和实行自治三项方法，欲以此“为社会根本改革，代替社会革命”。<sup>[161]</sup>此人虽明言希望以“改革”代替“革命”，但也自认为其主张是一种“根本的解决”。

正如李新、陈铁健等指出的：“当时有些人虽然主张‘根本解决’，但也只是一个笼统的大目标，其方法还是比较倾向于和平的或零碎的解决。”<sup>[162]</sup>另有一些人则既看到根本解决和零碎解决之间的对立，又以为应循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途径，从“部分”入手改良“全体”。如北京的《光明》杂志就明言“我们并不空谈什么主义”，我们“要研究的并不是什么‘主义’和什么‘学说’，乃是几个简单生活的问题、习惯改良的问题”。但其之所以这样的理由却是：“改良‘部分’就是改良‘全体’，要改良大的远的，必先要改良小的近的。”<sup>[163]</sup>

在五四学生运动前后政治态度还颇温和的恽代英<sup>[164]</sup>也有类似毛泽东的转变，他在1920年秋撰文论证“革命的价值”时，自称是一个“痛恶政党”和“完全不信政治运动值得我们努力的人”，但“相信这几年中，究竟逃不了有一次革命”。他虽然“十分不愿意看见流血的事”，但若革命确实“不可避免”，则“我们应该怎样利用他，利用他到怎样的田地，这值得我们事前研究预备”。恽代英希望热心革命者“须知革命不是治疗百病的神方，便在破坏一方面，亦非能具备几个条件不能生一点效验”；同时“盼望更勇敢更切实的人，还须注意社会的根本解决，不在轰轰烈烈的破坏，还在善战无名的建设事业中间”。<sup>[165]</sup>

那时的恽代英已确信“个人主义的新村是错了的，个人主义的工会罢工，亦非根本良法”；若“用一手一足之劳，想逆经济潮流与资本家争胜”也是行不通的。“要改造这个世界，一须做一个共同生活的模型，使世人知道合理有幸福的生活是可能的事；一须我们大家协力，不但解决自己及家庭生活问题，而且要有力量与资本家决斗”。至于决斗的方式，固然“可以组织工会，鼓吹罢工，用阶级战争为推倒资本家的方法。但我想要为世界求一个最后的解决，仅仅靠鼓动争存的单纯天性，总还不够。最好莫如利用经济学的原理，建设一个为社会服务的大资本，一方用实力压服资本家，一方用互助共存的道理，启示一般阶级。而且靠这种共同生活的扩张，把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sup>[166]</sup>

恽代英的《未来之梦》一文发表在《时事新报》之上，颇得张东荪赞赏，以为是“采资本主义之方法以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可谓独具只眼”。他希望多有些持这样观念者，“各分头进行，既不问中央政治，复不问地方政治，亦不谈何种主义，行之数年以后，再谋大同盟，以商定一种具体之主义，不为迟也”。张东荪自己就改变了过去“常觉有制定一种吾辈所托命之主义之必要”的想法，以为“必择一种主义而信为灵药”不过是万分无赖时“精神上之安慰”，其实是“环境太坏之一种反动。此太坏之环境实为问题之根，吾辈当硬着心肠以向此问题之根而求逐渐改造也”。<sup>[167]</sup>

舒新城当时曾对张东荪说：“中国现在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什么主义的余地，因为中国处处都不够。”张氏认为这句话“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因为“现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他说，“我们苟不把大多数人使他得着人的生活，而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如果要有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等”。这些意思看来很像前引王光祈的主张，不过王氏拟在“思想行为”上着力，以使“中国人能有应用各种主义的能力”，而张东荪则明言“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那就是发展实业。<sup>[168]</sup>

其他时人也有相类似的见解，如新民学会的周惇元就认为“吾人宜先事破坏，破坏后建设事业宜从下级及根本上着手”；同会的张泉山也曾主张“第一步采过激主义”，第二步“采用罗素、基尔特社会主义”来纠正俄国人牺牲自由的弊端。<sup>[169]</sup>而张申府提出的“中国改造的程叙”依次是，“革命、开明专制、实行极端的强迫教育”，然后改良农业，整理森林河渠，兴发工业交通等。他所说的开明专制就是苏俄的“劳农专政”，而张氏之所以设计出这一程序，是因为“以今日中国之一般知识阶级而言代议政治，讲选举，纯粹是欺人之谈”。<sup>[170]</sup>其言外之意即采用开明专制是中国人还不到实行代议政治的程度。

这样一种先激进后缓和或先革命后改良的“阶段革命”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都有人主张。傅斯年大约撰写在1919年的一篇未刊稿就认为，世界“近世史是要求平等的历史”，是一个“有始有终的政治社会改造运动”。其中前面的“政治革命”仅仅是同“一种运动”的“一小点，以后放着一大部的社会改造运动，不过是以往政治革命的补充，其意味没有两样”。<sup>[171]</sup>

陈炯明在1924年曾制定一种阶段性规划：“第一期则为‘武装革命’，以毒攻毒，期以一二年而成功。第



二期则为‘文装革命’，放下屠刀，从事宣传。”盖“老百姓不出，如民治何？”故需要分两个时期，“一为戡乱，一为制治”。<sup>[172]</sup>到北伐时，太虚法师也提出类似的阶段革命论，即国家统治者的改变只是“命令之革命”，但还有“继续生存之势力习惯”，所谓“国之势力所形成者为政制，国之习惯所形成者为礼教”；要使一国之政制、礼教皆随政治权势的转移而革故鼎新，方为“生命之革命”。必“生命之革命成功，命令之革命乃为有效”，后者成功才算完成“革命之功”。<sup>[173]</sup>

这些看法当然互有歧异，比较起来，恽代英的表述显得较系统也更具体。那时他还认为革命只能破坏，且其破坏力可能是有限的；而“用阶级战争来推倒资本家”也不过是依靠鼓动人类“争存的单纯天性”。要“建设事业”才是“社会的根本解决”，通过利用“经济学的原理”以资本压服资本家，再用“互助共存的道理，启示一般阶级”，构建一个“共同生活”来实现社会主义，“为世界求一个最后的解决”。这些人的见解值得反思，其一个共性即“根本解决”对不少时人而言未必意味着革命，或革命不过是走向根本改造的第一步，且不排除通过“逐渐改造”实现根本解决。

## 4.5 中共党人的主张

陈独秀不同意上述取向，他认为新村运动、北京工读互助团，以及恽代英的想法皆类“痴人说梦”，“在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底余地”。<sup>[174]</sup>恽代英自己不久也成为中共党员并改变了主张，他在讨论“民治运动”时强调要把“每个为自己谋利益而作战的联合”逐渐“引他注目政治，引他求政治上的总解决”。改变观念后的恽代英转认为“各方面零碎的解决，固然可以作练习作战的目标；但我们不可忘记，只有向政治上战斗，以求人民获得政权，用人民的力量建设、拥护而监督一种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才真能有一种成功”。<sup>[175]</sup>全文未提经济，建设也仅模糊提到，而特别强调“向政治上战斗”以寻求“政治上的总解决”。

但即使中共的观念那时也是灵活而具有包容性的，如1922年初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的《发刊词》在论及新文化运动的结果时就说：“近一二年来言论界，大非‘五四’前后的言论界了。大家都在纸上空谈不着边际的主义，并毫无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决心。”<sup>[176]</sup>《先驱》的前三期由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北京组织所办，李大钊、邓中夏、刘仁静等人当时都领导并积极参与北京青年团组织的活动。<sup>[177]</sup>同年稍后，这些著名的中共党人更联名在少年中国学会中提出一份推动“革命的德谟克拉西”的提案，明言不谈任何主义，只研究目前的事实问题。

提案一开始就说，“我们现在不谈任何主义，我们只研究中国目前的事实问题”。当时的中国是“内政腐败”，外国资本“挟政治势力以俱来”，致使“经济日渐枯竭”、人民的生活状况沦落，而“物质的束缚影响及于精神”，不仅一般民众“同情心消失，合群性沦亡”，就是知识界也显得“知识贫窳，缺乏活气”，大多数为衣食奔走，难有余力研究学问。简言之，“道德知识两俱缺乏，这便是今日惰性的中国，也就是今日麻木不仁死气沉沉的社会”。他们认为，“这种社会，不是以空泛的道德目标和不实用的科学常识所能征服的。而且除非物质生活的改善，永远不能将他完全征服。改良物质生活的唯一方法，是只有铲除国内的督军制和国外资本主义的这二重的障碍，由中国人开发本国的实业”。<sup>[178]</sup>

这大致确认了恽代英一年多以前的主张，但有一个重要的改动，即发展实业的前提是铲除内外障碍。提案进而指出，“唯一解除苦厄实行的方法是只有引导被压民众为有目的的政治斗争。政治斗争是改造社会，挽救颓风的最好工具”，这基本与恽代英后来的主张相同。由于“国内军阀政治的横暴，国外资本主义的压迫，将中国改良的各种希望都渐灭殆尽”，提案号召“任何主义者”在这时“抛弃一切武断的成见，客观的考查中国的实际情形”，以“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提案最后重申：“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学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

李大钊等以“不谈主义只研究问题”为开场白，结尾再重复不要“空谈高深的主义与学理”，部分可能是中共那时正在提倡“联合战线”，有意向主张“研究问题”的一方示好；<sup>[179]</sup>也可能因为提案特别针对着少年中国学会当时正就是否需要统一“主义”而争论。但《先驱发刊词》和提案的观念一致说明这样的表述或并非偶然随意为之，而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共产党人那时的观念。

直到1924年6月，主持《中国青年》编务的李求实在论证青年学生怎样发动民众参加革命时，仍主张我们应“少发些抽象的哲理高论，多注重于具体的实际问题”。他进而表态说：“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话虽未免有些人觉得不满；然而我们从一种的主义上去切实的研究民众——研究现实，总是应该的。”<sup>[180]</sup>

这样看来，“问题与主义”之争反映出的时代关怀是广泛而持续的，在一般认知的争论“结束”以后，包括一些中共党人仍在思考和呼应胡适的主张。同时，对少年中国学会一些成员而言，主义和学理是对立的；但对很多他人来说，当年的主义和学理其实意味着那需要输入或正在输入的外来思想资源。如前引少年中国学会上海同人所指出的，当时许多“研究学术之叙述文字”，其实不过是“叙述他人之主义”而已。既如此，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必须处理的问题。

## 5. 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

民初趋新中国人的口头禅之一即“世界眼光”，在一些人的思考中，中国的改造或革命也是“世界改造”或“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使外来主义和中国国情的关系与前面所论述的整体改造 / 革命和局部改造 / 革命的关系产生了某种关联呼应，并相应产生出两种思考：一种倾向于世界的整体性，中国的改造或革命将在世界改造或革命的成功中一起成功；另一种则注意到中国自身的特殊性，即世界之一部分的改造或革命与整体的世界改造或革命虽有关联，但也有其独特之处。<sup>[181]</sup>

此时恰逢“西方”在中国“分裂”，即作为榜样的西方是可分且应该有所选择的；而由于主义和学理基本是外来的，它们又像已经被“负面整体化”的中国“传统”那样带有“一家眷属”的不可分意味。这一内在的紧张给许多趋新人物带来困惑，通常是愈了解西方者愈感到有澄清的必要。一般视为尊西象征的胡适在五四运动前后一再提出：引证西洋学理应该考虑适合于“中国今日的问题”、必须能够“应用于我们中国今日的时势”，要在“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的基础上输入外来的学理和主义，想必具有非常不得已的紧迫感觉。民初思想界的错综复杂和诡论意味由此凸显，特别值得进一步分析探讨。

### 5.1 中西社会的歧异

这与“西方”分裂之后各种外来“主义”以中国为战场的现象相关，或许胡适已隐约意识到这一点，盖“主义”都来自西方，它们之间的竞争实不啻西与西斗；不仅中国沦为他人之战场，西方学理的自我争斗也未必有利于“输入学理”；若多研究问题，则具体问题都是中国的，仍可用西法解决之。所以他提出，“主义本来都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法，但是一种问题的解决法，在大同小异的别国、别时代，往往可以借来作参考材料”，则“主义的应用有时带着几分普遍性”；他只是反对“因为这或有或无的几分普遍性就说主义本来只是一种抽象的理想”。在研究了“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之后，诊断中国所患之病及下什么药都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sup>[182]</sup>

胡适最初的反对者却更多看到他意思中的另一面，蓝公武就说，“胡君的意思，以为一切主义，都不过是某时某地一种具体的方法转变来的，和吾们实际的需要未必能符；各有各的需要，各有各的方法，故说外来的主义是无用的”。<sup>[183]</sup>最后半句当然非胡适原意，而是蓝氏自己“提升”出来的。但他和李大钊二人在反驳胡适主张时却都指出了中国与西方社会的不同，只是西方社会要更“正确”些。

蓝公武自己就说：“社会的环境不同，主义和问题的关系也就不能一样。在文化运动进步不息的社会，主义常由问题而产生。……若是在那文化不进步的社会，一切事物都成了固定性的习惯，则新问题的发生，须待主义的鼓吹成功，才能引人注意。”前者当然是指西方，那里“一切事物都属能动性，常跟着时代前进，偶有那不进的事物，立刻便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成为问题，有问题便发生各种运动。从这运动中，便产生了若干主义，拿来作解决方法的实行标准”。后者则是中国，这里“无论何种事物，都有一个天经地义的因袭势力支配在那里，有敢挟丝毫疑义的人，便是大逆不道；如何能拿来当一个问题，去讲求解决方法呢”？必须要“有一种强有力的主义，鼓吹成熟，征服了旧习惯”，才可能“制造成”问题。<sup>[184]</sup>

他举例说：“譬如专制君主的害毒，在中国行了几千年，并没有人觉他不合理，拿来成一问题；及至最近数十年，西方的思想输入，人民有了比较，起了反省，即便成了极大的问题，产生出这辛亥革命的大事件。又如东方的家族制度、奴隶劳动，在今日思想已经进步的时候，尚不能成为问题；若移到西方去，立刻便成了一种不可终日的问题了。”在蓝氏看来，这证明“构成问题的要素，全在这主观的反省”，<sup>[185]</sup>但他无形中确实帮助胡适说明了中西社会的确不一样。

蓝公武进而承认，“在因袭势力支配的旧社会，他的需要，和那文化进步的社会，都是大不相同的”。不过对他而言，这反表明中国非常需要外来的主义以“制造”问题：既然“旧习所支配的社会自身不能发生新理想，则往往由他国输入富于新理想的主义，开拓出一个改革的基础来”。其实，“中国今日所有的新需要新问题，那一件不是外来的思想主义所产出来的？”只要中国“打开大门与世界文化接近，这个时候，吾们的需要，和欧美人的需要，也就相差不远”，外来主义的用处也就呈现出来了。<sup>[186]</sup>

应该说，蓝氏关于中国当时不少新需要、新问题是外来的思想主义所“产出”的观察不无所见，他很可能担心胡适的主张会妨碍当时向西方开放的趋势，故感觉不能不站出来说话。他在试图与胡适比谁更开放和趋新的言论中揭示了自己的顾虑，即胡适的主张可能导致“关上大门，排斥一切外来的思想”，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自能满足我们的需要”。然而蓝公武忽视了关键的一点，即中国需要“打开大门与世界文化接近”，恰因中国社会与承载着“世界文化”的西方社会不同。

李大钊在讨论对根本解决“不可一概而论”时也说：“若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举例说，俄国就是在推翻罗曼诺夫王朝和进行经济组织的改造之后，才把一切问题“全都解决了”。<sup>[187]</sup>



可知李大钊也清楚地看到中西社会的歧异，且他也像蓝公武一样认为西方社会更高明。不过他认为两者的差别可以通过对主义的不同“运用”来解决，即“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般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陈独秀正是从中西社会的不同看到革命的紧迫性，他认为，“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时间上不容中国人采取“渐进的Evolution”，故只能“取急进的Revolution”。<sup>[188]</sup>

胡适自己有时也分享着类似的中西歧异观，他后来在讨论“革命的根本方法在于用人功促进一种变化，而所谓‘人功’有和平与暴力的不同”时指出，“在未上政治轨道的国家，旧的势力滥用压力摧残新的势力，反对的意见没有法律的保障，故革新运动往往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公开活动，往往不能不走上武力解决的路上去”，当时的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尽管他非常清楚“武力斗争的风气既开，而人民的能力不够收拾已纷乱的局势，于是一乱再乱，能发而不能收，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扰乱而不能安宁”，但中国也确实缺乏通过宣传鼓吹、组织运动，以及立法或选举竞争等改变旧制度的条件。<sup>[189]</sup>

这一看法充分暴露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困境：他们既承认中国的国情基本不允许实行渐进的政治改良，又因暴力革命可能造成的破坏而主张仍实施和平的改良，但一般“起而行”的热血青年恐怕很难接受这样看似矛盾的取向。如果说初期的争论基本是学理上的，到中共成立之后，实际而具体的“革命”活动就迫使中共党人进一步思考输入的主义或学理怎样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其间还隐伏着一个与后来中共党内持续关注的“教条主义”相关的问题。下面主要探讨一些早期中共党人的观念。

## 5.2 中国问题的世界解决

陈独秀认为，输入学说应该“以需要为标准”。“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为他能够救济一社会一时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故“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底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他举例说，中国输入达尔文进化论，是因为“我们不懂适者生存底道理，社会向着退化的路上走”。如今“我们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革新希望的，生产劳动者又受了世界上无比的压迫，所以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底需要”。<sup>[190]</sup>

毛泽东在1920年3月论及出国留学时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故“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sup>[191]</sup>在次年1月新民学会的讨论中，他解释何以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提法说：“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其实“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sup>[192]</sup>

张申府与毛泽东的想法颇接近，他在留学法国后，“感着欧洲一时是无望的。生于东方的人，不能不仍希望东方。最好的希望是中俄之联合”。张氏也提出，应该“本世界见地改造各个地方：不要为一地方好而改造那个地方，要为世界好而改造各个地方。就令一切地方各单独像是好了，世界全个仍可以不好；世界全个不好，各个地方其实不能好”。他认为，“世界趋势固要晓得，但勉随趋势而忘了自己实况，必无好结果”。盖“政治尤不可专模仿人”，列宁的“一大长处”就在能认清自身的事实。<sup>[193]</sup>

张氏提到列宁的“长处”其实有较深的含义，因为在涉及中外社会对比时，苏俄不仅是革命成功的榜样，且横亘于中国和西方的参照关系之间：俄国社会在许多方面不同于西欧是许多时人都看到的，但对中共党人而言可能还有一个更具体的理论问题，俄国的“资本主义”发达程度不及西欧却又超过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主要涉及的是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而列宁则更多论及俄国的具体革命实践。这样，中国情形与“世界”局势的异同问题给中共党人带来较他人更深一层的理论困扰。

一些早期中共成员始终在尝试梳理这些复杂的关系，比较明确论及这一问题的是前引《先驱》的《发刊词》。文章指出：辛亥革命以后，虽然专制改成共和，实际却是“反革命的势力冒着民主的招牌，以行他们的抢掠之实”。新文化运动的结果也不使人乐观，“大家都在纸上空谈不着边际的主义，并毫无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决心”，致使“反动的势力”也“乘着这人家不注意他的机会大施其活动”。故“本刊的任务是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打破因袭、奴性、惰惰和倚赖的习惯而代以反抗的创造的精神”，并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走向共产主义的社会。<sup>[194]</sup>

但“有了这种精神，我们若不知道中国客观的实际情形，还是无用的”。那些“不就客观的实际情形研究，而徒凭个人主观的思想，想改造社会的人”，动机虽不错，然其“罪恶在实际上与反动派保守派没有什么分别”。该刊表示要参考“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成绩和失败之点”，并特别提请关注“俄国革命的状况和革命以后的建设”，因为“许多人都只知道骂俄国和赞美他”，却未曾注意研究“他的施设和他运动的方法”。文章



反对“不谙实际的传播一种高调的主张”，而强调要“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后面这句话很多中共党史的论著都曾经引用，但前面那句反对在纸上空谈主义而提倡研究问题的话则很少被引用。其实这一《发刊词》的结构有些类似前引李大钊等在少年中国学会的提案，即开始提到应研究问题不空谈主义，后面以反对高调主张，提倡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形照应之，并婉转说明输入学理和研究问题的关系，大体可见那时中共党人注重“实际”的态度，与胡适此前的主张也比较接近。

“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究竟如何？以及什么是“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中共党人还有进一步的探索 and 讨论。基本上，多数中共党人都像毛泽东和张申府一样强调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联，不过更多依据马列主义的理论来立说；他们也都注意到中国社会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异，蓝公武和李大钊那种“在欧洲本可如何，但社会不同的中国则不同”的表述形式也常出现在后来的中共党人的言说中，只是西方在蓝、李眼中是“文化运动进步不息的社会”或“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后来的中共党人则多以资本、资本主义和阶级等概念来界定西方的社会。

与毛泽东和张申府那种相对直观的表述不同，不少早期中共党人是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来认识中国革命的世界性。蔡和森在1921年2月说：“因为交通发达的结果，资本主义如水银泼地，无孔不入，故东方久已隶属于西方，农业国久已隶属于工业国，野蛮国久已隶属于文明国，而为其经济的或政治的殖民地。”世界既然一体化，“劳动解放绝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乃是一个世界的社会问题”。故“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195\]](#)

施存统在同年5月也说：“资本主义是带国际性质的，彼是要征服全世界的；共产主义也同彼一样，也是带国际性质的，也是要征服全世界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住在这块地方的无产阶级，也当然要起来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同心协力干这个全世界的社会革命”。[\[196\]](#)

蔡和森因而提出，“现今全世界只有两个敌对的阶级存在，就是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由于资本主义常常通过掠夺殖民地以缓和本国的经济剥削，甚至“分余润于其无产阶级”，使其“常常受其资本家的贿赂笼络而不自觉”。故“东方农业国野蛮国的无产阶级”所受的经济压迫，“较西方工业国文明国无产阶级之所受为尤重”。[\[197\]](#)

这类见解或者在留法学生中较流行，稍后周恩来也说：“全世界凡经资本主义铁蹄所践踏的地方，概都形成了同样的两大阶级：一是压迫阶级，一便被迫阶级。”前者“是以各强国的资产阶级为中心，各产业落后国的封建军阀只不过是他们的爪牙”；后者则是“工业先进国中的无产阶级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他们都“站在同一被剥夺被欺凌境地”。[\[198\]](#)可以看出，周恩来关于“被迫阶级”的分析与蔡和森略有不同。

陈独秀后来解释中国民族革命“是整个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说，“这两个革命的对象只是一个：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故“尽力世界革命即是尽力中国民族革命”。由于“全世界的经济成了整个的，全世界政治也直接间接在这整个的经济影响支配之下成了整个的”，故世界各部分的革命运动“相互影响之关系日渐密切”，也已“汇合起来成了整个的世界革命”而“不能分开”。中国在政治上为国际帝国主义所共同征服，在经济上是国际帝国主义共同掠夺的市场，若“不根本推翻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中国民族不会有完全解放之可能”。[\[199\]](#)

稍后《中国青年》的一篇文章说，“在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里，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政治经济，都具有他的国际性”，决不可能闭关孤立，“脱离国际的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相互间之公友公敌的关系而单独发展”。故中国国民革命的国际意义即在于它是“世界革命的局部工作”。[\[200\]](#)但是，世界革命的整体性以及世界性地划分“阶级”这类“公友公敌的关系”隐伏着一种可能性，即为了“整体”的利益而牺牲“局部”具体一国的利益。

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的民族革命曾得到苏俄援助，当凯末尔转而枪杀共产党人时，苏俄从“世界革命”角度考虑，仍对其提供物质援助，理由是凯末尔正在反帝。后来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即以此为例，主张以同一思路来处理中国革命中的国共关系。这是后来莫斯科一再反对广东北伐的重要出发点，因为北伐非常可能导致国民革命军和冯玉祥国民军的军事冲突，而国民军被打败则可能妨碍苏联正与张作霖进行的谈判。[\[201\]](#)这样，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作为世界革命“局部”之一中国革命也需要明确其独特性，这一点只能落在清楚地认识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形的基础之上。

## 5.3 探索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

中国社会情形不同于西方产业社会是早期中共党人的共识，这在理论上也为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提供了依据。前引李大钊1920年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便体现出他自身观念转移的轨迹，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这看上去与此前那种包容胡适观念的表述仍接近，但这次中国的“特性”却发生了变化，是“因中国受国际压迫（帝国主义与资本主

义），各阶级是相同的，所以实行时应当与资本中等……阶级联成一气，使中国成一独立者，不受国际压迫者之国家”。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情形是国际关系之故”，为打破国际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运动，当然以国际为范围”。<sup>[202]</sup>

陈独秀稍后提出，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民革命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同时“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有别于“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和“资产阶级崩坏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这两种“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sup>[203]</sup>后来邓中夏更明言：“中国革命的政权问题，并不是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政权，也不是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政权，而有中国的第三种形式”，即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一方面要消灭一切封建残余，一方面继续反帝国主义的奋斗，成一个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政权”。<sup>[204]</sup>

不仅中国革命是特殊的，中西国情的不同也成为中共党人分析中国阶级和社群的一个重要切入点，陈独秀在论证中国青年学生的革命责任时即说，“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社会有其“特殊状况”，即“幼稚的各社会阶级，都还在睡眠中，只有学生们奔走呼号，成了社会改造的惟一动力”。这样，他们“责任的轻重，与欧、美、日本的学生迥然不同”。中国学生的“特别责任”在于，“第一努力唤醒有战斗力的各阶级；第二努力做有力的各阶级间之连锁，以结成国民的联合战线”。<sup>[205]</sup>

青年团中央书记刘仁静也说：“资本主义的列强的学生，多半是中产阶级社会的子弟，列强的工业发达，中产阶级在他们的国家握有政治和经济的权力，所以他们能安心求学与学有所用；他们在社会上不成为一种特殊势力，他们无改造社会的志愿。中国的情形适得其反，学生与他们的家庭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同为被压迫者，所以他们必然的倾向于改造社会，从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此是中国特有学生运动西方所无的根本原因。”<sup>[206]</sup>

彭述之稍后更说：在欧美资本社会里，知识阶级“十分之八九是附属于资产阶级，充当资产阶级的走狗，因此它常是反革命的，如现时西欧各资本国里之知识阶级十分之八九是属反动派。可是在中国却不然”，中国知识阶级“除一部分为帝国主义所收买，军阀所雇佣，资产阶级所役使以外，差不多都有几分浪漫的革命性”。他们受帝国主义的侮辱，受军阀的冷视和摧残，故也“很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很赞成国民革命，并且有时还很激烈地参加革命”。<sup>[207]</sup>

而邓中夏则从中西社会差别中看到中国无产阶级的特殊力量，他反驳当时中共党内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很幼稚”的看法说，殖民地半殖民地与“产业先进国”不同，那里的资产阶级有本国和外国之分。如在中国，中、外资产阶级二者至少处于均势；由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在本国的和外国的两个资产阶级之下发育孳长的”，故在中国资产阶级尚幼稚而力量不强时，无产阶级却能“长成壮大”。<sup>[208]</sup>

瞿秋白也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处于世界革命的时代及国民革命的中国，他一开始自己的运动，便不得不直接参加政治斗争，决不能限于改善自己生活的经济斗争。‘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的’。这句话在西欧和俄国仿佛有一时期还是比较抽象的说明，在中国却是异常明显而具体的真理。”<sup>[209]</sup>这里的言外之意，正因中西社会的不同，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性上是超过其欧洲同类的。

上述言论大体出在中共基本意识形态的形成期，其中许多具体表述在中共后来确立的理论解释中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写，固不一定“代表”中共的正式看法；但这恰好体现出早期中共成员对世界环境和中国革命的认识并未形成一个抽象、清晰而固定的概念，而更多是一个不时出现意见分歧和观念竞争的持续辩论进程，一个随中国外在环境和内部社会条件的改变而不断重新认识和不断修订观念的进程。

在这样的进程中，中共党人一方面“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同时也在中西社会和国情不同的认知基础上，曾长期致力于建立某种“联合战线”（视具体时段而不甚相同），因而对一些后来定义为“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观念采取了更灵活也更包容的态度。不少中共党人认识到特定的西方理论可能因中西社会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作用，李大钊在论证其通过对主义的不同“运用”来解决中西社会的歧异时所举的例证是社会主义，而瞿秋白则以为实验主义在中国的作用虽有两面性，仍比在欧美具有更正面的价值。

瞿秋白在1924年提出，实验主义“教中国人自问‘为着什么而生活，怎么样生活’？在中国是旧制度崩坏，新阶级兴起时的革命标语；在欧美却是旧阶级衰落时，自求慰藉的呓语”。而其“且解决目前问题，不必问最后目的”这一原则，在欧美“纯粹是维持现状的市俗哲学”，若“应用于中国”，更有两重性：对于资产阶级，它意味着“不要管什么礼教罢，怎样能发展你自己便怎样做”，故“是很好的一种革命手段”；但其“他对于劳动阶级的意义却是：不用管什么社会主义了，怎样能解决你们目前的难题，便怎样做去算了”。故其“一方面是革命的，一方面就是反动的”。<sup>[210]</sup>

另一方面，中共党人在强调获取当时当地的知识方面，有时还真与胡适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处。张国焘在1922年特别针对那些到研究室去研究学问的五四“爱国学生”问道，“你们现在研究三年工夫了，现在你们得着什么了？”他说，“我们很知道‘知识便是权力’，我们并不看轻知识（马克思派还特别看重知识）”；不过，若“要得到知识，便要是得到一种与民众有利的知识。要得到与民众有利的知识，只有在民众中间去活动才能得到这部分最重要的知识，在书本子上是得不到什么的”。他承认这些人也“知道民众的觉醒是重要”且“也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但其只“在研究室里研究一些空的理论，用‘预备改造中国的工具’的语调欺瞒自己，完全把现实政治和中国问题置之不问”，实际起不到唤醒民众改造中国的作用。<sup>[211]</sup>



张国焘的观察当然不是无的放矢，周策纵后来就指出，自由主义者虽然提出“多研究些问题”，他们自己实际“很少参加社会调查和劳工运动”；倒是“很多社会主义者及其合作者却开始走到工人和农民中去研究他们的生活状况”，这不能不说是“具有讽刺意味的”。<sup>[212]</sup>故李维汉曾指责“中国所谓时贤，连分析批判过去的、死的历史的能力还没有”，更不了解中国的现实。他像张申府一样注意到，“列宁一生之长处，即在于”其不仅能“整理过去历史找出其中原因规律”，尤善于“综合考察批判眼前之事实，以求得新的进展的工具”，故能领导俄国革命取得成功。<sup>[213]</sup>

然而胡适自认比中国的知识青年更了解中国的实际状况，他在1930年说：“谈主义的书报真不在少数了！结果呢，还只是和汤尔和先生说的，‘不过纸张倒霉，书坊店走运’！于老百姓的实际苦痛有什么救济？于老百姓的实际问题有什么裨补？”有些“我们国内的少年，见了麦子说是韭菜，却要高谈‘改良农村、提高农民生活’，真是痴人说梦！”胡适再次建议：“少谈主义，多研究一点有用的科学。带了科学知识作工具，然后回到田间去，睁开眼睛看看民众的真痛苦、真问题。然后放出你的本事来，帮他们减除痛苦，解决问题。”<sup>[214]</sup>

尽管胡适和张国焘所说的“中国实际”可能不太一样，他们提出的建议更大相径庭，但对中国知识青年的观察则颇相近，而其强调应该研究本国实际问题的倾向更是相通的。的确，像胡适和李大钊这样来自乡村的人，对于乡村还多少有些直观的认识。对那些基本生长在城市的边缘知识青年，乡村的情形来自二手资源，民众的“痛苦和问题”可能真是构建出来的，不无虚悬想象成分；其相应的解决方法，很可能也带有纸上谈兵的意味。

对李维汉这样的革命者来说，胡适恐怕多少也属于既不知古也不知今的中国“时贤”之列。其实，知识分子不论年少年长，其“脱离实际”是中国革命运动中长期得到重复的表述；而中共在成立初期的几年中偏偏又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sup>[215]</sup>故拉狄克在1922年对陈独秀说：“我们许多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像从前他们研究孔夫子一样……而我们对你们讲的第一句话是，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到群众中去。”<sup>[216]</sup>

拉狄克可能不过是做出随意的比较，但中共党内确实有一部分“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家，代表着中共内部不时被批判的“教条主义”倾向。至少在中共党内，“脱离实际”可以有两个含义，一是普通意义的“不深入群众”，一是陷入纸上的外来的理论框架之中。毛泽东后来写出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特别批评中共党内讨论问题时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现象，并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文章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sup>[217]</sup>

从这一角度再来看《先驱发刊词》，特别是其把“研究问题不空谈主义”和“反对高调主张，提倡研究中国实际情形”结合起来讨论，就更能看出中共主张与胡适观念的直接关联。前引李求实在1924年的文章，也注意到两者的延续性。他形象地指出，不能像以前一样徒据“社会改革之学理”而“只唱自己的二簧”，却不顾人民的实际需要和实际思想状况；“应该去顺着民众唱那为他们所能领会的小调”。也就是“少发些抽象的哲理高论，多注重于具体的实际问题”。正是循着这一思路，他想起“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有些人觉得不满”的话，并看到其与“切实的研究民众——研究现实”这一取向的相通，只是应加上“从一种主义”出发这一补充而已。<sup>[218]</sup>

## 6. 余论：走向“行动的时代”

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几年后的反应看，在最初的争论后，双方都曾向对方表示善意，而马克思主义者一方似更明显；胡适的主张不但当时颇有人赞同，后仍得到呼应，其中也包括一些共产党人。如果过分强调1919年那次“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两种意识形态的正面交锋，则李大钊等人岂非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一方的胡适“认输”了么？“胡绳课题组”认为双方“在20年代的民主运动中还是相互信任和相互支持的”，是比较持平的看法。唯这次争论虽为时短暂，却触及到一些时代关注的焦点，反映出“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异常丰富而活跃的动态，也提示出不少可以反思的问题。

当年中国思想界那种阵线混淆的现象，特别是李大钊等人再三致意的“东也不是，西也不是”的苦衷，应予充分的注意；反过来，正因有各种流派混杂难分这一重要特征在，不少立说者不能不试图扶了东又想要再扶西，结果不免在短时期内出现看似自相矛盾的言论。对这样纷乱的现象，既要努力厘清各自思想的内在理路，也要试图梳理同一立言者那些表面冲突的言论所针对的具体“东”和“西”，以及某些看似一致的言说中隐伏的歧异或甚至可能对立的立说意图。

更重要的是，有些我们后来以为对立和冲突的观念，对当时当地的当事人而言，未必就那样对立，他们有时反而更多看到其相通之处。试图创办“问题研究会”的毛泽东主张“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这究竟体现出他在“问题”和“主义”之间的某种“调和”，还是像他这样的读者那时并未看重两种取向间的对立？这就需要尽量祛除我们的后见之明，以回归时人的认知。恐怕对不少时人而言，“问题”与“主义”两者是可以兼顾和共存的。如果他们本不甚感觉其对立，自无所谓“调和”。



毛泽东关于“由分处下手”而“进于总解决”的看法，张东荪那积“无数的小革命”以成“一个真正的大革命”的主张，以及王光祈从改造局部走向整体“根本解决”的见解，都表明当时不少人至少一度认为中国问题的局部解决和整体解决并非那么势不两立，反可能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且“根本解决”不一定意味着革命，而革命反倒可能是走向根本改造的第一步。我无意否认确实也有许多人看到两者间的对立，但相当一部分人思想观念那兼容的一面也不应忽视。而且，通过中国革命 / 改造与世界革命 / 改造的关联，类似的思路也被一些人运用于思考和处理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

胡适和李大钊关于“问题和主义”的言论在一段时间里共同成为年轻一辈的《新潮》派和毛泽东等人的思想资源，更提示着这一争论未必像许多人后来认知的那样意味着新文化人的“分裂”，或即使“分裂”也不到既存研究所论述的程度。胡适口中“我们这班新舆论家”和“新舆论界的同志”表现出清晰的群体认同意识，郑伯奇也看到“急进或缓进”两种取向同属于“直接从事于社会改造事业”者，而李大钊所说“我们谈主义”和“我们非主义”一语更能印证双方意见虽有不同却并未“分裂”。实际的情形是，在争论之后新青年同人间有相互示好的持续努力，<sup>[219]</sup>后来也时断时续地表现出对另一方观点的共鸣。

不仅争论的双方，那时朝野间也体现出某些“一致”。关注“社会”的革命或改良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共同点，包括安福系在内的各方都视之为项不可避免的举措。正是这样的朝野相似性使包括争论双方的“新舆论界”一边希望有所“区分”，以确立自身的独特性。今日研究者可以思考的或者是：为什么那时掌权或接近掌权的一方总要仿效民间的言说以“攀附”清流？

那么，何以“新舆论界”试图区分于当权者的努力却致使多数后来的研究者得出新文化人自身“分裂”的认识？中共的成立（尽管稍后才逐渐为人所知）及其表述出对中国历史和现状明显不同的认识，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则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陈独秀、毛泽东以及新民学会和少年中国学会中那样多原本态度偏向温和的读书人在1920年后后期及其随后的一两年间突然转向激进？<sup>[220]</sup>“五四”后几年或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非常值得进一步认真考察研讨。

那时中国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特别是哪些因素导致数量不少的读书人如此失望？这些问题已经大大逾越出本文的范围，只能简单涉及几个未必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其中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对于“互助”尝试（包括工读互助团、新村和菜园一类自食其力的举措）的失败，这些偏于理想的做法（有些不过是想法）的“行不通”似乎导致读书人对“中国社会”的重新认识。虽然也有从“互助”尝试的失败中进一步倾向于点滴改革者，<sup>[221]</sup>但愈来愈多的人日益感到需要根本性的变革。张东荪等以渐进达根本改造的愿望，以及新民学会的周惇元那样试图兼顾根本改造和渐进改良者，开始显得较难自圆其说，<sup>[222]</sup>反倒是两者间的对立日渐明朗。

另一个因素或许是“空谈”成风导致注重“实行”的凸显，<sup>[223]</sup>郑伯奇在讨论少年中国学会的分歧时，就指出关键“不在主义而在实现主义之手段”。<sup>[224]</sup>安徽青年韦丛芜等人的感觉或更有代表性，他们发现，全国普遍的现象是“高谈阔论现在大有人在，实地做事却未必有人”。然而，“智识阶级唱得再热闹，不把这种少数人的信念，脚踏实地去宣传到普通一般人的心里，使他变成一般人的普通信念，于社会改造上没有多大动力”。所以他要“像教徒们的传教一样”去实地宣传，以促成平民思想的转变，实现全社会“真正的革新”。<sup>[225]</sup>

这期间还有一个“汉宋之争”的传统延续，即学问是否当有益于世，读书人是否该出而“澄清天下”。胡适在1923年曾打算以整理国故为“他一身的大业”，张彭春就感觉当时“中国有才的人在社会上没有一个作‘活事’的机会，所以要他们才力放在不被现时人生能迁移的古学古理上”。所谓“活事”，是指“经营现时人与人发生关系的事业，如政治、学校事业、民族生活等”。<sup>[226]</sup>张是一个倾向文言而不喜白话的留学生，他也把整理国故视为疏离于时代需要的“死事”，可知当年不少新型读书人还是继承了传统士人那种对天下的关怀。

其实胡适此前也很强调面向社会的实行，他在1919年为《孙文学说》写的书评中说，“大多数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听见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就蒙着耳朵逃走，说‘我们是不尚空谈的’”。其实，那些“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的政客，自己没有计划，混一天算一天，“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真正的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孙中山就是一个实行家，其“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正因“大家把他的理想认作空谈”，致使其“《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实行”。胡适强调，“现在的大危险，在于有理想的实行家太少了；现在的更大危险，在于认胡混为实行，认计划为无用”。<sup>[227]</sup>

王光祈也注意到“现在一切富于惰性的政客，终日奔忙”于“解决零碎的问题”。这样一种“头痛医头、足痛医足的办法”，虽“美其名曰研究问题”，然其流弊正在于“终日埋头在局部具体的事实里头，而不能高瞻远瞩为根本的计划”；甚至使人类“没有一个共同最高的理想，限于一种极狭隘极无味的事实上面”。故他也主张“建立一个根本计划”，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sup>[228]</sup>

罗家伦则针对学生自身指出，如果没有“一定的目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东摸一下，西碰一下，没有计划，只谋应付，仿佛一个船在大海失了指南针一样，其结果必致全舟尽覆、根本破产而后已！”故今后“不能不有一个具体的大计划”，就像造大房子一样，“必须由工程师先把全体的图样打好，然后一步一步的造去，才能成一个预定的房子”；若“东拼一块，西凑一块，和斗‘七巧板’一样”，则房子很难造成功。

[229]

若对比一下三人的看法，他们皆倾向于有“理想”或目标明确的“计划”，胡适和王光祈都看到当时政客之所为与之相反，而王光祈和罗家伦则同样试图区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和有计划的“一步一步的”行动。但在王光祈眼里，政客之忙于“解决零碎的问题”恰与胡适提倡的“研究问题”有些关联。这样，由胡适来辨析有理想有计划的“实行”并非“空谈”（时孙中山以空谈著称，有“孙大炮”之名），多少也体现出他自身倾向的某种调适。

以胡适当年的影响，他所提倡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很快风靡，但社会风尚的无形力量却使其实际的走向有所转移。张闻天观察到，当时“青年普遍的心理”是“自己没有对于各种学问做根本的研究，人家要研究问题，他也加入研究”，但实际并未研究什么问题，不过“拿他的直觉写出来”。而青年之所以有点直觉就要写，是因为“心目中另抱出风头的目的”。[230]换言之，那时就“研究问题”发表言论已经可以“出风头”，故不少青年愿意追随。

在这样的世风下，张申府发现，随着“问题”本身的流行，主张研究问题一方自身也渐出现“空谈”的风气。“一个人出来说”不能瞎谈主义不研究问题，“于是许多人也渐渐的口说问题，笔写问题。可是问题从何而来？问题发生于事实。有了事实的不相容，有了事实的搁浅，于是成立问题。解决问题只是求去掉事实的不相容，使其归于和谐，进行遂顺。所以解决问题必须明白事实，必须按切事实”。然而那时“讨论问题”者却“不察事实，不管事实之有无，捕风捉影，设立问题”。这样设立出的问题，其解决自不能“与事实有涉”。且如此“清谈问题”，与空谈主义也是一丘之貉。[231]

张氏因而从哲学角度提出，“把杜威、罗素、柏格森三家之说合在一炉”，其实也就是“切实试行”这四个字。故“吾们不论主张什么东西，都要实地试试看”。做“一件事，不能总说要预备。预备与实行不能划为截然的两件事”。他认为：“不论什么好思想，都是生活迫出来的。不与实际接近，如何能说实话？不与社会奋斗，能把社会怎着？”且“一个主张，一个方法，不行，怎能知其可行不可行？”只有“越切实的试行，才越觉着有活趣”。故“不知则已，知则必行！不思则已，思则必行！不主张则已，主张则必行！”[232]

胡适重实行的观念也引起张申府的注意，他曾问陈独秀：“适之现在上海么？‘干！干！干！’现在怎么干法？”[233]这里说的是胡适在1921年5月的一首诗，其中反复说：“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到那年10月，胡适在另一首题为《双十节的鬼歌》的诗中，更提出纪念双十节的一种方法即“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这些诗在朋友中反应不一，老辈的范静生认为其方法太简单，而曾怂恿胡适革命的朱谦之见了则大喜。[234]一向被视为温和的胡适也曾表现出这样激进的一面，当年世风的走向可见一斑。

问题在于，一旦“干！干！干！”成为主导的倾向，思想和知识都可能退居二线，甚至连“知识”本身的含义都可能转变。这样一种双重的转变可能意味着读书人在整个社会中地位的下降，而那些欲追赶时代的读书人或许不得不进行某种程度的自我约束，甚至自我否定。

章太炎在清末提出“目下言论渐已成熟，以后是实行的时代”[235]之后不久，便自然产生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近二十年后，旅欧中共机关刊物在1924年初由《少年》更名为《赤光》，该刊宣布，其“所认定的唯一目标”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为实现这一目标，特“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236]伴随刊物更名的是从“理论”到“实际”的取向转变，多少可以视作时代的风向标。

在稍后的北伐之时，太炎的弟子鲁迅更观察到“知识阶级不可避免的运命”，即“革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还在其次，直白地说：或者倒有害”。[237]若读书人不能自觉意识到自己处于思想让位于实行的时代，其他阶层可能会起而提醒，沈雁冰又十多年后说，当小市民中的知识分子不断述说着各种“理论”之时，“旁观者却先不耐烦起来，会大声喝道：‘这是行动的时代，不是空论的时代！’”[238]

“行动的时代”的确是一句有力的棒喝，而“行动”与“空论”的疏离甚至对立则可能使一些读书人在“行动”中发现自己原有的知识“不合用、不够用”。《学生杂志》的一篇文章说，“五四运动以前的学生，以为‘知是现在的事，行是将来的事’，只知而不行。因为不行，所以他们的知，合不合用，够不够用，他们自己绝对没有觉得”。到五四运动学生出来参与种种事业，“一实行，可不对了。因为自己的知识不合用、不够用而发生的种种困难，他们都觉到了。于是，学生界的知识饥荒起来了，求知心非常急切了”。[239]

实际上，这一新感知的“知识饥荒”更多可能是因为“知识”本身的内容改变了。张国焘在强调知识“只有在民众中间去活动才能得到”时，更指出教育也“不能专讲学校教育；组织群众，率领群众运动，向群众宣传，便是一种最重要的群众教育”。[240]既然知识和教育都在民众那里，学校正在传播的“知识”便显得“无用”，至少“不够用”，导致杨荫杭所说的“教育破产”，即“学生自视极尊，谓可以不必学；且谓处此时世，亦无暇言学。于是教育与政治并为谈，而学生流为政客”，学校也“改为政社”。[241]在“读书不忘救国”的年代，这一现象或不少见。沈昌在“五四”几年后回忆说：“我自参加五四运动，一天一天的浮嚣起来，昧然以天下为己任，而把自己的切实基本学识弃去了。”[242]

也并非青年学生如此，在当年那种日益激进的语境中，如果“知识”的含义真像张国焘所界定的那样产生于“在民众中间去活动”，而不是“在书本子上”或“在研究室里”，投身于整理国故的胡适不啻选择了一条违背世风甚至疏离于“知识”的路径。他自己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几部古书的整理，于人生有何益处？于国家



的治乱安危有何裨补？”更不能不转而提倡青年学生先在实验室里做出成绩，再来“一拳打倒顾亭林”。

[\[243\]](#)这样悔悟式的“与昨日之我战”，有意无意之间恐怕也源于对“知识”含义转变这一重要思想语境的反思和因应。前引胡适主张青年先研究一点有用的科学，再带着科学知识“回到田间去”，大致也是这一思路的延续。

当然，重实行的风气兴起之时，也有一些人转向学理方面的努力。罗家伦在“五四”之后几个月即发现“现在全国青年——也有壮年在内——都觉得起了知识的饥荒”；他也感觉到自身的责任，即“我们要赶快接济他们知识的粮草（intellectual food）才是”。这一“知识饥荒”的产生仍与群众运动相关，但罗家伦并不以为当往群众那里去补充知识。相反，他注意到全国各地提供知识粮草的“我们”同样“感受知识的空虚，不够应用”。故提出“现在是大家分工的时候”了，即一部分人去从事社会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则在学术方面努力：“要知道现在中国没有一样学问，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位置的；无基本文化的民族，在将来的世界上不能存在的！”因此，“专门学者的培养，实当今刻不容缓之图”。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够造诣的人，抛弃一切事都不要问，专门去研究基本的文学哲学科学。世局愈乱，愈要求学问！”[\[244\]](#)

罗家伦给他自己的“分工”便是从事落实在学术之上的“文化运动”。他的北大同学傅斯年亦然，傅氏在1920年春颇感近来“考虑的心思周密，施行的强度减少”，这使他“心志上觉得很懈怠”，想要“寻个救济的法子”；但经过反思，对自己求学的经历有一个“恍然大悟”：他在北大预科时处于所谓“国故时代”，念书只为爱他”。后来“旧信仰心根本坠落”，所学开始注意切合今世；“因为切今世，于是渐在用上着想”。最近则顿悟“这个求合实际、求有成功的心思”使他“很难和学问生深切的交情；不能‘神游’。所以读书总觉不透彻”。于是“下决心”不考虑学问的“收获”，准备“至少以三年的功夫去研究”作为“心理的、社会的科学之根源”的“心理学”。[\[245\]](#)

这样一种有意识的“分工”恐怕比“问题与主义”争论时不同的观点立场更反映出新文化人的“分化”，即相当一部分读书人，尤其是北大“新潮社”中人，认识到应致力于从学问上提高个人以及整个中国人的层次，外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位置”，内则能够给全国青年和部分壮年提供“知识的粮草”。但这更多是一种主动的“分工”，而不是过去许多人认知的那样一种被动的“分裂”。也就是说，“五四”后一两年间，在一些态度温和的读书人突然转向激进并更加注重“实行”的同时，也有一部分人选择了更偏于学理也更加“迂远”的路径，即出国留学。[\[246\]](#)但是，中国社会当时的变动是那样急剧，以致许多人在外国游学数年之后，会看到一个已经相当不同的祖国。[\[247\]](#)

傅斯年在“五四”当年曾说：“现在的时代，恰和光绪末年的时代有几分近似；彼时是政治革命的萌芽期，现在是思想革命的萌芽期。”[\[248\]](#)

在一定程度上，20世纪20年代的“整体与局部”之争也是清末最后十余年关于“立宪或革命”争论[\[249\]](#)的再现，两次都出现了学理到实行的转折，两次都以“实行”方面的结果实际否定了学理方面的努力，或为此争论下了“结论”。所谓争论，本意味着思想的探索。既然已有“结论”，则一些人的探索或许仍在继续，相互的辩论却实际终止了。[\[250\]](#)

唯相关的思考和努力的确是持续的，一般不视为“激进”的梁漱溟直到1930年仍在反复陈述中国经济问题的“总解决”。他在论及乡村中洋货充斥时说，“经济问题恐须总解决，一乡一邑无甚好办法”；盖“经济问题是牵全中国社会为一身的问题，非求总解决不可，不能自辟一世外桃源”。[\[251\]](#)再参考他大约同时所说的“谁对于中国经济问题拿不出办法来，谁不必谈中国政治问题”；及其将他正推动的“村治”界定为“从旧秩序——君主专制政治、个人本位的经济，根本改造成一全新秩序——民主政治、社会本位的经济”这样一种“革命”的主张；[\[252\]](#)可知他那时仍在思考一种中国问题的根本或整体的解决，尽管是与中共和国民党的思路相当不同的解决。[\[253\]](#)

其实正如少年中国学会巴黎同人所说，当时的中国“处处皆是问题，方方皆宜着手”。针对那样的现状，既有主张围绕具体问题步步着手者，也有试图以一种主义为宗旨以避免东扶西倒之病者。后者那种无形中想要“定于一尊”的主张实有悖于新文化运动时的基本精神，却因有利于“实行”的需要而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当时较受欢迎的西方“主义”似乎都带有明显的排他性，而试图定于一尊的主观努力更强化了各类“主义”的排他性，使得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等原具包容性的团体纷纷解体，逐渐走向尊奉单一“主义”的组织。

胡适当时曾有所警觉，他认为“单有一致的团体主张，未必就是好的。安福俱乐部何尝没有一贯的团体主张呢？所以我们所希望的团体主张必须是仔细研究的结果”。[\[254\]](#)但这基本是以派别划线（即安福系先已“政治不正确”），并未排除在“仔细研究”基础上的单一团体主张；且胡适对“有计划的政治”始终青睐，这恐怕是后来他对国民党的新型组织形式大唱赞歌的“内在思想理路”。[\[255\]](#)

或可以说，尊奉单一“主义”的中共之成立和国民党的改组恰顺应了许多知识青年的突然走向激进的趋势，而苏俄此时介入中国政治，提供了新型动员整合的组织模式和行动模式，无疑起了相当大的助推作用。但包括思想资源在内的外力介入既可能凸显某些既存的问题，也可能导致新问题的产生——中共党人后来长期应对的“教条主义”就是这些新问题中的一个。

可知“问题与主义”之争确实触及和揭示了不少后来得到持续关注的问题。开头说过，本文对这一争论事件的讨论并不求全，如当年争论的具体文本，就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细致的解读（胡适、李大钊和蓝公武



三人对争论中一些关键概念的认知是有歧异的，若仔细解读就需要先厘清概念）；又如胡适曾说到的“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痛骂我”这一部分，本文也完全不曾涉及；其余还需要进行后续探究的内容尚不少，只能俟诸他文了。

原刊《近代史研究》2005年3期、《历史研究》2005年5期、《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2期、《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1期

# “五四”到北伐期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

胡适在1917年即将归国时的一首诗中，曾说他从农科转到哲学是要“讲学复议政”。<sup>[256]</sup>在后来一生中，他总体上偏重于“讲学”而较疏于“议政”，但对后者的兴趣并未稍减。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sup>[257]</sup>比较接近其心态真相的是胡适晚年的自述，“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sup>[258]</sup>除了因抗战而出任驻美大使的四年，他确实甚少参与实际政治，但“议政”却是他一直想做也不时在做的。五四学生运动后的十年，中国政治经历了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的大转变，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这样从组织形式到活动方式都深受苏联影响的新型政党；胡适“议政”的最初阶段即与两党有密切的关系，本文仅探讨北伐前胡适与中共的关系。

那段时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应置于其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谈政治”的一系列有关政治的言论和行动中考察，也与中共当年试图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一政策相关，并当注意那段时间中国思想界和胡适本人对社会主义的关注和思考，以及“新俄”对中国政治、思想两领域的有力冲击。胡适与中共双方都曾有过“求同”的努力，在具体政治主张上也有不少歧异：首先是对中国现状取逐步改良还是革命的根本态度问题上，双方立场基本相反；此外，在联省自治和善后会议两大议题上，双方的主张也相当对立；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共认为反对帝国主义是当务之急，胡适则以为当时帝国主义威胁已减弱，应优先处理好中国自己的内部问题。不过，直到北伐前夕，这些分歧似未从根本上影响双方“求同”的愿望，然而双方在基本政治立场上的对立也日趋明显。

## 1. “好政府主义”

胡适最初的谈政治，是因朋友陈独秀被捕，不得不接办陈主持的政治刊物《每周评论》。由于来得突然，他最初所谈的政治，还是偏于思想一面，他自己起初并不视为“政论”，这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学界对此讨论已不少，多数的文章著作，包括胡适自己后来的看法，都有较强的倒着放电影的倾向，过于强调论争双方对立的一面。其实在最初的争论后，双方都曾向对方示好，而以马克思主义一方更为明显，故那次争论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对立不宜过分强调，双方此后还有合作的一面。<sup>[259]</sup>

在胡适自己看来，“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还不完全算“谈政治”，要其在1922年提出的“好政府主义”才是谈“实际的政治”。他想到这方面的问题应渊源较早，还在1919年或最迟不过1920年，那时政治态度还颇温和的恽代英就写信向胡适提出好人应当出头的意思：“我相信善人应该做事，这是救中国，亦是救世界的唯一方法。善人不能做事，或不肯做事，天下的事便都让不善人做了。”他主张“善人要做事，要先有能力，先养势力”，但当时“学生的势力不配说是善势力；他们的根性同缺点，正同一般武人政客不相上下。这其中有两种原因：（一）有能力的人没有品格；（二）有品格的人不完全有能力”。所以要先“磨练有品格人的能力”。<sup>[260]</sup>

到1920年8月1日，《晨报》刊出一篇以北大同人为主的《争自由的宣言》，胡适名列其首。《宣言》指出：“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起一种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的实现。”这实现之法，就是先“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因为“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中国近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故郑重提出“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希望“全国同胞起来力争”。<sup>[261]</sup>

这一《宣言》的精神与恽代英的观点也有相近之处，可知那时南北读书人有一种隐约的共识，即中国从上到下实际干政治的和希望干预政治的人其实政治程度都不够高，都有一个提高的需要；故长远之计是培养国人或最有意干预政治的学生，当下之计则是“好人”或“善人”恐怕要站出来才行。到1921年夏，胡适深感“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时髦东西，这是大错的”。他已打算对年轻人进言，主张“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应谈有政府，应谈好政府主义”。<sup>[262]</sup>这表明胡适的思想已逐渐形成系统，且他在此时似感“谈主义”的趋势已难遏止，只好采取“预流”的方式加入进去，改变大家所谈的具体主义。

那年八月初在安庆，胡适“第一次公开的谈政治”，讲的就是“好政府主义”，其核心观念是：一、好政府主义是有政府主义，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二、好政府主义的基本概念是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由此更引申出“一个革命的原理”：工具可维修和更换，“政府不良，监督他，修正他；他不受监督、不受修正时，换掉他。一部分的不良，去了这部分；全部不良，拆开了，打倒了，重新改造一个。一切暗杀、反抗、革命，都根据于此”。这是胡适那年一贯的激进观念，不过这主要是为学生说法。他的实际侧重所在，是希望“好人”结合起来为实行好政府主义而积极奋斗。这比较温和的一面，是后来胡适好政府主义的基本内容。<sup>[263]</sup>

还在1921年5月间，胡适、丁文江等英美留学生已成立了一个小型而不公开的“努力会”（正式定的成立

日是6月1日），明确了“讲学复议政”的宗旨，即在发展各自职业的基础上“谋中国政治的改善与进步”，与胡适关系密切的蔡元培等少数非英美留学生也参加。到1922年春，努力会决定出版议政为主的《努力周刊》。胡适为此写的《努力歌》强调，“自命为好人者”若不出来努力，中国的事就没有希望了。歌中并说：“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sup>[264]</sup>

《努力歌》基本是喊口号，胡适也在考虑写一篇能代表同人意见的务实正论，拟名为《我们的主张》。他再三考虑后，决定以南北和会为下手的第一步，“自信这是最切实的主张”。这是胡适“第一次做政论，很觉得吃力”，一直写到半夜才完稿。文章本是专为《努力》所做，写完后胡适意犹未尽，心绪还有点激动，忽然想到“此文颇可用为一个公开的宣言，故半夜脱稿时，打电话与守常[李大钊字]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家会议，邀几个‘好人’加入”。第二天也就是5月12日上午，集会蔡宅的皆胡适的熟人和北大人。事情议定后，下午王宠惠和罗文干也来加入。<sup>[265]</sup>

后该文更名为《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了以南北和会为核心的五条十六款具体主张，然其核心观点是政府要管事，实行“有计划的政治”，而其基础则在于社会上的“好人”都应出头，或谈政治，或干政治、入政府。换言之，好政府首先必须是好人政府。其所针对的，第一是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第二是实际上由“不好的人”组成的不做事的“恶政府”。文章要求“国内的优秀分子”平心降格地把“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同时提出“宪政的、公开和政府”和“有计划的政治”作为政治改革的原则。当时中国政治败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好人自命清高”，不加入政治运动。所以，好人必须起来“做奋斗的好人”并产生“决战的舆论”。<sup>[266]</sup>

文章发表后反响热烈，胡适“费了一天的工夫”整理收到的关于此文的讨论，选出可发表之文十四篇。主要的反对意见是认为文章的精英意识（当时并不用此词）太重，忽视了民众。也有人觉得中国政治已无法改良，只有实行彻底的革命。但赞成的人则觉得这些提法都切实具体，更应组织团体落实之。总的趋势对“清高的好人”肯关心政治都表示赞许，但也有少数人以为“好人”还是以坚持“清高”更好。<sup>[267]</sup>胡适看了这些文章“颇有感触，做了一篇《后努力歌》”，以为好社会与好政府、教育与政治、破坏与建设都是互为因果的连环，解开的唯一办法就是“努力”或“干”。<sup>[268]</sup>这样针对“清高”而特别强调努力肯干，已透露出后来胡适“重行动轻学理”的倾向了。

胡适上述言论的基本的取向是提倡一点一滴的逐步改良，但至少理论上也允许改良不成之后的革命。他在答复王振钧等关于革命与改良的意见时明言：“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他认为破坏与建设并非绝对相反，“有时破坏即是建设，有时建设即是破坏；有时破坏必须在先，有时破坏自然跟着建设而来，有时破坏与建设并进”。不过胡适自己并不打算身与革命，而是主张“人各有偏长，而事业须合众长”，为求“殊途同归”，正不妨“各行其是，各司其事”。<sup>[269]</sup>他这一态度与上年在安徽演讲所论基本一致，从那时起就未得到充分注意，此后亦然。

五四学生运动后的几年间，正值文人徐世昌任总统，北京政治似乎正经历着一个转变的临界点。不少既存势力在探索改组或重组，许多方面也在主动试探机会的有无，其间一个相当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政治逼迫学者出头。不仅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一批相对独立的技术型政治人物是各方面争取的对象，以前不怎么介入政治的北大教授社群，俨然也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李大钊当时就注意到：“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醋意，真正讨厌！”<sup>[270]</sup>

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当时试图组织一个研究社会政治状况的团体，也曾联络顾维钧等技术官僚和胡适等北大人，因各类“积怨”而事未成；反倒是胡适等北大教授和留学生在政治活动中一度唱了主角，最初特别积极的研究系基本被排之于事外，感觉“大不高兴”，说北大派“有意排挤他们研究系的人”。按研究系所说大致不错，蔡元培初被罗文干接触时反应尚积极，一发现是研究系在背后主导便予抵制，并立即提醒胡适注意。<sup>[271]</sup>胡适自己在1921年初给陈独秀的信中也明确地将《新青年》同人划为“我们”，把梁启超及

《改造》同人划为“他们”。<sup>[272]</sup>这一社会区分涵盖了从思想、学术到政治的多方面歧异，且已达双方的意识层面，应予充分的重视。<sup>[273]</sup>

那时国民党尚未改组，中国共产党正从酝酿到成立，苏联式的政治组织方式刚开始进入中国，中共的意识形态也还在形成之中（详后）。前引不止一次政治性的宣言，李大钊和胡适等北夫人都共同列名，胡适写完《我们的政治主张》甚至半夜就商于李大钊，可见两人的交情及李大钊那时在胡适心目中的重要，尤可见双方在“谈政治”方面非常接近。<sup>[274]</sup>

实际上，当时北京政府的军警即认为，中共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可能参与发动了“好政府主义”。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的报告说，“默查该党潜势力日渐膨胀，将为大局之害。闻其中央执行部联络一般学界如胡适、李石曾辈，进行其所谓‘好政府’之预备也”。<sup>[275]</sup>军警方面显然不是过于“敏感”，因李大钊当时确实积极参与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组织的活动。但是，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却不同意“好人政府”的设想，并感到有必要公布自己的政治主张，由此开启了中共与胡适等人之间的正式争论。



## 2. 胡适与中共的观念歧异（对内）

据张国焘回忆，胡适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后，参与署名的李大钊曾向中共中央表示这不失为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一些党外的新文化人也希望中共支持“好人政府”；但中共中央开会未能同意，并决定公开自己对时局的主张，推陈独秀起草，这就是1922年6月中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

[\[276\]](#)

在此之前，李大钊等在少年中国学会的联名提案已号召“任何主义者，我们以为，都应该在这时抛弃一切武断的成见，客观的考查中国的实际情形，应该在此时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United Front），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朋友们，我们再不能延宕了，我们不能再使内部分裂，反与敌人以可乘之隙了。……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动员了，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学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277\]](#)

这里强调“革命的手段”或许是对《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某种界定和修正，但其结尾与好人必须起来“奋斗”以产生“决战的舆论”仍非常相似。特别是李大钊等专门以“不谈主义只研究问题”为开场白，结尾再重复不要“空谈高深的主义与学理”，更明确提出“联合的战线”，主张“我们不能再使内部分裂”，其传达出的信息应该再明白不过了。

如果说提案是以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同人的名义发出，《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则可以说是针对胡适等人《政治主张》的正式回应，其中说：要改善中国现状，只能用民主政治来代替军阀政治；“民主政治当然由民主派掌握政权，但所谓民主派掌握政权，决不是在封建的军阀势力之下，选一个民主派人物做总统或是选几个民主派的人物组织内阁的意思，乃是由一个能建设新的政治组织应付世界的新环境之民主党或宗旨相近的数个党派之联合，用革命的手段完全打倒非民主的反动派官僚军阀，来掌握政权的意思”。

[\[278\]](#)

文件直接点到“好政府主义诸君”之名提问说：“军阀势力之下能实现你们所谓好政府的涵义吗？你们观察现实京、津、保的空气，能实现你们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和六个具体主张吗？”你们“刚才发出‘努力’、‘奋斗’、‘向恶势力作战’的呼声，北京城里仅仅去了一个徐世昌，你们马上就电阻北伐军。据中外古今革命史上的教训，你们这种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正都是‘努力’、‘奋斗’、‘向恶势力作战’的障碍物”。不过，中共中央也明确表示了要“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愿望，仍将“好政府主义诸君”列入打倒军阀政治的一边（详后）。

这一文件由张国焘带到北京，得到李大钊对中共中央意见的赞同后，又由李大钊将文件分送主张好人政府的诸公，并说明这不是陈独秀个人的意见，而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个新兴集团的慎重主张。[\[279\]](#)这一沟通显然是成功的，胡适立刻将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所提出的11条目标全部转载于《努力》，并评论说，“这十一条并无和我们的政治主张绝对不相容的地方。他们和我们的区别只在步骤先后的问题”。他认为中共的主张与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可以相通，所以他的回答是：“我们并不非薄你们的理想和主张，你们也不必非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280\]](#)

但中共方面有人不同意，在欧洲的周恩来说：“我们却要代答胡先生道：‘我们却很菲薄你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而尤其信依着你们最不努力的方法，你们最低限度是永远做不到的。至我们的主张，只有用政治争斗的革命手段才能达成实现，我们殊不愿上你们无革命精神的大当。’”不过，这里的“代答”一词说明这是周恩来个人或中共旅欧支部的观念，且此文一开始即说，“胡适先生本是我们所敬爱的一个人，他的思想和言论很有些令我们佩服的地方。但我们看他最近在《努力》周刊中所发表的一切政论”，表明“胡先生对于政治太缺乏了革命的精神”，故“使我们非常失望”。[\[281\]](#)口气还是比较友善的。

在国内，高君宇也尖锐地指出，王宠惠虽然“曾与好几位时贤”一起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在署理内阁揆后，却“把从前主张的丢之脑后”，仍一承旧政，为军阀搜款。不仅外间有人批评“学者做官也一样做了军阀的账房，且有讥他为失品格的；就是他同伙发表主张的《努力报》记者，也有嫌他不发表计划，竟因质问‘为何不实行我们的政治主张’，弄到面赤耳红”。[\[282\]](#)后者的确一针见血，胡适等人正为王宠惠内阁并不实行他们这些“好人”提出的建议而甚感恼火。[\[283\]](#)

但高氏认为应该“责难”的实质问题是，王宠惠“‘努力’的不是通道。现在做中国政治有力因子的是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北京政府尤其是显然为他们操纵；在这种情势之下，就是较王博士强干而有棱角的来做‘好人努力’，也逃不脱为高压在当头的势力利用”。他强调，“在一种自己做不得政治主动的情形之下，想以‘好人努力’的方法将政治整理向宰制势力利益的反面，这不是呆小子的梦想，便是骗子手的谎诺”。这种情形足以“证明‘好人努力’的破产”，故应该“另找一条努力的通路”，就是“打倒军阀和外国的压迫”。他呼吁说，“小资产阶级妥协牵就的心理的努力是已证明在我们眼前失败，且为我们仇人利益利用了”。

最后一句“为我们仇人利益利用”表明高君宇仍将胡适等人视为同盟者，高氏文章发表后不久，得吴佩孚支持而上台的王宠惠“好人内阁”很快因直系内部的矛盾而于1922年11月下台，正式宣告“好人政治”的失败。对曾经非常努力地为王内阁提建议的胡适来说，打击最大的可能还不是王内阁的垮台，而是王等在台上时已不能实行胡适等人提出的建议；所以他又将议政的重心从中央转到地方，正面反驳“我们的朋友陈独

秀”否定联省自治的主张，认为“建设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是“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sup>[284]</sup>结果又引起中共方面的反击。

陈独秀说，他不反对“联省自治即联邦这个制度的本身”，但当时“中国政象纷乱的源泉”正是“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全国兵马财政大权都操在各省督军总司令手里，中央政府的命令等于废纸，省长是督军的附属品，省议会他们的留声机器，法律舆论都随着他们的枪柄俯仰转移”。他“正告适之先生：中国此时还正在政治战争时代，不是从容立法时代”，故其“断然不敢承认联省自治能够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陈氏质问说，在胡适所谓“已行自治的”湖南、广东和“正在经营自治的”云南、四川，这些地盘本是“军阀用兵力取得的，他们肯以军权换省自治吗？他们果真是为了省自治才拥兵割据吗？他们宁肯抛弃军权不肯抛弃省自治吗？先生这种公平交易的估价，恐怕军阀听了要大笑不已”。<sup>[285]</sup>

蔡和森进而指出，“十年以来军阀专政和军阀割据的封建残局”的形成，是因为“中华民国乃是革命阶级羽毛未丰，将就封建的旧支配阶级势力，与之调和妥协而后苟且成立的”。故“今日不但直，奉，皖，各系军阀为前清遗下的北洋派之嫡系；就是川，湘，滇，粤等经过民主革命领域的新军阀，也是在这封建政治的残留局面之下孳乳出来的”。联省自治就是后一类“武人主倡的”。胡适主张以省议会等工具来“增加地方的实权，使地方能充分发展他的潜势力，来和军阀作战，来推翻军阀”，虽可说是联省自治论中的大进步，“但我要明白告诉适之先生：你这种英国式的议会政策用在政治问题解决后——即封建的军阀被推翻后——是有点作用的；若用来解决政治问题乃是绝对不可能的”。在军阀没有铲除的时代，“想借议会来推翻军阀，结果只有军阀推翻议会，这是武人政治下的必然律，证以过去现在的事实，没有人可以否认”。<sup>[286]</sup>

他分析说，倘“在今日而讨论未来的政制”，可以说是无病呻吟；“若讨论现实的政制，则决不能置现状于不顾”。军阀正是“中国政治的乱源”，故“现在根本的问题不在政制而在怎样推翻军阀”。若“以为改变一种政制就可以止乱定国，那末，不将乱源嫁于政制，便将政制认为是止乱的方法，胡适之先生便完全犯了这种错误”。他“那种新发明的‘统一’史观”不过是“梦想改变一些纸上的制度来和平改良”，只要明确了中国的乱源在于军阀本身，就知道今日除革命外没有别的出路。所以“我们要高声说：他那种牵强皮相的分析是很谬误的”。蔡和森模仿胡适的语调说，“我们也可以大胆告诉适之先生：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在民主的革命”；也只有“革命的统一”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双方的分歧在于，究竟以何种方法来打倒军阀、实现统一。胡适并不反对打倒军阀，但他不认为那时就能以“革命”的方式来实现此事；或者按照他前述的思路，要在恶势力实在不容纳改良之时，才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此前仍应“尝试”改良。他“再三考虑现在的政治情形”后得出的结论是：武力统一绝不可能，单靠宪法来统一此时也做不到，私人的接洽不是正当办法，“大革命——民主主义的大革命——是一时不会实现的，希望大革命来统一，也是画饼充饥”。则“今日的唯一正当而且便利的方法是从速召集一个各省会议，聚各省的全权代表于一堂，大家把袖子里的把戏都摊出来，公开的讨论究竟我们为什么不能统一，公开的议决一个实现统一的办法”。<sup>[287]</sup>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胡适的想法的确有些太书生气（也应注意胡适先有改良不成即可革命的主张）。《向导》的读者陈此生以为，胡适主张召集一个各省会议来解决时局，但他“讲这番话的时候，已经忘却阻碍统一的唯一物是实力派的‘军阀’”。就算这样的会议得以召开并议决出一个实现统一的办法，若军阀们“置诸不睬”，又能怎样？故“只有实行民主主义的大革命，把所有军阀完全推倒，才有实现统一之可说”。胡适“对于这种会议居然迷信他有万能的本事了，我真不懂解胡先生为何不知军阀是妨碍统一的人物，为何不先解决推倒军阀的法子？”寄希望于各省会议来统一，那才“真是画饼充饥！”<sup>[288]</sup>

高君宇也指责说，胡适所谓“省自治”本是指“分权于民”和“打破现在割据局面”，但他在《努力》上却称誉“陈炯明割据的广东和赵恒惕割据的湖南为‘已行自治的各省’”，不啻“专门替军阀找冒牌的方便，来欺骗我们被压迫的老百姓”。<sup>[289]</sup>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陈炯明这一“最反动的军阀”治下的警察眼中，《努力周报》与《向导周报》其实还很接近。在1922年11月广州一次警察检查新青年社书店的行动中，不仅搜缴了《向导周报》，又“将店中所有的社会主义书籍一齐取出，新出版的社会主义讨论集亦在内，并将别类的书籍和报章也各搜了一份；吹鼓‘联省自治’之《努力周报》，亦遭池鱼之殃，真可为之抱屈”。<sup>[290]</sup>这一《向导》的通信作者虽语含讥讽，惟这一倾向性明显的书店本身同时出售两种周报，也从侧面提示出两者确有接近的一面。

其实胡适不仅支持联省自治，稍早还真为陈炯明打孙中山有所辩护，他在《努力》的时评里抨击近来“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时举例说，陈炯明的一派“推翻孙文在广东的势力，这本是一种革命；然而有许多孙派的人，极力攻击陈炯明，说他‘悖主’，说他‘叛逆’，说他‘犯上’”。他认为“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不应以这类‘伦理见解’来解释政治行为。而且，‘究竟怎样的行为是革命？怎样的行为是叛逆？蔡锷推倒袁世凯，是不是叛逆’呢？胡适承认，“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叛逆’、‘犯上’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sup>[291]</sup>对孙、陈之争的“评价”成为胡适与中共的另一冲突。

反对旧道德本是几年前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主题，胡适从这一角度提出怎样算“革命”，使当年提倡“道德伦理革命”最力的陈独秀很难在伦理上为孙派国民党辩护，遂提出一种以发展眼光看待革命与反革命的主



张：“段祺瑞在赞成辛亥革命反对洪宪帝制讨伐张勋复辟时，本是革命的人物，后来组织卖国机关（安福俱乐部）讨伐西南护法军，便是反革命的行为了；……陈炯明在辛亥革命时代在漳州时代，在讨伐陆荣廷莫荣新时，都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党，后来阻挠北伐军，驱逐孙中山，便是反革命的行为了。胡适之先生说陈对孙是革命行动，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陈炯明举兵逐孙，不但未曾宣告孙中山反叛民主主义之罪恶及他自己有较孙更合乎民主主义之主张，而且逐孙后，做出许多残民媚外的行为，完全证明他是一个反革命的军阀。”<sup>[292]</sup>

不过，一方面当时中共本身对孙、陈之争的看法也不一，<sup>[293]</sup>同时中共正在开始联合的国民党本未排除以和平方式达成“统一”的可能性，根本是孙中山自己在正式开展国共合作后不久就与陈独秀眼中已发展到“反革命”阶段的段祺瑞等合作，北上谈判召开国民会议或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在孙中山本人也可能参加善后会议时，中共方面的态度也相对温和，不过认为“今日一班苟安麻木之国民，对革命终无信仰，对军阀心存依赖，如胡适及虞洽卿等，均可代表一部分国民期望军阀赐与和平改革之心理”。<sup>[294]</sup>

其实胡适等人早已对军阀没有多少“期望”，代胡适主编《努力》的高一涵在1923年8月就表示：“我们对于北京政府绝望；对于南下议员绝望；对于北附议员也老早就绝望；对于研究系，政学系，安福系，直系，甚至于对于国民党，也都一律的绝望。”<sup>[295]</sup>这与前引李大钊1921年初观察到各方面都试图拉拢北大教授群相距不过两年多的时间，他们对中国政治已感到整体的失望。有同感的胡适在两个月后正式提出停办议政的《努力》，因为“此时谈政治已到‘向壁’的地步。若攻击人，则至多不过于全国恶骂之中，加上一骂，有何趣味”。<sup>[296]</sup>但胡适那实验主义的尝试精神终使他不能放弃每一次实验的机会，所以他尽管态度有所保留，仍参加了1925年的善后会议。

对胡适似颇具“了解之同情”的瞿秋白正从尝试的角度对胡适参加善后会议进行了婉转的批评，他说：“胡适之加入善后会议，报上说他是去尝试的。这尝试两个字，在每段新闻里都带着些滑稽口吻。其实我们倒很可以替适之抱不平，因为他本是个尝试主义者，他去尝试，实在无可讥笑。我们要看他试得怎样，再加批评。再进一步说，单是说他尝试失败，说他尝试的结果不好，也还不够，因为，一则我们明知他这次尝试必然失败，适之自己也未始不知道；二则尝试不过是适之的一种政治态度，还不是他政见的本身。所以我们不必斤斤于他尝试的怎样，成功还是失败；我们却要看他怎样尝试，提出怎样的政见。”<sup>[297]</sup>

瞿秋白认为，从段祺瑞方面看，善后会议的成功就是通过一个段式国民会议组织法，可以将其“临时执政”扶成“一个正式执政”。而“适之虽然不革命，未必便肯把这样的‘成功’，算做自己的成功。……适之所要的成功，大概就是想善后会议——段氏政府通过他的国民会议组织法”。但这只有“胡适之的政见完全和安福系相同”或“善后会议变成人民的会议”才有可能。“从五四运动前后，直到如今，胡适之总算还是社会上公认的民治主义者，要他立刻变成安福系，未免太快些。那么第一个办法是不能实现了”。

由于胡适“向来是个民治主义者，或者他在人民的善后会议上公布的真正民治主义的政见来，可以通得过”。那他就“应当赞成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要求社会团体加入善后会议”；若能做到，“亦许胡适之的尝试会成功”。然而“胡适之竟没有多试这一试”，他“不但表示他的尝试主义不彻底，而且已经表示他那民治主义也就不大高明了——不拿到人民会议上去试，却偏要在一群安福系里试”。瞿秋白接着指出，胡适提出的“国民会议组织法草案”在“表面上看来，确是民治主义极了”，但草案中有不识字者“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的条款，等于剥夺百分之八十中国公民的选举权。这种草案在善后会议上是否能通过尚不得而知，胡适已因河南打仗而“自认尝试完全失败而退出了”会议。

整体而言，胡适试图改革中国政治的“努力”和“尝试”确如中共所言，不能算成功。正如高一涵所说：“中国政府坏到这步田地，如果我们仍抱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终究是没有功效的。我们的社会简直是百孔千疮，比不得欧美的社会大部分健全，只有小部分生点癣疥。所以英美的实验主义派可以主张零碎修补，我们便不得不主张根本改造。”尽管高氏提出的“根本改造”其实也是一般意义的改良，<sup>[298]</sup>此语由《努力》说出，终代表着对现实的某种承认。

胡适主张学美国式“一点一滴的改革”渐进方式，却忽略了一个他自己曾指出的重要现象，那就是近代中国的社会重心已失，据思想言论中心者大都“小成即堕”，不过几年就让位。<sup>[299]</sup>当年各派各人对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是名副其实的五花八门，而且谁也说服不了谁；没有一个大家基本接受的共同立脚点，也就不存在搞一点一滴改革的基础。近代中国本是动荡多变的“乱世”，胡适却总想引进美国这个“治世”的渐进方法；药不对症，当然也就未必能治中国的“病”。更重要的是，外国在华存在（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的帝国主义性质无人能够否认；在列强已全面“介入”中国权力结构的背景下，怎样处理对外问题，是胡适与中共的另一重大歧异。

### 3. 胡适与中共的观念歧异（对外）

前引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主要是针对“封建军阀”这一革命目标，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发出宣言，则主要针对另一革命目标“帝国主义”。<sup>[300]</sup>胡适随即针对中共的主张说：“我们的朋友陈独秀先生们在上



海出版的《向导周报》，标出两个大目标：一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第一项，我们自然是赞成的。对于第二项，我们觉得这也应该包括在第一项之内。”他不同意中共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关系的分析，以为缺乏事实根据，“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胡适强调：中国内部“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他“很恳挚的奉劝我们的朋友们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sup>[301]</sup>

除了“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稍有些语涉轻薄外，<sup>[302]</sup>胡适上述意见本不无所见。可是他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事实，那就是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即使是纯粹内部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的努力，只要含有对既存权势结构挑战之意，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胡适自己稍后就发现，连谈“全国会议、息兵、宪法”这类具体的“问题”，都“势必引起外人的误解”，<sup>[303]</sup>可见“外人”在中国涉足极深，干预范围甚宽。

中共方面对胡适的文章做出了迅速的反应，《向导》第5期上刊登了一条“读者注意”，说本报收到张国焘君《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略的危险么？》一稿，“系驳胡适君《国际的中国》的。因本期版已排就，不克加入，俟下期登载”。<sup>[304]</sup>随后刊发的张文说，“美国哲学博士胡适先生，素来与美国驻华政治家、舆论家、学者来往亲密，于美国‘文明’多所介绍”；其最近发表的《国际的中国》“竟完全替英美帝国主义辩护，并武断中国现在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末尾一段还劝本报同人此时不必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像这样为英美帝国主义辩护的文章，似乎比美国每年花上三千万银子雇派许多牧师、记者、侦探、顾问、学者等向我们所做的亲美宣传，还更明显而且有力，真是出人意料之外”。<sup>[305]</sup>

在列举了胡适文章的大意后，张国焘说：胡适劝我们“不要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只要专心整理国事，使政治上轨道。我们呢，老早就想说明中国人民为什么要反抗任何国的帝国主义，为什么非打倒英美日等国的对华侵略主义，不足以改造国内政治，现在胡适先生既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乐得把胡适先生的谬论略加驳覆，以当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说明”。然后即以相当长的篇幅对胡适的观点进行了系统反驳。

张氏指出，中国现在不是“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已由19世纪的武力为主转变为经济侵略为主，后者“既省钱，又省力，还不易引起重大的反感”，然其“残暴厉害”更甚于前者。由于“列强在华利益素来错综复杂，就是要瓜分中国也难得分赃平均”，故“瓜分土地的事实现在或许不会发生了”，然而外国资本家经济侵略的危险更加严重，且列强对中国市场的竞争也不稍减，形成一种“相互竞争的侵略”。

列强的“政策既然不一致，因此各个扶持一派势力，进行他们的暗斗，为的实行各自的政策”。张国焘承认胡适关于“远东问题只是英美日三国的的问题”这一分析不错，但重申中共《宣言》所说：“日本帝国主义先后扶助安福部、张作霖、新旧交通系等当权的北京政府，为的是要利用北京政府为实现日本侵略计画的工具。英国便站在吴佩孚派的督军后面，为的要借此巩固他在长江一带的权利和势力范围的推广。美国却勾结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知识阶级分子，想用掩眼法来实现他国际托辣斯的经济侵略政策。”军阀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当年国共两党的共同看法，然而张氏并未举出多少足以印证其说法的实据。<sup>[306]</sup>

与时人一般将英美并论不同，张国焘注意到美国与英国的区别及其特殊政策。当时舆论多以为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有所收获，张氏指出，“这也是帮助美国开放中国的门户呀！中国虽然挽回一点微小的利权，但是多引进一个富有经济力的抢掠者”。他特别提醒国人，“美国资本家银行家是不知道怜悯受痛苦的中国人民的，即使真有几个舆论家学者援助中国，与美国资本家侵略中国的勾当也是不相干的”；不能“因为美国有几个学者舆论家和我们卖弄假风情，就连美国资本主义吞噬四万万中国人的雄图都忘记了”。这显然是针对杜威访华所起的广泛影响。

他发现，就连英国最近也因“北京政府是亲美派人物，中国新兴资本家都习于任用美国机器，以及一班学者、教员、政治家、政论家都替美国吹嘘（因为他们多由留美学生出身）大起醋意，认英国没有注意中国留英学生问题，实属危及商业利益。他们最近注意到留英学生问题”，就是希望“在中国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多一些“各种侵略的介绍人和中间物”，以利其下一步的经济侵略。张氏的结论是：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几十年了，现在的经济侵略比武力侵略更危险，列强间虽有竞争，但会继续侵略中国则是共同的。“因此国际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敌人，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为了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为了中国的独立和自由，非急速打倒他不可”。

胡适在文中曾列举了一些中国人感觉到外国势力的“好处”，其实那都是上层阶级的感受，“我们小百姓到不觉得是这样”。中国人民“同时也受军阀的摧残、官吏的讹诈、厘金制的剥削，痛恨的对象不专是国际帝国主义”，但不能“借此隐蔽国际帝国主义的罪恶”；故在打倒军阀官僚的同时，也要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他质问道：“为什么那自命‘政论家’的胡适先生竟眼小如豆，只知道武力的侵略是危险的，竟不知道经济的侵略更是危险呢！这或者经济的侵略只能使四万万中国劳苦群众受痛苦，不会使美国学者的胡适先生受痛苦，所以他不能感觉到那些危险罢。胡适先生也是中国人，也是和我们一样受了几十年外国的压迫和侮辱，那继续不断的外国压迫想也忍受不了，更厉害的经济侵略的危惧又在目前，胡适先生还应多替中国苦同胞设想一些才好！”

张国焘特别声明，“并不因为我们是马克思派，所以这样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我们正为中国人民的利害关系，所以要提醒和引导中国人民一致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他指责胡适“企图减轻国人对于外人侵略的

注意，促成帝国主义者们的侵略顺利情势”，这显然冤枉了胡适，因为胡适在意识层面并无此“企图”。但当胡适说外国投资者也希望中国的安宁与统一，并举美国接受英国铁路投资为例来证明国际投资不会有危险时，张氏抓住了胡适思路的一个根本问题，即“以半殖民地和列强角逐场的中国和那时的美国比较”。不论是否以“半殖民地”来定义中国的性质，不平等条约体系下的中国的确是“列强角逐场”，在接受国际投资方面与美国实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张文这样的系统驳斥外，中共对胡适说他们“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一语记忆颇深，约一年后，罗章龙发现连国会的“吴景濂这流政客”在北京各界欢迎加拉罕的演说词中也提到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而“一年以前的大学教授尚在目为奇谈（去年胡适在《努力》周报中对于中国共产党解释英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认为海外奇谈）”。<sup>[307]</sup>到1925年蔡和森在论及“革命势力的觉醒”时又说：“中国人民最近几年的政治生活完全为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支持着。革命势力的觉醒一天扩大一天，革命宣传的感受一天深入一天。犹忆二年前本报初揭载国际帝国主义侵掠中国之理论与事实时，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之目为海外奇谈，现在这种海外奇谈竟成为普遍全中国的政治常识。”<sup>[308]</sup>

另外，不少中共党人都很不欣赏胡适的亲美言论，邓中夏在1923年即重复张国焘的用语，指责胡适等办的《努力》周报“公然与美国花了三千万银子雇派的许多牧师、记者、侦探、顾问等向我们所做的亲美宣传一鼻孔出气，武断的说‘中国现在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是“最可惜的”。且其“言伪而辩，未尝不麻醉一部分人的神经，淆淆一部分人的视听。其所造罪恶并不在梁启超、章行严之下”。<sup>[309]</sup>不过邓中夏的表述明显带有惋惜的口气，并不特别对立。

胡适另一能“麻醉一部分人的神经”的观念就是美国与其他帝国主义有区别，这是张国焘已经努力驳斥的。曾经与胡适的“好人政府”主张相当接近的恽代英到1926年说：就美国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两次为自己利益牺牲中国利益以迁就日本与近年事事与英朋比压制中国观之，可知美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无异致，乃亦以有教大[按似指教会大学]与留美学生如胡适之博士，与其他教育界、学术界名人为之说辞，至今尚有人认为中国唯一之友邦”。<sup>[310]</sup>

两人在驳斥胡适的同时，都承认其言论还有一定的影响，似乎胡适在反帝方面比其在内政方面的议政稍更“成功”（从前引吴景濂的言论看恐也未必）。其实《国际的中国》这篇胡适谈中外关系的重要文献也是他最不为人理解的文章之一，直到晚年，胡适仍在慨叹：共产党骂这篇文章，“国民党也不会了解此文”，意谓共产党实际上并未了解此文。<sup>[311]</sup>从其文章的整体意思看，胡适对中共大体仍是他爱说的“诤友”态度。

毋庸置疑，中共与胡适当年在对内对外的政治主张上都有较大的歧异。那么，这些分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双方的关系呢？从当年中共的政策及相当数量中共重要成员的公开表述看，一方面由于胡适整体上采取了友好而非对立的态度，同时不仅广州警察不欣赏《努力周报》，北京政府负责治安者也多少视胡适为“过激派”，中共正在推动的民主主义联合战线本是针对“更反动势力”的集结，在批评胡适一些主张（因胡适追随者众，其影响不可忽视，故不能不批评）的同时，对他仍采取了联合的方针。

## 4. 中共的“联合战线”与胡适

前引中共1922年6月《对于时局的主张》已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在提出11条具体的奋斗目标后，中共表示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文件以“中外古今革命史上的教训”来奉劝“好政府主义诸君”，显然仍将后者列入打倒军阀政治的“革命”一边。到7月，中共的《二大宣言》又提到“无产阶级和贫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且“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sup>[312]</sup>

胡适随即在《国际的中国》一文中正面回应中共《二大宣言》说：“中国共产党近来发出一个宣言，大意是说他们现在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件事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sup>[313]</sup>按前引那两句话是《二大宣言》唯一与“联合战线”相关的内容，与胡适所述并不十分一致。胡适特别提到这一点，可能是因为他接着要反驳中共关于帝国主义的主张，先表明友善的态度；也许他心里仍记着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甚至可能因为中共那段时间和他在“联合战线”方面持续沟通，胡适对中共意向的了解超过《宣言》本身。

实际上中共二大确实通过了一个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内部决议案，<sup>[314]</sup>不排除胡适多少了解这一决议内容的可能，因为中共那段时间一直让胡适知道这方面的事。如李大钊1922年8月底给胡适的信中就通报说：“昨与溥泉、仲甫商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Democratic front），与反动派决裂。”<sup>[315]</sup>信中“与反动派决裂”一语值得注意，李大钊这样说而不加解释或界定似乎提示着此前已有所联络，彼此所知尚更多；至少在李大钊放弃《我们的政治主张》中的立场后，胡适对此能够理解，大家仍相互视为同盟者。

到9月，胡适又和李大钊一起署名于蔡元培领衔的《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胡适向来秉承“惟名



与器不可假于人”的古训，他支持陈独秀自是老朋友当为之事，但通常未必肯参与“外人”或层次较低之人的共同行动；而这一启事除蔡元培和李石曾、蒋梦麟等少数几位教授外，其余更多是张国焘、蔡和森等少壮中共成员。<sup>[316]</sup>胡适这次能与这许多“少年”共同署名在一个启事之上，很能表明他确实将中共视为“我们”。

同在9月，陈独秀在反对联省自治时再次提出：“我主张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颠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sup>[317]</sup>胡适在撰文反驳“我们的朋友陈独秀”的主张之前，也特别表示“完全赞成”陈独秀关于“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的主张，这与他在《国际的中国》一文中先正面回应中共的写法是一样的。<sup>[318]</sup>

或即因胡适此时对中共的批评大体采取他爱说的“诤友”态度，他与中共的争论基本没有影响中共推动其对胡适的“联合战线”。张国焘在系统反驳胡适《国际的中国》那篇长文中便不忘指出，“胡适先生既然赞成我们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我们自然是很欢迎的”。他也学胡适的口气“恳挚的奉劝胡适先生：中国的智识阶级商业和工业的资产阶级要自己能够避免美国的愚弄，他们的民主运动才能依正轨进行”。<sup>[319]</sup>

大概是为将中共二大的决定贯彻到胡适所代表的政治派别之上，张国焘又专门撰文“劝告”胡适等人。他分析说：“在小资产阶级和平派中间，胡适先生或可为一派的代表，他发刊《努力周报》，活动甚力。这个资产阶级的学者曾发表那有名的政治主张，标榜好政府主义。他还梦想他自己是个漂亮的外交家，主张由各省政府、省议会、商会、教育会等派代表组织一个会议，要求一班军阀官僚把袖子里的把戏拿出来，做到‘杯酒释兵柄’的故事；并大倡联省自治，梦想用这种制度削减军阀实权。这位先生也曾多少站在一个政府党（王宠惠内阁）后面，企图把他的主张慢慢实现。结果经过这几月的试验，不但竟是一场春梦；反被王怀庆等加上他一个过激派的头衔，要把他捉将官里去。”<sup>[320]</sup>

这表明了北京政局的变化，即“由吴佩孚指挥北京政府的稍微进步时期已是过去，政府现已落在曹锟手里”，后者“受一班帝制派和反动官僚的包围，变成更反动[ ]的军阀领袖了”。若其稳握政权，北京便会现出恐怖的色彩。“凡属带着一点所谓新的色彩的分子，无论是革命的或是非革命的，□[ ]将来都要遭受同一的危惧”。换言之，胡适派以及“研究系的左派”蒲伯英派等“各种进步的势力”都面临着共同的威胁。“倘若你们细心考察这种政治情况，倘若你们想到反动的势力都已结合一气的事实，或者能提醒你们感觉与革命势力携手的必要罢”。

中共认为，历史事实和目前现状都证明：“所有温和的改良运动，立宪运动，是会毫无结果的；目前解决政治的惟一方法，是革命的民主派和各派社会主义团体联合的革命运动。……无论哪个诚实希望改造中国的人，现在是没有法子否认我们的革命方略了；而且他们现在是没有旁的道路走了，除非跟着我们一块儿走去。这个多年躺在文化运动底下的胡适先生，因为奉直战争时局变更，促着他献身政治宣传；这个蒙上社会运动面具的蒲伯英先生，也因为那次政变，促起他注意国会制宪事业。现在有一个捉将官里去的危险；一个目击多数议员卖身给军阀去了，或能感觉制宪的无价值了。先生们，现在在你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你们如何干法呢？”

张氏针对胡适说：“现在呢，或者是使他细嚼过去经验的时机到了，或者是使他重申过去的政治主张和决定目前的方针的时机也到了。我们要问问他：目前你怎么办呢？还是三十六计，跑为上计呢？还是坚持原来的主张呢？还是从此更有新的觉悟呢？”既然“更反动势力都已联合拢来了”，各进步势力不也应该进行“共同抵御”吗？他进而明确说出中共对所有“小资产阶级和平派”的态度：“现在我们要求你们做什么呢？我们仅仅要求你们来抵御更反动的势力。……我们决不要求你们和我们一样的向军阀进攻，但是我们要求你们来共同抵御这种危惧。”

具体言之：“我们所希望于你们的，是在不与任何外国侵略家发生关系之下，在不帮助叛贼陈炯明辈之下，和在不宣传不可能的和平主义而阻碍中国的改进之下，与我们共同抵御更反动的军阀势力。再说显明些：胡适派或者目前应该放弃替王正廷辩护的态度，放弃替顾维钧、罗文干声冤的态度，也不要一溜烟跑了；而且在上项条件之下，努力做暴露反动军阀祸国卖国的宣传。……用这样的方法干去，就是说你们在唤醒大家痛恨军阀的事业上做了一些工夫，这就是说你们在改造中国的事业上尽了一点力量。”

张国焘问道：“你们敢接受我们的要求么？请你们快快答覆这个问题，用事实答覆这个问题。”且现在还有“许多知识阶级分子在后面看着你们：他们会看着你们现在怎样干法，借此审定你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倘若你们不能照上面所说去做，“我想那些知识阶级分子再不会让你们在政治上说话了罢”；而若能照这样做，“虽然我们在政治上是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我们相互中间，目前是没有大冲突的”。

此文并非个人口气，显然是在贯彻中共二大的决定，应是对胡适态度的一种回应。几个月后，陈独秀又呼说：“知识阶级诸君呵！最近政象已明白告诉我们：我们若不愿投降于军阀，只有民主革命这一条路可走，别无中立徘徊之余地。”知识阶级“不但不应怕劳动阶级的组织及运动，而且应当竭尽全力以赞助此等组织及运动”。<sup>[321]</sup>到1923年7月，陈独秀更具体地提出，“适之所信的实验主义和我们所信的唯物史观，自然大有不同之点，而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因为当时“号称新派学者”大多半新半旧，“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只有胡适之。张君勱和梁漱溟的昏乱思想被适之教训的开口不得，实在是中国思想界一线曙光”。<sup>[322]</sup>



邓中夏虽然在《努力周报的功罪》一文里反驳了胡适的亲美言论，但他在三个星期后又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明确把梁启超等《改造》同人加上梁漱溟、章士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划为“东方文化派”，把胡适等人划为“科学方法派”，再把共产党人划为“唯物史观派”。他指出，“东方文化派是假新的、非科学的；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是真新的、科学的。现在中国思想界的形势”，应是“后两派结成联合战线，一致向前一派进攻、痛击”。<sup>[323]</sup>

前面说过，胡适在1921年致陈独秀的信中明确将《新青年》同人划为“我们”，把梁启超及《改造》同人划为“他们”。我在1995年已引用此信，并指出邓中夏与胡适的看法相近。<sup>[324]</sup>张太原最近也据同一史料得出对胡适的相同看法，但他在引用了邓中夏《努力周报的功罪》一文后进而认为邓氏在此“把胡适从‘我们’中推出去，和梁启超同划为‘他们’了”。<sup>[325]</sup>这恐怕有些误解，因为邓氏在此文中也特别指出，胡适等“把张君勱、梁漱溟的东方混乱思想打倒，究竟值得我们表同情”。<sup>[326]</sup>与陈独秀一样，邓中夏最看重的，恰是胡适等人与所谓“东方文化派”的对立。

正是在扫荡“东方文化派”所代表的“封建宗法思想”这一目标下，中共关于思想界派别的划分与胡适所划分的“我们”与“他们”基本一致。邓中夏据唯物史观分析这些思想派别的产生说，“科学方法派可说是代表新式工业的资产阶级思想，唯物史观派可说是代表新式工业的无产阶级思想”；尽管最终“资产阶级思想必被无产阶级思想征服”，但在“中国新式产业尚未充分发达”之时，“代表劳资两阶级思想的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尚有携手联合向代表封建思想的东方文化派进攻的必要”。这一学理层面的分析非常值得重视，因为这意味着两派联合的时段可能会相当长。

约两个月后，邓中夏再次撰文正面呼应陈独秀关于“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的主张，他说：陈独秀为“扫荡封建宗法思想”而提出的“唯物史观”和“实验主义”结成联合阵线，“在现在中国这乌烟瘴气的思想界中不特是必要，而且是应该”。他并认为，仅仅是这两派“联合的范围似乎太狭一点，不能使我们革命派的势力增厚和地盘加大”，故进而提出扩充范围，与“行为派的心理学家”、“三民主义的政治家”、“社会化的文学家”和“平民主义的教育家”四种“气味相投趋向相近的生力军”一起“结成联合战线，向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一致进攻”。<sup>[327]</sup>邓氏上述三文的发表时间在三四个月内，且明确主张联合的是后两文，说其已“把胡适从‘我们’中推出去，和梁启超同划为‘他们’了”，实不合其原意。

如果说陈独秀和邓中夏等主要侧重在思想方面，毛泽东则从政治力量上做出类似的划分，他在1923年4月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把当时中国各派势力划分为三，即“革命的民主派”（包括正合作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非革命的民主派”（含“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北洋各系组成的“反动派”；并指出：“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革命及非革命的民主派“在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是会要合作的”，以“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而所谓“稍后的一个时期”，即指军阀当道之时，“会要有十年八年都说不定”。<sup>[328]</sup>若按前引邓中夏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所做的分析看，到“中国新式产业充分发达”之前，都属于“代表劳资两阶级思想的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结成联合战线的时段，其时间还要更长得多。

大体而言，与胡适自视为中共之“诤友”而既批评又赞赏其“联合战线”相类，共产党人当时对胡适的具体主张有许多不同和不满的看法，不仅正面指出了不同，批评了其“对军阀‘妥协’”和“不甚反帝”的主张，但基本视其为可以联合也应该联合的对象。<sup>[329]</sup>萧楚女在1923年底的文章是个典型的代表，他对胡适等提倡整理国故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称之为类似“老妈子补破裤”，全文几乎不见前引周恩来和邓中夏文中所带的善意口气，但他最后仍呼吁说：“且快快放你们手中底破裤，来做个‘时代’的拥护者，和我们组成联合战线；扫灭那些饿鬼，那些野心军阀——那些法西塞蒂。”<sup>[330]</sup>

实际上，在1927年4月国民党正式开始“清共”以前，国共合作既然是中共全党的基本政策，某种程度的“联合战线”始终是中共的既定方针，唯一可以讨论的是胡适及其代表的特定“派别”是否仍包括在此“联合战线”之内。从中共对时局的主张、二大决议和宣言到张国焘、陈独秀、邓中夏、毛泽东、萧楚女的一系列表述，可知至少到1924年初，不仅“联合战线”仍在执行，这些中共重要领导人的公开表述也都将胡适等容纳在联合范围之内（前引毛泽东所言“稍后的一个时期”已表明了这一“联合”时段仍在延长，而邓中夏所做的两派阶级分析更大大延伸了联合的时段）。

“胡适”这一姓名所代表的象征性意义本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连，后者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有直接关联，故得到中共的重视。但国共合作及1925年五卅运动后，中共所关注和侧重的问题已有所变化。随着中共的“革命工作”日益进入具体的工农运动甚至武装斗争阶段，纯粹“思想战线”本身受到的关注已较前为轻，胡适及其代表的“派别”在国共正式合作后在联合与反对两方面都逐渐不那么受到中共重视了。<sup>[331]</sup>

1926年1月，瞿秋白连续撰写两篇长文论述五卅运动的划时代意义，其中一个重点也涉及中国革命史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卅运动这两大里程碑的关联。他非常重视“五四”时代，注意到那时“知识阶级里，社会主义的思想，自然地随着笼统的新文化运动、德谟克拉西的要求、和反宗法社会的斗争而普遍的广泛的发展”。故“中国社会里，新的革命力量正在这一时期渐渐的形成”。<sup>[332]</sup>可以说，“中国民众革命运动的开始”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端”都在“五四”时代。瞿秋白将“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定为“资产阶级性质”，当时的“新文化思想——反对孔孟、反对旧礼教、白话运动、妇女问题等等，都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所需要的”。<sup>[333]</sup>

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反对宗法封建军阀的革命，内部必定含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种

子”。中国“这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在“事实上思想上都是受世界革命潮流的冲动”，如1917—1919年间，“中国新思想的勃兴，谁又能否认俄国革命、德国革命、英美大罢工、劳动问题的世界化等等的影响呢？那时的青年和学生，差不多个人人都注意报上世界革命运动的消息，个个人都想谈几句劳动问题、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的思想，当然是很笼统模糊的，然而就在这一源流里生长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共产主义。《新青年》杂志的左倾与其共产主义化的过程，便是明证”。

无产阶级革命的种子含孕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中这一特点正体现出“联合战线”的意味：当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劳动社会问题的研究热与上述各种运动混流并进。这是很明显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反抗宗法封建社会”。到五卅时候，“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领袖五卅运动，尤其是无产阶级指导下之联合战线发展的最高点”。不过，由于“中国无产阶级运动长足的进步”，由于“无产阶级在这国民革命过程中，确已占得多份的优势”，资产阶级“看见国民革命的进行中资产阶级要牺牲自己的私利……于是开始反动而求争回革命的指导权以消灭革命”，具体表现在“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的兴起”。<sup>[334]</sup>

总体言之，“五四到五卅，这六七年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有重大的政治上文化上的意义”。但五卅运动本身又是分水岭，最明显的变化是：“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五卅之后，大家争着辟阶级斗争。”瞿秋白认为，“半年来思想界里的反动潮流，从主义上策略上革命领袖问题上以及道德文化上所发生的争执”，都是“阶级分化”这一现象的表演。或可以说，正是“五卅”体现出的划时代转变把“五四”推入已逝的往昔。阶级分化的结果自然导致“联合战线”本身的改变，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之一的胡适，恰又素不赞成“阶级斗争”，其所受中共重视当然也就今非昔比了。<sup>[335]</sup>

不过，瞿秋白也指出，为了促成国民会议的召开，仍需要“切实的结合一切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力量；资产阶级在妥协失败之后应当觉悟，小资产阶级在受了妥协政策的迷误之后尤其应当立刻站到革命的平民一方面来”，连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也在联合范围之内：“各地工商学农各界、国家主义、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左派、共产主义派，大家联合起来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就当地实行民众的意志，组织武装力量，反抗军阀的统治。”<sup>[336]</sup>

可以看出，尽管瞿秋白的态度有较大的保留，在军阀这一“封建势力”仍当政时，资产阶级就仍在争取之列。当年中共意识形态尚在形成之中，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定位长期悬而不决：<sup>[337]</sup>像胡适这样阶级属性似定未定的知识精英，其“反封建”一面向来为左派所承认，自然也是可以争取或联合的。前引瞿秋白对胡适参加善后会议的批评虽带揶揄口气，大体还算温和，并且他到底承认胡适“总算还是社会上公认的民治主义者”，这是当时以民主主义革命为口号的中共对胡适坚持“争取”方针的基础。

而且，胡适以及北京知识界相当一部分人那几年的政治倾向有其独特之处，很难以黑白分明的划分法来认知。在当时中共一般的思路中，帝国主义和苏联是对立的势力，通常捧苏俄的不喜欢英美，反之亦然；而在胡适及一些人眼中，苏俄也是“西方”的一部分，他们对两边都赞赏，确实使中共很难把胡适这样有影响的人划出“联合”的范围。1926年夏，胡适途经苏联到英国参加中英庚款会议，中共（以及苏俄）便对他实施了一系列“争取”的努力，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 5. 胡适与中共“舌战”莫斯科

五卅前中共希望联合胡适等人的期待与当时思想界的倾向大体吻合，自苏俄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后（实际并未完全实行），北京的学界思想界左倾亲俄风气本相当盛，到五卅后更有增无减。在张彭春看来，当时知识精英自己也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之中，然而却对推动世风走向激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年岁稍高的人”一方面“劝青年冷静好好读书”，一方面又不免教猱升木，“主张共产，与苏俄合作”。他们既“主张用外交机关，承认已有的政府，缓缓进行”；又“鼓动国民救国，对内对外同时用力，以群众运动为工具，以赤俄为模范及后援”。<sup>[338]</sup>

张彭春的观察大致准确，早在1922年苏俄代表越飞访华时，北大就设宴招待越飞，胡适也出席。据说蔡元培在席间表示“愿以中国居于俄国革命的弟子之列”，遂有法国电讯说“北京大学过激化了”。而中共的高君宇则表示，若真如此，“那是我们被压迫的人民要欢迎的呀！”<sup>[339]</sup>到1923—1924年间中苏两国就恢复邦交进行谈判，苏联代表加拉罕在与北京政府谈判陷入僵局时曾提出以“中国人民”为外交对象，这一相当不符合国际外交谈判正常程序的举措，却适应了当时中国各界民众对政府不信任并要求参与外交的心理，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各类中国人士的应和。如一般并不被视为特别激进的张君勱就要求加拉罕本着外交公开的宗旨，将其对中国政府所提出之条件公示于中国国民，国民必能秉公道正义以赞助加拉罕。<sup>[340]</sup>

1925年下半年苏俄是敌是友的问题曾在北方高层次知识分子中引起一场大争论，以《晨报》和《京报》的副刊为主要阵地（这与北洋军阀的“反赤化”虽然同时，思想上也有关联，却不是一回事）。<sup>[341]</sup>张奚若那时便说，“在今日人人对于这个重要问题不敢有所表示的时代”，《晨报》敢站出来公开发表反对共产和苏俄的言论，“令人非常可佩”。<sup>[342]</sup>公开发表反对共产和苏俄的言论已需要勇气，可见当年北京世风有多么激进。那年末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北京政局一度出现左倾的趋势，张彭春自己也因“北



京国民党得势”而感觉“共产主义快到临头，必须研究它了”，乃“专看俄国革命书”。<sup>[343]</sup>

胡适对苏俄的态度与思想界上述倾向非常接近，他虽不曾“主张共产”，大体也属于张彭春所说的“年岁稍高的人”中的一个，其在1926—1927年间的言论应可以算相当亲俄。<sup>[344]</sup>而且，胡适在1925年所作题为“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的演讲中，因其听众是教会大学人员，曾明言：以收回租借地和废止不平等条约为代表的“新起的民族主义的反动（a new nationalistic reaction）”是“很自然的、很正当的”。他对中共党人赞扬义和团并不赞成，但在文中大量正面引述中共的反帝观点，然后指出：“这种反动是不可轻视的。他们的理由就是八十年来列强欺侮压迫中国人的历史；他们的证据就是外国人在中国取得的种种特权和租借。这些不公道一日不除，这些不平等的情形一日不去，那么，这些反动的喊声一日不能消灭。”<sup>[345]</sup>

1925年6月胡适在中国少年卫国团演讲时，更明确提出应当“要求于最短时期内开一个根本修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会议，以铲除一切冲突的祸根”。因为“那些条约或是利用他们的武力，或是利用我们的愚痴，其不公平而应该修正，理至明显”。针对六国使团的通牒“说我们有排外的运动，他们发生最大的恐怖”，胡适“试问这恐怖哪里来的？完全由于他们基于不平等的条约，享有特殊的权利而来。所以我们提出修改也是极正当的”。他认为修约不仅“很有可能的性质，而时机还算成熟了”。这部分因为“美国也有人主张修改条约，而俄国自是赞成的了”。<sup>[346]</sup>中苏条约一年前已经签订，此时苏俄“赞成”中国修订与他国之约正是其反帝主张的一部分，胡适的口吻说明苏俄宣传的成功仍在继续，而他对俄国的作为显然持肯定态度。

这些言论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主张反帝的中国人之足够注意，尚难确定，但对中外关系言论有特殊关怀的苏俄在华人员却很可能注意及此（待考），故苏俄与中共对胡适稍后对苏联的访问寄予厚望。<sup>[347]</sup>为安排胡适访问莫斯科中山大学，<sup>[348]</sup>驻华大使加拉罕曾为其写介绍信。据胡适自己的记录说，他于7月29日下午2时到莫斯科，到旅馆洗浴后即出门径往中山大学访校长拉狄克，很能体现其心情的迫切。到中山大学时，拉狄克已走了，学生多在乡间歇夏，胡适将加拉罕的介绍信交给一位认得他的中国学生（此人曾在北京听过胡适演说），然后去中国大使馆。<sup>[349]</sup>

当晚胡适出门“走了一会，回来见于右任先生留下一张条，不知他怎样知道我来了”。第二天有苏俄方面安排的参观，隔日（7月31日）胡适又往中山大学访右任先生不遇，但其“寓中有一人，乃是蔡和森。相别甚久，彼此竟不认得了。我们纵谈甚快，陆续来者甚多，有刘伯坚、任××、王人达、马文彦等。后来越来越多，至十余人之多。右任也回来了。我与和森仍继续辩论，余人参加者甚少。从三点直到九点，Radek〔拉狄克〕来了，才把我们的舌战打断。Radek谈了一会，先走了。我们出去到‘大莫斯科饭店’吃饭。散时已十一点多钟了。”

这次与左派中国学生长谈是反映当年胡适与中共关系的重要史事，而胡适自己的记录有其选择性，恰省略了他与蔡和森“舌战”的具体内容这一要素，故此事的“全貌”仍待中共和苏联方面的记录佐证，可惜在场的中大学生和苏联方面的记录现在尚未发现。<sup>[350]</sup>不过，这次“舌战”在当年留俄人士中已成传闻的“事件”，目前我已见到两份关于此事的他人叙述，将此同一“故事”的三种不同叙述对看，虽未必能得其“真相”之全貌，却可以有稍更深入的体会。

曾就读北大的毛以亨1926年追随冯玉祥到苏联，他记载说：

胡适之过俄时，曾参观孙逸仙大学。拉〔狄克〕氏问他他对苏联的观感如何？胡氏答得亦极幽默，说：“有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问他干得好否，他说这是将来的事，他非预言家。此乃孙逸仙大学当时的学生对我说的，而且大骂胡氏，谓为资产阶级训练出来的东西，难道苏联会干不好么？似乎胡适之的幽默战胜了拉狄克，倘不认为吃了胡适之的亏的话，大家不会气愤历久而不已。<sup>[351]</sup>

另一记述出自汪菊农，他本人是留俄的学生，但胡适到中山大学时他因病在克里米亚疗养，所以他的记录也是听同学转述的：

（胡适抵达莫斯科时），在中山大学、东方劳动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以及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齐集莫斯科车站迎接他，人山人海，盛况空前。胡适下车伊始，我们中山大学的同学，又复邀请他来校作一次演讲，校长拉狄克主持其事。胡适登台之后，首先盛赞苏联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成功并表示佩服。不料他说到国际形势时，立论却突变了，竟说美国对华政策是亲善的，首先退还庚款，为中国培养科学与文化的人才，改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云云。其时有一同学，写一纸条递上讲台，质问胡博士看过《中美望厦条约》没有？胡适随即作答：“那是美国过去的历史，现在美国对华的政策的确是亲善的。”弄得同学们啼笑皆非，大家都很不愉快。校长拉狄克作结论时，高举手杖，大声疾呼：“我要教导我的学生，学成归国，奋斗！革命！”<sup>[352]</sup>

两份他人叙述虽都出自那段时间在苏联的中国人，然均非亲历，而是听中山大学学生讲述，且都是较晚的回忆，自不能要求其特别准确。但正如“知人”需要“论世”一样，任何事件的“真相”本蕴涵在其前后左右的时空脉络之中。这些从当时传闻得来的二手叙述，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当地当事人认知中的“胡适访问莫斯科中山大学”大致是怎样一回事，与第一手“实录”性文献相比，别有其史料价值。<sup>[353]</sup>

据胡适日记可知，中山大学等中国学生齐集车站迎接胡适以及请他到中山大学演讲都只是传说而非事实。就整体事实而言，汪菊农所记虽更多具体的细节描述，毛以亨所记相对更符合于胡适日记中的记述。至于胡适与中国学生和拉狄克等的讨论内容，毛、汪二氏虽各有明显的倾向性，<sup>[354]</sup>然根据胡适其他的文字表述看，两人所记大致都非常接近，似可以互补。

例如，汪菊农所记胡适先盛赞苏联又立论“突变”，就非常符合他这段时间涉及中共与苏俄的撰文风



格：区别美国“过去的历史”和“现在对华政策亲善”，也是胡适向有的主张。在前引《国际的中国》中，胡适就说列强在清末还想征服统治中国，但民国以来列强对华态度明显改变，外国投资者也“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中国人若能“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使外国投资有了保障，也就没有理由再在中国实施帝国主义政策了。<sup>[355]</sup>汪菊农并明确了中山大学“同学们”和拉狄克对胡适不满之所自，即表彰苏联不够，而又公然为美国说好话，虽为传言，也相当能说明问题，这与前述中共对胡适的不满是一致的。

又如毛以亨所记胡适陈述其对苏联的观感是“有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这在胡适一面，完全是实话实说，并非毛氏所说的“幽默”。前引胡适的《后努力歌》里已提出“努力”或“干”是解开各种互为因果的连环之唯一办法。在其公开发表的赞颂苏俄文字中，胡适明确提出“我们要干政治”的主张，而且是干“什么制度都可以”。当时《晨报副刊》上一篇署名伯山的作者就看出胡适“明显地流露出不据学理不择方法去干”的倾向，他发现，胡适“近来的精神”就体现在“他那‘肯干’‘能干’的豪气”。<sup>[356]</sup>可知“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乃胡适那几年素所向往，用之于表述对苏联的观感，在他个人已是相当高的赞誉。

时人传言中学生“齐集车站欢迎”虽非事实，仍揭示出某种心态；那时正与中共青年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于右任当晚即往访胡适（后来胡适正在于舍见到蔡和森等），颇能印证中共和苏俄确实对胡适的访问期望甚高。这里很可能有胡适的老朋友李大钊所起的作用，而加拉罕为胡适写介绍信给拉狄克，更说明中共和苏俄非常想“争取”胡适。蔡和森和刘伯坚在“舌战”后回访胡适，两人都希望胡适“在俄国久住一些时”日，<sup>[357]</sup>提示着他们并未放弃“争取”胡适的努力。

实际上苏俄已尽量努力影响胡适，且其努力还相当成功。胡适到莫斯科的第二天和第三天连续被安排参观革命博物馆和第一监狱，让他从不同侧面认识新俄。从胡适那两天的日记看，他的观感和反应完全是正面的。胡适在关押重罪犯的第一监狱看到“每二人一室，不穿囚犯制服，允许穿其家送来之衣服。每日工作八时，所得工资，除必需之费用及作工原料外，皆寄与其家人。作工之外，各依其性情与教育，组为各种文化的与教育的活动，如补充教育，音乐会，文学讨论会，政治讨论之类”。狱中“每室有自来水，有一桌二凳”；有一室因一犯人为音乐家，“平日须作谱”，特增一桌。监狱有常驻狱医，专门医生如花柳专家、心理病专家和牙医也不时会来。他并试吃了犯人自作的面包，觉得比他所住旅馆的还好。<sup>[358]</sup>

在胡适离开莫斯科的火车上，邻室恰有一位苏俄外交委员Theodore Rothstein，在胡适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即亲美而不那么反帝且怀疑苏俄的专政）后，Rothstein指出，“英美等国名为尊崇自由，实是戴假面具，到了微嗅得一点危险时即将假面具撕去了”；其实“他们也是一种Dictatorship，只是不肯老实承认。苏俄却是言行一致，自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胡适以为，“此言却甚有理。我看苏俄之《刑事律》及《苏俄指南》，皆十分老实，毫无假装面孔”。<sup>[359]</sup>

当然，胡适也不止听信苏俄的“一面之辞”，他与那时恰在莫斯科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C. E. Merriam两次交谈，第二次更“谈甚久”。胡适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Merriam）以政治学说史家的眼光看苏俄，感想如何？以一党专政，而不容反对党的存在，于自由的关系如何？所谓Dictatorship的时期究竟何时可终了？既不许反对党的存在，则此训政时期岂不是无期的延长吗？”Merriam答复说：“此间作此绝大的、空前的政治试验，自不容没有保障，故摧残一切所谓‘反革命的行为’是可以原谅的。向来作Dictator的，总想愚民以自固其权力。此间一切设施，尤其是教育的设施，都注意在实地造成一辈新国民，——所谓‘Socialistic generation’，此一辈新国民造成之日即是Dictatorship可以终止之时。”胡适基本接受这一解释，以为“此论甚公允”。<sup>[360]</sup>

他立刻将这位教授的观念引用到寄回国发表的书信之中，指出专制必愚民，而苏俄则“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民治制度”。<sup>[361]</sup>在斯大林1927年完全掌握苏俄权力并推行依靠自己力量集中发展重工业之前，苏俄曾努力想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其教育也颇受美国影响，胡适的老师杜威后来也曾“大夸许苏俄教育”。<sup>[362]</sup>胡适在莫斯科期间特意阅读了苏联“教育部所作《公家教育》，不能不感觉八年来的教育成绩可惊。其教育方针实根据于新的教育学说”。<sup>[363]</sup>大概正是基于专制可经教育变民主这一判断，胡适在1930年断言：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sup>[364]</sup>

在访问莫斯科的同时或稍后，胡适写了一系列文章，高度推崇新俄的“空前伟大的政治新试验”。他甚至认为中国应当学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应当学德国学日本，“以养成一点整齐严肃的气象”。倒是英国不足学，因其“名为evolution [渐进]，实则得过且过，直到雨临头时方才做补漏的工夫”。这一切，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就是他的“新的兴奋”。<sup>[365]</sup>与几年前陈独秀提出的“拿英美作榜样”相比，胡适为了国家的快速发展，竟主张以当时几个最著名的集权国家为榜样，其观念的变化是相当巨大的。

这样一种观念的巨变，显然与胡适对苏联现象的现场观察直接相关。正如徐志摩所说：“你一出国游历去，不论你走到哪一个方向——日本、美国、英国、俄国，全是一样——你总觉得耳目一新，精神焕发，……除非是白痴或是麻痹，谁去俄国都不免感到极大的震惊，赞成或反对他们的政治或别的什么另是一件事，在那边人类的活力几乎超过了炙手可热的度数，恰好反照我们这边一切活动低落到不可信的地位。”<sup>[366]</sup>

的确，近代中国士人个个都盼望中国强盛，而苏俄正提供了一个由弱变强的新模式，故俄国的兴起对

任何中国知识分子都具打动人心的作用。且“新俄”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是多重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或者看到的是革命夺权的成功，自由主义者看到的恐怕更多是夺权后的建设和“改造社会”的措施，苏俄的“新教育”和莫斯科第一监狱的现象对胡适而言正可谓“求仁得仁”（若后者的安排不是出自胡适本人的要求，说明俄方对胡适还确有几分“了解之同情”）。

从胡适与前引芝加哥大学教授的谈话中可知，怎样认识苏俄所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他那时特别关注并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也是他的许多老朋友不能接受“新俄”的关键。任鸿隽虽然同意胡适所说中国人的毛病“一个是迷信‘狄克推多’，一个是把责任推在外国人身上”，但他也提出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迷信‘狄克推多’是由不信‘德谟克拉西’来的，而现时俄国式的劳农专制，正与美国式‘德谟克拉西’决胜于世界的政治舞台。我们若要排除‘狄克推多’的迷信，恐怕还要从提倡‘德谟克拉西’入手，你说对吗？国内的朋友对于你赞成苏俄的论调发生疑问，也就在这一点。”<sup>[367]</sup>

对胡适而言，任鸿隽提出的关键问题已由那位芝加哥大学教授帮他解决了。非常有意思的是胡适用孙中山的“训政时期”来指谓苏俄的“一党专政”，这既提示出他对国民党政治的某种看法，也暗示了他在提问时已将苏俄的“一党专政”预设为一个可以有下限的历史时段，故其得到的仍是“求仁得仁”的答案（这里也隐伏了胡适稍后对国民党的正面肯定：既然苏俄的“训政时期”可以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民治制度”，正接受苏俄援助并仿效苏俄政治行为的国民党之“训政时期”自然也可能发生类似的转化<sup>[368]</sup>）。

胡适的另一朋友徐新六也对胡适那“新的兴奋”有所疑问，他说：“兄西游后，政治思想颇多变更，在各处通讯中所见兄之议论，弟赞成者甚多。例如对俄国革命态度之修正，认为对于全世界之大challenge [挑战]，调和稳健即是因循苟且，以及我辈政治活动能力之薄弱，均是无可驳击。”但是他也指出：“俄国革命对旧式社会虽有震撼摧拉之力，我辈亦不能见其力大而即以为是。”徐氏认为，“俄国革命之特色，一为政治上党治之试验，一为经济上共产之试验”。他显然注意到胡适急于要“干政治”的兴奋，特地提出：“我辈当平心静气研究此二点之是否，以及对于我国此时是否为对症之良药。如其不然，当研究出一方案来。”在胡适“对于政治如未用过上述几层工夫以前，不必急提方案，而却不可不苦用一番工夫，或可终于提出一个方案”。<sup>[369]</sup>

徐新六的观察甚敏锐，“力大”（因而效果明显）正是新俄对胡适（及其他许多人）的魅力所在。他的问题实际是：对苏俄的“共产”和“党治”，中国究竟学不学？如果不学，又学苏俄的什么？胡适那时主张向俄国人学习的，首先是“努力肯干”的认真精神，多少带有前引伯山所谓“不据学理不择方法去干”的倾向。可以说，重在行动是胡适当时政治主张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正是在此基础上，一些在常人看来矛盾、冲突或对立的政治趋向才可能被胡适“兼容并包”而熔于一炉。不了解这一点，就较难对胡适那段时间所表述的政治理念及其表现出的政治态度产生“了解之同情”。

任鸿隽关注的“俄国式的劳农专制”与“美国式‘德谟克拉西’”的对立和竞争关系本实际存在，许多人由此视角看问题亦甚自然。类似思路一直影响到后来，张忠栋即曾说，胡适在1927年初从欧洲到美国后，即扫除了他对苏俄的兴奋，再度认定美国的价值。<sup>[370]</sup>此说颇为其他一些学者采纳，其实恐怕误解了胡适。胡适当然更加认同美国，不过前引其1930年关于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的断言表明，胡适认同美国方式并不以放弃对苏俄的兴奋为代价，他本人即曾明言自己对新俄的梦想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sup>[371]</sup>

张先生似也过于夸大了苏俄之后的欧美观感对胡适的影响。从前引胡适日记及毛、汪二位的回忆看，胡适在苏联时就公开表述了其倾向美国的态度，且因此招致拉狄克和中共学生的不满。可以肯定，胡适在莫斯科时就未曾疏离于美国式政治，完全无需到欧美考察后再“重新”认识到美国方式的价值或“回归”到美国方式。

然张忠栋观点的影响迄今不衰，张太原最近在引用其上述观点后说，“到30年代，苏俄取得的‘新成就’，又重新燃起了他[胡适]对苏俄的热情。他把苏俄看做与美国同样先进，但取径却不同的国家”。<sup>[372]</sup>按张太原此论无注，前后亦无相关论述，不知其何所本？胡适既然保持其对新俄的梦想，本无所谓中断，何来什么“重新燃起”？

从任鸿隽到两位张先生似乎都太过强调一般认知中美国与苏联体制的对立，但对胡适来说，既然他认为“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显然更强调两国“取径”的“共同”而非其“不同”。胡适对西方有着自己的亲身认识，他并不像一般人那样笼统看待广义的“欧美”或“西方”政治。

观其当时公开说英国不足学，可知他在英国的观察较多负面印象，这与他到苏联的颇多正面印象非常不同，值得特别注意。而且，胡适那段时间一直把苏俄看作“西方”的一部分；从1919年开始，他长期以来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是关于输入什么样的学理、怎样输入，以及某些学理是否适合中国等问题，但从未质疑这些学理属于“西方”。

与张忠栋相似，张太原也特别看重苏俄之后的欧美观感对胡适的影响，他认为胡适一度因其对苏联的好感而对中共“颇抱同情”，但“他历经美国后，这种本来就较勉强的‘同情’便很快消失了”。<sup>[373]</sup>按胡适在游美后的确指出：“世间的大问题决不是一两个抽象名词（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紧的是事实。现在许多朋友却只高谈主义，不肯看看事实。……拿一个‘赤’字抹杀新运动，那是张作霖、吴佩孚的把戏。然而拿一个‘资本主义’来抹杀一切现代国家，这种眼光究竟比张作霖、吴佩孚高明多



少？”[\[374\]](#)

既然胡适这段时间对苏联的好感是持续的，则其对中共的同情无论有多“勉强”，也未必因“历经美国”而消失。观其仍用“朋友”来称谓其批评对象，便可知他仍维持着“诤友”的态度。在我们并不特别清楚胡适与蔡和森的具体辩论内容之前，我倒倾向于认为，胡适访苏的当时及稍后一段不长的时间内，凡是对中共有所批评的言论可能都与那次胡蔡“舌战”相关，有些恐怕就是将辩论中的话重述一遍，并不需要美国观感来支持。这当然只是“大胆的假设”，但不同意“拿资本主义来抹杀一切现代国家”正可与汪菊农回忆中胡适与中山大学学生的辩论内容相呼应，似可作为这一假设的旁证。

其实胡适对苏俄政治方式的保留也是持续的，无需到美国后才改变。他承认和接受苏联所进行的“绝大的、空前的政治试验”并不意味着他已认可苏俄的政治方式（详后）。更重要的是，胡适对美国政治方式的赞赏也是有分寸的。尽管他长期以来有意无意间试图将美国方式运用于中国，但在因一段时间的议政而较仔细地考察过中国国情并实地参观了新俄的社会主义制度后，胡适对什么样的体制更适合中国似乎有了新的认识，与蔡和森等人的“舌战”显然给了他思想上的刺激，使他产生了一些突破性的想法。

简言之，若用之于中国，胡适并不完全认同美国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政策，而是强调一种更加社会主义化的美国式政治。这些内容可见于胡适8月3日的日记，其中一段非常重要，值得全文引在下面：[\[375\]](#)

今日回想前日与和森的谈话，及自己的观察，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我想，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共产党谓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之政治哲学，这是错的。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有贵族阶级的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的争自由，今则为无产阶级的争自由，略如下图（图略）。不以历史的“必然论”为哲学，而以“进化论”为哲学。资本主义之流弊，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党纲应包括下列各事：1. 有计划的政治。2. 文官考试法的实行。3. 用有限制的外国投资来充分发展中国的交通与实业。4. 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

在离开莫斯科时的私下思考中，胡适主张“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并把人为制裁管理“资本主义之流弊”列为其主要施政目标之一。其设计的自由党“党纲”凡四条，其中“有计划的政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两条就非美国当时所实行（此可与徐新六所说苏俄的“政治上党治”和“经济上共产”之两大“试验”对照）。而“用有限制的外国投资来充分发展中国的交通与实业”一点也明显是在因应反帝一方的思考。他显然认为：若用以“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为基础的“有计划的政治”来制裁和管理“资本主义之流弊”，似乎比强调阶级斗争和“一阶级专制”的苏联方式更合适于中国的国情；恰因不甚赞同正仿效苏联方式的国民党和中共路径，他才产生出自己“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并组织政党的想法，希望走出一条包容美国政治方式和苏俄社会政策的实干之路。[\[376\]](#)

从学理上言，胡适那时特别强调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共性。前引日记中有一段极其值得注意的话，即胡适发挥其以“进化论”哲学为基础的“历史眼光”，提出“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有贵族阶级的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的争自由，今则为无产阶级的争自由”。既然“无产阶级争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则自由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已相当宽广，不仅可以容纳当时英国工党的政治主张，甚至可以向苏俄政治和社会政策的一些面相开放。

胡适从苏俄到英国后即反复对英国人强调：社会主义不仅是西方早期更重个人的民主观念的补充，是西方民主运动的历史组成部分，而且是“西方文明最伟大的精神遗产”。他认为西方人在一次世界大战后已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文明的优点，即不能认识社会主义的价值；而中国能对今后的世界新文明做出的贡献，即在帮助西人认识他们未看到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胡适教导英国人说：“我们或许可以不喜欢社会主义。但它显然是人类所发明的关于社会秩序的最高理念之一。”实际上，“世界正在不知不觉中变成社会主义的世界”。[\[377\]](#)

可以看出，胡适那段时间虽然给人以“不据学理不择方法去干”的倾向，但主要是针对他所认知的国人“政治活动能力薄弱”这一缺失；他那时当然特别强调努力肯干，但也有其学理的基础，即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性。而其“重在行动”的取向则给予胡适更大的活动空间和回旋余地，使其在学理上和实际操作上都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能容纳一般人眼中对立的政治和社会取向。尽管胡适组党“干政治”的冲动后来未能付诸实践，有关他1926年对莫斯科中山大学访问的几项记录却能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其当时的心态和思考。

胡适“新的兴奋”引起了中共的注意，毕竟前引任、徐二氏的质疑都只是私下的交流，而胡适对新俄的赞颂和提倡“干”的主张却是公开发表的，这当然会有不同的影响。如果苏俄和中共对胡适前次未接受蔡和森等的邀请可能有些失望，他们随后即从胡适公开发表的文字中看到了苏俄新气象的真正影响力。胡适到美国后得知，李大钊曾提出，“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378\]](#)看来中共对“新俄”的魅力颇具信心，故希望能进一步向胡适展示。

在此后一段时间里，胡适赞颂苏俄的言论也常被中共提及，彭述之就充满信心地说：“苏俄在国际上的影响，国际上的潜势力一日扩大一日，欧洲产业国的工人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压迫的民族一日接近苏俄一日，如中国民众近来亲俄的表现及欧美赴俄参观团增多便是事实。即是向来代表资产阶级的实验主义的胡适博士看了苏俄之后，也不得不表示赞佩。总之，苏俄仿佛是太阳光，慢慢将全世界都要晒遍而晒热的，全世界因这太阳光热度之增高而必有一天要大起变化的。”[\[379\]](#)

一向主张新旧不两立的陈独秀曾在1926年9月发表文章认为，当时国内战争双方都是“有主义、有社会



目的之战争”，即“赤与反赤”、“半封建势力与民主势力”之战争。他并把当时“关系两方之社会势力”也分成半封建派（反赤的）和民主派（赤的）“两大营寨”，前者包括奉直军阀、官僚、洋行买办、大学教授、地主土豪、交通系、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复辟派及新社会民主党、老民党、各种宗教徒；后者有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国民军、农民、工人、学生、有政治觉悟的工商业家、中小商人、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语丝派创造派等文学家。他明确地把大学教授划在了半封建派一方，似应包括胡适在内；但他在具体分析两派之间“很少有中立之余地”时又特别对将“常常装出中立的态度”的研究系一派人“列在半封建派之内”做出了解释，指出其一向“拼命和民主派作对”。<sup>[380]</sup>

可知陈独秀只是笼统地做一个对应的比较（教授对应学生），他把研究系列入对立“营寨”尚需解释，遑论一向并未“拼命和民主派作对”的胡适呢！尤其按陈氏的定义，“半封建派”和“反赤”是划等号的，而在此后一段时间里连续引用胡适对苏俄的赞颂来反驳“反赤”一边，更可证明陈独秀并未将胡适划入“半封建派（反赤的）”这一“营寨”之内。他在发表上文半个月后即引胡适的话来呼吁北京教育家不要反赤：“胡适之由赤俄写信给北京一班主张‘仇赤友白’的朋友说：‘我看苏俄的教育政策，确是采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如此看来，我们的教育家还要反赤吗？”<sup>[381]</sup>

不久他发现“反赤派首领”福建后方司令李生春取缔赤化的布告说“苏俄实行赤化，时未数年，几致国破人亡，其由饥饿而死者，竟达全国五分之二”；并表示“一经发觉有赤化嫌疑者，即为国人所共弃，身死极刑”。乃感叹道：“军阀眼中口中的赤化与苏俄，无一不是这样。然而胡适之先生偏要十分顶礼佩服苏俄，岂不犯了嫌疑吗？适之先生的一班友白仇赤朋友，应该快快电告适之，万万不可回国，免为国人所共弃，身死极刑！”<sup>[382]</sup>

恽代英直到1927年初还把“胡适之思想的变化”作为“最近有三件比较可喜的事情”的第一件。他肯定胡适关于苏俄的言论“表明他多少是有些进步”，虽然知道作为教授的胡适“至多只能为‘赤’说这多的公道话”，而且还不能不以各种方式“表示自己之并非赤化”，但也是“给那些像徐志摩等一般思想落后的人的当头一棒”，而胡适“这些意见在思想界的影响”就包括使陈源等“文学家亦受革命热潮的鼓舞”，表现出“比胡适之更进步”。<sup>[383]</sup>

北伐期间身处南方国民政府治下的顾颉刚也注意到，胡适“主张我们没有反对俄化的资格，这句话也常称道于人口”。<sup>[384]</sup>这应该是指包括国共两党之人的态度，且更多可能指中共方面，因为国民党一部分实力派此时已在淡化与苏俄的关系了。陈独秀1927年3月发表的言论颇能证实顾颉刚的观察，他说：“自从胡适之发表了称赞苏俄教育的几封信以后，便有徐志摩和瞿菊农一班人极力反对苏俄的党化教育，又有张象鼎一班人极力赞成党化教育，其实两方面都是闭着眼睛瞎说。”<sup>[385]</sup>可知中共到此时仍看重胡适言论的正面影响，特别是注意到胡适与其好友徐志摩观念的不同。

但顾颉刚在同一信里也向胡适建议，“先生归国以后似以不作政治活动为宜”，若“继续发表政治主张”，则新当局者“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于先生者”。<sup>[386]</sup>顾先生对他的老师和南方形势都有比较清楚深入的了解，不论胡适怎样赞颂苏俄，他与国共两党都还有许多原则分歧。

其实胡适约在1925年底就对陈独秀说，旧势力“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反倒是陈氏的“同党少年”这类“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颇不容忍，对胡适进行攻击。他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否则的话，“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sup>[387]</sup>

尽管胡适这是肯定表述，即认为陈独秀尚能容忍“老朋友”胡适这样的“异己”，但他不能不这样申说，仍清楚地表明，双方对其政治主张的“不同”都无让步之意。胡适对苏俄的赞颂可能使彼此稍更走近，终不能解决其根本的政治分歧。

原刊《近代史研究》2003年4期

## 注 释

\* 本文引用昔年言论，尽可能注明其写作年代，然作者未自注写作时间者，则注出其发表时间。各家文字，凡通行文集所收者，一般使用文集，以利读者核阅，仅对那些不常被引用者兼注明其发表的报刊。

[1] 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470—499页。更早的表述可见高全朴、张岂之：《“五四”时期李大钊同志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斗争》，《历史研究》，1959年6期。

[2] 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二版，258页。

[3] 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919—1923，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本文所用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的新版，212—223页，引文在220页。按在美国的周策纵很早即对这一论争进行了与前述观点不甚同的简略讨论，参见其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218-22.不过他的书直到90年代中期才译成中文，此前基本未参与到中国大陆的学术言说之中。

[4] 参见李林：《还“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本来面目》，《二十一世纪》，第8期（1991年）；李良玉：《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考辨》，《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1期；马以鑫：《“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评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4期。

[5] “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适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下径引书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6] 《胡适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18页。

[7]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62—70页，引文在67—68页。按课题组成员是丁伟志、徐宗勉、陈文桂、闵杰。

[8] 陆剑杰：《中国的自由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哲学研究》1999年11期。

[9] 黄济：《中国近百年教育思想回眸》，《北京大学教育评论》1卷2期（2003年4月）。不过，作者也指出，在其研究的教育思想领域，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甚大，“当时出版的由中国学者所撰写的教育专著，也多数受到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甚至有的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所写的教育论著，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也是肯定的”。

[10] 另有不少相关论述出自对胡适和李大钊的研究，基本上所有关于胡适和李大钊的传记性研究都多少涉及这一问题（不具引），但大部分也都有明显的“附带”论及的意味，故多未深入。

[11] 少数论文如前引李良玉之文也进行了相对细致的考辨，惜其欲证明胡适所针对的非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似无必要，盖李大钊文本后出，自不可能成为胡适批评的对象。参见刘维：《一个必要的考据》，《光明日报》1960年8月4日，3版。

[12] 相关论述较早有李达嘉的《胡适在“歧路”上》（收入《胡适与近代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213—252页），较近有桑兵的《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3期）。我个人对此也较关注，先后有一些论著讨论及此，参见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学人》第4辑（1993年7月）；《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4期。

[13] 前引《伟大的开端》和《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都特别注意这方面，很可参考，但仍有不少可论之处。

[14] 周德之：《为迷信“主义”者进一言》，《晨报副刊》，1926年11月4日；马君武：《读书与救国》，《晨报副刊》，1926年11月20日；陈炯明：《中国统一刍议》，1928年自刊本；均引在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266页。

[15] 傅斯年：《心气薄弱之中国人》，《新潮》，1卷2号（1919年2月），343页。

[16] 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适文集》，第3册，364页。

[17] 胡适：《汤尔和译〈到田间去〉的序》（1930年5月），《胡适文集》，第8册，402页。

[18] 胡适在当年7月致《教育杂志》的信中说：“一班洋人专爱用几个名词来变把戏，来欺骗世人。这不是小事，故我忍不住要指出他们的荒谬。”参见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82—183页。

[19] 本段与下段，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年11月），《胡适文集》，第5册，508—510页。

[20]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以下径引书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75页。

[21] 《胡适口述自传》，194—195页。按这其中可能有译注者唐德刚先生起的作用，译注本这一节的标题便是“‘问题’与‘主义’之争：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但这不排除是唐先生自己“总结”文意后加上的，因为他并未说各章节标题是胡适自定，有的标题如“考试和书院教育”便不像是先有，更像是后加（甚至有的分节恐怕都是后来“编辑”时的处理），待考。

[22] 相反，殷海光后来甚至指责胡适只知宣扬民主，却“很少注意与民主思想敌对的思想”。参见张忠栋：《胡适与殷海光》，《台大文史哲学报》，37期（1989年12月），126、163页。

[23] 按《新青年》6卷5号虽标明是1919年5月出版，实际出版时间则延后，学者已有考辨。如李大钊那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中，就请读者参照当年8月初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3号上的内容。不排除李大钊能先看到《每周评论》稿件，即使如此，他撰文时至少《每周评论》第33号的内容已确定，故《新青年》“马克思研究号”的实际出版时间当更晚。

[24] 更实际的情形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且新派的进攻性要大大强于旧派。说详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国的新旧之争》，《历史研究》1995年5期。

[25] 一般而言，已树立地位的社会精英是既得利益者，最不支持任何形式的革命。但民初中国的情形则反是，许多士人因鼓吹、参与、或支持各种“革命”而先一举得名，继则获得社会承认，或入名大学获高薪教职，或竟直入政界为高官，成为名实俱获的社会精英。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在树立地位即成为社会学上所谓既得利益者之后，仍不同程度地提倡、支持或参与文化、思想、学术、社会、家庭等各种革命，其中也不乏身与政治革命者。这个问题牵涉甚宽，我会另文讨论。

[26] 章士钊：《孔传考——答吴承仕（1925年8月1日）》，《章士钊全集》，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5卷，90页。

[27] 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学人》第4辑（1993年7月），28—29页。

[28] 本段与下段，参见白坚：《论危险思潮敬告为政者与将帅》，《公言报》1919年6月27日、28日，均2版。是邓野先生的论文《王揖唐的“社会主义”演说和“问题与主义”论战的缘起》（《近代史研究》，1985年6期）提示我查阅此一社论及下面述及的王揖唐演说。

[29] 《昨日安福部之议会》，《公言报》，1919年7月9日，2版。

[30] 本段与下段，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收入《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29—30页。

[31]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2卷3号（1916年11月），《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224页。不过，要注意陈独秀那时所谓“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是偏向自由主义的，他说，“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故中国若实行民治，要“拿英美作榜样”。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29、32页。

[32]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胡适文集》，第2册，558页。

[33] 白坚：《论危险思潮敬告为政者与将帅》，《公言报》，1919年6月28日，2版。

[34] 李大钊：《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原刊于1919年6月1日的《每周评论》第24号，收入《李大钊文集》（2），327页。

[35] 白坚：《论危险思潮敬告为政者与将帅》，《公言报》，1919年6月28日，2版。按“社会政策”在当时或指谓某种带有“均贫富”倾向的系列社会改良措施，毛泽东稍后曾列举五种“世界解决问题的方法”，其第一种就是“社会政策”；而他认为这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参见《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新民学会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22—23页。

[36] 《昨日安福部之议会》，《公言报》1919年7月9日，2版。李林认为，安福系研究民生主义也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当时南北正议和，安福系谋与孙中山接近，并在国民党的推动下至少表面上赞同“孙文学说”，可备一说。参见李林：《还“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本来面目》，《二十一世纪》第8期（1991年12月）。

[37] 《昨日安福部之议会》，《公言报》1919年7月9日，2版。

[38] 白坚：《论危险思潮敬告为政者与将帅》，《公言报》1919年6月27日，2版。

[39] 本段与下段，参见罗家伦：《今日之世界新潮》（1918年11月），《新潮》1卷1号（1919年1月），19—23页。

[40] 傅斯年：《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1918年11月12日），《新潮》，1卷1号，128—129页。

[41] 傅斯年：《朝鲜独立运动中之新教训》（1919年），《新潮》，1卷4号（1919年4月），687—688页。

[42] 罗家伦：《覆张继》（1919年11月8日），《新潮》，2卷2号（1919年12月），366页。

[43] 罗家伦后来回忆说，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是当时趋新师生两个相互问答辩论的聚会场所之一，而他和傅斯年两人几乎天天都在那里。参见罗家伦（口述）：《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传记文学》（台北）54卷5期（1978年5月），15页。

[44] 例如，罗家伦：《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新潮》2卷5号（1920年9月），863—888页。另一方面，罗家伦在此文中也明确引述了经济决定论的观念。

[45] 若愚（王光祈）：《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每周评论》第18号（1919年4月20日），2版。后来毛泽东曾列举出五种“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不仅有“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包括“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与“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新民学会资料》，22页）。甚可见时人认知中这些“主义”间既相互关联又歧异的复杂性。

[46] 黄凌霜：《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进化》1卷2期（1919年2月），收入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5—16页。按黄凌霜1922年到苏俄后有大转变，他对陈独秀说：现“已确信”无产阶级专政“乃今日社会革命唯一之手段，此后惟有随先生之后，为人道尽力”。见凌霜致仲甫，《新青年》9卷6号（1922年7月），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90页。又，在论战中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来立论驳论是那时的风气，稍后在“科学与玄学之争”时，张君勱也指胡适等人所信奉的“科学”观念是欧洲16—19世纪的主张，已被20世纪的欧洲人抛弃。参见罗志田：《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看“五四”时期对五四观念的反思》，《历史研究》1999年3期。



[47] 本段与下段，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胡适文集》，第2册，249—250页。

[48] 刘华瑞：《社会改革之正趋》，《时事新报》，1919年9月22日，1张1版。

[49] 志希：《评〈解放与改造〉》，《新潮》2卷2号（1919年12月），361页。

[50] 吴康：《从思想改造到社会改造》（1921年1月4日），《新潮》3卷1号（1921年），37页。

[51] 李大钊：《混充牌号》（1919年4月6日），《李大钊文集》（2），311页。

[52] 李大钊：《新鲜名词》（1919年10月5日），《李大钊文集》（3），60页。

[53] 李大钊：《“鼓吹共产主义”》（1919年11月16日），《李大钊文集》（3），90页。

[54] 李大钊：《主义》（1919年12月7日），《李大钊文集》（3），125页。

[55] 在湖南的毛泽东就注意到，在世界新思潮的冲击下，当地一些“官气十足的先生们，忽然屈尊降贵研究起来”。其所“研究”者，当然是与新思潮相关者，故有人说他们的行为是“青叶上青虫的体合作用”。毛泽东：《健学会之成立及其进行》（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湖南出版社，1990年，368—369页。不论是变为与环境相类的体色以自保，还是确实有意争夺对“道统”的掌控，“官方”在思想上趋近于“民间”的现象是很明显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之《发刊词》稍后也指出：辛亥革命以后，虽然专制改成共和，实际却是“反革命的势力冒着民主的招牌，以行他们的抢掠之实”（《先驱发刊词》，收入《“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三联书店，1979年，第二集下册，528页）。

[56] 胡适：《他也配》，原刊《每周评论》第28号（1919年6月29日），收入《胡适文集》，第11册，18页。

[57] 胡适等：《为新潮社辟谣启事》，原刊《晨报》，1919年7月6日，收入《李大钊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卷，293页。按当时一般的习惯，共同文字的作者通常署名最后，然从两文相近的表述看，《启事》或亦为胡适所做。

[58] 李大钊稍后观察到，以前相对疏离于政治的北大教授社群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受到各方面的拉拢。李大钊：《致胡适》（1921年1月18日），《李大钊文集》（5），299页。

[59] 从无风不起浪的角度言，也不排除安福系真有想要“收买”二人的尝试。连胡适等人也是先说安福系不配“收买得动”二人，然后才改说不配“收买”。

[60] 当年的民间舆论和多数后来的研究者都将安福系视为那时的当权派，但前引王揖唐的演说，就曾明确区分“政府”和议会“政党”的不同责任，而《公言报》的社论也明言不赞成以严刑峻法遏阻“危险思潮”的做法，提示出安福系确有与执政的政府有所区分的自觉意识。进而言之，民间舆论将议会党团视为当局者的做法提示出，似乎许多受过西方训练的自由主义读书人反而不如安福俱乐部那样注重立法和行政的分别，这是很可思索的现象。

[61] 蒋梦麟曾回忆说，因傅斯年“是五四运动领袖之一，当时有人要毁掉他，造了一个谣言，说他受某烟草公司的津贴。某烟草公司，有日本股份，当时全国反对，所以奸人造这个谣言”（语出蒋梦麟《忆孟真》，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16页）。可知当时确实存在类似的做法。

[62] 实际上，这恐怕也是那时与社会主义相关的各种主义最能相通之处，前面提到的黄凌霜转而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后，陈独秀对他讲：“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两句格言，不但共产党不反对，我想除了昏狂的人，没有人愿意反对；现在共产党所争持的所努力的乃是怎样使我们由强制而习惯的作工，使人人真能各尽所能；乃是怎样通力合作，怎样使生产事业集中成为社会化，怎样使生产力大增、产品充裕，使人人真能各取所需。想努力实行这些理想，都非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这道理吾兄一定是明白了，尚请向旧日真的安那其诸同志详细解释，以免误会才好。”陈独秀答凌霜，《新青年》9卷6号，91页。

[63] 那时思想界的混同当然不仅在朝野之间，“五四”后罗家伦便看到“我们的文化运动有种危险：就是许多投机的人，也办了些假冒招牌的杂志……夹在里面胡闹，弄得鱼龙混杂，大众受欺，使我们的运动也发生许多障碍”。他也同样具有明确的区分意识，故希望《时事新报》能“辟一栏‘蒲鞭’，将他们鞭策一回”。参见罗家伦致张东荪，1919年9月30日，《时事新报》，1919年10月4日，3张4版。按原信未署年月，此日期据报纸时间及信中说“现在大学已开学”推断。

[64] 当然，就像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胡适自己也在大“谈”杜威的实验主义。而且我们现在知道，他本人不仅不反对、且曾长期向往社会主义。参见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学人》第4辑（1993年7月）。

[65] 本段与下段，胡适：《旅京杂记》，《新青年》4卷3号（1918年3月），252—253页。

[66] 李大钊：《强力与自由政治——答高元君》（1918年7月1日），《李大钊文集》（2），198页。龚书铎、黄兴涛先生已注意及此条材料，参见龚书铎、黄兴涛：《胡适与李大钊关系论》，《史学月刊》1996年1期。

[67] 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新潮》1卷2号（1919年2月），151—152页。

[68] 李大钊：《混充牌号》，《李大钊文集》（2），311页。从这一视角看，前引傅斯年、罗家伦被“收买”的谣言还真有可能出自安福系自身。并参见前引李大钊1921年致胡适函。

[69] 本段与下两段，胡适：《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1919年6月），《胡适文集》，第11册，14页。

[70] 关于“西方分裂”，参见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3期。下文还会涉及这一观念，均请参看此文，不再注出。

[71] 本段与下两段，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文集》，第2册，249—252页。

[72] 关于民初以章士钊为代表的“逻辑文学”政论文派，参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第3册，234—237页。

[73] 知非（蓝公武）：《问题与主义（三）》，《国民公报》，1919年7月26日，5版。

[74]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文集》（3），1—3页。对于同一“主义”在各地的实行中可能产生歧异一点，胡适很难反驳。因为他也记得“前次杜威先生在教育部讲演，也曾说民治主义在法国便偏重平等；在英国便偏重自由，不认平等；在美国并重自由与平等”；因为“英国、法国、美国的先哲当初都能针对当日本国的时势需要，提出具体的主张，故三国的民治各有特别的性质”。参见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胡适文集》，第2册，272页。

[75] 知非（蓝公武）：《问题与主义》，《国民公报》，1919年7月24日，5版；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文集》（3），5页。

[76] 知非（蓝公武）：《问题与主义（七）》，《国民公报》，1919年7月31日，5版。

[77]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文集》（3），4页。

[78] 知非（蓝公武）：《问题与主义》，《国民公报》，1919年7月24日，5版。

[79]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文集》（3），1、5—6页。

[80] 知非（蓝公武）：《问题与主义》，《国民公报》，1919年7月24日；《问题与主义（七）》，《国民公报》，1919年7月31日，均5版。

[81] 本段与下段，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胡适文集》第2册，270—274页，关于删节的说明在253页。

[82] 如胡适说李大钊关于主义的运用会因时因地因事而“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主义论”，便未曾注意李氏在文章稍后也说到提倡“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83] 本段与下段，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胡适文集》，第2册，274—278页。

[84] 本段与下段，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集》，第2册，553—556页。

[85] 当然，胡适对待蓝公武和李大钊的态度仍有明显的不同，毕竟李是《新青年》同人，而蓝则属于正与胡适等竞争的梁启超派。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262、281—285页。

[86] 志希：《评〈解放与改造〉》，《新潮》2卷2号（1919年12月），361页。

[87] 《胡适日记》，1922年5月11日、12日，第3册，664—665页。

[88] 关于胡适和中共那段时间的关系，参见本书《“五四”到北伐期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

[89] 李大钊：《主义》（1919年12月7日），《李大钊文集》（3），125页。

[90] 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集》，第3册，365—366页。



[91] 《胡适日记》，1921年6月18日，第3册，325页。

[92] 关于当时中国传统的负面整体化，参见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年，14—24页。下文提到这一观念时也请参看此书，不再注出。

[93] 蔡元培：《新年梦》（1904年2月），《蔡元培全集》（1），233页。按“老法子”后来成为传统的负面代名词，鲁迅就曾说整理国故是“新思想中了‘老法子’的计”。《鲁迅致徐炳昶》，1925年3月29日，《鲁迅全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25页。

[94] 陈独秀、胡适：《复易宗夔》，《新青年》5卷4号（1918年10月），433页。按此文后来收入《独秀文存》，应为陈氏作品。

[95] 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八》（1919年），《鲁迅全集》（1），336—337页。他自己的译文见其《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6），313页。

[96] 黄凌霜：《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15页。

[97] 若愚（王光祈）：《总解决与零碎解决》，《晨报》1919年9月30日，7版。

[98] （张）东荪：《零碎解决与总解决》，《时事新报》，1919年9月22日，1张1版。

[99] （张）东荪：《民意与南方》，《时事新报》，1919年9月21日，2张1版。

[100] 那时张东荪写了一系列文章来论证他所提倡的“总解决”，参见其《人与我》，《时事新报》，1919年9月23日，1张1版；《势力与决心》，《时事新报》，1919年9月24日，1张1版；《能动的精神与〔原文如此〕》，《时事新报》，1919年9月25日，1张1版。

[101]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45页。

[102] 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新潮》，1卷5号（1919年5月），918—919页。这大致成为“新潮派”的共识，罗家伦在“五四”后也说，那时各方面的情形“使我们觉悟到以政治的势力改革政治是没有用的，必须从改革社会着手；改革社会必须从改革思想着手”。罗家伦：《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新潮》，2卷5号（1920年9月），878页。

[103]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文集》（3），6页。

[104]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文集》（3），2—3页。

[105] 李大钊：《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1919年9月21日），《李大钊文集》（3），52—54页，引文在54页。

[106] 李大钊：《被裁的兵士》（1919年11月23日）、《归国的工人》（1919年11月23日），《李大钊文集》（3），95、96页。

[107] 李大钊：《面包运动》（1919年10月12日），《李大钊文集》（3），66页。

[108] 李大钊：《青年厌世自杀问题》（1919年12月1日），《李大钊文集》（3），117—123页，引文在117、120—121页。

[109] 本段与下段，志希（罗家伦）：《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1919年11月），《新潮》2卷2号（1919年12月），346—348页。

[110]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69—71页。

[111] 陈独秀：《随感录·解放》，《新青年》7卷2号（1920年1月），160—161页。

[112] 陈独秀：《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1920年1月），《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83页。可比较胡适一年后对北大学子的新闻同志会演讲时所“希望他们对于真的问题活的问题有点贡献，不要拿马克思、克洛泡特金来替人家充篇幅”。《胡适日记》，1922年2月12日，第3册，555页。

[113] 陈独秀：《答高铭：哲学思想与化学工业》，《新青年》8卷1号（1920年9月），11页（通信栏页）。

[114] 陈独秀：《随感录·比较上更实际的效果》，《新青年》8卷1号（1920年9月），《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169页。

[115] 陈独秀：《敬告广州青年》，《广东群报》创刊号（1920年10月20日），《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187页。

[116] 陈独秀：《随感录·懒惰的心理》，《新青年》8卷2号（1920年10月），2—3页（栏页）。

[117] 陈独秀：《答郑贤宗》，《新青年》8卷3号（1920年11月），《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194页。

[118] 赤（张申府）：《随感录·研究问题》，《新青年》9卷6号（1922年7月），84页。

[119] 陈独秀：《随感录·主义与努力》，《新青年》8卷4号（1920年12月），《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217页。

[120] 本段与下段，毛泽东：《问题研究会章程》，《毛泽东早期文稿》，396—403页。并参见汪澍白等：《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年5期。

[121] 毛泽东：《讲堂录》（1913年），《毛泽东早期文稿》，581页。

[122]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85—87页。

[123] 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毛泽东早期文稿》，464—466页。

[124]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20年3月12日），《毛泽东早期文稿》，470页。

[125] 毛泽东：《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1920年6月）、《反对统一》（1920年10月），《毛泽东早期文稿》，488、530—531页。

[126] 本段与下两段，毛泽东：《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1920年9月）、《致罗璈阶（章龙）信》（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早期文稿》，507—508、553—554页。

[127] 参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62—66页。

[128] 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上册，111页。

[129] 李维汉致毛泽东，1920年8月28日，《新民学会资料》，161页。

[130] 蔡和森致毛泽东，1920年9月16日，《新民学会资料》，161页。

[131] 毛泽东致萧子升、蔡和森等，1920年12月1日，《新民学会资料》，147—150页。

[132]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新民学会资料》，18、23页。

[133]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新民学会资料》，26页。

[134] 说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3期。

[135]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新民学会资料》，24—25页。

[136]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新民学会资料》，19页。

[137]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新民学会资料》，23页。

[138] 参见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228—238页。

[139] 《存统复哲民》，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0年4月11日，14版。

[140]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75—76页。

[141] 如曾琦在胡适关于“多研究问题”的文章发表后，即致函胡适说，大作“对于现在空发议论而不切实际的言论家，痛下砭鞭，我是万分佩服。我常说：‘提倡社会主义，不如研究社会问题，较为有益。’也和先生的意思差不多”。参见曾琦致胡适，1919年7月2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年，上册，66页。

[142] 《上海同人致北京同人》，《少年中国》1卷1期（1919年7月），37—38页。

[143] 参见《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二号）》，《新民学会资料》，3、8、18页。

[144] 知非（蓝公武）：《问题与主义（七）》，《国民公报》，1919年7月31日，5版。

[145] 《北京同人覆上海同人》，《少年中国》1卷1期（1919年7月），38页。此函似为当时少年中国学会主要负责人王光祈所作，未经北京同人讨论，康白情等后来指出：“当时王君总揽北京会务，函为王君手笔，固未尝经会议定其内容，而后者笔者也。”参见《一九二二年杭州大会纪略·康白情孟寿椿等的提案》，《少年中国》3卷11期（1922年6月），75页。此点承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波同学提示，谨此致谢！

[146] 本段与下段，《巴黎同人致京沪同志》（1919年9月27日），《少年中国》1卷7期（1920年1月），57—62页。

[147] 本段与下段，若愚（王光祈）：《总解决与零碎解决》，《晨报》，1919年9月30日，7版。

[148] 虞：《改造的要件》，《时事新报》，1919年9月27日，1版。我颇疑这一作者就是王光祈（字若愚），因为文章也说，“改造的第一要件，是实质上换一班人，不是表面上换一种方法；第二要件，是不许一班坏人加入改造运动”。这与王氏当时主张首先改造“人”的观念是

相通的（译下段）。且作者也曾引用“我的朋友曾慕韩说，‘三十岁以上的人，多半是靠不住的’”一语，说明其与曾琦关系很深。文章最后更同样提出“这副改造运动的重担，只好搁在我可爱的新青年的肩上”。

[149] 王光祈：《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少年中国》1卷6期（1919年12月），1—3页。

[150] 《少年中国学会问题·郑伯奇意见》，《少年中国》3卷2期（1921年9月），39页。

[151] 周作人：《新村的精神》（1919年11月8日），《新青年》7卷2号（1920年1月），131页。

[152] 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1920年9月），《胡适文集》，第2册，569—570页。

[153] 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集》，第3册，364—366页。

[154] 不过，江西改造社的发展有些类似湖南新民学会，持根本改造主张的成员似较占上风。参见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联书店，1979年再版，294—295页；并参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关于《新江西》的介绍，见第三集上册，27—38页。

[155] 毛泽东：《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1920年9月），《毛泽东早期文稿》，507页。按新民学会成员赴法国多在上述少年中国学会巴黎同人通信之后，特别是直接影响毛泽东的蔡和森赴法更晚，则他们关于注重组织、以政权改造社会等“根本改造”的主张应与此前巴黎留学生群体的见解相关。参见《蔡林彬（和森）致毛泽东》（1920年9月16日），《新民学会资料》，153—162页。

[156] （张）东荪：《各自改造》，《时事新报》，1919年9月26日，1张1版。

[157] K.S.：《怎样去研究社会改造问题》，《新群》第1期（1919年11月），转引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上，371—372页。

[158] 韦丛芜、李寄野致胡适，1922年，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以下径引书名），黄山书社，1994年，30册，649—650页。

[159] （张）东荪：《各自改造》，《时事新报》，1919年9月26日，1张1版。

[160] 李大钊：《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1920年），《李大钊文集》（4），5页。

[161] 刘华瑞：《社会改革之正趋》，《时事新报》，1919年9月22日，1张1版。

[162] 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919—1923，伟大的开端》，223页。

[163] 参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关于《光明》的介绍，见第二集上册，317—319页。

[164] 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279—280页。

[165] 恽代英：《革命的价值》（1920年10月10日），《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上卷，224—226页。

[166] 恽代英：《未来之梦》（1920年10月），《恽代英文集》，上卷，244页。

[167] 张东荪：《再答颂华兄》收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8卷4号（1920年12月），13—14页（文页）。

[168] 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收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8卷4号，1页（文页）。

[169] 参见《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新民学会资料》，24—25页。

[170] 张崧年致陈独秀，《新青年》9卷3号（1921年7月），2—3页（栏页）。

[171] 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约1919），《中国文化》第14辑（1996年12月），196页。

[172] 陈炯明答吴敬恒书，1924年5月13日，陈定炎：《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年，1157页。

[173] 太虚：《说革命》（1926年6月5日），《海潮音文库·第一编·佛学通论·政治》，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影印，17—22页。

[174] 陈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收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8卷4号，23页（文页）。

[175] 恽代英：《民治运动》（1922年9月），《恽代英文集》，上卷，342页。

[176] 《先驱发刊词》（1922年1月15日），收入《“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下册，528页。

[177] “先驱”条目，《“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上册，12—13页。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及北京组织的活动，参见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373—381页。

[178] 本段与下段，参见黄日葵、陈仲瑜、邓仲解、刘仁静、李大钊、沈昌：《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For Revolutionary Democracy》，《少年中国》3卷11期（1922年6月），收入《李大钊文集》（5），357—361页。

[179] 参见本书《“五四”到北伐期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

[180] 匪石（李求实）：《革命中学生应持的态度》（1924年6月14日发表于《中国青年》第35期），收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142—143页。

[181] 这样，“世界”既是“我们”，也是“他人”。既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当然是“我们”；然而，时人也隐约意识到，“世界”实质上不过是“西方”体系的另一种表现，所以许多中国人一直有着“进入”世界的持续愿望和努力。这个在一定程度上集“我们”与“他人”为一体的“世界”正是不少民初人以及此后的中国人困惑之所在。

[182] 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胡适文集》，第2册，270—271页。

[183] 知非（蓝公武）：《问题与主义（七）》，《国民公报》，1919年7月31日，5版。

[184] 知非（蓝公武）：《问题与主义（五）》，《国民公报》，1919年7月29日，5版。

[185] 知非（蓝公武）：《问题与主义》，《国民公报》，1919年7月24日，5版。

[186] 本段与下段，知非（蓝公武）：《问题与主义（五）、（七）》，《国民公报》，1919年7月29日、31日，均5版。

[187] 本段与下段，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文集》（3），6、3页。

[188] 陈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收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8卷4号，20页（文页）。

[189] 胡适：《我们走那条路》（1930年），《胡适文集》，第5册，358页。

[190] 陈独秀：《随感录·学说与装饰品》，《新青年》8卷2号（1920年10月），《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177页。

[191]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早期文稿》，474页。

[192]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新民学会资料》，18页。

[193] 张崧年致陈独秀，《新青年》9卷3号（1921年7月），2—3页（栏页）。按希望中俄联合似乎是那时不少人的想法，张东荪在1920年也说他曾希望“中国与俄联盟，建立劳农国家，以两民族之力以推翻世界之资本主义”。张东荪：《再答颂华兄》，引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8卷4号，14页（文页）。

[194] 本段与下段，《先驱发刊词》，收入《“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下册，528—529页。需要说明的是，中共党人在此文中所说的“主义”可能较多针对无政府主义。

[195] 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1921年2月），《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75—78页。

[196] C.T.（施存统）：《我们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原载《共产党》，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265页。

[197] 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1921年2月），《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75—78页。

[198] 周恩来：《革命救国论》（1924年2月），《周恩来早期文集》，刘焱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下卷，443页。

[199] 本段与下段，陈独秀：《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1926年5月），《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1055—1061页。

[200] 吕群：《破产的国家主义》，《中国青年》6卷20、21号合刊（1926年12月20日），人民出版社1956年影印汇刊本，第6集，524页。关于中国问题是世界问题之一部，故不能不通过“世界革命”来解决的观念此后仍相当流行，梁漱溟到1930年还说：事实表明，“中国问题已不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而是世界问题之一部；中国问题必在反抗资本主义运动下始能解决”。这就是国民党为何要“联俄，要加入第三国际，要谈世界革命”的原因。见梁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1930年），《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40页。

[201] 加拉罕的表述出自其1926年2月《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引文及进一步的讨论参见本书《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

- [202] 李大钊：《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1920年），《李大钊文集》（4），5—6页。
- [203]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557页。
- [204] 邓中夏：《1926年之广州工潮》（1927），《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372—373页。
- [205] 陈独秀：《青年们应该怎样做！》（1923年10月），《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541—542页。
- [206] 敬云（刘仁静）：《学生会的任务及其组织》（1923年10月），《六大以前》，75页。
- [207] 彭述之：《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年12月），13—14页。
- [208] 邓中夏：《我们的力量》（1924年11月），《邓中夏文集》，98—99页。
- [209] 瞿秋白：《〈瞿秋白论文集〉自序》（1927年2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415页。
- [210] 瞿秋白：《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1924年8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619—620页。
- [211] 国焘：《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导》12期（1922年12月6日），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向导周报社汇刊本，99页。
- [212]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译本，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311页。
- [213] 李维汉：《列宁与中国》（1924年3月9日），《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13—14页。
- [214] 胡适：《汤尔和译〈到田间去〉的序》，《胡适文集》，第8册，400—403页。
- [215] 北伐前夕中共曾主张退出国民党，所持的一个理由即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实质上是知识分子反对派”。参见古比雪夫（季山嘉）和拉兹贡：《给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1926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上册，18页。
- [216] 转引自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三联书店，1985年，47页。如果再追溯远些，则外国传教士很早就指责中国读书人动口不动手，类似的观念在后来曾为许多外国人所重复，此不赘。
- [217]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11页。
- [218] 匪石（李求实）：《革命中学生应持的态度》，《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142—143页。
- [219] 许多人都已注意到胡适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中将马克思主义区分为唯物史观和阶级战争两大要素，基本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过去批判胡适者多就其对立者的态度立论，而后来试图给胡适“翻案”者又往往强调其对前者的态度，其实都失之于偏。对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或实验主义者而言，能高度赞赏唯物史观，不能不说是一种善意的体现。另一方面，当年赞同阶级斗争的也未必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周作人在1926年就曾说过“阶级斗争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参见周作人：《谈虎集·外行的按语》，台北里仁书局影印本，1982年，上册，261—266页。
- [220] 金观涛先生关于《新青年》杂志对“革命”一词的使用频度进行的统计表明，自1920年后期起的几年间可见“革命”一词使用频度的急剧攀升，可从一个侧面了解这一时期读书人突然转向激进的趋势。参见金观涛：《观念起源的猜想与证明——兼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2期（2003年12月），125—140页，特别是136页的图表。
- [221] 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919—1923，伟大的开端》，243—244页。
- [222] 按周氏的两可态度明显，他在1921年初学会投票中对“促使社会进化”取向投了赞成票，然后又声明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与“促社会进化”两都赞成。后一举动尤其体现出他自己对渐进取向的缺乏自信。参见《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新民学会资料》，22页。
- [223] 侧重“行动”当然是五四学生运动后中国社会一个相对普遍的倾向，罗家伦当时就反复说，“这次‘五四’‘六三’的结果，只是把全国的人弄‘动’了”（罗家伦致张东荪，1919年9月30日，《时事新报》，1919年10月4日，3张4版）；“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2卷4号，1920年5月，850页）。但与“空谈”对应的“实行”得到凸显，却与“问题与主义”之争有更多的关联。
- [224] 《少年中国学会问题·郑伯奇意见》，《少年中国》3卷2期（1921年9月），39页。
- [225] 韦从芜、李寄野致胡适，1922年，《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0册，649—650页。
- [226] 张彭春：《日程草案》（即日记），1923年2月20日。原件藏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所用的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微缩胶卷。
- [227] 胡适：《评〈孙文学说〉》，《每周评论》31号（1919年7月20日），《胡适文集》，第11册，28—30页。
- [228] 若愚（王光祈）：《总解决与零碎解决》，《晨报》，1919年9月30日，7版。
- [229]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2卷4号，855—856页。
- [230] 张闻天致张东荪，《时事新报》1919年12月12日发表，收入《张闻天早期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31—32页。
- [231] 赤（张申府）：《随感录·研究问题》，《新青年》9卷6号（1922年7月），84—85页。
- [232] 赤（张申府）：《随感录·切实实行！！》，《新青年》9卷6号（1922年7月），79—81页。
- [233] 张崧年致陈独秀，《新青年》9卷6号，89页。
- [234] 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253—254页。
- [235] 章炳麟：《〈民报〉一周年纪念会演说辞》（1906年12月），《章太炎政论选集》，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77年，上册，328页。
- [236] 周恩来：《赤光的宣言》（1924年1月），《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436页。
- [237] 鲁迅：《关于知识阶级》（1927年10月25日），《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8），188页。
- [238] 茅盾：《又一种看法》（1938年7月），《茅盾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166页。
- [239] 文叔：《五四运动史》，《学生杂志》10卷5号（1923年5月），13页（文页）。
- [240] 国焘：《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导》12期，99页。
- [241] 《申报》，1923年2月3日，收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711页。
- [242] 沈昌：《我十年来的学生生活》，《学生杂志》10卷1号（1923年1月），5页（文页）。
- [243] 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342—349页。
- [244] 罗家伦致张东荪，1919年9月30日，《时事新报》，1919年10月4日，3张4版；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1920年5月1日），《新潮》2卷4号（1920年5月），852、860—861页。
- [245] 傅斯年：《留英纪行》（1920年5月），《晨报》1920年8月6、7日，均7版。并参见Wang Fan-shen, Fu Ssu-nien: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53-54.
- [246] 关于“新潮社”诸人的出国深造，参见Vera 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133-43.还有一些人因其他原因走到更偏学理的取向，如张东荪就在北伐时感到报纸不能自由说话而退出报界转入学界（参见张东荪：《思想与社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4页）。
- [247] 实际上，留学返国后的“新潮社”中人也未必都始终留在学术研究的领域，罗家伦自己就不时参与“干政治”的活动。而其老师辈的胡适也长期徘徊在“思想”和“行动”之间，胡适一生有好几次“干政治”的冲动，与“问题与主义”之争最近的一次是在1926年访问苏俄之时（参见本书《“五四”到北伐期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
- [248] 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新潮》，1卷5号（1919年5月），918页。
- [249] 参见识冰峰：《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66年。按，将清季之争以“立宪或革命”来概括可能较多反映了后之研究者的认识，至少在争议的早期，也曾有人用“革政”或“革命”来界定类似的取向，参见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1989年（该书第6章即名以《“革政”和革命》，然似未多申论）。
- [250] 这只是就大的趋势而言，实际的争论当然是持续的，且不少参与争论者自身的心态也是曲折而充满紧张的。如后来在学术上强调“提高”远胜于“普及”的傅斯年，其内心中就维持着对“干”的欣赏。他在北伐时对胡适说到孙中山在安身立命处“完全是一个新人物”时，特别指出“中山肯‘干’，而我们都只会批评人‘干’，此中山之不可及处”。胡适颇有同感，以为“孟真此论甚中肯”（《胡适日记》，1929年4月27日，



第5册，404页）。从其对傅斯年语的赞同看，曾几乎就要“干政治”的胡适对自己逡巡于言和行之间，大概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并参见胡适：《知难，行亦不易》，《胡适文集》，第5册，589—600页；《评〈孙文学说〉》，《胡适文集》，第11册，28—30页。

[251] 梁漱溟：《答马儒行君来书》（1930年7月19日），《梁漱溟全集》，第5卷，177页。

[252] 梁漱溟：《冯著〈从合作主义以创造中国新经济制度〉题序》（1930年6月24日），《中国问题之解决》（1930年10月发表），均《梁漱溟全集》，第5卷，122、220页。

[253] 按梁漱溟当时非常强调其“村治”的革命性，明确其并非“改良”，这是他与胡适等人颇不相同之处；而其提倡和实践的“革命”又与中共和国民党正在实践的“革命”从思路到方式都大相径庭，所以他那时等于在和几方面同时作战。对于当年各思想政治力量在解决中国问题上进行的包括思想和实践的“路线之争”，还大有探索分析的余地。

[254] 胡适：《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胡适文集》，第11册，12—13页。

[255] 说详罗志田：《前恭后倨：胡适与北伐期间国民党的“党化政治”》，《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

\* 大约四五年前，李又宁教授曾来信约我写一篇“胡适与共产党”，尽管我曾在《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近代史研究》1996年4期）一文中简略地讨论过“胡适与国共两党的早期关系”，但自忖对这一题目太不熟悉，终未敢应承。不过，因为李教授的敦促，我开始较前更多地关注这方面的材料，近日渐觉稍有可述，遂成此文，这里特别要向李教授致谢！

[256] 《胡适日记》，1917年6月1日，第2册，592页。

[257] 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东亚图书馆，1931年8版，卷三，95页。

[258]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以下径引书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36页。

[259] 参见本书《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认识》。

[260] 恽代英致胡适，约1919年8月21日，收入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36册，531—532页（关于此信的日期，恽代英日记1919年8月21日记其“写致适之先生信”；次日记其“写致东荪先生信，与昨致适之先生信，皆我联络善势力，以得正当助力之企谋”；同年9月8日写给王光祈的信中，一个重点内容仍是好人应养成善势力以扑灭恶势力，与致胡适信内容甚接近，似可暂时将此信系于此日，参见《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609、610、621—625页）。类似的观点恽代英至少持续到1923年末，参见代英：《怎样才是好人》，《中国青年》1期（1923年10月20日），人民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3—6页。

[261] 《争自由的宣言》全文收入《李大钊文集》（5），372页。从署名次序、文字风格和内容看，这一胡适领衔的宣言大概由高一涵起草，胡适或有修改，如其中提到的“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便是胡适经常表述的意思。

[262] 《胡适日记》，1921年6月18日，第3册，325页。按“无政府主义”也是胡适眼中“教条主义”倾向的重要成分，“好政府”的具体目标或是当政的“恶政府”，在观念上却主要落实在北大以及全国有重要影响的李石曾等无政府主义者身上，这是他们后来在北大校内反对胡适的重要原因；同时这些人也是所谓“北方国民党”的核心，胡适与他们的恩怨为北伐后国民党几乎“法办”他埋下了伏笔。

[263] 《胡适日记》，1921年8月5日，第3册，414—417页。按胡适本有激进的一面，1921年表述的尤其频繁，多次提到手枪、炸弹一类“干”的精神，尤其在那年10月做的《双十节的鬼歌》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253—255页。

[264] 《胡适日记》，1922年4月22日、5月7日，第3册，634—635、660—661页。

[265] 《胡适日记》，1922年5月11日、12日，第3册，664—665页。王、罗二人毕竟是曾经为官者，其活动的积极又过于多数北大人，后来他们直接进入“好人政府”而成为其主干。

[266] 《我们的政治主张》，《胡适文存二集》，卷三，27—33页。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文中提出：我们要求“有计划的政治”是“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强调计划政治和政府的干预作用，是现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通之处，也是胡适等倾向社会主义的中国自由主义分子长期坚持的观念。

[267] 《胡适日记》，1922年5月25日，第3册，675页；这些反应的文章及胡适的答复以《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为题收在《胡适文存二集》，卷三，35—90页。

[268] 《后努力歌》收入《胡适日记》，1922年5月28日，第3册，677—678页。

[269] 胡适等：《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努力周报》4期（1922年5月28日），1版。

[270] 李大钊：《致胡适》（1921年1月18日），《李大钊文集》（5），299页。按李大钊所说的“大学”是专指北京大学。

[271] 关于这段时间研究系和胡适等人的互动，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281—286页。引文见《胡适日记》，1922年5月14日，第3册，666—667页。

[272] 胡适致陈独秀（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以下径引书名），中华书局，1979年，上册，119—120页。

[273] 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330—331页。

[274] 这也证明此前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在胡、李之间实不算多大一回事。且此前的争论是在中共成立之前，而此时已在中共成立之后。胡适对早期中共的了解超出我们过去的认知，他在20世纪50年代所做的口述自传中，便曾指出中共是1920年“诞生”的（参见《胡适口述自传》，184页），而当时一般党史研究是按照中共决议将其“诞生”置于1921年7月，不排除胡适从陈独秀、李大钊二人或其中之一那里获得一些这方面的讯息。

[275] 参见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给大总统的报告（1922年11月），转引自萧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381页。

[276] 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年，233—235页。唐宝林和林茂生的《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基本采信了张国焘的说法，参见其167—168页。

[277] 黄日葵等：《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李大钊文集》（5），360—361页。

[278] 本段与下段，《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人民出版社，1979年，331—341页。

[279] 张国焘：《我的回忆》，235页；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68—169页。

[280] 胡适：《这一周》（1922年7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167—169页。这在那些年应是具有某种代表性的言论，蒋介石在北伐时也说：“中国共产党若要达到最后目的，一定要求中国国民革命赶快成功。中国国民革命成功之后，中国共产党是不会不发展、不会不成功的。”蒋介石：《总理纪念周训话》，1926年6月7日，收入《蒋校长演讲集》，（广州）中央政治军事学校，1927年，107页。类似的思路 and 表述在学术领域也有，顾颉刚在1933年解释他何以不站在唯物史观立场上作研究说，他“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不过学术是发展的，信古的清代学者整理古书的成果，传下来却“给我们取作疑古之用”！所以然者，他们自居于“下学”，把这根柢打好了，我们就可跳一极而得其“上达”了。他们的校勘训诂是第一极，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极。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得错用了。是则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我们虽不谈史观，何尝阻碍了他们的进行，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呢！”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重印本，22—23页。整个口气非常像胡适对中共态度的表述。他们虽从不同角度出发，却均承认共产党的目标更高远。人往高处走本是通性，加上近代以来“毕其功于一役”的观念相当流行，既然中共的目标更为高远得到正式承认，许多边缘知识青年直接走入最高目标之所在，也相当自然。

[281] 周恩来：《评胡适的“努力”》（1922年12月），收入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0—1924.6）》，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下卷，401—404页。

[282] 本段与下段，君宇：《王博士台上生活应给“好人努力”的教训》，《向导》5期（1922年10月11日），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向导周报社汇刊本，42—43页（以下引用《向导》页码均汇刊本页）。

[283] 关于胡适向王内阁提建议而很少被接受，参见胡适1922年8—11月的日记，不一一引述。

[284] 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这一周》，《胡适文存二集》，卷三，109—128、145—272页。

[285] 独秀：《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向导》1期（1922年9月），2—3页。

[286] 本段与下段，和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向导》2期（1922年9月20日），14—16页。

[287] 胡适：《这一周》，《努力周报》22期（1922年10月1日），1版。

[288] 陈此生：《一个会议能解决时局吗？》，《向导》7期（1922年10月25日），60页。

[289] 君宇：《“新创民治之关外”！》，《向导》6期（1922年10月18日），52页。

- [290] K. J.:《陈炯明与向导周报》，《向导》11期（1922年11月22日），92页。
- [291] 胡适：《这一周》，《努力周报》12期（1922年7月23日），1版。
- [292] 独秀：《革命与反革命》，《向导》16期（1923年1月18日），收入《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403—404页。
- [293] 据说广东地方的不少共产党人站在陈炯明一边，陈公博并因此事而退出中共。参见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59页。
- [294] 仁静：《最近北方政象及民众势力之勃兴》，《向导》100期（1925年1月28日），838页。
- [295] 高一涵：《我们最后的希望》，《努力周报》64期（1923年8月5日），1版。
- [296] 胡适：《与一涵等四位的信》（1923年10月9日），《胡适文存二集》，卷三，143页。
- [297] 本段与下两段，双林（瞿秋白）：《胡适之与善后会议》，《向导》106期（1925年3月14日），883—884页。
- [298] 高氏所谓“根本改造”不过是寄希望于教育界和工商界这些“大有希望的阶级”，实施“学者制宪”（由教育界“选出专门学者充任宪法起草委员”），改革政治，工业界出来主张“无职业者不得充任国家一切官吏”和“商业界出来干涉财政”等，与国共两党主张的“革命”相去甚远。同时应提请注意的是，高氏这里所说的“英美的实验主义派”乃是实指英美，他并不是要区别于“中国的英美实验主义派”。参见高一涵：《我们最后的希望》，《努力周报》64期（1923年8月5日），1版。
- [299] 参见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997年11月）。
- [300]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人民出版社，1979年重排本，3—16页。
- [301] 胡适：《国际的中国》（1922年10月1日），《胡适文存二集》，卷三，128a—128i页。
- [302] 在1923年胡适与梁漱溟的争论中，梁漱溟曾致信胡适，指出“尊文间或语近刻薄，颇失雅度”；胡适承认梁的批评“深重适作文之病”，盖他作文为求活泼，“有时不觉流为轻薄，有时流为刻薄”（梁漱溟致胡适，1923年4月1日；胡适致梁漱溟，1923年4月2日，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二，86—87页）。此亦一例，尤其胡适自己是留学生，这样说别人听了更觉是“有的放矢”。
- [303] 胡适：《与一涵等四位的信》，《胡适文存二集》，卷三，143页。
- [304] “读者注意”，《向导》5期（1922年10月1日），44页。
- [305] 本段及以下数段，国焘：《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略的危险么？》，《向导》6期，45—50页。
- [306] 以今日的 hindsight 来看，当时除日本与奉系的关系比较实在外，英国援助吴佩孚的说法的确缺乏充分的证据。双方的联络不能说没有，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可能也有一些当时当地的“现场合作”，但似未到达决策层面。其实苏俄也曾把吴佩孚列为拉拢和援助的对象并进行了具体的尝试，一些中共人士如李大钊还参与其中。不过，当年并非国共两党这样说，不少政治倾向不明显的报刊上也多可见类似的表述，故这类说法在多大程度上是“事实”固然还需进一步斟酌，其已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共识”却不假。相关问题当另文探讨。
- [307] 章龙：《外交家的体面》，《向导》41期（1923年9月23日），311页。
- [308] 和森：《孙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向导》107期（1925年3月21日），893页。
- [309] 邓中夏：《努力周报的功罪》，《中国青年》3期（1923年11月3日），6—7页。
- [310] 恽代英：《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原载《广东青年》4期（1926年6月30日），收入《恽代英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826页。
- [311] 胡适致郭廷以，1960年1月，引在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修订版，第2册，508页。其实胡适向有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话的取向，在中外关系上表现得最明显。他凡是主张不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论，都是对中国人说的；而他对外人或教会人员讲话时，却常常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其对外国利益自身的危害。他这样做大概是想要表现其“大国国民的风度”，却似少努力要让人知道这一点；其士大夫意识使他很愿意体现其“特立独行”，对一般人的误解很少辩解，只求自我心安，结果造成了立说者与听众之间的传播障碍。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267—279页。
- [312]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331—341页；《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14页。
- [313] 本段与下段，参见胡适：《国际的中国》，《胡适文存二集》，卷三，128g—128i页。
- [314] 决议案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344—346页；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134—136页）也收录了这一议案。
- [315] 李大钊致胡适，1922年8月底，《李大钊文集》（5），310页。
- [316] 《启事》原载《晨报》1922年9月24日，转引自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78页。
- [317] 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努力周报》18期（1922年9月3日），收入《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378页。
- [318] 胡适：《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编者按语》，《努力周报》18期（1922年9月3日），3版。
- [319] 国焘：《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略的危险么？》，《向导》6期，50页。
- [320] 本段和以下四段，国焘：《我们对于小资产阶级和平派的劝告》，《向导》13期（1922年12月23日），105—106页。
- [321] 独秀：《怎么打倒军阀》，《向导》21期（1923年4月18日），收入《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441页。
- [322] 陈独秀：《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前锋》1期（1923年7月1日），收入《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517—518页。
- [323] 本段与下段，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青年》6期（1923年11月24日），2—6页。按朱文华的《胡适评传》（重庆出版社，1988年，204—205页）已论及邓中夏这一主张。
- [324] 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330页。
- [325] 张太原：《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历史研究》2002年4期，56、59页。
- [326] 邓中夏：《努力周报的功罪》，《中国青年》3期，6—7页。按张太原虽引邓中夏此文，却未引这一句。
- [327] 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青年》15期（1924年1月26日），6—10页。张太原也引用了此文，但他把“气味相投趋向相近的生力军”说成是指胡适等人，则稍有疏忽。
- [328] 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11页。
- [329] 中共对胡适言论始终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胡适在读书人中的影响一直较大。同时，尽管胡适在中共眼里或者太温和甚至落后，北京政府却总把胡适视为带有“过激”色彩之人。不仅前引张国焘所说胡适差点被“捉将官里去”，陈独秀也指出，“北京国立大学请胡适之教书著书，而北京警察厅却查禁他的书”。参见独秀：《两件不可解的事》，《向导》75期（1924年7月23日），604页。
- [330] 楚女：《教育界的法西斯蒂“国学”》，《中国青年》11期（1923年12月29日），1页。按张太原认为，陈独秀提出的“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这一主张“并没有象联合国民党那样成为整个党的决定”（张太原前引文，59页）。怎样才可以称作“整个党的决定”，当然也可以做出某种特别的界定，但将全党大会的决议案和宣言等视为“整个党的决定”似亦不能算过分。中共试图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以对抗“封建军阀”已见诸上述文件，“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似应包括在前一联合战线之内。从张国焘的“劝告”、陈独秀的正式提出“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以及邓中夏的连续呼应，都提示着将中共二大的决定贯彻到思想战线之上应即是“整个党的决定”之一部分，不一定需要特定的专门决议才可以算数（现尚“未见”类似决议并不能断其为“未有”，何况基本的档案材料未曾全部公开）。
- [331] 但要证明其确被排除出“联合”对象之外，尚需提出至少相对正式或明确的依据（如正式的决议、党组织或领导人的内部或公开表述等）。实际上，部分正因为重视程度降低，对于像胡适这样有着“反封建”佳绩的知识精英，中共也未必就会做出“不联合”胡适等的正式决议。
- [332] 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新青年》（本文所用是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第3号（1926年3月），1页。
- [333] 本段与下三段，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新青年》第3号，21—25页。
- [334] 同时，资产阶级本身也分化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及智识阶级也就逐渐显现他们的左倾；——最近半年来北京方面有《猛进杂志》、《莽原杂志》，上海方面有《洪水杂志》等等；至于国民党内如柳亚子、朱季恂、甘乃光、陈公博等居然形成强有力的群众的左派，汪精卫、蒋介石等革命倾向之确定更不用说。”



[335] 胡适在五卅事件前参与善后会议，被认为是认同于北洋政府；在五卅事件后也曾劝学生专心读书，不必管这些身外之事。故不仅中共党人对胡适等的表现不满，认为胡适“落伍”是那时新老各派中不少人的共同看法。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317—319页。

[336] 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新青年》第3号，20页。

[337]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层面言，这牵涉到“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当时不少人是将知识分子算作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这又牵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资产阶级（包括后来才区分清晰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所有这些理论问题在北伐前仍属“发展中”的讨论阶段，比如张国焘在1922年底就认为，“在素来缺乏政治活动的中国人民中间，那极少数的知识阶级是最彻底最有革命精神的成分，占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参见国焘：《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导》12期（1922年12月6日），98页。直到北伐前夕，中共在主张退出国民党时，所持的一个理由仍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实质上是知识分子反对派”。参见古比雪夫（季山嘉）和拉兹贡：《给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1926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上册，18页。这样的观念与后来确立的产业无产阶级最具革命性的主张颇不相同。

[338] 张彭春：《日程草案》（即日记），1925年6月29日。原件藏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所用的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微缩胶卷。

[339] 君宇：《北京大学过激化了吗？》，《向导》7期（1922年10月25日），55页。

[340] 《晨报》，1923年9月11日，6版。关于《中苏条约》和中苏谈判过程，参见何艳艳：《国民外交背景下的1923—1924年中苏建交谈判》，《近代史研究》2005年4期。进一步的例子是，曾在欧洲学国际法的周鲠生稍后在自由主义知识精英所办的《现代评论》上发表《革命的外交》一文，主张“对于既存的国际规则、惯例或条约的束缚，都要一概打破”；同时更要“利用民众势力”，以“遇事生风”和“小题大做”为革命外交的“要诀”。他更明言：“流氓的方法，实在是对待帝国主义列强政府最有效的外交方法。”参见周鲠生：《革命的外交》，收入其同名论文集，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1—11页。

[341] 此事学术界尚乏研究，原始材料都收在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上），由北新书局于1927年在北京和上海同时出版。

[342] 张奚若：《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晨报副刊》，人民出版社1981年影印，1925年10月8日，13页。

[343] 张彭春：《日程草案》，1925年11月30日、12月27日。

[344] 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351—354页；《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231—233页。

[345] 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胡适文存三集》，亚东图书馆，1930年，卷九，1159—1162页。按这本是胡适的英文演讲，中文文本里的反帝排外主张皆有出处，明确可知是来自中共；英文文本在1925年曾两次刊发，首次是7月，其中的反帝排外主张虽未注明出处，但从其引文、特别是关于“cultural imperialism”的界定等，仍可看出是中共言论。参见其“The Present Crisis in Christian Education,”收入《胡适英文文存》，周质平主编，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年，第1册，187—191页。胡适在1926年3月把这一演讲用中文“追记”出来，并于1930年收入其文存三集，都提示着某种倾向的持续。

[346] 胡适：《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1925年6月），《胡适文集》，第12册，723页。演讲的时间约在6月17日，最初刊发在6月26日的《晨报副刊》上。

[347] 或正因此，胡适虽努力说好听的实话，而苏俄和中共皆以为胡适的亲俄表述尚不够，大致也是事实。

[348] 关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参见Min-ling Yu,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1925-1930,” Ph. 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1995.

[349] 胡适当年游俄时的日记不知为何没有收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后由耿云志先生设法找到并整理刊发在他主编的《胡适研究丛刊》第2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上，现已纳入本文所用的《胡适日记》，本段与下段参见1926年7月29—31日，第4册，233—237页。沈寂先生最近讨论了胡适访问莫斯科一事，他虽基本未对既存相关研究做出因应，其文大体平实地引述了胡适日记，参其《胡适访苏及其感受》，《近代中国》第150期（2002年8月25日）。感谢《近代史研究》编辑部提示我注意沈先生的文章。

[350] 我曾就此问题请教过专门研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余敏玲教授，她说未见关于此事的俄文记录。胡适日记中提到积极参与谈话的学生如蔡和森、刘伯坚等皆中共党员，以中共和苏联方面对此事的重视，我猜想当年应有某种形式的记录或报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搜寻。

[351]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台北水芙蓉出版社，1983年，166页。

[352] 汪菊农：《胡适二三事》，收在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三联书店1989年，20页。

[353] 其实就连档案中也包括着“虚构”成分，若进一步深入考察，“故事讲述者”怎样讲述故事本身也可以告诉我们许多史事真伪之外的论世知人的内容。参见：Natalie Z. Davis, Fiction in the Archives: 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6, 111-14.该书近已有中译本：《档案中的虚构》，杨逸涛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年，可参看32—51、302—309页。

[354] 两位叙述者各自的立场值得注意，毛在海外，基本倾向于胡适一边；汪则大致站在中山大学学生一边，惟其与胡适有个人关系，也颇注意不把胡适“讲坏”（朱熹曾说：“屈原之赋，不甚怨君，却被后人讲坏”。转引自章学诚：《史考摘录》，收入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书店1993年，339页）。

[355] 胡适：《国际的中国》，《胡适文存二集》，卷三，128a—128i页。

[356] 关于胡适对苏俄的赞颂，参其《欧游道中寄书》，《胡适文存三集》，卷一，73—90页。伯山：《与适之先生论干并及新自由主义》，《晨报副刊》，1927年1月6日，3页。

[357] 《胡适日记》，1926年8月1日，第4册，237页。

[358] 《胡适日记》，1926年7月30日、31日，第4册，235—236页。

[359] 《胡适日记》，1926年8月2日，第4册，238页。

[360] 《胡适日记》，1926年7月31日，第4册，235—236页。

[361] 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胡适文存三集》，卷一，75页。

[362] 《胡适日记》，1934年5月31日，第6册，389页。并参见：Robert C. Tucker, Stalin in Power: 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 1928-1941, New York: Norton, 1990, pp. 40-43, 74-76.

[363] 《胡适日记》，1926年7月31日，第4册，236页。

[364] 《胡适日记》，1930年3月5日，第5册，681页。

[365] 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胡适文存三集》，卷一，73—90页。

[366] 徐志摩：《一个态度及按语》，《晨报副刊》，1926年9月11日，17页。

[367] 任鸿隽致胡适，1926年12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以下径引书名），中华书局，1979年，上册，411—412页。

[368] 关于胡适与国民党，参见罗志田：《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226—274页。

[369] 徐新六致胡适，1927年1月1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19—420页。不过，任、徐二氏的质疑都只是私下的交流，而胡适对新俄的赞颂和提倡“干”的主张却是公开发表的，这当然会有不同的影响。身在国民政府治下的顾颉刚稍后就告诉胡适：先生最近“主张我们反对俄化的资格，这句话也常称道于人口”（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26页）。

[370] 张忠栋：《胡适五论》，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7年，37页。

[371] 说详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351—355页。

[372] 张太原前引文，63页。

[373] 张太原前引文，61页。

[374] 胡适：《漫游的感想》，《胡适文存三集》，卷一，63—64页。

[375] 《胡适日记》，1926年8月3日，第4册，239页。



[376] 我过去曾说胡适此时干“什么制度都可以”的干法“后来证明仍未出议政的范围”（《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231页），这只能是就其实际行为而言，从其日记最后的组党打算看，我至少低估了胡适当时的雄心。

[377] 参见胡适“在利物浦大学的演讲”，1926年11月25日，“在曼彻斯特大学的演讲”，1926年11月26日，均为当地报纸报道，附在《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同日的条目中。更详细的论述见胡适1926年11月9日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的演讲，刊发在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I:6 (1926), pp. 265-79；及胡适的英文论文：“Civilization of East and West,” in Charles A. Beard, ed., Wither Mankind,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29, pp. 37-41. 并参见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学人》第4辑（1993年7月）。

[378] 胡适：《漫游的感想》，《胡适文存三集》，卷一，61—62页。

[379] 述之：《十月革命第九周年的苏俄之经济政治的进步》，《向导》178期（1926年11月15日），1857页。

[380] 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172期（1926年9月25日），收入《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1106—1111页。

[381] 陈独秀：《我们的教育家还要反赤吗？》，《向导》175期（1926年10月12日），收入《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1119页。

[382] 陈独秀：《军阀口中的赤化与苏俄》，《向导》177期（1926年11月4日），1840页。

[383] 恽代英：《思想界“反赤”运动之过去、现在与未来》（1927年1月1日），《恽代英文集》，下卷，978—979页。

[384] 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26页。

[385] 陈独秀：《苏俄何尝有什么“党化教育”！》，《向导》190期（1927年3月6日），2046页。

[386] 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26页。

[387] 胡适致陈独秀（稿），约1925年12月，《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355—357页。

## 下 编

### 北伐前的军政格局

# 北伐前南北军政格局的演变，1924—1926

1924—1926两三年间是中国南北武装力量权势更迭相当快速激烈的时期，北伐时南北双方的主要军事将领至少有一半都是在这两年才崛起，北方的张宗昌和孙传芳大约在这两年才逐渐成为全国性的人物，就是冯玉祥也基本是在这段时间才成为中国军政不可或缺的要角，所谓国民军体系同样是在此期间形成并壮大；而南方的唐生智、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李济深（李济琛）等更是在这段时间开始在其所在区域确立其地位，到北伐时暴得大名而成为全国性人物。就是后来长期维持国民政府领袖地位的蒋介石，也是在这段时间才逐渐广为人所知。如果在1923年底综论中国军政局势，上述人中除冯玉祥外恐怕很少会出现在讨论之中，而当时的冯玉祥也还不具备左右局势的实力。

这些新兴军人中的大部分也是在这两年中因确立实际控制的地盘而得区域军事领袖的认同。冯玉祥的国民军逐渐向西北发展并最后获得“西北军”的区域称号，孙传芳以江浙两省为核心的五省联军防区，张宗昌那半独立的鲁军及稍后的直鲁联军，唐生智的盘踞湘南，李、白、黄的掌握广西而成为“新桂系”，以及国民党黄埔系的党军和许崇智、李济深部粤军通过两次东征真正控制广东（从而奠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体系中的地位），也大多在这短短的两三年间。

当时一位高级将领魏益三后来回忆说：“1926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动荡最激烈的一年。在这一年，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前夕，军阀混战的次数最多，动员的人数最大，涉及的地域也最广，而大小军阀之间互相火并、离合拥拒的形势也发展到最微妙的程度。”魏氏本人在“这一年中间的变化也是极为复杂剧烈的”，其所辖部队在一年之内先后五次转换隶属关系：在这年的1月，参与郭松龄反张作霖失败的魏部退出了奉军，在山海关接受“国民四军”的番号；到3月间又改组为半独立的“正义军”，再到5月间又投到吴佩孚“讨贼军”的麾下，随后即参加了打国民军的战役；到这年年底，又因北伐军的胜利而参与国民革命，转为国民革命军的第三十军。<sup>[1]</sup>

如果不计“军阀混战”的定义，<sup>[2]</sup>魏氏所述大致不差。而且除“正义军”那次改组外，魏部每次转换隶属关系都是倒戈转向敌对方，这样一种“离合拥拒的形势”的确已发展到“最微妙的程度”。北伐前两三年间南北军政格局的演化如此曲折复杂，显然值得更加认真的关注。本文所说的“军政格局”，主要指因军事的发展演化而导致的相对宏观的政局转变，故下面的具体讨论将以军事为主；先考察北方的局势演变，侧重北洋军阀体系的新陈代谢所造成的冲击，并从地缘分布视角看北洋体系中边缘挑战中心的态势，两者从不同侧面揭示出北洋体系正统衰落、边缘兴起的趋势。

## 1. 北洋军阀的新陈代谢

《申报》主笔杨荫杭在1920年说，中国传统“右文而贱武，故成文弱之国”。自甲午为日本所败，国人为矫文弱之弊而大声疾呼“尚武”；但民国后的共和制却导致军阀割据，国人乃“知右文之说，尚未可厚非”，又大声疾呼曰“文治”！不过问题不在是否应该尚武，在于“当使武力操于有教育者之手，而其国乃强”。<sup>[3]</sup>文武关系的转变，尤其军人地位的上升，是近代中国较大的变化之一，而“使武力操于有教育者之手”的确是北伐前许多国人特别关注的问题。

中国虽有“教而后战”的古训，不过更多是指一般参与作战者；同时也有所谓“出将入相”的传统典范，理想的读书人应能“上马杀贼下马做露布”，但通常似不以为军人非读书不可。关羽燃烛读《春秋》的形象画面能够长期流传，正反映出某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理想。因此，军人特别是军官应受系统的军事教育而后能胜任，大致是近代传入的新知，多少带有把“教而后战”的古训缩小范围而直接落实到带兵者身上的意思。

在清季“兵学”大兴的影响下，军官须受系统教育的观念日益普及，从“讲武堂”到“武备学堂”的各类速成军事培训机构遍及全国。近代多数西方事物引进到中国后都有所调整改变，从清季到民国建立的保定军官学校及其配套教育系统的产生，正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保定生入学前要求5—7年的陆军小学和陆军中学教育（毕业后随营实习半年到二年），入校后要学习二年整。<sup>[4]</sup>从陆军小学开始到军官学校毕业，不计随营实习也有7—9年的在校军事教育（若加上陆军大学系统历时更长）。尤其正规军事教育从“小学”阶段（当然和今日的小学概念有所不同）开始，具有相当的独特性。<sup>[5]</sup>虽然具体的年限在执行中或有缩短，足量完成设计学制的或并不多，仍充分体现出新型的“教而后战”思想。

不过，与多数近代中国的改革相类，越是成系统而健全的设计就越不适应当年各方面变化皆剧烈而频繁的时代特征。从清季开始的北洋军事教育体系，其设计者用心不可谓不良苦，然这样长久的训练，待稍具规模时已是进入民国十年以后，北洋体系本身也已接近崩溃，实非草创者始料所及。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北洋军事教育体系之设计虽充分体现出新型的“教而后战”思想，北洋军事领袖的发展恰反之，后来明显是武力越来越操于无教育者之手（这只是就北洋最上层的发展倾向言，同时当然也有一些受过军事教育的将领在兴起）。<sup>[6]</sup>

通常所谓“北洋军阀”中，最早一批如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毕业于李鸿章在光绪十一年（约1885）在天津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他们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新军的主要操控者，此后才是保定北洋速



成武备学堂、保定军官学堂培训的军人，再后又有民国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但北洋内斗的结果，在小站系统和保定系统之间出现了某种断层，在最上层是军校毕业一辈老成凋谢，到20年代新兴起来一批基本未受过教育的特殊军人，不仅行伍出身的老北洋曹錕做了总统，<sup>[7]</sup>更有张作霖、张宗昌、冯玉祥等新兴者。这与晚清从湘军到淮军的发展稍类似而不全同，淮军将领的科举功名远逊湘军将领，然多少还受过正规教育（以当年标准言）；北洋后起的二张与冯则或识字不多，或竟基本不识字，结果出现“绿林之剧盗通电而论时事”的情形。<sup>[8]</sup>

这样的情形也有其内在的原因，早期的北洋军事首领虽多受过西式或日本式的军事训练，实际掌握军权者多数并未接受“武力操于有教育者之手”的观念，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曾任保定军校队长的日本士官生何柱国回忆说，“当时北洋军阀一般都喜欢行伍出身的人带兵，学生出身的人只能用作参谋之类的幕僚”。而北洋派系争斗也直接影响到保定军校的命运，民国保定军校历任校长多是日本士官出身的人，1922年直系控制局面，改派北洋老武备出身的张鸿绪为校长。据说因张氏排挤士官派激起风潮，“大部分士官派的教官和队长离职他去。他们一般都是从人事关系即同学、同乡和亲友等关系选择去向，其中少数人去了广东，戴联玺、杨正治、赵翼、梁济和毛福成等二十余人则去东北投向奉军”，何本人即后者中的一个，而保定军校自身也在次年即告结束。<sup>[9]</sup>

不过，近代中国一个重要特点即多歧性，北洋体系也不是铁板一块。身处南方的北洋孙传芳部将领马宝珩就强调，孙军战斗力强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各部重要军官，多是保定军校出身的青年军官”。<sup>[10]</sup>据何柱国观察，东北军中也有以日本士官生杨宇霆为首的新派，“大量吸收各国陆军留学生和国内陆大、保定军校等出身的军官，特别是原籍东北而散在关内各方面担任军职的人”。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即整军经武，“全军各师旅的参谋长和各团管教育的中校团附全数改由军校学生出身的人充任，其中保定军校各期毕业生为数最多，来自关内的各国陆军留学生和陆大出身的人次之；并且，以后遇有团、营长出缺，一般皆由各部队的参谋长、团附以及讲武堂的教官和队长调充”。与其他北洋军中军校毕业生多只能作幕僚不同，奉军中“很多学生出身的人都直接带了兵”。<sup>[11]</sup>

孙传芳军，特别是奉军，在后来北伐战争时期都是北洋方面以能战著称的部队。相比之下，有些北方军队则大不同。据苏联顾问勃拉戈达托夫观察，在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里，在国外受过教育的将军和军官一个也没有，只有不多几个人是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在这几个人中，鹿钟麟将军和唐之道将军的军事知识出众。总的来说，冯军军官们文化水平都很低，只能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吸取军事知识。他们都不会独立研究作战方针或制定战斗计划，因此总是同意那些从军校毕业出来的参谋人员的意见”。<sup>[12]</sup>最后一语可能还需要界定，所谓“总是同意”大概仅指狭义的“制定战斗计划”而已，在具体指挥作战时“计划”常常不起作用，勃拉戈达托夫自己便经常抱怨这一点。

在实际作战中，行伍出身的指挥员往往回避其所不擅长者，有时甚至对其有利的条件也不加利用。例如，当时许多军队中炮兵的作用便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部分或即因为炮兵官长“须略具军事学识”，行伍出身难以胜任，故各部炮兵官长皆军校出身。<sup>[13]</sup>尽管在两次直奉战争中均已较多使用大炮和机关枪，甚至飞机也用于投弹，<sup>[14]</sup>但重兵器的使用与否及是否得法，很多时候仍视指挥官而定。直到北伐时，汉阳湖北守军的仓库里放着“十二门连同全份炮弹的日本坂野炮（七十五毫米）”，这样的重火力竟然并未用于作战，在汉阳失守后被唐生智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全数缴获。极有意思的是，这批大炮同样没有用于北伐军稍后进攻武昌的战斗！<sup>[15]</sup>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到北伐前夕，已是保定毕业生鼎盛之时。那时保定毕业生任职于全国，保定二期的何遂在1926年春的通电中便说“国内袍泽，半属同年学友”。<sup>[16]</sup>但这更多是各军队的中高层，最上层则不然；在有些军队如国民军中，连下层也不然。需要说明的是，军队首领的“出身”未必就决定了其所辖队伍的行为，比如“绿林之剧盗”领导的奉军就是北方装备最好可能也是军事观念最“现代”者（即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作战观念），实际战斗力大概也最强。<sup>[17]</sup>但北洋体系老成凋谢、未受或少受教育及职业军事训练的一批新军人的兴起，终意味着行为准则的转变。

张作霖、张宗昌、冯玉祥等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不甚顾及北洋自身的传统行事准则。<sup>[18]</sup>有“倒戈将军”之称的冯玉祥，对几乎所有的上司和同盟者，皆有不同程度的倒戈行为，他自己最后也因部下倒戈而失势。刚到中国的苏俄顾问“感到奇怪的是，国民军第一军军长冯玉祥是一个信基督教的将军，然而却称自己是孙中山的信徒，他同中国人民的公敌张作霖签订了协议，反对自己的上司吴佩孚”。这位顾问发现，“冯经常在琐事上耗费精力”，他“不仅经常出尔反尔，而且还像罗马的太阳神一样耍两面手法”。因此，“任何时候你都不清楚他明天会有什么举动”。<sup>[19]</sup>

这样的行为方式可能为当时变动剧烈的时局所促成，同时又反过来推进了军政局势的不稳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还比较适应当时变化频仍的军政格局。冯玉祥和国民军的兴起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本来缩居山西一隅而进退于各派军事力量之间的阎锡山在北伐结束时地位和影响都明显上升，一度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则是另一类型的例子。

这一变化若置于北洋内争发展史中考察当更为清晰，简单回顾北伐前数年各地军阀、特别是北洋体系内部的争斗历程，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两次直奉战争期间北洋内斗较前远更激烈。以前北洋军阀内斗向有“电报战”之称，战争双方通常是雷声大、雨点小，通电多于交战。杨荫杭在1920年即注意到，当时战事“直与

演戏无异”，各方并不“出其全力以从事于战”，反倒是“用其全力于打电报”。实是“诸公好‘滑稽’，以国事为儿戏”。<sup>[20]</sup>西人稍后亦尝称之为“天朝滑稽剧”。<sup>[21]</sup>

但两次直奉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则动员的兵力是以前战争的数倍，而伤亡则数十倍之。不仅战争的规模扩大，作战的方式也更现代化，战斗多发生在交通最发达可迅速调动军队的东部省区。致使自太平天国以后基本未受战争骚扰的，也是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遭受战争重创，民生被严重扰乱，社会元气大伤。<sup>[22]</sup>

同时，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出现了民国政治史上一个崭新的现象，即中央政府第一次在军阀战争中正式站在其中一方（直系）的立场上。当时吴佩孚要求内阁在其司令部召开办公会议，并在会上对政府总理和部长随意指示，使与会的部长顾维钧得到“一番新的阅历”。<sup>[23]</sup>这个现的表面含义是中央政府对派系政争态度的转变，但还有更深远的意义：直系以中央名义讨奉，乃使中央政府从虚悬在各派系之上的象征性权威移位到为一派所利用，大致类似于古代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或增强了这一战争的正当性，实际却从根本上损毁了中央政府自身的统治合道性（political legitimacy）。<sup>[24]</sup>

在整个北洋体系的发展之中，自有派系产生，皖系早败而奉系后起，唯一的一个自始至终参与竞争北洋控制权的大派就是直系。从字面意义看，北洋体系本诞生于直隶，直系的形成虽较皖系为后，实际是最“正宗”的北洋嫡派。皖系需要自创所谓“参战军”（后改边防军），奉系则基本自建于边远地区，若以狭义论恐怕算不得北洋军，两者不同程度上皆具边缘挑战正统的意味。<sup>[25]</sup>同时直系领袖的代际传承也较为成功，产生出吴佩孚这样的后期领袖，在当时军阀中的确可以说是文韬武略兼具的佼佼者。直系打败皖系后又取得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期并不居劣势，其利用海军攻奉的战略也相当有见地，如果不是冯玉祥的倒戈，也许直系真能统一中国，亦未可知，至少或能统一北洋控制地区。<sup>[26]</sup>

假如直系后来真能统一全国并控制之，则其统一可以说在战前已开始；如果从直系最终失败的角度看，则其失败即始于破坏了北洋军阀自身的政治伦理和政治体制：袁世凯去世后逐渐形成的在地方割据基础上维持“虚”中央政府这一北洋体制在第二次直奉战前已经崩溃了。以前中央政府能相对独立，即因其不全为一派势力所造成；而1924年时中央政府已公开为一派所造成并控制，行事既没有以前那么多顾忌，其名义上的合道性也不复存在，为后来的北伐预留了“有道伐无道”的先机。

第二次直奉战争虽因冯玉祥的阵前倒戈而以直系失败而结束，但整场战争未能产生出一个确定的赢家，反呈现出北洋体系的崩裂之相：以冯玉祥部为中心的国民军体系的形成和稍后奉系主力郭松龄部的倒戈反奉，使奉系战胜的意义大打折扣；奉系乘战胜之机向东南扩充的努力并未成功，然张宗昌、李景林部却因此而形成实际的半独立状态（不久联合成为直鲁联军，北伐将结束时张宗昌部欲退入东北而为张学良拒之门外）。更重要的是，直奉双方冯、郭这样的高级将领先后率大部倒戈而试图组合成新主流的尝试虽未成功，却有力地揭示出北洋体系中强烈的不稳定因素。<sup>[27]</sup>

对北洋体系来说，没有确定赢家的结果或可说是毁灭性的，即北洋内部对于一个有力军人可武力统一中国的信心基本丧失。孙传芳稍后曾说，“中国之所以弄到如此地步者，皆蒋介石、吴子玉二人之过”。<sup>[28]</sup>盖蒋、吴均有武力统一中国之决心，<sup>[29]</sup>而北洋方面自吴佩孚式微之后，即不复有任何军阀仍有统一全国的雄心。<sup>[30]</sup>不仅统一全国已不再是北洋目标，即使统一北洋体系自身，也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及了。北京政府既已失去实际的统驭能力和名义上的正当性，北洋体系实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结果，各地中小军阀也频繁互斗，使北洋体系进一步分裂，阀下有系，系下有派，各不相让。<sup>[31]</sup>有些军阀并不想争独霸之地位，但也不能让别人有此地位（这在直奉战争后渐成多数军阀的共同心态）。各方所争，不再是要争取一人一阀独大，毋宁是防止任何一人一阀独大。<sup>[32]</sup>北京的社会学教授许仕廉1926年观察到，“目下中国心理的环境，最为悲惨，其原因就是无英雄可崇拜。现在一般大头目小头目，谁也不崇拜谁”。<sup>[33]</sup>如许氏所具体指出的，“谁也不崇拜谁”的心态主要存在于各大小头目之中。<sup>[34]</sup>

这样的风气形成后，相互的猜忌甚于合作。结果是乱象更甚，而竞争各方又都受到这种混乱局势的影响。证以前述魏益三的回忆，1925—1926年间军事局势的确变化极快，各势力之间的分与合有时真是仅以日计。那时一般所谓军阀似乎相当盛行先联合共除一敌，旋即内斗；其间又有分合，又重组一联合体共除一敌，再继续争斗。其联合时期或反复的周期都不长，且临阵倒戈现象相当频繁；每一力量均思随时利用当下局势以利己（退则自保，进则扩充自身实力），而不甚考虑自己五分钟前的立场。冯玉祥支持郭松龄反对其上司而合作不成的过程，就可以说是上述心态比较典型的表现（详后）。

这是一幅均势已去，故任何一股力量均可影响大局的典型图像。在北洋体系控制了全国多数地区而南方（西南）在全国事务中渐无足轻重时，北洋军阀内部的皖直或直奉两极均势既予以各中小军阀依附一派的便利，也给予其在体系中不时转换立场或保持相对中立的实际选择，局部的争夺即使诉诸战争，也不一定会危及整体局势。一旦均势开始崩溃，一支小部队的立场转换就可能发挥影响全局的大作用。比如，江浙战争的导火线即是驻闽军臧致平、杨化昭不足万人的残部投奔占据上海的皖系卢永祥，而本可视为直皖之争余波的江浙战争随即引发更大规模的第二次直奉战争。

国民党当时即注意到这一变化，其1925年5月的时局宣言在指责“中国之内乱，由依赖帝国主义以为生存之军阀所造成”后说：“军阀之大者，把持中央政柄，藉统一之名义以迷惑国人；军阀之小者，割据地方，藉联省自治之名义迷惑国人。其名义虽不同，其为造成内乱则一。本党向持根本解决之旨，对于把持



中央之大军阀，从事挾伐；其割据地方之小军阀，有敢凭陵自恣及窥伺革命政府根据地、受帝国主义者之嗾使以图倡乱者，本党必联合国民痛击之。”<sup>[35]</sup>这样一种试图区分大小军阀并拟采取不同对策的努力恰反证出北洋军阀的分化，也意味着“小军阀”作用的增强。

对民国前期的实际作战情形而言，直到北伐时每一具体战役所涉兵员多不过数万，战斗规模并不甚大。故那时只要有万人甚至数千人的军队且敢战肯战，就是非常重要或至少不可忽视的力量。<sup>[36]</sup>这大概是卢永祥不惜冒战争风险而收编臧、杨余部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名义属国家的军队已出现向区域化甚至个人化发展的趋势，万人规模的军事力量必须有自己控制的“地盘”以养育和补充队伍；如果没有，则只能投靠已有地盘的更大军阀，否则就不得不尝试以武力开拓自己的地盘。在当年的军政术语中，“地盘”算得上一个关键词，出现频率非常高。北洋军阀的各大派系本身即依地域命名，从地缘分布视角看北洋体系的后期演化，或能有较前更深入的认识。<sup>[37]</sup>

## 2. 边缘挑战中央的地理态势

民初交通已成为军事要素，地理分布对军事的重要因此而凸显，交通不甚便之西南（指四川、云南和贵州，非时人口中的“西南”）、西北及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基本未入北洋主流。西南之中，最接近中原的四川向有“军阀混战”最剧的不良声誉，表面上的特征之一是军队人数居全国各省之冠而几乎足不出蜀，更实质性的缘故则因川省久为南北双方所持续争夺，川军间错综复杂的内斗往往不过是南北各方之争的反映，结果整体的四川或南或北的认同始终不那么明显。<sup>[38]</sup>而热、察、绥和西北则因与中原接近，通常成为北方无地盘而有实力者首先争取的地区，从地域言也可说很早就有一个据边缘以挑战中央的意思。

当时热河、绥远、察哈尔一方面成为中央用以安插无地盘者之处所，同时也是各类无地盘者欲借以发展的基础；如徐树铮、冯玉祥等皆先后试图以热、察、绥为基地，冯在得察、绥后又致力于陕甘，终获得“西北军”的认同。<sup>[39]</sup>这一趋势既可说是边缘挑战中央，也可说是礼失求诸野，就看从哪方面立言。北伐后实际留存的北方军队除较特殊的阎锡山晋军外，恰即所谓东北军和西北军，提示着这一地域发展趋势似还值得思考和探索。

实力不甚强却能长期维持其地盘者，派系不明朗的山西阎锡山是个典型的成功代表。尤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失败、冯玉祥下野、张作霖出关那段时间，阎锡山成为北方唯一的不倒翁，其重要性可见明显的增加。<sup>[40]</sup>山西距北京甚近，阎锡山多次坐观他人争斗的结果是自己的地位逐步提高，到1926年初已大致达到几乎可据京师的程度。这样一种战略性的地理优势，承平时作用不明显，乱世则可能有大用。后来阎锡山甚晚参加北伐，却成为四大集团军之一并首先进据北京，实非偶然。<sup>[41]</sup>

这一特殊的战略性地理优势在冯玉祥军队崛起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且最初不过是偶然形成而已。1922年冯玉祥被取消河南督军，授陆军检阅使，包括冯本人在内的一般人皆视为吃亏，然冯部因此而驻北京南苑，稍用其兵力即可挟制中央政府，造成了超过其军事实力的地理优势和战略影响，对国民军以至“西北军”的崛起帮助实大。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那几年北洋统治的急速崩溃实超出多数人的预料，盖局势大体稳定时很少有人会考虑一支有力部队驻扎京畿的战略作用；另一方面，此前较出格的政治军事行为多是倪嗣冲、张勋这样的旧军人所为，北洋军人自有其行事准则，当时的主政者恐怕也低估了冯玉祥挑战北洋传统的胆略。<sup>[42]</sup>

这样，冯玉祥军队实创北洋新典范：一方面军事力量不断壮大，同时却几乎没有自身的地盘，复因其驻扎区域的战略性地位而获得意料之外的回报。当然，冯部寻求地盘的愿望和努力是持续的，也是促使这一军事力量发展壮大的主要动因，其最终成为“西北军”尤说明固定的地盘意识并未因国民革命这样的政治鼎革而改变，而是相当持续有力（“西北军”认同的取得在北伐前夕，而其确定则还在北伐结束之后）。简单回顾冯部从直系到国民军再到“西北军”的兴起进程，应有助于了解北伐前北方军事格局的突破性演变，这一进程又与原处西北的各军事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冯玉祥早在1914年随陆建章第7师入陕西，后升第16混成旅长，于1916年率部入川，到1921年再入陕西时已是第11师师长，任督军约一年，收编的陕军编成胡景翼、田维勤、曹士英三个混成旅，1922年夏冯督豫时带入河南，然三人皆有部属留陕。故冯部与陕西本有较深的渊源。继冯玉祥任陕西督军的刘镇华本豫人，1918年率所部镇嵩军入陕，任陕西省长，然陕西驻军复杂，刘之权威常受挑战，故其势力增长后反欲回乡督豫。两次直奉战争期间刘部受吴佩孚命出入陕、豫，甚为活跃，直系战败后刘又借驱吴之名进兵河南，然作为战果的河南地盘却为国民二、三军所得，于是形成镇嵩军与国民军二、三军争夺河南、陕西的持续战争。<sup>[43]</sup>

二次直奉战后，冯玉祥在1924年11月的天津会议上分得向京汉铁路沿线发展之权益。由于奉军实力太强，终迫使他将主要发展方向定在西北。1924年12月，冯玉祥通电取消国民军称号，<sup>[44]</sup>被段祺瑞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1925年初，段祺瑞复任命孙岳为豫陕甘剿匪司令。这些任命显然不会是执政府的一厢情愿，而是顺应国民军方面的意思。不久冯部先后得察哈尔、绥远，并使之纳入“西北边防”辖区，冯玉祥乃移驻张家口，国民军渐被称为西北军。<sup>[45]</sup>此后陕西的争夺主要在镇嵩军和国民二、三军之间进行。段祺



瑞任执政之时，国民军常能迫使中央颁布对其有利的命令，其在陕西初胜后即曾试图罢免刘镇华而由孙岳继任陕督，因张作霖反对而未果（但冯部向陕西开拓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奉方的鼓励或容忍，因为国民三军原驻直隶的保定、大名，若无处发展便不会“让防”）。<sup>[46]</sup>

由于山西与陕、豫临近，阎锡山又是执政段祺瑞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晋阎在双方的争斗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双方也都努力争取山西的支持。阎一方面与国民军胡景翼互派代表联络，并表示“赞成晋豫两省携手合作”；<sup>[47]</sup>但基本站在刘镇华一方，不仅代其向执政府说项，<sup>[48]</sup>且以子弹接济，盖阎自认“与陕联合，自属胜着”，唯对镇嵩军进一步的参战要求，又以“无中央命令不好出兵”而推托。<sup>[49]</sup>

阎部晋东盐运使马骏当时分析陕豫之争说：“刘胜则中央可将陕付吴〔新田〕、孔〔繁锦〕，败亦可付吴、孔。如能乘胡疲竭时中央明命鄂皖鲁苏陕各省以讨其破坏大局，一鼓歼之，最好。上策即以豫界冯。胡胜后颇可虑。”<sup>[50]</sup>按马氏较有战略眼光，其实就是希望刘、胡两败俱伤，给山西一个相对安宁的周边环境；其最后提到的“各省”讨胡竟然不包括晋省，甚能得阎锡山不主动干预外事之宗旨。且胡本陕人，若胜而据豫又兼领部分陕地，则对山西形成夹击态势。战事的结局正是马骏所忧虑的，不过胡景翼新胜据豫后，本可大展宏图，却于1925年4月因病身故，使时局发生相当大的变化。<sup>[51]</sup>

陕豫间的战局刚告一段落，奉军于1925年4—5月再次入关，张作霖到京，确定“政局商定后再讲地盘”的方针，试图“先恢复国务院，以新旧交通系为阁员”。段祺瑞虽“态度消极”，仍不能不勉予同意。而冯玉祥则“一味退让，希图保存”。<sup>[52]</sup>实际上冯玉祥大体仍在实施其主要向西北发展的既定政策，故在“商定政局”的同时，基本维持着奉向东南发展而冯向西北开拓这样一种各忙其事的形势。不过，奉系在东南的发展最初虽较顺利，迅速取得数省地盘，却遭遇到远更强有力的抵抗，盖东南久为北洋所据，其对手皆驻扎于此的正统北洋部队；而西北本未入北洋主流，国民军所遭遇的主要是北洋边缘部队，相较而言，国民军的西北开拓更具实际成效。

胡胜刘败后陕西的结局确如马骏所料，段政府准战败的刘镇华辞职，以吴新田继任督办。惟吴部实力不够，始终未能真正控制陕西局面，不久陕西也为国民三军所得。1925年8月执政府正式任命孙岳为陕西督办，冯玉祥兼任甘肃督办，在名分上和实际上进一步确认了冯部在西北的地位（惟陕西之外的西北“地盘”还须继续开拓）。<sup>[53]</sup>国民军既得陕、甘、豫，北有察哈尔、绥远，形势看上去甚好，但其并未集中全力于巩固在西北的地位，而是更有所图，其拓展方向又回向山东和直隶，甚至可能包括山西。

奉系对东南显现出较大野心，引起各军阀不快，终推动新据江南五省的孙传芳与其余直系剩余力量的联合，吴佩孚乃乘间而再起，出任讨贼联军总司令以攻奉。<sup>[54]</sup>孙传芳讨奉时，国民二军曾参与攻鲁；战胜后的徐州会议，岳维峻也曾出席。这就使国民军和奉军终难共处，国奉之间战争很难避免。同时，整个国民军与山西的矛盾也日趋激烈。盖国民军既得陕、甘、豫、察、绥，北京也有驻军，在地缘分布上已置山西于其夹击态势之下；不论其在山东、直隶的进展如何，国民军若图将地盘连成一片，最容易也最可能的下一兼并对象就是山西。故晋阎欲图自保，就只能联奉。在国民军又将李景林逐出保定、大名后，奉张决定联吴佩孚打击冯玉祥。1925年11月22日，阎锡山驻汉口吴佩孚处的代表报告说：“奉派某要人来汉协商解决〔国民〕第一军，此间令其先行攻击。”<sup>[55]</sup>

且国民军内部并不团结，前引晋东盐运使马骏将国民军之冯、胡二部分别看待，并非无因。冯玉祥就曾自别于国民二军，他致电阎锡山说，“二军份子复杂，唯利是图，久为世人所诟病”，与冯氏自己“十数年心血教练而成”的一军不可同日而语；并力辩自己不仅未参与国民二军对山西的军事，且曾屡次劝阻之。

<sup>[56]</sup>而胡景翼、孙岳皆曾参与同盟会反清革命，自视与纯北洋出身的冯玉祥不同，反与也曾加入同盟会反清的阎锡山同属“民党”。就在国民军与奉、晋开战前不久，国民二、三军的代表谷仲言曾与阎在北京的代表联络，对“山西与冯合作而不与民党之二、三军携手，深致不满”。他强调，二、三军的“军队虽极复杂，军官确系民党主义，以主义与之拉拢，必可奏效”。故“山西应以民党关系，脱开冯方，与二、三军切实合作”。<sup>[57]</sup>

可知国民一、二、三军之间的关系确不十分和谐，而胡景翼去世后接掌国民二军的岳维峻与“民党”无瓜葛，他不仅联孙传芳讨奉，且亦公开列名于拥戴吴佩孚出山的通电之中。<sup>[58]</sup>这样，国民军内既不和，外将面临与奉、晋、直三方同时作战的不利局面，形势相当不妙。恰在此时，奉军郭松龄于11月22日（即阎锡山得知直、奉联合的当天）正式发出反奉通电，此举对国民军的存亡有重大意义。据勃拉戈达托夫对国民二军的观察，该军“只能对付土匪”，实“无力同正规军作战”。若与奉军战，恐难取胜。“多亏郭松龄采取了行动，才将部队从困境中拯救了出来”。<sup>[59]</sup>这一观察或许有些过分，二军中李济才、李云龙部皆甚有战斗力；<sup>[60]</sup>且如冯玉祥所言，国民一军的战斗力应超过二、三军；但总体上国民军并不具备同时多方作战的实力。

尽管郭松龄反奉对国民军非常有利，冯玉祥仍拒绝了苏俄顾问提出的以骑兵援助郭松龄的建议，认为郭“自己完全能应付”。国民军的所有军事行动均涉及地盘：国民一军出兵接管了热河，这还算是对付奉方地盘；同时国民一、二、三军又联合进攻支持郭松龄的李景林“地盘”，这一“违约”行为导致李部由支持郭而转向“中立”，继则转向支持张作霖而向冯宣战。勃拉戈达托夫认为冯玉祥“没有充分利用”郭松龄反奉的“有利局面”而在作战上“及时援助郭松龄”，冯后来也承认“他低估了自己敌手李景林的力量”，竟将一半的军队留在远距离的后方。<sup>[61]</sup>

其实冯玉祥和苏俄顾问所认知的大到战略利益小到“有利局面”皆不一致，<sup>[62]</sup>冯恐怕恰是在“充分利用”他眼中的“有利局面”，试图占领与自己最接近的地盘，以解决其兵多地少的矛盾。从冯部与奉军终不能不战一战的战略眼光看，若冯玉祥真出大力援郭而推翻张作霖，则不论是郭松龄拥张学良主政或其自主，皆必致力于巩固东北，暂无暇顾及关内，国民军在华北的地位会相当优越。直鲁联军南有孙传芳虎视眈眈，是否能自保尚成问题，不能对国民军构成太大的威胁；此时以优势兵力再图直隶地盘不迟，并挟中央政府以与势力尚松散的吴佩孚战，胜负实难逆料。

不过，冯玉祥那时仍在强化其对西北的控制。1925年8月执政府刚任命他兼任甘肃督办，冯即派主力之一的刘郁芬师出征甘肃。<sup>[63]</sup>10月间，阎锡山派往冯部的代表观察到，“冯军连日向西开军队甚多，向东开只昨日有骑兵二连”。<sup>[64]</sup>究竟冒险逐鹿华北还是确立其对西北的控制，这恐怕才是冯玉祥面临的重大战略抉择。郭松龄不过奉军之一部，其反奉能迅速取胜大概很少会在时人事先意料之中，故真正援郭反奉可能需要倾国民军全力以赴，而胜败尚难逆料，具有相当的冒险性；若进兵西北则所遇对手实力相对较弱，且冯具有中央任命的督办职务，可以说是在自己属地进行“内部清理”，以当时军政运作规范言，颇具正当性。比较而言，在其他主要军事力量竞争华北甚至东北之时，倾全力以控制西北，是比较稳妥的现实选择。

然冯玉祥计不出此。他不援郭或因其对全国性战略地位竞争的冒险性考虑较多，但他又不想放弃当时华北的有利局面，也没有真正全力西进。也许他想让郭松龄与张作霖两败俱伤，自己则一面巩固西北，同时抓住可乘之机在华北据地（以国民一、二、三军之间的矛盾及各自意图的不同，此时或也不完全能由冯决策）。这一战略选择的结果几乎是毁灭性的，郭败而国民军不得不面临奉、直两系的夹击，而且还加上新近转向的阎锡山。山西的总兵力并不甚强，却最接近国民各军的实际地盘，具有非常直接的威胁；阎的出兵随时可将国民军在华北前线和陕西、河南的部队分隔开来，使其无法集中兵力对付奉、直任何一方，而不得不同时分别与奉、直、晋三方作战。国民军处于这样的劣势，很大程度上实因冯玉祥在郭松龄反奉时缺乏战略眼光而太顾及眼前地盘利益所致。<sup>[65]</sup>

在郭松龄兵败被杀的1925年12月24日，国民一、二、三军联合进攻李景林取胜，并占领天津。次日，段祺瑞循冯玉祥之意任命孙岳为直隶督办，据说这引起国民一军内部不满，数日后冯玉祥通电下野，移居平地泉，拟赴苏联考察。<sup>[66]</sup>勃拉戈达托夫多次表述了对冯玉祥在部队面临奉、直夹攻而最吃紧时宣布脱离军队远赴苏联一点不理解，然冯或自有其算计，他认为“吴佩孚和张作霖是‘死敌’”，不可能有认真长久的合作；他显然希望这两个“死敌”面对面的接触会导致实际利益的冲突，从而爆发战斗，自己则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待其两败俱伤后再回来收拾残局。<sup>[67]</sup>这也不无所见，但当时奉直双方恐怕都已视冯为更可怕的敌人，<sup>[68]</sup>如果不是北伐这一新因素的迅速改变局势，直奉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多半只会爆发在冯部被基本“解决”之后。

对国民军尚有利的，是奉、直、晋三方内部也有类似国民军的自身困难，其相互配合显然不足。先是李景林由中立转而通电讨冯后，阎锡山即连电其驻汉口代表探询吴佩孚是否真与奉方结合，不久即得“津李、鲁张、汉吴、苏孙确已联络对付国民军”的确信。阎锡山于是提出，冯李既然开火，“玉帅非速动不可，否则张〔宗昌〕、李〔景林〕不支，更无办法”。但他很快发现吴佩孚其实指挥不动其名下的军队，尤其实际控制湖北的萧耀南与吴之间“感情日恶”，萧并不实际支持吴的对北作战。<sup>[69]</sup>不过，这一障碍因萧耀南在1926年2月中旬突然因病逝世而解决。

更直接的困难是已表示接受吴统辖的岳维峻在河南不动，盖当时欲谋豫督地位者众，在岳氏看来，“战之胜败，豫之地盘均非所有”，故不欲北上。“吴对岳极悲观，无办法。吴之鄂豫旧部以岳失信，欲以兵力压迫，吴不允”。<sup>[70]</sup>这一困难竟由国民军无意中代为解决：那段时间段祺瑞几次试图下野不成，执政府益受占据京津的国民军操纵；在萧耀南病逝后，吴佩孚任命了临时继承人，段则循冯意另任卢金山、刘佐龙为湖北军民两长，并正式下令卢、刘讨伐吴佩孚，命岳维峻等“督饬部队会同进剿”。<sup>[71]</sup>吴佩孚的部队“借道”河南北上不成，直接攻打岳维峻又显得正当性不足，此时反有直取河南的理由了。

在各方的夹击攻势下，国民军与直奉晋三方皆边打边谈，在作战的同时尝试与各方和平解决的联络始终不断，景象相当奇特。<sup>[72]</sup>1926年3月中旬王士珍等北洋大老提出和平息争主张（详后），冯部将领迅速在3月20日通电表示接受，愿意“将所部队伍撤回原防地，专力开发西北，不欲内争”。<sup>[73]</sup>国民军并于4月上旬在北京逐段祺瑞而释曹锟，希望获得吴佩孚谅解；直系内部也有主张容纳冯部的主张和实际的努力，但遭吴拒绝。此时军事上集中于消灭冯玉祥已成为直奉晋三方高层的共识，阎锡山连电吴佩孚，主张迅速合力灭冯，他说：“合肥既去，政治上不成问题。鄙见根本上歼敌计划，总应贯彻到底。极盼转电雨帅，迅电前方各军，戮力同心，灭此朝食。”在得到吴、张“所见相同、主张一致”的确讯后，阎一面指出“敌虽狡猾善变，必无幸存之理”，一面更强调“彻底灭敌，务绝根株”的必要性，希望吴佩孚“旌麾北上，就近指挥，于战胜攻克，收效尤大”。<sup>[74]</sup>

4月中旬，国民军被迫退出北京，但各军围剿国民军的战斗并未停息。稍后张学良到京，再次“向齐燮元陈述目前先急军事，政治后题”的方针。<sup>[75]</sup>5月17日，冯部将领又一次宣言表示愿意保境安民，努力开发西北。<sup>[76]</sup>次日却以晋军阻断其退路为由，分六路大举攻晋，占据了晋北大部分地区，至6月在雁门关一



带与晋军形成相持局面。<sup>[77]</sup>5月底至6月底，直奉双方分别罢免了各自内部倾向于联合国民军的靳云鹗和李景林，吴佩孚和张作霖于6月底在北京会晤，由吴佩孚亲自指挥南口一线直奉联军与国民军的决战。至8月底，国民军全线溃退，各军星散。<sup>[78]</sup>

就在国民军前途堪忧之时，北方不甚重视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却取得了超出多数人预料的迅速进展，结果不仅冯部未能彻底消灭，直奉集全力于北方战事的方针反成为战略上的败笔，确非先前所能逆料。<sup>[79]</sup>国民军充分利用了南军北伐的机会，在败退中尚能肃清甘肃，保存了再起的基础；尽管直奉夹击之下的国民军主力出陕使刘镇华复起占据陕西大部，国民军李云龙（字虎臣）、杨彪（字虎城）仍能固守西安，直到北伐开始后冯玉祥从苏俄返国，1926年9月誓师五原，新的国民联军逐渐重新据有陕甘。<sup>[80]</sup>

细核国民军1926年春夏各通电，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即其一再表示愿致力于“开发西北”。这意味着他们终于有了自己后退的“地盘”，并在此基础之上确立了他们的区域认同——当时的谈判和各方往来电报中，不仅国民军自身以“西北方面”自称，他方也多以“西北军”称之，报刊舆论亦然。在陕甘再起的冯部虽一度自称国民联军，不久且正式并入国民革命军，后来一般仍称其为“西北军”，就是其自身军人也如此。<sup>[81]</sup>

简言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因冯倒戈促成吴垮台后，段虽出山，皖系并未能再起，北洋中后起的奉系成为大主角；而原较边缘的西北各军也应运而出，一度颇能影响国是，阎锡山的晋军也在这段时间日益活跃。吴佩孚的复出未能挽救正崩解中的直系，此时中原争夺的主要角色是奉军（北伐后改称东北军）和国民军（形成中的西北军）。北伐后还能长期存在的北方军事力量正是东北军、西北军和阎锡山的晋军三部分，在北洋系统内可以说皆非正统。故北伐结束后所发生的情形其实早已形成势头，说此后十年的军事格局大体奠定于此时，或亦不为过。

### 3. 反赤旗帜下北方军政的整合尝试

在此混战期间，五卅后出现的“反赤”倾向一度给北洋体系提供了新的整合机会，在此旗帜下北方政治和军事皆曾有实际的整合尝试，但基本未能成功。尤其奉军利用五卅事件这一机会进驻上海，破坏各方原先达成的上海不驻兵的协议，凸显了奉方觊觎江南的野心，是江浙反奉战争的直接起因之一，也使北方在“反赤”旗帜下实行非武力整合的希望相当渺茫。不过，在政治活动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已渐成当时中国政治的一个倾向。杨荫杭在1922年就注意到，“近人滥用‘卖国’字，凡异己者，即以此头衔加之”；各派军阀所发文电在“攻击他党”时，便常指责对方“卖国”。<sup>[82]</sup>由此视角看，“反赤”至少是一个可资利用的政治口号。<sup>[83]</sup>

1925年12月4日，正与冯玉祥争夺京、津地区的军阀李景林通电讨冯，说冯“利用赤化邪说，以破坏纲常名教之大防”；其“助长赤化风潮，扰乱邦家；若不及时剿除，势将危及国本”。而李本人则“不为党争，不为利战”，持“人道主义”以“荷戈卫国”，以期“殄灭世界之公敌，而挽我五千年来纪纲名教之坠落”。<sup>[84]</sup>这里“赤化”与“纲常名教”的对立更多隐喻着中外矛盾，时服务于逊清朝廷的郑孝胥立刻注意到“此极好题目，惜吴佩孚不解出此”。<sup>[85]</sup>此后各军阀的通电中以“反赤”为其军事行动正名者便日见增多。

那时“反赤”舆论在北方也确有一定的威慑力，国民军就一方面努力从俄国获得武器弹药，一方面试图淡化其“赤色”。国民军第二军的岳维峻在1925年底对苏俄顾问斯卡洛夫说“很多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共产党人（？）[原文如此，盖表执笔者之疑问态度也]，这对工作是有害的，会使敌人借口同以我和冯为代表的‘赤色危险’做斗争来网罗反对派”。若说岳维峻本非国民党，身为国民党员的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也对俄国顾问说，我“不能让你们到部队中去，因为人们可能猜疑我这个直隶督军同情红党。你们是不是最好去北京？”他明言：“我们在思想上是朋友，但现在不是表露这一点的时候。”故孙岳也曾拒绝出席苏联驻天津领事的宴会，并对苏俄顾问利沃夫解释说“这是因为不想让敌人找到攻击我们亲近的借口”。<sup>[86]</sup>

有时“讨赤”似有助于反国民军各方的军事整合，据说直奉晋等各方5月10日在北京成立了“讨赤各军联合办事处”，各派驻一全权代表，以“谋军事上之统一，以期彻底的讨伐赤化”。<sup>[87]</sup>由于直奉双方基本认可先军事后政治的方针，故军事整合相对容易，而政治整合就困难得多了。先是段祺瑞政权因与国民军过于密切的联系而渐失直奉两方的拥戴（尽管本来也更多是名义上的），张作霖在1926年初已正式宣布不受命于执政府，实行东三省自治；<sup>[88]</sup>在段祺瑞在2月下令讨伐吴佩孚后，吴氏也于3月通电讨伐段祺瑞和冯玉祥。但真要达成政治解决，段祺瑞的政治地位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国民军自己驱段释曹，为各方的政治解决扫清了一个障碍。

在这样的思想环境和政治背景下，北洋元老王士珍等在3月中旬曾出面发起全国和平会议，倡导北洋内部息争，各军停战后退，划直隶、京兆、热河为缓冲区，各不驻兵。处于劣势的国民军一再表示接受，响应和平通电，但张作霖要求国民军还直隶、热河于奉，方可停兵。由于各方反应并不理想，国务总理贾德耀率阁员于3月25日再次通电主和。这一通电经王士珍等修改后发出，有意思的是内阁通电初拟递达者有冯玉祥而无吴佩孚，电文中并有“雨帅焕帅，国家柱石”等语。王士珍等认为冯已下野，不应列名，吴则应加入，遂改电文为“雨帅玉帅，国家柱石”；原电说“执政委托聘老诸公主持和议”，亦以免除“其他误会”为由删



去“执政委托”四字。<sup>[89]</sup>

一日之间的电文更易，最足见当时势力消长盈虚之瞬息万变。冯、吴的一退一进，直接反映出军事形势的异变。而贾德耀本出身皖系，王士珍等却有意要切断与段祺瑞执政府的关联；尤其贾氏不久前曾附署讨伐吴佩孚的通电，今忽又通电改称其为“国家柱石”，不仅贾氏个人甚感难堪，当时“内阁”之几无地位亦可见一斑。

王士珍等和平息争的主张终因各方实际利益冲突太甚而收效甚微，这批元老只是在国民军退出北京到新内阁成立期间起到了维持治安的作用。且“其他误会”也未能免除，段祺瑞的影响虽被删去，吴佩孚又猜测和议是出于冯玉祥的主张，以为“聘老言和，系受赤党所包围，非其自由主张”。<sup>[90]</sup>的确，在直奉晋三方联合讨冯之时提倡北方息争，当下的实际受益者首先是国民军，吴佩孚有此认知实不足怪（但这也可能只是他拒绝息争而不正面对抗王士珍等大老的推托之辞而已）。

直奉双方对政治问题也一直在讨论，但在“护宪”还是“护法”这一问题上的不妥协立场使政治解决的达成相当困难。<sup>[91]</sup>当时的政治情形相当复杂，直系主张“护宪”，即承认曹锟任总统时所颁布的“宪法”，然可以接受让曹退位，即所谓“旧法新选”；另有不少人主张以更早的“约法”为国家基本法（当然也就不承认“宪法”），是谓“护法”。两者都进而牵涉到已不存在的国会问题。<sup>[92]</sup>奉系先前曾“讨伐贿选”，现在若承认曹锟宪法，则与此前的行为有冲突，故张学良对阎锡山的代表“面称护法不护宪”，致后者得出“政局恐一时难有办法”的结论。<sup>[93]</sup>

昔日的老民党章太炎此时也颇致力于“恢复法统”，试图拥黎元洪复位；盖黎氏为武昌首义正宗，又是当选副总统，其复位后再据《约法》新选国会，最能体现“法统”之恢复。从这个角度言，太炎与不赞成“护宪”的奉系主张相对接近。他曾于1926年4月下旬函杨宇霆商拥黎事，杨复函支持，但不愿公开主张，仅欲“观成”。太炎以为即此也足，故觉“甚为满意”。<sup>[94]</sup>其实黎元洪能否重新出山正取决于究竟有无实力派的真正支持，在直系明确主张“护宪”之时，奉系虽主“护法”，其仅欲“观成”的态度显然不足以恢复黎元洪的地位，结果吴佩孚坚持的以颜惠庆内阁摄政获得成功。

颜内阁摄政虽然只是个过渡性的安排，仍表明直奉双方在政治上确实有所合作。在北京地区奉系军事实力远大于直系的形势下，奉系在政治方面对直系显然有所退让。若将南方发展中的变化计入长远考虑，北洋系统此时真能携手，其实对大家都有利。但那时北方尚少有人认真顾及南方军事格局的变化，他们的眼光仍多关注北方，且各方成见皆已较深而相互信任不足，其大致共同之处，即集中全力先消灭国民军。

章太炎反对颜内阁摄政而未果，其设想的由黎元洪任命一新国务总理在南方摄政也不为北方有实力者所接受，但他仍强调继续反赤的优先性，以为国内各事可于“南北二赤次第荡定”之后徐议之。<sup>[95]</sup>盖太炎以为，中外矛盾大于国内政争，“今日国内问题”，已不在什么护宪护法，“而在注意如何打倒赤化。护法倒段问题虽大，而以打倒赤化相较，则后者尤易[宜？]”引人注目。十余年来之战争，尚系内部之争；今兹之事，则已搀入外力。偶一不慎，即足断送国家主权，此与历次战争绝对不同。”<sup>[96]</sup>

到1926年4—5月间，章太炎与各类在野士绅组织起“反赤救国大联合”，要联合全国各界同志起来“共除国贼”。从“赤化”角度看，当时本存在所谓“南北二赤”，即北方的国民军和南方的国民党，后者“赤化”的程度远超过前者。当时直奉之反赤者地域意识甚强，更多瞩目于“北赤”；太炎与这些北方军人最不同之处即在于他将“南北二赤”共同看待，实际越来越更看重“南赤”上升中的力量。

或许预见到其“拥黎”的努力难以成功，太炎从1925年末就提出，处于“赤化时代”的中国大势“宜分而不宜合”，故“不如废置中央，暂各分立”，分别反赤。<sup>[97]</sup>他在1926年初解释“恢复法统”之义说，“吾所主者，不在去段一人，而在否认北京之政府”。自袁世凯以后，“国政听于骄帅之言”渐成北京政治常态，“所谓政府者，即近畿军阀之差遣”。本来“总统国会，法之所当有；而非法之总统国会，则法之所不许。故暂缺中央政府者，所以尊法，非违法毁法也”。只要大家都反赤，实行区域分治或者比有名无实的统一更有效率。<sup>[98]</sup>到1926年5月，太炎仍主张：“以事势观之，吴[佩孚]处果能退让无过，暂缺中央，任王士珍等维持治安，即所谓三分之局也。若南北二赤果尽解决，彼时或再有可议尔。”<sup>[99]</sup>

这样一种先解决“南北二赤”再及其余的主张与奉直双方先军事后政治的方针在思路上有接近之处，但许多实际掌军权者并未接受“先反赤后内争”这一次序，他们在落实“先军事”之时甚至可能藉“反赤”之名而争夺地盘。而且，即使各地分别“反赤”也需要较大规模的跨省跨派系军事行动，这与区域分治多少有些矛盾。随着“反赤”的重点逐渐从言论口号转向实际的行动，这些问题迅速凸显出来。到北伐军已占据江南、直逼北方后，奉直各方的关注才越来越转向南方，直到吴佩孚在湖北大败于北伐军，所有剩余的反赤力量才真正开始联合起来；但反赤方面联合的一个重要基础，倒未必是章太炎所期望的“以夏攘夷”，恐怕更多是中国国内的南北之分。<sup>[100]</sup>

简言之，1924—1926年间，北洋军阀体系的新陈代谢造成的权势更迭相当快速激烈，出现正统衰落、边缘兴起的趋势。类似趋向也体现在前述北洋体系演化的地缘分布之上，第二次直奉战争促成直系垮台，皖系也未能再起；北洋中原较边缘的西北各军和阎锡山的晋军应运而生，与后起的奉系和新兴的国民军成为大主角，北伐结束后仍长期存在，故后来的北方军事格局其实早已奠定。五卅后出现的“反赤”倾向一度给北洋体系提供了新的整合机会，在此旗帜下北方政治和军事皆曾有实际的整合尝试，但基本未能成功。

可以看出，第二次直奉战争是一个转折的关键。共产党人瞿秋白稍后即认为那次战争表现出军阀“开始

分化和崩溃”，而北方国民军的形成则是“中国军阀战争史中最重要的现象”。在“中国军阀之中，居然发现一派较与民众接近的武力——虽然他们不能直接算是国民的武力，然而他们在四围复杂的环境里，全国民众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要求里，不能不如此表示，始终可以说：即使不是民众武力的形成，至少也是军阀武力的崩溃；即使不是民众方面增加一部分武力，至少也是军阀方面减少一部分武力。”因此，“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较重要的关键”。<sup>[101]</sup>

前面说过，在北洋两大派系相持的均势下，各中小军阀虽不断转移其立场，却无伤大局（同理也适合于南北双方的均势）。冯玉祥和郭松龄的先后倒戈直接导致了北方均势的瓦解，到两极体系中一方优势明显时，居弱势的一方会在体系内外有意识地努力寻求（长期的或暂时的）同盟，以取得平衡或优势。同时，危迫的局势也可能促使居弱势的一方采取一些非常规的行动方式。惟政治规则即使在对付敌手时也不宜随意“突破”，只要开了先例，则对敌之方略也可能随时转而对自己。

南方固然曾试图在北洋体系中寻找可以联络的对象，北洋人也可能往南方寻求支援。在直系倒段祺瑞时，吴佩孚等已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南方军阀的力量，这就在北洋体系的内争中引入了外力，增加了北洋内斗的复杂性。后来直系占优势时，奉、皖两系也联络在南方开府的国民党孙中山系，同时吴也曾试图联合与孙对立的陈炯明。<sup>[102]</sup>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大规模杀伤毁掉了北洋体系的元气，此后新主政的段祺瑞和作霖不得不将国民党视为重要力量而加以联络，邀请孙中山北上谈合作，使当时所谓“三角同盟”进入实际运作层面。此时南北虽仍对立，但已互相援引利用，南北均势已逐渐是名义多于实际了。

在一定程度上，第二次直奉战争可以视为北洋军阀内部最后一次武力统一的尝试，而其后的“善后会议”及大约同时各种召开“国民会议”的要求则是南北双方各政治力量最后一次和平统一的努力。国民党1925年5月发表的《时局宣言》说：“总理既怀与人为善之诚，躬自北行，与之商决国事。倘使北京临时执政肯以诚意与本党合作，接受总理所提倡之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原则，本党敢信，不但中国之政治的统一早已实现，而国民革命进步，亦必以一日千里之势克底于成。”<sup>[103]</sup>孙中山的逝世可能是这次和平统一努力不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sup>[104]</sup>没有南方参加的善后会议本已大减其影响力，而会议始开，河南镇嵩军和国民军已经开战，自然很难再谈什么和平建国（于此益可见那时原较边缘的“西北”对大局的影响）。

两次统一努力的失败不仅促成北洋体系的崩散，也更使时人感觉到北洋政府统治合道性的丧失，故后来的北伐军在长江流域取得出人意料的大胜后，不少读书人便产生出“有道伐无道”的想法。<sup>[105]</sup>同时，北洋新陈代谢的结果和南北既对立又互相利用这一局面的出现，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北伐前夕的一般舆论所说的“北方”实与前已有较大的差异，而“南方”的变化或者还更大，至少是更明显。可以说，北伐前数年的“南北”双方都有些今非昔比。下面侧重考察这段时间湖南与广西的军事整合进程，借以分析南北攻守势易的关键性转变。

## 4. “教而后战”：北伐前夕的南方军事整合

由于这段时间北洋内争规模不断扩大，无暇顾及南方，国民党及其亲近的粤军乃能从容以新武力统一广东；李宗仁等新桂系以武力取代旧桂系控制广西后，两广新兴军事力量进而联合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适唐生智在湖南驱逐赵恒惕，虽未得全省也占有湘南，并与两广势力联合。结果，南方形成比原来集中得多的三个新兴政治军事集团，并造成一个国民政府治下相对统一的数省势力范围，与北方的四分五裂适成对照。

这一北分南合的趋势是后来北伐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南方”自身权势转移的结果。从地理视角看，民初北洋的对立面有一个从“西南”向“南方”转换的过程，这一应该说是显著的转变过去却不十分受人注意。若仔细考察，稍早的“西南”称谓实际地反映了其实力的构成，即以滇黔桂三省的军事力量为主（四川部分因为其与滇黔驻军的矛盾，稍后起者更多偏于北洋一边），而国民党所在的广东虽然也在“西南”集团之中，却不仅有互不统辖的各类粤军，还多为“西南”范围内各省失势军队的避难所（当然也就意味着广东地盘的进一步划分），实在只是所谓“西南”的外围而已。<sup>[106]</sup>

粤、桂、湘三省的军事整合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南”的军政格局，基本统一的两广和湘南都拥戴国民党的新领导核心，大致成为一体，并于1925年击退滇军的进犯，意味着“西南”之中的“西部”衰落而“东部”兴起。<sup>[107]</sup>最能追随时势的舆论之表述即明显可见在“西南”范围内由西向东移动，逐渐以“南方”代替“西南”来称谓北洋的对立面。更重要的是，南方军政集中的趋势提示出武装统一全国的可能性，对久乱思安定的中国社会颇具吸引力。适逢北洋政府表现出明显的“失道”现象，反衬出国民革命的合道性，遂为北伐的取胜打下了基础。

三省军事整合的一个共同倾向，即都由当地层次相对偏低而又较“新”的力量取代偏“旧”的既存上层势力。这里所谓“新旧”的一个明显特征，即带兵者是否受过新型军事教育。前述军队中排斥军校毕业生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北方，在南方的两广及湖南，保定军校及与之相关的所谓“四校”系统的毕业生在既存军事系统中不仅不易得到升迁，有时甚至找不到工作，即或找到也多非实际带兵的工作。<sup>[108]</sup>这样一种体制和实



际社会需求的疏离正是南北“旧军阀”系统的问题所在，也成为南方新军事力量得到整合的一个重要契机。

前述保定军校于1922年的风潮期间去广东的少数人中，即包括钱大均和黄奇翔，他们稍后都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重要将领，而黄埔军校许多教官也来自保定军校。湖南的唐生智、广西的黄绍竑和白崇禧也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另一广西主要军事首领李宗仁则是陆军小学堂毕业，他们的主要干部队伍即是在既存体系中受到排斥的“四校”系统毕业生。<sup>[109]</sup>可以说，南方军事整合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比北方更注重利用清季以来新型军事教育的成果，适应了民初作战方式日益“现代化”的实际需求。

孙中山很早就注意到保定军校的作用，1916年夏，孙中山在上海与任职滇军的革命党人李宗黄谈话，希望李氏将保定军校学生组织起来，由他们练成一支劲旅来推翻北洋军阀。李介绍说，清季开办的陆军小学、中学等军校的学生多文武兼资，且不少向往革命，入民国后更经保定军校系统培训，必堪大用，而北洋军阀则对军校生嫉视和排斥。孙乃提出可将陆军小学、中学和预备学校学生一并包括在内，于是李宗黄开始筹组“陆军四校同学会”，后于1918年2月在上海正式成立，然该会主要的发展却不在北方而在西南各省。<sup>[110]</sup>

在孙中山和段祺瑞、张作霖联合反对直系而有所谓“三角同盟”期间，段祺瑞派前保定军校校长曲同丰到广州联络，李宗黄在广州四校同学会（成立于1923年3月）举行的欢迎会上说，北洋政府以十一年的时间和大量人力财力，训练出六千余名军官，但由于北洋军阀对保定生不予重用甚至排斥，而孙中山却对他们信任关怀，结果这些学生泰半投向革命阵营，以与北洋军阀战，真是莫大的讽刺。<sup>[111]</sup>“泰半”或不必是准确数字，但保定生在北洋体系中少得重用而在南方新军队中却能迅速崛起这一基本事实大致不差，且李所指出的北洋斥资训练大量军官而自身不用，反为对手所用以与己战，虽带讽刺意味，的确有据可立。

苏俄顾问勃拉戈达托夫稍后即注意到保定军校毕业生在北伐军中的影响，他发现，“由于保定军校的关系，第四军同第七军互有来往。新建的第八军加入了这一派”。<sup>[112]</sup>鲍罗廷在1926年5月也承认，第四、第七和第八军是国民革命军中的“保定派”。<sup>[113]</sup>第四军主要是许崇智、李济深等指挥的建国粤军改编而成，据李宗黄观察，其“团以上的军官，几于无一不出身陆军四校”；第七军即“新桂系”部队，从军长、纵队司令以下，“所有的团、营、连长，一律全是四校同学”；而第八军则为湖南唐生智部，其军官也从上到下几乎全是四校同学。这些新兴军事力量皆非黄埔系统，是北伐的主力。其实黄埔军校不少教官即来自保定军校，且在黄埔系统的第一军中，也只有中下级干部才是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上级军官则“俱为四校出身”。<sup>[114]</sup>

这样，许多北洋体系的“弃才”却为南方各新兴军事力量所充分利用，北洋系统自身不甚重视的军事教育实际起到了为南方培训军事骨干的作用。不过，上述军校学生带领的南方新兴武装也大多是在与当地既存军事力量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广东的情形由于英、俄为代表的外国势力及各省“客籍”军队的卷入而呈现出特殊性，将另文专论，<sup>[115]</sup>下面仅简单考察湘、桂两省的军事整合进程。

1920年湘军在直系吴佩孚的默许下驱逐皖系张敬尧，实现所谓湖南自治。谭延闿短暂掌权后于年底被部下赵恒惕所迫出走，由赵接任湘军总司令，实际控制湖南直到1926年初，赵又被其部下唐生智逼走。两次权力转移的共同特点是最具军事实力的部下逼走上司而自己基本以和平方式接任。这样一种相对和平的权力转移大概因为20年代前期的湖南主要为湘人自治，省内各地则实行半独立的防区制，各镇守使在其防区内握有大权，省最高领导的易位对各防区实际控制的转换影响较小。<sup>[116]</sup>

这段时间湖南权势争夺情形比较复杂，其中当然包括参与者政治观念的差异；且湖南虽然“自治”，仍一直受到南北两大势力对峙格局的影响（湖南提倡“自治”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希望避免成为南北交锋的战场）；同时流亡在外的老革命将领程潜也不断纵横捭阖其间，遥控其所属派系参与竞争。可以说湖南省内的权力争夺主要在程潜、谭延闿和赵恒惕三派军人中进行，尤以曾同属一派的后二者势力较强，其间的斗争也更激烈。

当事人赵恒惕后来回忆说，“湘军分新旧两派：新派多为保定军校出身，水准较齐，知识亦较高”；“旧派则分子复杂，有湖南速成学堂、武备学堂卒业者，有学兵，亦有行伍出身者”。<sup>[117]</sup>此说大致不误。时任职湘军的保定军校毕业生李品仙也说军官分新旧两派，“高级的将领以旧派居多，拥谭就是这批人物；新派大部都是保定军校的学生，多数担任旅、团、营长”，都是拥赵的。盖赵恒惕为部下信赖，湘军军官多是“经他手里训练乳育起来，旅团长以下的干部大多数都是拥戴他的”。<sup>[118]</sup>

另一位任职湘军的保定军校毕业生龚浩的回忆稍不同，赵、李所说的“旧派”在他看来是“士官派，都是年纪较大的军人”；而新派又可细分为二：一是“保定派，都是保定学生”；一是“干部派，是广西干部学堂出身，赵恒惕的学生”。保定派和干部派联合拥赵，士官派及其他无所属的则拥谭。龚浩特别指出，保定派“当时已有十六个团长，此外都担任营连长等中级干部”，而拥谭派则“部下官佐素质较差”。<sup>[119]</sup>若不计细节的差异，当时湖南军官有新旧之分，且新派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主是大家的共识。

赵恒惕以为，当年“新派军官因程度较高，逐渐成湖南军政之重心”。1923年谭延闿受南方政府命由粤入湘，旧派谋拥谭重握政权，唐生智等新派中坚认为，“如以旧派军官为中心，拥谭出任省长，则新派军官必遭排除”。事实上“湖南历次之得以靖乱自保，多赖新派军官之效力，旧系军人实不足以言安定内部而御外侮也”。后两派终开战，是为“护宪战争”或“谭赵之战”，由于“新派军官之学识较胜于旧派”，战争以新派获胜结束，拥谭的鲁滌平等退出湖南撤到广东。<sup>[120]</sup>



此次战争后湘军重新整编，由二师扩为四师，唐生智升任第四师师长。赵恒惕似将其注意力集中于“省内的各项建设，主要在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在军事方面未曾继续“扩充部队，武器装备也没有什么增购”。但唐生智则不然，他先已在龚浩建议下联络全省十六位担任团长的保定同学，结拜兄弟，所有同谱兄弟家庭无论本省外省都由他接济，形成以唐为领袖的团体，“有举足轻重之势”。此时更致力于军队的训练和充实。整编后湘军各师均辖二旅，独唐生智的第四师辖三旅，“在兵力上比其他的师几乎多一倍”；其他三师各只有枪七八千枝，而唐部有枪一万多枝；再加上驻防衡阳，“防地广、财源足（军饷有廿多万，其他各区不过十几万）”，又尽量从各处添购武器，终“成为湖南最大的势力”。<sup>[121]</sup>

赵恒惕已指出新派军官“学识较胜于旧派”，而唐部军官更是“清一色保定同学”，并因此与保定前校长蒋方震（百里）结下长期的联系，蒋百里本认为“湖南是中国的普鲁士”，对唐生智也特别看重，因唐的关系而成为“湖南新力量的指导，大家奉之若神明”。实际上唐生智还真求助于神明，他“在军队中宣扬佛法作为精神教育，并令全体官兵一律入教”，尊奉顾和尚为师。长期任其参谋长的龚浩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唐信任顾，也是少读书之故。最初的动机，只想效法北方的基督将军冯玉祥，也来个佛教将军”，以巩固其对军队的控制。<sup>[122]</sup>

湖南地处南北之间，不仅北方的冯玉祥成为效法对象，南方的两广也成湖南模仿的榜样。为打破湖南的防区制，时任赵恒惕参谋长的龚浩“建议仿照广西办法，将军财统一”。赵表示只要唐生智赞成就可以办。于是龚浩找到唐，得其同意后召开会议，“决定军队核实点验，每师派一团到省城接受训练，并仿行广东革命军的办法，请刘文岛为政治部主任。税收方面，由省统一办理，第一个月各师由省发饷，第二个月起由省收税发”。<sup>[123]</sup>

龚浩本是唐的谋士，拟请来的刘文岛亦保定毕业生，曾受过唐的馈赠，后来更任唐生智驻广东代表；当时赵恒惕已有让位于唐的表示，若唐接位，这些“军财统一”的措施也对他控制全省有利，但赵唐之间的互不信任已较强，唐在会议之后又违反前言，两人之间的冲突乃无法避免。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即唐已和两广、特别是广西新政权有了较密切的接触。

先是赵恒惕派旅长叶琪于1925年冬访问广西，意在居粤之湘军程、谭两部，希望进则助广西攻广东，顺便消灭在粤湘军，退亦求广西在以后湘粤交战中保持中立。但此时广西已正式加入国民革命阵营，故一面以各种“新气象”予叶琪以深刻印象，一面四处散布叶琪是代表唐生智来商谈湘粤桂合作的消息，<sup>[124]</sup>并拉叶琪参加广西方面在梧州为国民政府代表汪精卫、谭延闿举行的欢迎会，最后叶还与谭一起访问广州。叶琪也是保定军校学生，此行本带有唐的书信，一些人大概也就弄假成真。其实在1926年2月中旬，唐生智自己也秘派代表至粤，与国民政府联络。不久唐正式电请广西方面在他进兵讨赵时派兵遥相呼应，并得到广西的允诺。<sup>[125]</sup>

赵恒惕外受南北压力（在双方对立日益明显的情形下湖南要保持“自治”并置身事外越来越困难），内为强势部下之“兵谏”所迫，乃于1926年3月初下令任命唐生智代省长；但长沙随即出现国民党推动的要求废除省宪、彻底改造湖南政局的市民游行。游行的举措提示着两广的新兴政治方式已传入湖南，也表明唐生智不接受“不彻底”的安排。<sup>[126]</sup>赵恒惕终不得不辞职出走，唐生智于三月中旬入主长沙。在下旬的军事会议上，唐生智逮捕二、三师师旅长等五人，杀其中三人，终导致湘军其他师的军事反弹。复因唐生智公开联合广东政府（3月25日两广代表白崇禧、陈铭枢已到长沙公开活动），反唐湘军得到吴佩孚的军事支持，唐生智在夹击下迅速败退，在广西援军的支持下才立足衡阳，保持其对湘南的控制直至北伐。<sup>[127]</sup>

当时广西全境已在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控制之下，李是广西陆小毕业，黄、白皆保定军校毕业，三人在旧桂系军队中仅至营连长级，不甚得志。后李、黄各带千余人的小部队起家，两次结合，其部军官以陆军四校同学为骨干，作战能力强，发展壮大较快。其势力兴起的转折点在1923年，先是黄绍竑部于1923年春与广东革命政府联络，受任为广西讨贼军，是年冬李宗仁部改称定桂军，两者名义上都以广西全境为目标，气魄上已非小区域割据之主。当年末，两军在驻防西江的粤军李济深部支持下消灭陆云高部，控制邻近广东的西江上游地区，成为沈鸿英和陆荣廷两大势力外的广西第三大力量。1924年春，陆荣廷和沈鸿英为争广西而战，李、黄、白等采取联沈倒陆的策略，乘陆、沈激战于桂林方向时一举占据南宁，不久肃清陆荣廷残部，正式组成统一的定桂讨贼联军，据地颇宽，在广西形成与沈鸿英对峙的局面。<sup>[128]</sup>

然而孙中山在北上与段祺瑞会谈前于1924年11月任命在粤桂军将领刘震寰为广西省长，令其率部返桂。李、黄、白等派胡宗铎赴广州向代元帅胡汉民表示强烈反对，黄绍竑也于11月到广州参加国民党，胡汉民乃以大元帅名义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督办、黄绍竑为会办、白崇禧为参谋长。实际上，广东客军林立的状况不仅使广州政府号令不行、名实不符，更是广东不能安宁的重要原因：滇、桂、湘等省主政的军人都因有该省失势军队在粤而觊觎广东，总思一举解决后患。刘震寰和杨希闵两部是击退陈炯明拥孙中山返回广州的主力，故与孙关系密切，但他们与少壮新领导的关系就相对疏远。胡汉民告诉胡宗铎，对刘震寰的任命“不过是名义而已。我们不让他去，你们不让他来，就行了”。而驻扎西江的粤军李济深部本是李、黄、白的后盾，刘虽有图桂之心，却不能越李部而过，于是一面联络沈鸿英，一面邀约云南唐继尧。

唐本有意出兵广东解决（征服或收服）当地滇军，更思在孙中山北上后控制大元帅府，遂决定进兵广东，曾数派代表与李、黄、白部联络“借道”之事，并许以厚报，未得同意。沈鸿英则于1925年初主动向

李、黄、白部发起进攻，反被后者于2月中旬攻占桂林。3月中孙中山逝世后，唐继尧通电就任广东政府副元帅，号称要到广州视事。先期入广西的滇军龙云部已于2月下旬不战而据有南宁。至4月下旬李、黄、白部基本肃清沈部，乃回师攻击龙云，经昆仑关激战后将南宁包围。此时滇军唐继虞部又逼近柳州，李、黄、白部主力转向柳州迎击，于6月4日在沙埔血战，击溃唐部主力。滇军兵力虽众，然两路不能结合，终被各个击破；到7月下旬滇军全部退出广西，至此广西全境为李、黄、白部所控制。

“新桂系”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以少胜多、屡破强敌而统一广西，出乎多数人的意料。广东方面此前除粤军李济深部对“新桂系”的军事行动一直予以实际支持外，大约并未十分认真对待这支力量。<sup>[129]</sup>广西统一后，湖南赵恒惕和贵州袁祖铭的代表迅速到达广西，广东也于1926年1月派出以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和谭延闿、甘乃光为首的高规格代表团到梧州“慰劳”，与“新桂系”领导人会谈。这次“梧州会议”外间传言甚多，各人所见不同，李宗仁等散布叶琪代表唐生智来谈合作的说法虽较成功，但在广东方面看来，这恰证实了“新桂系”倾向联省自治的印象（据说叶琪随汪、谭到广州后还因鼓吹联省自治与三民主义的共性而遭其保定同学邓演达面斥）。<sup>[130]</sup>

在叶琪和非国民党势力看来，这样的讲话应代表着湘粤桂三省合作的意向，而在邓演达等广州国民党人看来，这显然意味着不够革命的妥协倾向。的确，广西新当局在1925年曾专门派副官长吕竞存到北京联络段祺瑞，李宗仁也多次坚持要求“督办”的头衔，这都让广州的少壮国民党人感觉其与旧式军阀的接近。<sup>[131]</sup>但“新桂系”也确有其“新”，如叶琪对广西的群众运动便甚感新颖，尤其在群众大会上演讲获得热烈掌声和欢呼，使他颇受感动，体会到了什么是“革命运动”。<sup>[132]</sup>可知当时从“旧军阀”到激进的革命“新军人”之间有许多层次，在广东革命军人眼中仍偏“旧”的“新桂系”在湖南军人眼中已相当新奇了。

“新桂系”之“新”更多表现在军事方面，即各级军官以军校毕业生为主，注重军事训练和战术运用。这是他们与旧桂系最大的区别，也是广东方面一些人从很早起即对其另眼相看的重要原因。李、黄、白在广东的主要支持者是李济深部粤军，尤其是其中的保定等四校同学。<sup>[133]</sup>李宗黄说，白崇禧等最初到广州谒见孙中山，“从事前的联络，届期安排，一切都由四校同学会为之代办”。广西驻粤代表陈雄便是保定军校毕业生，也是广州四校同学会会员。<sup>[134]</sup>邓演达在黄绍竑部初下梧州时即向孙中山报告说，该部“虽原有基干仅千余人，而其干部均系学生为多，皆青年有志之士，自命为广西陆军正派，目沈鸿英、林廷俊〔俊廷〕等人直为土匪流氓而不肯与为伍”。<sup>[135]</sup>

这样的身份认同和强烈的“正邪之分”感觉固因其所接受的新型军事教育，也源自旧桂系对他们的排斥。正因此，“新桂系”在推进军队新陈代谢方面有着较强的主动感，他们还在与滇军作战时就多次致电广东国民党中央领导，要求以军事手段取缔在粤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并表示愿抽调军队入粤助战。后广州的杨、刘之役出乎意料的在数日内顺利解决，广西军队又协助广东以武力解决了由湘西转入广东的建国川军熊克武部，<sup>[136]</sup>并积极参与对粤南邓本殷和驻钦廉之桂军申葆藩之战，协助以少壮派为主的新广州政府确立对广东的全面控制。<sup>[137]</sup>

在此基础上，白崇禧和黄绍竑在1926年初先后到广州谈判，终于在3月中旬达成协议，正式对外公布了两广的统一，使刚刚获得对广东真正控制的广州国民政府管辖范围扩大到两个省。两广的统一与北方的混战适成鲜明对照，其实也是象征意义超过实质意义。广西方面成功地保持了军事、党务、政务的基本独立，但其希望与广东实行财政统一借以“沾光”的设想也被否决，同样不得不“自理”。后者使广西方面相当失望，因广西的天下基本是他们自己打下的，现在拱手“送”给中央，所得回报甚少。被任命为广西军务督办的李宗仁后来认为，迫使广西财政自理的先例使“国家法度全失”，此后经济丰裕的省份如湖南等在纳入国民政府治下时也循例要求自理，“闹出各省割据之局”，而始作俑者竟是中央政府自己！<sup>[138]</sup>

在各自都外临强敌的情形下，两广的统一对双方的自保都有明显的好处；从南北对峙的视角看，两广统一对外的象征性威慑作用尤其不可低估。不过，那时大概很少有人能预计到不久后国民政府北伐能迅速取胜，所以广州未必具有充分的中央政府心态，仍更多关注广东一省，而广西也并不完全服从和依赖其拥戴的中央。在正式参与国民革命的同时，广西方面也在努力与云南唐继尧修好，并联络自1926年春实际执政贵州的周西成，在湖南则“因唐方多是同学”而明确支持唐生智。<sup>[139]</sup>

尽管存在这样一些带分裂性的因素，两广和湘南的结成一体终意味着南方的军事新陈代谢告一段落，李宗仁、唐生智部先后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七、第八军，基本受国民政府节制。在广西和湖南的军事新陈代谢中，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主的军事领导人作用相当明显。随着各地新兴少壮军人的崛起，过去的“西南”色彩也基本褪去；广西已无旧桂系，有功劳势力大的在粤客军纷纷被灭，过去作用不大力量较弱者反得以保存。<sup>[140]</sup>此前的“西南”无论如何与北洋系统对立，其上层人物与北方仍有许多割不断的联系；新兴的“南方”少壮领袖与北洋较少瓜葛（两广尤少），南北军政联系远不如前，利于战而不利和。

## 5. “有道伐无道”的形成：南方的军事整合及南北攻守势易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出现了一个近代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即中央政府渐失驾驭力，而南北大小军阀已实际形成占地而治的割据局面。由于以北洋内斗为主的“军阀混战”久战而无确定胜者，武力统一在



北方已被表述为破产的“迷梦”。然而对久乱的中国来说，统一恰是代表着许多人愿望的广泛社会要求，已成为温和、保守与激进的社会各阶层和各政治流派一个相对共同的目标。对当时任何有意逐鹿中原的军政力量来说，是否提倡统一并证明其统一的能力意味着是否能适应全社会的时代要求，也影响着此后数年至许多年中国政治局势的演变。<sup>[141]</sup>

在一般人心目中，相对宁静安定的生活乃是一统局面下的题中应有之义，至少来自“兵”或“匪”方面的骚扰可以大大减轻。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就提出：“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为什么要和平？因为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乱，全国因连年战乱的缘故，学生不能求学，工业家渐渐减少了制造品的销路，商人不能安心做买卖，工人农民感受物价昂贵及失业的痛苦，兵士无故丧失了无数的性命，所以大家都要和平。为什么要统一？因为在军阀割据互争地盘互争雄长互相猜忌的现状之下，战乱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将军权统一政权统一，构成一个力量能够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然后国内和平才能够实现，所以大家都要统一。”<sup>[142]</sup>

随着以北洋为主的“军阀混战”进一步加剧，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民生被严重扰乱。胡政之在北伐开始后得出与中共几年前的见解非常接近的看法，他分析说，过去多年“虽乱而未甚，虽恶而可忍”，各行业之人尚能苟安。至内乱加剧，“商不能商，工不能工，农不能农；甚至官亦不能官，教亦不能教，于是全国各业之人虽欲偷生苟安。忘大义取小利而不可能”。结果“全社会之态度一变”，而“统一意识与全国意识兴矣”。<sup>[143]</sup>

中国传统向主“思不出其位”，但其前提是至少要有可以苟安于其位的社会条件。到天下大乱，则庶人要议政，匹夫有责于保天下，是思不出其位而不可能。这样一种因思出其位而产生的全国意识，乃是一种思变求变且极富能动性的焦虑思绪。其建设性的一面，是促进了全国性思想言说的形成，并寻求一种全国性的解决；其破坏性的一面，是对既存政权的否定性判断——即判定其已“失道”或失去了统治的正当性，这对于任何当局者都是不利的。

时人对怎样获致统一怀有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武人当政是造成民初社会混乱的原因之一，故文人多倡“弭兵”；但要想统一，历史上最常见也有效的方式正是使用武力，这又可能意味着武人当政的延续。一些读书人或仍主“弭兵”，而厌乱者已思能以任何方式统一之人。杨荫杭在1920年已提出，若能统一全国，军阀也可接受：“使段家将而有统一全国之武力，段家将亦未可厚非。”他进而分析说：“不战而能统一者，上也；战而后统一者，次也；既不能战，又不能和，而苟延残喘者，下也；既不能战，又欲强战，战线延长，民不聊生，又其下也。”<sup>[144]</sup>

对不少人来说，久乱之后，目的渐重于手段，统一是否以武力达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当时武力统一的主张在北方不得人心，更多是因为持此论者无此能力。力既不足，在此寻求全国性解决的思绪形成之时，北洋军阀恰失去了统一全国的信心。由于中枢的自毁，遂给处于边缘者造成了机会。如前所述，第二次直奉战争是北洋军阀内部最后一次武力统一的尝试，而其后的“善后会议”及大约同时各种召开“国民会议”的要求则是南北双方各政治力量最后一次和平统一的努力，两次统一努力的失败为此后的北伐预留了先机，主张且能够实行武力统一的新来者仍有尝试的余地 and 成功的机会。

在1925年的一系列“统一广东”战役之前，已较长时间开府广州的国民党实际上连“偏安”之局也未能充分实现。1923年底开始的国共合作引进了苏俄式的紧密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使中国整个政治运作状况发生了根本的革命性改变。改组后的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既定意识形态，又有接近苏俄模式的政党组织扮演动员民众及沟通军政、军民等因素的整合角色；新型政治带来的动员整合力量大大推动了国民革命军这一新型军事力量的形成，<sup>[145]</sup>再加上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新领导核心通过东征等一系列军事行动真正控制广东，南方三个新兴军政集团基本受国民政府节制，两广和湘南的结成一体也提示了以武力实现全国统一的可能性。

实际上，国民革命的一个主要感召力未必像以前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在其反帝的一面，而恰在其强调统一，并以军事胜利证明其具有统一的能力。<sup>[146]</sup>不过，尽管国民党已成为当时唯一一个既有统一愿望又有相当实力的政治军事力量，其长期居于边陲毕竟使其在一般认知中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此前使用的大元帅名号也表明其本非“正统”。1925年成立的国民政府虽然可能有着某些权宜之计的考虑（比如可以借此断绝唐继尧以副元帅身份入主广东的正当性），到底表现出其自信心的增强，敢于以中央政府自命，凸显了国民革命事业的全国性，但国民政府足以统治全国的合道性仍需建立。

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愿望，国民党在1925年5月发表《时局宣言》指出：“军阀之大者，把持中央政柄，藉统一之名义以迷惑国人；军阀之小者，割据地方，藉联省自治之名义迷惑国人。”稍后的《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就职宣言》又说，“中国军阀，凭藉帝国主义之后援，割据自雄；或揭武力统一之名，或标联省自治之号”。<sup>[147]</sup>可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充分认识到“武力统一”和“联省自治”都是能够“迷惑国人”的口号，由于北伐实质上仍是一种“武力统一”，广东当局既要针对带有“西南”特色的“联省自治”，又要区别于北方的“武力统一”，故特别致力于树立其“革命”的合道性。<sup>[148]</sup>

北伐出师前，国民党“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说：“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人民的统一政府。”<sup>[149]</sup>蒋介石也强调，中国统一，“除了中国国民党以外，也再无别个团体可以胜任”，因为只有国民党是有“主义”的团体。<sup>[150]</sup>他稍后



就任总司令时进而说，“曩昔革命之失败，皆由于我军人不知革命之需要，不明战争之目的，不求牺牲之代价，尤不知主义为救亡唯一之生路，迷信武力为统一中国之张本，受军阀至微薄之豢养，而甘为帝国主义者效死命”。如今“国民革命以主义为依归，绝不同于军阀武力统一之梦想”。<sup>[151]</sup>

同样是“武力统一”，有“主义”的一方便既正确也能够胜任，“主义”的功用真是神奇。从实用层面看，民初的中国社会，因政治鼎革造成整体性的制度转换，加上传统的崩坏，一统的意识形态不复存在，结果是各种新兴的“主义”起而填补思想领域的空白，并出现各类西方主义以中国为战场的现象。<sup>[152]</sup>当年比较成功的军阀，多少也有些“主义”用以整合其部队。与思想界多采西方观念不同，军阀中除冯玉祥以基督教统一部属外，吴佩孚是以关羽、岳飞精神号召全军，唐生智则有“佛化”的军队，到北伐时还曾临时出现孙传芳军系的“三爱主义”和奉鲁军系的“四民主义”。<sup>[153]</sup>后两种“主义”显然是模仿三民主义，提示出国民党运用“主义”的成功。

这的确是那时南北双方治军方略不同之所在，1924年初伍朝枢代表孙中山访奉时，曾问担任接待的何柱国：“你们奉军的官兵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何答曰否。伍乃“用一种异乎寻常的目光盯住”何追问，“官兵不知道为什么去死，怎么会打仗呢？”何回答说，“我们奉军讲的是爱国，有的是义气”，一样能打仗。张学良知道后，“满不在乎的说，‘他们自然有他们的一套，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套，各不相干’”。<sup>[154]</sup>各有各的“一套”是个很形象的说法，但后来北伐时北方试图学习南方的现象说明国民党那“一套”似更起作用。

蒋介石就认为，“军阀有必败之道，致败的原因甚多，最大的，就是他们内部自相冲突”。这都是“因为无主义做中心，一切都以自己利害作主体。所以无论军队，无论什么，都须有主义、讲主义”。<sup>[155]</sup>除了“主义”的有无，南北军队另一个明显区别就是南方有仿苏式的国民党组织，这一新因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南方的政治复杂化，同时对整合军队也起了较大作用。蒋稍后解释“为什么要有党”说：“党是有主义的，运用主义的。没有主义，固然没有党；没有党，也不能运用主义。”<sup>[156]</sup>党的存在，有助于消弭当年南北皆存的文武之间的紧张和疏离，起到整合文武双方的功用，促进了南方的军政结合，使北伐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军事政治并行的军队。<sup>[157]</sup>

不过，主义、政党一类新因素的效力当时还在证明的过程中，国民革命的“合道性”很大程度上毋宁是由北洋方面的“失道”所反衬而成。伴随着北洋体系老成凋谢和未受或少受教育及职业军事训练的一批新军阀兴起的，是其行为准则的转变。特别是张宗昌、张作霖等一反北洋对文人忍让的旧则，随意捕杀记者、学生，严重损毁了北洋政府的统治基础。<sup>[158]</sup>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926年3月的“三一八惨案”，不论此事究竟该由哪一部分军警负责及其负有多大的直接和间接责任，<sup>[159]</sup>若将其与稍后4月间《京报》被封、名记者邵飘萍被负责治安的奉军杀害联系起来共观，便体现着某种类似而连续的行为模式。

学生运动是民国的新事物，中央政府以这样的方式杀学生前所未见，连江南的北军孙传芳也认为政府应为此负责。他和陈陶遗联名通电说：“政府早日既疏于化导，临时又过于张皇，枪杀多命，演成惨剧。谁无子弟，能不痛心！”且“年来政府对于学界举动，禁纵无常：利用则借为前卫，反对则视同大敌”。这是相当敏锐的观察，日益热心政治的“学界”当时已成为一股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和政治势力，连中央政府有时也试图“利用”而使“是非淆乱”，故“邪说异端，相因而至”；这一次就是因为“兵争不戢，驯至与学子为仇”。孙、陈希望“当局诸公，早知改图。平时教督防护，当负相当之责任；对于此次主使及行凶两方，必须实行公平之惩罚，勿徒以一纸空文，涂饰耳目”。若处置不当，则可能导致“上下乖离，祸至无日”的结果。<sup>[161]</sup>

孙氏等对学生运动的“主使”一方也主张实行惩罚，多少还站在北洋体系的立场上。他们对政府的批评虽已相当严厉，毕竟仍承认既存中央政府的地位。梁启超则认为，“这次惨案显然是卫队得在上的指使惨杀无辜的青年”，故必须“赶速督成严密的法律的制裁；上自居最高位的头儿，下至杀人的屠夫，一概不予幸免”。<sup>[162]</sup>这已露出否认执政府之意了。上海商界表述得更直接，其致全国公电明言：“自段氏窃据首都，述其所为，对外则一味奉承，对内则动辄压迫；今竟听令卫队惨杀爱国运动者至百余人之多，如此媚外残民，罪恶滔天，实全国之公敌，亦法律所不容。除即应驱令下野外，我全国人民宜急起监视其行动，或设法拘禁，以待国民会议之公判。”<sup>[163]</sup>

梁启超与上海商界的表述虽稍异，其观念大致相类，即基本否定执政的段祺瑞，然尚大致承认民国这一法统。北京国家主义派的立场则更进一步，他们认为，过去的“军事协约、参战借款、唆使和利用国奉的战争等等事件”已证明，“段祺瑞和他的爪牙媚外卖国，残民以逞”。此次更“穷凶极恶，用枪炮大刀将无辜民众杀死了这样多，这种样人不但是一毫无法律，简直是毫无天良！”该派明确宣布：“我们不去希望法律式的制裁——固然被难的家属们仅[尽?]可以去告状——因为法律对于军阀早已失了效力；并且法律式的解决使生出效果，也不痛快。”<sup>[164]</sup>

此次事件本因外国军舰封锁大沽口而起，孙传芳和陈陶遗已注意到“外侮”与“内争”的关联，他们就认为这次“外侮之来，亦由内争所召”。<sup>[165]</sup>重要的是这使一些人将此次惨案与不久前的五卅事件相比，结果更凸显出北京政府的失道。梁启超评论说，“试想去年五卅的血案还是现鲜鲜的放着，那时我们全国人民怎样一致的呼吁反抗，我们也取得国际间一部分真挚的同情。谁知紧接着英国人的残杀行为，我们自家的政府演出这样更荒唐的惨剧！这正当各国调查法权的时候，我们这国家此后还有什么威信可讲，什么脸面见

人？”<sup>[166]</sup>

北京国家主义派更认为，这样的人在中国当执政，“不但是国家之羞，而且是人类之耻”；必除掉以“为国家人类雪了羞耻”。<sup>[167]</sup>当时正被国家主义派攻击的中共，其见解也非常相近，中共告全国民众说，“爱国同胞死于帝国主义者之手，已足使人愤不欲生；今爱国同胞为爱国示威而死于自称中国执政之手，全国民众又将何如？段祺瑞早已不是中国人民的执政，现在又变成彰明较著的卖国凶犯”，这样“杀人的卖国凶犯”当然应该讨伐。<sup>[168]</sup>

爱国者死于本国政府之手，且其惨烈更甚于帝国主义，这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年代对北洋统治合法性的打击实在太太。梁启超等还希望依靠既存体系的法律制裁，国家主义派和共产党在许多问题上立场对立，却皆得出以革命的方式推翻现政权的结论。这两个政治团体在当时都没有足以将造反落实到行动上的军事力量，结果这一局势最有利于正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后者不仅有自己的军队，且已取得区域性的政治控制。

北洋政权的“失道”行为从反面衬托出国民革命的合道性，使北伐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汤武“革命”那种“有道伐无道”的意味。当年一些知识精英的态度颇能提示出国民党在几年间从政治边缘走向中心的进程。任职清华的张彭春在1925年分享着社会对“统一权力”的期盼，他对“国家到这步田地，没有创造的、中国的、可以统一全国精神的方略和领袖人物出现”甚为感叹，认为“无论什么能统一的权力总比没有好。社会这样不安宁，什么实业、教育都不能发展”。到当年11月张氏已发现“北京国民党得势”，这大概与冯玉祥对北京政局的影响相关；不久他进而感到“共产主义快到临头，必须研究它了”，于是“专看俄国革命书”。<sup>[169]</sup>

张彭春或因当时国民军利用郭松龄反奉攻占天津而感觉共产主义将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方“反赤”的部分“成功”——即学界中有人已接受冯部“赤化”的宣传），故预为适应“新朝”做准备。但国民军之得势带有回光返照的意味，其很快就败退西北，倒是更加“赤化”的南方国民党愈来愈显现出“得道”的趋势。倾向自由主义的胡适在1922年尚与人共同表示“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用武力做到的”，他后来却承认：“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sup>[170]</sup>胡适自己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那时对“新俄”和国民革命的积极赞许恐怕还超过一般读书人。<sup>[171]</sup>

对相当数量的新老知识精英来说，20世纪20年代实未出现一个足以使其从内心折服的政治力量。他们此时的心态，大约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来形容。据沈刚伯回忆，胡适1926年秋在英国大说国民党的好话，即因为他本人虽“反对武力革命同一党专政，但是革命既爆发，便只有助其早日完成，才能减少战争，从事建设。目前中国所急需的是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有现代知识。只要他们真能实行三民主义，便可有利于国，一般知识分子是应该加以支持的”。<sup>[172]</sup>

最初反对后又转而支持北伐的共产党人陈独秀也分享着类似心态，他认为，“与民众合作的军事势力，即不幸也形成军事独裁的局面，他们的军事独裁比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总要开明一些”。陈氏知道开明的军事独裁“至多只能造成统一的中国”，而“不能造成民主的中国”；但一个由武力统一的中国至少可以结束战乱的局面，为一个“民主的中国”打下基础。<sup>[173]</sup>

简言之，中国当时政治局势的错综复杂有增无减，实处分裂的南北双方虽皆主张南北应统一，其实自身也很难统一。当时的情形是谁能先统一内部，始可言统一全国。苏共中央考察中国状况的布勃诺夫使团总结其对中国的观察说，北方（包括华中）和南方“存在着两种基本上不同的政治局势”：南方“已经度过了某些中国军阀（军事买办）连绵不断的武装冲突时期”，日益强化的国民政府在发生作用；而北方的情形正“与此相反”，那里作为“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仍接连不断”。<sup>[174]</sup>这一观察基本看到了北分南合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两广和湘南的结合已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数省势力范围，而其政府的领导作用也强过北方。

当然，这在那时主要是指发展倾向而言，即南方比过去呈现出更集中的态势，而北方则明显较前更趋于分裂。其实北方也不乏“集中”的因素。从表面看，北方也形成了各辖有数省地盘的几大势力集团，且各自的兵力多胜过整合后的南方全部；然奉系甫经郭松龄反叛的打击，直系吴佩孚虽受拥戴而号令难行，新兴的孙传芳部看起来最具朝气，唯其外来征服者的“暴发户”意味太明显，辖区内的地方军队与其貌合神离，后来成为致其败落的重要因素。<sup>[175]</sup>

重要的是，北方此时仍具有中央政府的名号，理论上正应号令行于天下，若号令不行则罅漏立显；而南方虽也自诩正统（许多受国民党影响的史学论述实际也如此叙说），时人一般仍多视其为“造反”者，地位完全不同，其整合的成功处反易为人所见。也就是说，国民革命的合道性部分是由北洋政府的失道“反证”出来的。其实南方的军事政治整合虽皆取得一定成效，仍尚不足以结合成一个相对稳固的整体，其内部也不免矛盾重重。在一定程度上，广东政府鼓吹甚力的北伐也是一种解决内部矛盾的权宜之计。军事力量方面的北强南弱是当时南北多数人的共识，广东方面恐怕很少有人真以为近期即可统一全国。<sup>[176]</sup>对那时国民革命阵营各方面言，北伐本身有着颇不相同的意义。

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分析说，对蒋介石而言，北伐有利于其大权独揽；而“广东的政治工作也都是由其余所有人以准备进行北伐的这场革命进攻战的名义进行的；我们在邻近省份的组织也都在等待广州军队的到来，要反对这种情绪将是极其困难的”。在广州，不同的人围绕着北伐都有着自己的打算：“右派希望蒋介石率领军队北上，部分左派和部分共产党人鉴于有必要对群众进行革命的动员，幻想把恢复原来局面的

希望同战争联系起来。蒋介石则指望利用这场战争把反对派将领派到华北去和筹集资金。”中共中央对北伐的“态度一度摇摆不定”，直到派往广州调查中山舰事件的使团6月返回，其“总的情绪又主张进行北伐，认为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的唯一出路”。<sup>[177]</sup>

以北伐求生存本是广东革命根据地一个长期存在的思路，孙中山1924年北伐的主要考虑即是“在粤有三死因”，故不得不“舍去一切，另谋生路。现有之生路，即以北伐为最善”。<sup>[178]</sup>中共中央1926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上，即主张广东政府“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动势力所包围而陷落”。<sup>[179]</sup>蒋介石自己在许多年后也回顾说，当时俄共谋夺在广州的政权，“所以我们必须突破这限于广东一隅的危局，实行出师北伐”。<sup>[180]</sup>双方所认知的在广州的危险虽迥异（一为“反动势力”一为“俄共”），其以北伐求生存的思路则相同。且其忧虑的重点，都在革命阵营自身。<sup>[181]</sup>故北伐的发动，实亦有不得不为的苦衷。

在国民党对外宣传中，北伐是以统一全国为号召的，然而所有上述具体思虑没有一种与“统一”相关，很能体现北伐对许多人来说的确是一种解决内部矛盾的权宜之计；但这一权宜之计能够提出并付诸实践，正由于国民党尚存统一全国的愿望。后来北伐渐得人心，在很大程度上即因国民党长期坚持对武装统一的正面提倡，适应了久乱思安定的社会需求，并以军事胜利提示了实现全国统一的可能。北洋已消极，而国民党正积极（皆相对而言）；北洋的失道，更使国民党的北伐不再是地方对抗中央，反成为有道伐无道。攻守之势既易，北伐胜利的基础已经奠定了。

原刊《史林》2003年1期、《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5期



# 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广州政权在不长的时期内进行了带根本性的权力重组。在围绕确立新领导中心的权势竞争中，苏俄因素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却不仅因其对中共所谓“国民党左派”<sup>[182]</sup>的支持和操控，同时更体现在其与近在咫尺的香港之英帝国主义的国际竞争（包括意识形态的和国家利益的对立）；当时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在广东权势竞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仍有不少超出国共之争和国民党左右派之争的因素需要考察，地方意识就是一个时常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关键因素。<sup>[183]</sup>而英俄国际竞争与广东地方意识在国民革命事业中已纠结在一起，对当时权力争夺影响甚大，本文试从两者互动的视角出发，分析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

## 1. 引言：从狭义到广义的土客矛盾

1925年7月，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分析当时的局势说，全国整体上有南北之分，在南方有革命军与反革命军阀之分，在广东内部还有真革命军和假革命军之分。帝国主义惯用其买中国人打中国人之策，当时已“愈用愈精了，不但是他们买北军来打南军，买反革命的军阀来打革命军，还要买假革命军的军队，来打真革命军”。<sup>[184]</sup>从国民党立场言，这一分析对各种力量的划分可以说相当清晰，但有一重要的遗漏，即回避了（也可能是正式演讲中不便言及）广东当时非常明显的土客矛盾，长期以来各种不同类型的“客籍”因素聚集于这一革命基地，造成了广东局势特殊的复杂之处。

当时广东不仅有互不统辖的各类粤军，还多为“西南”各省失势军队的避难所。陈训正描述广东“客军”林立的状况说：那里不仅有正宗的革命党，“凡富有革命性或革命领袖有渊源之军队，亦相率而来此土；甚至假革命反革命之部队，亦冀暂图生存，徐谋发展，揭革命之旗帜而来，混迹其间。以故同一区域，同一革命队伍，乃竟有粤军、湘军、滇军、桂军及鄂军、豫军等等不同之旗帜”。<sup>[185]</sup>这一概括已相当形象，实际情形还更复杂，在这些以地域命名的客军中，来自同一地域者也常有不同系统不相统辖的军队，如驻粤湘军便有程潜系和谭延闿系两部，皆各立一军。

“客军”林立不仅使广州政府号令不行、名实不符，更是广东不能安宁的重要原因：滇、桂、湘等省主政的军人都因有该省失势军队在粤而觊觎广东，总思一举解决后患。<sup>[186]</sup>同时这一状况也意味着广东有限地盘的进一步划分，蒋介石在1924年即看出，“今日驻粤客军，日谋抵制主军，以延长其生命，跋扈之势已成”。对此“如不谋所以消弭之道，未有不可为吾党制命伤者”。故粤局“不患在外敌之强，而患在内部之杂”；国民党“不患在对外之难，而患在治内之艰”。他那时向孙中山提出的对策即“姑不必就全国着想，而当为粤局急筹补救之方”。<sup>[187]</sup>

困难的是这些“客军”都打着“革命”的旗号，致使蒋介石早在1923年8月已认为，中国革命“不能藉今日南方之革命军为主力军”，因为这些军队“囿于一城，已成为地方军队，不惟无革命之精神，而且借革命名义以谋其私人之权利。流弊至极，其障碍革命之为害，实甚于北方军阀之抵抗吾革命”。<sup>[188]</sup>孙中山也分享着既存“革命军”不可靠的观念，他稍后说：中国革命十多年不能成功，就是因为“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尽管“现在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并不少，他却“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在苏俄顾问的提议和资助下，孙中山决心通过黄埔军校的开办来创立国民党自己的武装。<sup>[189]</sup>

包括联俄在内的国民党改组（1923—1924年）使其成员组成和领导核心发生较大的改变，国民党第一次在中央委员会里设置了青年部，凸显了对知识青年的重视，在接受共产党集体加入的同时成功地吸收了大量边缘知识分子，<sup>[190]</sup>黄埔军校的学员和学兵主要即由这些人组成。边缘知识青年从全国各地涌入广东这一革命基地固然增强了国民党的全国性，也使前述广东“客籍”成分林立的状况进一步复杂化，以黄埔校军为基础的国民党党军实际也是一种地域色彩不明显的新型“客军”（详后）。

那时广东还存在着更具广义的客籍成分：毗邻的香港在经济上与广东已渐成一体，然港英当局又提示着帝国主义的具体威胁；苏俄的顾问和援助带来明显的“世界革命”意味，也是外国势力在广东的直接体现。1925年的五卅事件和6月沙基惨案影响了广州的政局，外患的深化增强了“一致对外”的必要性，要求国民党的权势竞争尽快达成一个结果；<sup>[191]</sup>两次事件促成的民族主义情绪显然有助于国民党权力斗争中偏于激进的一派掌权——反帝的要求愈迫切，苏俄援助的重要性就愈得到凸显。<sup>[192]</sup>

这么多饱含冲突对立的外国和外省的新老因素聚集于广东一隅并相互纠缠争夺，使广东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他人之战场，凸显出外来者的“客籍”共性；同时这些外来因素又与原处竞争中的各类新旧本土因素

（粤军派系的复杂不亚于各类客军，历次讨伐“反叛”粤军时多有另一部粤军参加）产生了矛盾。鲍罗廷就注意到粤籍军政人物中一个长期流行的观点，即“广东人的广东”。孙中山和陈炯明的一个主要矛盾即孙始终考虑全国问题，而陈则侧重广东一地，主张先把广东建成模范省，然后再考虑其他地区。<sup>[193]</sup>当时正是各省“自治”主张流行的时代，<sup>[194]</sup>广东人的地方意识决不弱于他省。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各类“土客矛盾”既曾为国民党所利用，也成为其树立中央政府权威的障碍，更是考察当年广东军政格局演变的一个切入点。

## 2. 1925年广东军事的新陈代谢

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大半年中，广州的新政权一直致力于努力巩固其对广东的控制，广东权势演变的大趋势即以国民党和黄埔军为核心的新型“客籍”势力击溃相对偏旧的“客军”和本土军，用蒋介石的词汇表述就是“真革命军”打垮了“反革命军”和“假革命军”。这一控制的取得通过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包括两次东征陈炯明、肃清杨刘等客军、驱逐熊克武军、南征邓本殷和收缴改编梁鸿楷等部粤军。

在过去明显受国民党意识形态影响的历史叙述中，这些作战都是以“革命”讨伐“反革命”为基调的；其实从陈炯明到刘震寰、熊克武等，皆从同盟会时代就参加“革命”，杨希闵也从“二次革命”时便进入革命阵营，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其革命资格并不算浅。这些“反革命”或“假革命”力量虽不时与北洋方面联络，然在外间特别是北方人看来，恐怕还是“革命”的一面偏多。杨、刘等以客军身份驻扎广东，时常不免因资格老、势力大而以客凌主，且其治军方式偏旧，故若将东征、杨刘事件、驱逐熊克武、讨伐邓本殷等一系列作战合观，其一个共相便是以军校学生为核心的新兴军队以武力取代旧式军队，或也可视为南方革命阵营自身的军事新陈代谢。

1924年底孙中山北上后，陈炯明有意重返广州夺权，广州大元帅府决定主动实施东征。作战开始前孙中山尚在世，杨希闵素得孙信任，其所部滇军实力也最强，被任命为联军总司令，担任左路进攻，桂军刘震寰担任中路，而许崇智部粤军和黄埔校军为右路军。因左、中两路并不积极，实际作战主要在右路进行。出乎多数时人预料的是，小规模黄埔校军（仅两教导团及学生队约三千人）和部分粤军竟能大破陈炯明军主力。从1月下旬到3月下旬，右路军连连连捷，基本控制了东江地区。<sup>[195]</sup>蒋介石被任命为潮汕督办，是为国民党中央真正“染指”的第一块“地盘”。黄埔校军也正式扩编为国民党“党军”第一旅，何应钦升任旅长。<sup>[196]</sup>

杨希闵和刘震寰长期以来对陈炯明部采取的是养虎自重策略，故多次参与讨陈而屡不积极。然而这一策略的要点是“虎”的存在，一旦陈部受重创而虎威不再，则杨、刘本身的存在价值也就锐减。东征初胜，以黄埔校军和粤军结合的右翼东征军声威大震，适孙中山弃世而“三角同盟”废，继任的国民党新军政领袖不仅与北方的军政联系剧减，其与驻粤客军的关联也相对疏远，乃挟战胜之威，回师攻击杨、刘。后者本是1922年击退陈炯明拥孙中山返回广东的主力，孙若在世或不致决裂；反过来，杨、刘自恃功高势强，孙在世时已呈尾大不掉之相，对孙之继任者更不放在眼里。其东征之役采取引而不发之势，已是无视大元帅府之举；更重要的是在云南唐继尧表明入粤夺权之意后，刘震寰公开表示了对唐的支持，希望能借此返桂掌权。<sup>[197]</sup>

本来杨、刘对唐继尧入粤夺权态度不同，杨希闵是滇军顾品珍的部下，原与唐继尧对立，且解决杨部恐怕还是滇唐入粤的重要动机。然而在国民党内部却始终担心杨部会与刘震寰部一起在广州以政变方式夺权，然后配合唐继尧（以副元帅身份）统治广东，对杨、刘有着整体的不信任。本可分而对付甚至使杨、刘对立的局势却未加利用，也表明国民党新领导群在东征初胜后自信上升。在4月底的讨论中，蒋介石和廖仲恺都主张与唐继尧妥协，让其入主广州，而将革命根据地东迁至粤东，以巩固新获得的地盘（蒋明确指出让已得地盘的将领离开防地去打一次无希望的仗非常困难），并向闽南发展。待唐继尧与留驻广州一带其余客军和粤军发生内讧时，再回来收复广州。但鲍罗廷反对这一计划，主张在唐继尧逼近广东前倾全力击溃在粤之滇桂军。蒋、廖被说服后，许崇智又反对，仍主向福建发展。但鲍罗廷的意见最后获得通过，并确定了此役由蒋介石指挥。<sup>[198]</sup>

正像杨、刘讨陈不积极而丧失其地位一样，许崇智对讨伐杨、刘的消极态度成为其后来失去军事指挥权的重要潜因——蒋败自然无话可说，许既得地盘也保留了与各方斡旋的余地；若蒋胜则功勋与声誉俱增，局势就将完全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所有各方皆预计唐继尧会轻易消灭广西军队并迅速抵达广州。可知新桂系击败滇唐大军是整个南方局势至关重要的大逆转，它决定了北洋的对立面由“西南”向“南方”的地域转变，促进了广东新兴力量解决杨、刘的决心并确保其在没有外敌威胁的形势下完成。到5月初，范石生发回的电报表明广西军事形势的发展与所有人预料的相反，新桂系正取得胜利。在唐继尧的威胁不复存在后，苏俄顾问及其支持者提出肃清客军以扩大地盘、增加税收、实现广东人统一广东的口号，以区域意识和物质利益为讨伐杨、刘的驱动力。<sup>[199]</sup>

6月初开始的讨伐杨、刘之役顺利得出人意料，实际战斗不及十天就以大元帅府方面的完胜结束。<sup>[200]</sup>杨、刘两部本身未必行动一致应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地方意识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黄埔校军的宋希濂观察到，广州市民久受客军盘剥，闻其败而奋起，“多有持铁棒、菜刀、扁担等为武器，将其击毙，为数颇多”。身逢其事的滇军将领李宗黄更形象地描述说，广州市民因“近几年了受够了客军盘踞欺凌压榨的恶气，一旦有了可乘之机，无不怒眉横目……揭竿而起，但知泄忿雪耻，见到了戴红边军帽的滇军是一拥而上，挥刀猛砍，甚而至于用牙齿一口口咬死人”。<sup>[201]</sup>

杨、刘的覆灭使广东军政局势发生根本的改变，党军利用杨、刘溃散后的兵员军械，一举由一旅扩编为两个师。有此基础，大元帅府随即要求统一广东民、财两权（即要各军交出其所控制的地方行政权和财权），并正式决定成立掌管全国政务的国民政府、废除地方军称号而改组为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于7月1日正式成立，得到苏俄顾问支持的汪精卫担任主席，对讨伐杨、刘不积极的代元师胡汉民退居外交



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然已失去实际统兵权。数日后成立了由八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仍是汪精卫。<sup>[202]</sup>以具有正式国家政府名义的国民政府取代临时性的大元帅府当然有其长远的建设性意义，但在当时恐怕也是着意于告别“大元帅”体制的一种权宜举措——“大元帅”体制既然不复存在，唐继尧欲以副元帅入主广东之正当性也随之而逝。

不过，统一财权对参与讨伐杨、刘各军来说意味着原来用以作为驱动力的税收等物质利益落了空，而杨、刘的消失使作为另一驱动力的地方意识也转换了针对目标，因为“客军”的定义可以是广泛的，与其讨伐对象陈炯明粤军相比，黄埔军本身也不脱“客军”意味，只是没有其他客军那样鲜明的地域色彩罢了。

<sup>[203]</sup>未曾参与讨伐杨、刘的许崇智已基本失去兵权，他和梁鸿楷、魏邦平等原在孙、陈之间亲孙中山的本地土军将领都具有危机感，遂在“土军排斥客军”的口号下结合在一起。他们对再次东征陈炯明并不积极（这也可能是师法杨、刘“养虎自重”的策略），甚至不排除与陈炯明部联合的可能，因陈部亦土军也。

<sup>[204]</sup>

在此背景下，我们一般史学论述中主要视为国民党左右派斗争的廖仲恺被暗杀事件就与土客军之争发生了密切关联，而争夺的核心利益正是消灭杨、刘之后如何支配广东的“财权”。当时就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土客矛盾”及财权问题的鲍罗廷说，梁鸿楷等粤军将领为实现“广东人的广东”，自消灭杨、刘后即“试图夺取政权。对他们来说，政权首先表现在财权上。政治委员会任命的财政部长是廖仲恺，这就是说需要排除廖仲恺，于是他们就把他干掉了”。但“客方”在这一次的权势争夺中显得更高明，他们利用许崇智和胡汉民两位粤人的矛盾，以放逐胡的方式换取许对解决粤军梁鸿楷部的默许，于1925年8月成功地将梁部缴械。

<sup>[205]</sup>

梁鸿楷部有上万人的兵力，是当时国民政府治下粤军中最强者。与此同时，黄埔军在李济深（李济琛）部粤军的配合下，将东莞郑润琦部、石龙莫雄部、广州梁士锋部粤军缴械；梁、魏等被捕，失去基础的许崇智被迫出走。党军利用粤军力量再次扩编一个师，不过数月的时间，黄埔军从东征开始时的两个团扩充为三师九团。<sup>[206]</sup>许、梁、魏等的失势意味着广东驻军的新陈代谢以激烈的方式又迈进一大步，当地军事形势完全改观。梁鸿楷部等被缴械后数日，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正式组建国民革命军五个军，党军为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除李福林军之外的粤军组成第四军，李济深升任军长，这两军是国民革命军的主力。

1925年秋，以第一、第四两军为主进行了第二次东征，至年底完全占领东江地区，陈炯明余部溃退入福建。其间国民政府在新桂系军队支援下首先解决了新近从湖南退入广东的熊克武建国川军，10月，又以朱培德第三军、第四军陈铭枢师和谭延闿第二军一部组织南路军，在广西军队的配合下讨伐邓本殷和驻钦廉之桂军申葆藩，至1926年初南征结束，国民政府第一次真正控制广东全省。有功劳势力大的在粤客军纷纷被灭，过去作用不大力量较弱者反得以保存（主要是湘军）。粤军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类似的演变，许崇智所属各部除一直亲黄埔的陈铭枢旅成建制地转入第四军扩充为第十师外，余多被“消化”，反倒是非核心而实力有限的李福林部保存较久。<sup>[207]</sup>

以两次东征为核心的一系列争战在许多方面都是重要转折点，最能体现广东革命阵营内部的新陈代谢。从地域视角看，它代表着地域色彩明显的“客军”从广东军政事务中淡出（余下的区域“客军”基本不具备挑战政府的能力，多半也无此愿望，但图自保而已）；从军事角度看，它标志着黄埔军声誉的确立和一批军校训练的广东少壮将领的兴起；<sup>[208]</sup>就国民党及其主导的整体革命事业言，它见证了孙中山时代的结束（这一结束是广泛的：孙本人的弃世及国民党新领导层的形成是一方面；更直接的转变是孙的最大挑战者陈炯明势力的终结以及与孙陈相争有关的一系列反陈军人、包括粤军内部的许崇智和客军的杨、刘，皆随之退出权势争夺第一线）和后孙中山时代的开始。所有这一切转折中的新兴因素都与蒋介石多少相关，他不久即在国民革命事业中疾速上升，显非无因而至。

然而这一系列权势转移发展得实在太快，数月间权力核心的人事更迭和军事将领的新陈代谢频繁得使人眼花缭乱，其一个直接社会后果即造成大量从政者和军人突然“失职”，尤其是军官（数万客军和数量相近的粤军在短期内“消失”，积累下来的“闲散”军官为数甚众）。许多客籍军政人士本避难于粤土，不易返回故地；更重要的是不论本土还是客籍，这些人鲜有其他谋生特长，主要的希望就是以某种方式“复职”。更因“世界革命”落实在广东一隅，港英方面非常乐于以各种方式支持这批“失职”军政人员，以扰乱甚至威胁新兴的国民政府，后者支持的省港大罢工直接影响着香港经济，且有着鲜明的共产革命色彩，在港英当局眼中多少代表着苏俄利益。

当年的“土客矛盾”中隐伏着一个潜在但至关重要的大问题，即究竟哪一方面才具有统治广东的正当性。大元帅时代的广东是所谓非常时期，可以不言法度。而国民政府却正式举起“国家中央政府”的大旗，以中央政府名义而号令不过刚及广西，且因不允广西在财政方面“沾光”而自失“国家法度”，其统治的正当性原本有限。国民党曾利用广东人的地方意识讨伐客籍的杨、刘，但当其需要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时，广东地方意识却成为其统治正当性的一个强力障碍。与此同时，国民党本身的新陈代谢也围绕新领导中心之确立在进行，苏俄顾问和共产党人的直接参与增强了这一权势竞争的多元性，但仍有不少超出左右之争和国共之争的因素需要考察。



### 3. 中山舰事件前的广州政治权势竞争

1926年初南征结束后的几个月间，广州一直处于相当复杂的权力斗争之中。持不同观念的各种团体或派系的关系至为曲折，而其分合也常常转瞬即变；主要特征是各方都既联合又斗争，每次联合或斗争多是相机而动，未见十分明显的持续性。这里当然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即“主义”的分歧和冲突，这也是过去史家关注较多者；但左、右两派的主义之争并不能涵盖当时权力斗争的全部，有时甚至不一定是主导因素。关键是新从杨、刘和陈炯明等手中夺来的广东仅一省之地，而各方皆欲染指，或试图掌握全部权力，或至少分一杯羹；不仅失意或失职者力图恢复昔日的地位，新兴者或仍在努力想要兴起者为数并不更少。

这些权力斗争的一次大爆发就是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研究已较深入，<sup>[209]</sup>但整体上都相对忽视那些不能以“左右之争”来涵盖的因素，比如前述的“土客矛盾”及以此为基础的“蒋李交恶”，便应得到进一步的重视。<sup>[210]</sup>当年京沪各报如《晨报》、《时报》和《申报》上常见关于蒋介石和李济深“交恶”的报道，其具体的陈述或时有误差（特别是因对广东复杂的派系关系认识不足而区分双方的“敌友”失误），<sup>[211]</sup>惟“蒋李交恶”之事大致是存在的。<sup>[212]</sup>

两次东征胜利后蒋介石的个人地位有了根本的提高，他自己说，东江打下之后，“从前许多学生敢来规劝我、责备我的，现在都没有了，当作我是一个特殊阶级看待。所以我想以党来做中心的，而今反以我一个人来做中心；所谓团体化、纪律化的方针，完全做不到，这是非常惭愧的一件事。大家要晓得，我们革命党的危险就是在这个地方！要是大家不赶紧觉悟，仍旧是认人做中心，那末，校长一死，这中心就失掉了。”<sup>[213]</sup>这一新出现的“个人中心”最初主要还是在党军系统之中，在整个广东党政军体系中，蒋的资望实不够；不过，每次清洗掉一些老资格，他的地位就提高一次，到中山舰事件前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已实际居于第二位，这样的快速窜升引起许多人的侧目。<sup>[214]</sup>

其实李济深也是新近才疾速窜升为粤军领袖的。广东久为革命根据地，本土革命军在此长期奋斗；尽管粤军自身的争斗不断，但各次内斗主要是将领的兴衰，下层的兵员仍多在内部“消化”（讨伐“反叛”粤军时往往有另一部粤军参加，通常比他部更易接收本土溃兵），特别是与许崇智长期不和的李济深，其部在讨伐杨、刘后历次解决“反叛”粤军的行动中（尤其是第二次东征和南征）都表现积极，所获最丰，实力陡增数倍，已成为国民革命军中兵力最强的一军。李氏以广西人而任职粤军，在粤军内部多少也有些“客”的意味，但在粤军与中央政府的“土客”竞争中，李济深此时已成长为本土军的代表人物。再加上李因其广西人的关系长期支持新桂系，广西统一后屯兵西江上游的新桂军反过来又成为李氏的有力后盾，更强化了其在广东的地位。

作为东征主力的黄埔军和粤军，在联合中也有竞争，取胜之后权力分配问题更日益凸显。国民党新中央真正控制广东后，在军事、政治、财政等方面都提出“统一”的要求，这对基本据有防区全权的粤军是直接的“侵犯”；过去中央政府和梁鸿楷等的矛盾再次出现，不过这次落在李济深身上了。东征后何应钦以军功升第一军军长，蒋介石被任命为革命军总监，军事“统一”对他有利，当然支持；蒋既身处中央，其余的“统一”他也不能不支持。有时李济深等既得权力受到的挑战并不直接来自蒋，但也往往被认为与蒋一致。比如宋子文试图“统一财政”，意味着李部交出驻区财权，就并非蒋欲得利；<sup>[215]</sup>又如汪精卫任全军总党代表，并命令各军一律由中央党部派任权限甚大的党代表，也是蒋表面支持而暗中头痛的问题；<sup>[216]</sup>而南征后李济深接管了原邓本殷的地盘，中央所派南路行政委员甘乃光以“统一政治”之名撤换李所任命之县长而代以新人，甘本亲汪，从派系言也更多反映汪的扩充势力而已。<sup>[217]</sup>

军事方面的蒋李之争，蒋也不很占先。尽管李济深在东征时曾为蒋之下属，据说他对蒋被任为总监颇感不服和不满，谭延闿、朱培德也不表态支持蒋。<sup>[218]</sup>国民政府面临的困难在于，黄埔军虽是国民党之党军，其他各军利益也不能不考虑。曾负责参谋团的苏俄顾问罗加乔夫分析说，“为了所有其他军的利益，就不能允许蒋介石搞独裁”。他特别指出，各军之中最需要顾及的是“由广东人组成的第四军”，盖在广东人眼中，“蒋介石本人及其军队都是北方人”。故中央政府在推行“军事集中管理”时相当注意“土客矛盾”和平衡各方利益，军事委员会即在这样的原则下调整：参谋团改为参谋部，李济深任总长；升军需监为部，朱培德为部长；谭延闿则自许崇智离粤后即任国民政府军事部长。他们担任中央级职务后皆仍兼军长，独蒋基本为空衔（总监虽预示着可能改为总司令，然其职责及管辖范围当时并不明确），仅兼广州卫戍司令。罗加乔夫承认，蒋在此前一直受到俄方特别优待，这次的安排却“使蒋介石权力受到削弱”。<sup>[219]</sup>

有报道说，“蒋李交恶”的一个原因即蒋认为参谋部隶属总监，而李则认为两者同级。<sup>[220]</sup>实则只要没有隶属关系，即使蒋的总监等级更高，也因不直接带兵而多少有些失势的感觉。这样的“军事统一”显然使蒋不满，他一面设法扩大卫戍司令部规模，希望以此为基础改编为总监督府（此虽报纸传闻，大致可信。2月6日，由粤军改编的黄埔教导师改称第二十师，划归卫戍司令指挥）；<sup>[221]</sup>同时于1926年2月9日辞去黄埔校长外一切军职，正式表达其不快。但蒋以辞职表抗议的方式未得预期反应，其辞呈被汪精卫留中不退。

<sup>[222]</sup>2月22日，蒋介石又单独呈请解除东征军总指挥职，这或有暗示李济深的南路总指挥亦不必存在之意，同时又似乎意味着前之总辞职已部分取消，仍可以总监身份执事。<sup>[223]</sup>

2月24日，国民政府与广西达成两广统一事项，在原有的六个军的基础上，留出第七军名义，而改编广

西军队为第八、九军。<sup>[224]</sup>此时广东方面若组建第七军，以卫戍司令部所辖第二师和第二十师为宜，两师皆有较大的粤军成分，则以本为粤军出身的第二师师长兼卫戍司令部参谋长王懋功任军长似较顺理成章。但在外间纷杂的传言中，王懋功已被卷入“蒋李交恶”的旋涡之中。有说李济深部下师长陈济棠反蒋甚力，曾拟联合王懋功部反，因谭延闿、朱培德中立，李不肯发；有说王联络何应钦欲反，被周恩来告密。<sup>[225]</sup>更复杂的是王懋功同时还牵涉到国民党和黄埔军队内的左右之争以及蒋介石和苏俄顾问季山嘉的矛盾。

蒋在中山舰事件后就指责汪精卫和季山嘉试图诱王叛蒋。<sup>[226]</sup>其实汪等试图拉拢扶植王懋功大约是实，然看不出有倒蒋之意。就王本人而言，他较早参与黄埔军校事务，从入伍生总队长做起，其后颇得蒋信任，屡膺重任。王本许崇智部下，时人多认为他积极参与倒许，他自己也承认蒋在倒许前“曾一度见商”，他“力劝慎重，并言须得政治同情”，可知确曾出谋划策。<sup>[227]</sup>以此背景看，那时若在蒋、汪之间选择，他未必肯定站在汪一边。不过，有实力的部下“叛上”已成当时南北军界的流行模式，王虽未必有意背叛，外在诱惑力若增强，难保其不受影响；同时王在第二师内部也坐不稳，那时该师内孙文主义学会反王倾向很甚，已导致部队的不安定。<sup>[228]</sup>重要的是黄埔军主力在东征后仍留潮汕，仅王懋功率领的第二师留驻广州。蒋当时已辞广州卫戍司令职，虽未批准也未不准，身份尴尬，而王以参谋长身份理论上还可指挥最近划归卫戍司令属下的第二十师。

在这样的形势下，王懋功一身实为许多不稳定因素的结合点，尤其黄埔第二师和卫戍司令部是蒋在广州唯一可依靠的力量，也是蒋继续发展壮大其势力的凭借，不能不予以特别的重视；若去王，则各种可能致乱的因素皆散而难聚。蒋介石于2月26日断然撤去王之第二师师长职，以副师长刘峙接任，次日即将王押送上海。蒋在将王懋功押送上海后自认：“凡事皆有要着。要着一破，则纠纷不解自决。一月以来，心坎憧忧，至此略定。”<sup>[229]</sup>其实这一“要着”只是稳定本阵营的预防性措施，它并未使外在的“纠纷不解自决”，但毕竟为蒋采取进一步行动奠定了基础。

蒋的另一预防性措施也与防止“叛上”相关，即落实何应钦的态度。以潮梅绥靖委员身份率第一军主力驻防东江的何应钦那时也算获得了“地盘”，一定程度上面临与李济深等相似的问题，他恐怕未必欣赏“统一”民、财两权的措施。当时各报言反蒋事扯上何应钦的不少，何对蒋个人态度虽不必与李济深等同，从那时起多少有些若即若离则不差。时任何部秘书长的李仲公说，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前曾密电何应钦，说广州有要人联合重要方面反对他，欲避而无容身之地，愿何赐教。何乃誓言忠诚，为蒋后盾，必要时请蒋到汕头指挥。<sup>[230]</sup>这一密电往来恐不像李仲公诠释的那样两人“完全一致”，而是意味着蒋对何不放心，两人之间的关系已到需要“核实”的程度。<sup>[231]</sup>

逐去王懋功及何的表态为蒋可能采取的行动增加了安全系数，后防基本稳定的蒋介石当时可以有多种选择，首先他可以进一步联俄。苏俄在国民党和政府中的影响有目共睹，同时意味着当下和以后源源不断的物质援助，其在军事技术方面的指导正使中国与欧洲的新战术“接轨”；<sup>[232]</sup>更重要的是面临帝国主义威胁的中国革命必须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俄援乃是后者最鲜明的体现。此前蒋一直被认为是联俄最积极者之一，其部所得到的俄援也最多；鲍罗廷在中山舰事件前夕就认为蒋不但左，甚至可说“极左”。反之，李济深长期驻扎西江地区，不仅个人显露头角稍晚，且显然与苏俄顾问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以致鲍罗廷到1926年2月似乎根本不知有此人，他在一份重要报告中两次把李济深说成是另一粤籍将领吴铁城。<sup>[233]</sup>

但蒋若强化联俄，需要苏俄方面也有类似意向的“配合”，季山嘉在苏俄顾问内争中的胜出基本断绝了这一可能性。与久在欧洲帝国主义阵营里进行革命的鲍罗廷不同，季山嘉倾向于苏联红军那种更加直接的处事方式，且在鲍罗廷的竞争中占了上风，而蒋最能接受的加伦先已离开广东。<sup>[234]</sup>当时苏俄明显在加强对谭延闿和朱培德之第二、第三军的工作，这意味着物质援助的分享，蒋对此也不满意。<sup>[235]</sup>联系到上述军事委员会的人事安排，1926年初苏俄工作的整体形象是对黄埔军的重视较前降低，而更注重其他各军。在这样的形势下，进一步联俄显得不那么切实可行，何况还有蒋与季山嘉的个人恩怨横亘其间。

然而，在一般人眼里，蒋介石又恰是联俄的主要象征之一。在3月20日行动相对准确的消息披露之前，京沪各报关于蒋捕王懋功的传闻大都说王是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可知蒋被外间视为孙文主义学会的对立面。也有说陈济棠联合李福林、吴铁城、何应钦等通电要求蒋宣布反赤宗旨、召回胡汉民、裁削赤俄军官实权、释放反赤政治犯等。甚至有报道说蒋拟辞职赴港，而俄籍军官和军校学生劝蒋以武力解决，蒋为所动，乃在黄埔设行营，集中各处党军准备采取行动。<sup>[236]</sup>这些虽为传闻，多少也事出有因，尤其最后所述蒋几乎赴港事，陈立夫曾多次述及，视为秘闻；<sup>[237]</sup>要么蒋类似的反复有多次，要么此事在中山舰事件前早已外传，故为报人所探知；这一传闻说蒋之几乎出走是为右派所迫而得到左派及俄方支持，相当能体现广东以外地区对蒋介石政治倾向的认知。

外在的认知当然有来自广东本地的渊源，既然鲍罗廷也视蒋为极左派，在李济深等人眼里，统一财政等强化中央权力的举措多少与蒋相关，也较正常。当时广东关于“蒋李交恶”的谣言颇盛，到3月上旬已出现第四军的讨蒋文电，兼及李济深部下师长陈铭枢（据说陈与李不和而亲蒋），至少以传单或揭贴形式在广州一带散布，上有第四军主要军官姓名，李济深本人未署名，然在广州政府说李部通电是挑拨时，李初不表态；后经汪精卫调停，同意李部所辖西江和南路之财政行政暂不“统一”，仍由李支配，李部党代表由其荐任等；陈铭枢本人也到广州面见李济深，李遂表示要通电辟谣。此意甫露，《广州民国日报》立即以社论方式宣布蒋、李或李、陈“交恶”乃失职军人之谣言。数日后李济深正式率第四军将领（包括陈铭枢）通



电，电文历数一、四两军的友谊，宣称“只知有革命反革命之分，并不知有军与军之别”。<sup>[238]</sup>

“蒋李交恶”的化解只是表面的妥协，此事的产生、发展及“解决”透露出不少当日政治运作的消息：各方的矛盾显然更多是实际利益的冲突和权势争夺，后来的妥协也侧重于此；但其表述却基本回避实质性的内容，而是诉诸民族主义等更为高远的政治理念，在思想上与当时北方的“反赤”运动隐相呼应（作反蒋宣传者与北方实际的联系或不能说没有，然更多仍只是观念上的借鉴）。苏俄及其“赤化”的外国特性被有意渲染，提示着以香港为基地的港英舆论的积极参与和推动；“赤化”既是外来的，联俄也就随之带有不够“独立自主”的潜义，后一观念的兴起却是在中国鼓吹反帝的苏俄所促成。这样，以实际利益为基础的“土客矛盾”因俄、英的卷入而国际化，地方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奇特结合使广州政局的纠葛更加错综复杂，而其解决似也不能不与外国在粤存在相关。<sup>[239]</sup>

现在尚不清楚汪精卫对李济深的让步是否得到蒋介石的赞同，但从后来蒋指责汪“离间各军感情”看，<sup>[240]</sup>汪的处置显然让蒋不满，尤其在蒋渐悉广东出现“反蒋运动”之时。还在送走王懋功的次日，蒋即注意到“忽又发生一件戒心事，无法解决，最后决用强制手段，否则为害于党国，不可名状”。此事究何所指尚待考证，观其次晨即“与邓演达议处置军械办法”，则多半与军事相关。<sup>[241]</sup>现虽不清楚蒋拟实施的“强制手段”是什么，但他此时应已准备做出较大的举动。3月7日，蒋从刘峙和邓演达那里得知“有人以油印传单分送各处，作反蒋宣传，此心反得安适”。这应非故作镇定，此前数日他曾感自身处境如“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后两三天他发现，“近日反蒋运动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亦渐显明”。<sup>[242]</sup>则其心“反得安适”或是弄明白了反蒋者究为何人之后的感觉。

这样，2月底那件“戒心事”有可能指各方的“反蒋运动”。今日不少史家多据蒋介石后来的叙述，似接受这些反蒋宣传来自中共方面；<sup>[243]</sup>其实由上文可知，应基本来自粤军方面。而广州更早就出现过指责蒋“左”倾的“倒蒋口号”，更可能出自孙文主义学会方面。<sup>[244]</sup>有意思的是蒋从“反蒋运动”中认识到，从前在政治组织方面不曾用心，“完全信任同志”，如今始知“事事非精明审虑，皆为人之傀儡”。<sup>[245]</sup>这时他已有“上当”，的感觉，且其不满并非指向反蒋者，却是让他作“傀儡”的汪精卫；这一思路预示着他后来以相当奇特的方式处置“反蒋运动”，即先不直接反击“作反蒋宣传”之人，而是釜底抽薪，使反蒋者不再能攻击他亲俄“左”倾。

由于黄埔系统内左右矛盾日益尖锐，在季山嘉主政的前提下，进一步联俄对蒋又不够现实（这也意味着他无法依靠中共），在当时的状态下他就不能不向“右派”靠拢了。鲍罗廷后来也说，夹杂在左派、中派和右派之间的蒋介石那时处境“极为困难，他必须对孙文主义学派或对共产党人采取措施”。<sup>[246]</sup>研究北伐的朱丹以为，中山舰事件时蒋若不出而站在右翼一方发挥领导作用，则年轻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也会照样动手，甚至可能连蒋一起扫除。<sup>[247]</sup>按朱丹未作进一步分析，亦未引证材料，似有些夸大孙文主义学会的力量，然其大致把握到当时那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情景。<sup>[248]</sup>

这样一种紧张的态势部分是人为所造成。从杨、刘之役到梁鸿楷部等粤军解散后之失职军人甚众，成为出产“谣言”的温床。广州当局在中山舰事件前就已采取措施，大量拘捕失职军人，并将非粤籍者押登沪轮，递解出境。惟利用和传播“谣言”造势似已成为当时广东政治的一个特色，邹鲁就曾告诉陈公博，中山舰事件前蒋对汪的猜疑是伍朝枢有意编造谣言所促成。<sup>[249]</sup>其说未可全信，但仍从一个侧面揭示出造谣传谣是当时广东政治运作的一种流行方式。到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与蒋介石再次合作，仍感觉有必要就此达成协议，“采取最严厉的惩罚手段，根除有人经常在省内外散布恶毒谣言，以破坏政府的威信、稳定和财力的现象”。其具体做法就包括逮捕吴铁城和驱逐伍朝枢，这或者是伍朝枢始料未及的。<sup>[250]</sup>

蒋介石在事后认为，汪精卫“始以利用王懋功背叛不成，继以利用教育长陷害又不成，毁坏余之名节，离间各军感情，鼓动空气，谓余欲灭某党、欲叛政府”。<sup>[251]</sup>这里最核心的两点就是“各军感情”已不佳，而蒋与“某党”的关系也可能出问题。蒋并正式指责说：汪在三月初旬召集孙文主义学会及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训话时，曾说“土耳其革命成功，乃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未成功，又欲杀共产党乎？此言也，不知兄何所指？而军官听者，无不惊骇，皆认兄此语是引起共产党与各军官之恶感，无异使本军本校自相残杀也。所以三月二十之事一触即发，以为共产党员闻兄之言必有准备，所以各军官亦不得不出于自卫之道”。<sup>[252]</sup>杨奎松以为，“不得出于自卫”一语“表面上是说各军官，其实正是蒋这时心理的写照”，<sup>[253]</sup>确有所见。

一方面来自各方的压力确实很大，另一方面蒋也做了采取行动的准备，中山舰的调动乃成“事件”发生的导火线。既存的研究已不少，尤其近十多年的研究使我们对史实的了解进一步深入，<sup>[254]</sup>但现在仍不能确证究竟是谁“发动”了这一事件。看来事件因误会而起的可能性极大，然既不排除确有针对蒋的某种“阴谋”存在，<sup>[255]</sup>也不排除蒋介石利用中山舰的调动发难。<sup>[256]</sup>事从海军而起似也有些前因，据陈洁如回忆，她处理的蒋介石密信中有一函称，对蒋的“快速窜升”取敌视态度的人中，以海军司令部之人为最。海军曾由苏俄人员直接管理，在被中国军官替换后又是当时国民党内左右斗争冲突最激烈的场所之一，从3月上旬起海军主要领导更迭频繁，与“蒋、李交恶”一起成为各报最关注的两个焦点。<sup>[257]</sup>

## 4. 中山舰事件后的广州政局



3月20日事件过程各家叙述已详，此不赘。当时上海各报对事件的认识进程却值得关注：《申报》到3月30日（据3月23日港讯）仍说事件乃李之龙试图组织工人政府失败，<sup>[258]</sup>次日发表毅庐发自3月21、23、25日三封长篇通信，算是了解到事件乃是“民党左派分裂”，蒋介石转变了信任共产派态度，依靠左派打击极左派。<sup>[259]</sup>《时报》之报道则仍说何应钦和王懋功是孙文主义学会首领，并联络李济深、朱培德、谭延闿等欲采取行动，蒋为其所迫，乃派兵搜索各右派要人住宅。但因党军中本有两派，出发后各派均借机搜捕对方（故实际发生的一系列针对“左”派和苏俄顾问的行动皆被说成是孙文主义学会矫令行事），及搜得之文件表明“左”派将在北伐开始后发动政变夺权，“蒋氏察悉共派阴谋，态度复立变”而转为反共。<sup>[260]</sup>这些本非“事实真相”的叙述说明，对一般外人而言，要接受一贯亲俄“左”倾的蒋介石突然反共，实在相当困难，故不得不努力搜集各方传言，以圆其说。

事稍平息后，3月22日召开的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决议令俄顾问主动引去，第二师党代表撤回，对不规军官查办”。<sup>[261]</sup>这是一个妥协的决定，最后查办“不规军官”一条至少部分是针对包围苏俄顾问团等行动，它既可为逮捕李之龙的行为正名，也为后来逮捕欧阳格埋下了伏笔。<sup>[262]</sup>从国民党改组以来，蒋介石的一贯态度就是革命阵营内部应尽可能妥协，<sup>[263]</sup>尤其黄埔系统内左右双方都是他借以兴起的部下，俱难轻易舍弃。蒋在3月21日即觉“人才缺乏，实无改造一切之工具，孤苦伶仃，至于此极，可堪痛心”。二十天后，他仍感“对于退出军队之共产分子甚难为怀”，因为这牵涉到“以后政治方针究应如何决定”。但蒋也认识到，自3月20日的行动后，“团体分裂，操戈同室，损失莫大焉。二年心血尽于此矣！”这应是发自内心的老实话。团体已分裂的现实迫使蒋不得不在二者中选择依靠其一，鲍罗廷以为，蒋在采取了3月20日行动后就“只能（违背自己的意志）反共”，这一观察大致接近真相。<sup>[264]</sup>

此前苏俄推动的军事改革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这一次蒋也借中山舰事件削弱苏俄在军内的实际控制权。对此苏俄方面基本接受，苏共中央代表布勃诺夫到广东后承认，中山舰事件的确有苏俄方面的错误，特别是“军事工作中的过火行为”非常明显，主要体现在设置参谋部、军需部和政治部等“军事集中管理搞得过快”，引起军官上层暗中反对。他认为，上述三部及党代表和顾问就像“给中国将领脖子上套上了五条锁链”，当俄国（即外国）顾问对中国将军表现专横时，等于刺激中国军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过去曾发生让中国主官或军校校长在队列前向俄国顾问报告的情形，实在过分，简直是“反革命行为”。布勃诺夫强调，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国民革命军不是工农红军”。<sup>[265]</sup>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国委员会后来也同意，“蒋介石将军的3月20日行动是由我们军事顾问们的错误引起的”。<sup>[266]</sup>

在这样的认识下，苏俄方面自然希望继续与蒋介石合作。一度担任广州苏俄临时负责人的索洛维约夫从北京到广州前已与加拉罕取得共识，“蒋介石能够留在国民政府内，也应该留在国民政府内；蒋介石能够同我们共事，也将会同我们共事”。他注意到，蒋在3月20日态度不很合作，但在24日得知布勃诺夫使团要走而鲍罗廷尚不知何时返回后，主动表示要与布勃诺夫面谈。谈话的结果强化了上述共识，尽管“使团决定迁就蒋介石并召回季山嘉，是将此举作为一个策略步骤，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索洛维约夫却以为，既然错处主要在苏俄方面，“现在我们应当设法以自己受点损失和作出一定的牺牲来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以前的局面”。这需要人际关系中的“个人威望”，只有鲍罗廷具有这种威望，因为“蒋介石和汪精卫都信任他，他能胜任这个任务”。<sup>[267]</sup>

索洛维约夫反映的是不少在粤苏俄人员的共识，美国记者索克思恰在中山舰事件后不久到广州，他在舞会上与俄国人交谈，后者以为一切都完了，中共党人多藏匿或逃逸，反共势力兴高采烈，扭转局势的唯一可能是鲍罗廷返粤。<sup>[268]</sup>鲍罗廷受命立即从北方返粤，这意味着他在与季山嘉的竞争中最后胜出。4月29日鲍罗廷抵达广州，未见中共而先往见蒋。张国焘闻讯到鲍府等候，显然不满鲍罗廷的态度。数日后鲍罗廷告诉张，蒋介石和孙中山都是国民党中派，且都有较强的反共意识。若孙中山在，也会采取某种步骤来限制中共的活动。张国焘发现，鲍罗廷最关切的是苏俄与国民党的关系及苏俄是否会因此被迫离开广东，而视国共关系和汪精卫的地位等为次要问题。鲍罗廷并确信自己有维持与国民党关系的办法，那就是他手中有钱。<sup>[269]</sup>

在以往蒋介石与在粤各军的资源争夺中，鲍罗廷始终支持黄埔军，后者是俄援的主要接收者，<sup>[270]</sup>这是蒋、鲍关系尚好的基础。同时老革命家鲍罗廷算计甚深，他带回了久已离粤的胡汉民。<sup>[271]</sup>胡在莫斯科时屡有相当激进而“左”倾的表述，若蒋介石不与苏俄妥协，鲍罗廷也可尝试拥胡汉民任领袖；若蒋逼俄退出而使国民党右转，他本人将立刻面对资望高于他的胡氏，后者本国民党“右派”代表，在反“左派”方面尤具“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sup>[272]</sup>同时，包括物资弹药和军事技术的俄援是黄埔军力量的重要支柱，失去俄援则黄埔军力量顿减。而中共和“左”倾的青年军人在黄埔军中的潜势力仍不可小视，宋子文、谭延闿等新老中间派均持调和态度。这样，不论文斗武斗，蒋在中山舰事件后均无独自胜出的把握，除联俄外也别无出路。

其实蒋介石在逐王懋功后与汪精卫谈季山嘉专横时，已“料其为个人行为，决非其当局者之意”。3月22日，当苏俄参议来问蒋中山舰事件的作为是“对人”还是“对俄”，蒋“答以对人”。俄参议表示“只得此语，心已大安”，并称要将季山嘉等遣送回国，<sup>[273]</sup>结果双方很快达成继续合作的协议。

蒋介石与苏俄的妥协当然不仅着眼于权势之争，他是那时较少认真考虑了帝国主义威胁和攘外与安内

关系的国民党领袖。如果中国革命与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甚至正面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任何一个革命领导人都不能忽视苏俄援助的重要性，包括物质的和心理的。蒋介石早在1925年7月就认为，沙基惨案的发生表明“英帝国主义者与我实际上盖已入于交战状态”，故“我政府亦惟有认英帝国主义为当前之大敌”。<sup>[274]</sup>在面临帝国主义近在咫尺的直接威胁时，革命事业也有邻近的大国援助这一象征作用并不低于物质的和军事技术的援助。

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情绪原本较强，他在1924年谈及联俄时就对一些“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表示不满。<sup>[275]</sup>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既可针对俄国人，也可针对任何外国人。对多数中外观察家来说，蒋本人正是联俄的主要推动者和直接受益者。他自1925年以来表现出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及其对收回主权的激进主张颇令各国担心，美国亦其一。1926年初，美国《国民》杂志记者根内特（Lewis S. Gannett）在广州采访蒋介石，蒋在得出根内特尚属“真诚”的结论后，宣称要告诉根内特从别人那里听不到的真话：“中国有思想的人恨美国更甚于恨日本”，因为美国人是两面派，虽然甘言笑脸，却和日本人行动一致。<sup>[276]</sup>由于蒋介石至少认为他自己是“中国有思想的人”，这个信息是非常明显的。

在中山舰事件后的几个月中，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精琦士（Douglas Jenkins）对蒋的认知一直处于变化之中。<sup>[277]</sup>到1926年6月，精琦士终于有了初步的结论，即蒋就是“广州的政府”，他不会容忍“不管来自温和派还是激进派的干涉和反对”。精琦士认为，蒋与共产党人和俄国人的暂时联盟不过是为了得到军火和资金。但他也在那次报告中明确指出，蒋本人恰以“排外而特别是反美”著称。<sup>[278]</sup>《纽约时报》驻华记者亚朋德（Hallett Abend）后来回忆，“1926年时的蒋介石是以从内心里讨厌所有外国人而著称的”，<sup>[279]</sup>这或能反映那时多数外国人对蒋的观感。

蒋的表现与五卅事件后全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外在大环境非常合拍，在政治活动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的一个日渐流行的倾向。1926年初即有人指出：“郭松龄打张作霖便是打日本。无论中国怎样一个军阀，敢和外国抵抗，是我们十分钦佩的。不幸抵抗外国而失败，是我们十分惋惜的。”<sup>[280]</sup>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时代，能与外国人一战，即可得民心，胜负还是其次的问题。那时北方一般军阀对此显然认识不足，南方的蒋介石却表现出明显更敏锐的政治识力，已意识到对外作战即使不胜，仍可得心。

据报载，1926年2月，广东政府因粤海关案与列强成对峙之势，在决策会议上，蒋介石力主采取强硬手段与外人一战。他分析说：“外国对粤用兵甚难，未必因此即以武力为后盾。就令用武，而广东全省新胜之兵，不下六七万；且有俄员之指挥，俄械为之接济，大可以拼命而战。若幸而战胜，则东方第二土耳其，匪异人任矣。若不幸而败，极其量亦不过将广州政府退移于韶州。外兵人地生疏，万不敢深入国内，终须退出。然因此一战影响，已博得全国排外者之同情，目前虽稍吃亏，而将来声势，必从此更为浩大。盖能与外国人开仗，其地位已增高不知几许也。”谭延闿和孙科极力反对，他们认为，“若谓藉一战以博取国人之同情，则将来之价值未必得，而目下之地盘先不保，岂非以大局为孤注”。陈公博和谭平山等支持蒋，而李济深、伍朝枢、宋子文等则附和之一见解；汪精卫初偏于蒋，后“为谭、孙所战胜，亦表赞同”。结果会议决定向海关税务司妥协，蒋即“突然辞职，宣言不问政治”。<sup>[281]</sup>

这一会议的情形目前虽仅见于报纸，但与蒋介石那时的一贯识见相通，他更早就认识到攘外可以安内，主张在政治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蒋在1925年7月初上书国民政府说，“中国革命，其浅近目标，固在军阀。舆论皆谓内政不修，无以对外。实则内政之坏，大半由于军阀得帝国主义强力之助，方敢肆行无忌”。故“今后革命目标，应注重此点，认定帝国主义为当然大敌，誓与奋斗。盖必先杜绝帝国主义与军阀勾结之途径，则军阀不攻而自倒。故今日革命，以对帝国主义为主要目的，而对军阀不过为一枝叶问题耳”。他特别指出，与英帝国主义战，“无论胜负谁属，皆足引起全国及全世界革命群众之注意”。<sup>[282]</sup>

到7月下旬，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的讲演中进而阐述说，打倒帝国主义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即使英帝国主义真与我们开起战来，我们据大陆与他相持，他未必能离开海岸线制胜我们。”英国所恃为军舰大炮，只要离海岸线一百里，军舰即失作用；除铁路沿线外，中国一般道路狭小，大炮难以移动，其余军用品也输送不便，只要再离开铁路，英军便难取胜。有意思的是蒋的表述中也有些晚清观念的“再生”，他列举的英军可以战胜的原因也包括吃面粉的英军不能在吃米的南方持久，以及英军“穿不惯草鞋，走不了山路蹊径”等，<sup>[283]</sup>大致是当年夷狄离不开大黄、腿直不便走山路等说法的现代翻版。

在蒋看来，中国革命“是今日世界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一场最后的大激战”，军阀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傀儡，“吾党革命目标，与其革军阀的命，无宁先革北京东交民巷太上政府帝国主义的命。擒贼先擒王，所以吾党革命当自打倒帝国主义始”。只有“我们能打倒帝国主义，才为革命的真成功；我们敢同帝国主义作战，方为革命的真起首”。他说，“人之爱国，谁不如我？北方军人必有爱国者，西南军人亦必有爱国者”，若大家团结在国民党周围“共同救国”，就可以逼迫帝国主义“本国自己的军队直接来同我们打仗”，革命军就是“希望同外国帝国主义者直接来打一仗！”到“外国与我们革命军开仗的时候，我们革命军成功的日子就不远了”。这是因为，无论中国“哪一省一处与帝国主义开仗，就是燃着了中国大革命成功的导火线，亦就燃着了世界大革命成功的导火线。世界革命一起，帝国主义再没有幸存的道理”。

从这些言论看，前述报载关于粤海关案的争论中蒋介石的发言基本符合其一贯主张，他的确希望通过与帝国主义直接开战而获取全国的支持；并且他也认为，如果在中国内地打持久战，帝国主义未必不可战



胜。苏俄带来的“世界革命”观念进一步武装和提升了蒋介石的思想，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之战，则中国任一军队与帝国主义开战，不仅可以博得全国同情和政治支持，更能点燃“世界大革命成功的导火线”，这就意味着世界革命基地苏俄的卷入和参与。由此看来，国民党领导的革命不能没有苏俄的援助，蒋介石此时不与苏俄决裂，所思虑者应较为深远。<sup>[284]</sup>

若前述关于粤海关案的争论属实，则不仅与中山舰事件有所关联，且反映出广州当时权势之争的某些面向，尤其各类人物的分野值得注意。在讨论中支持蒋的谭平山和陈公博皆粤籍少壮新锐，谭乃共产党，中山舰事件后仍未失势（直到整理党务案提出后才与其他共产党一起退出政府）；而陈也是前共产党，他回忆说，中山舰事件后不久，蒋介石让邓演达找到他，“说要组织一个左派的核心，因为一面要防备右派，一面限制共产党，因此不能不有一个坚强的组织”。其成员有12人，蒋、邓、陈外，还有谭延闿、朱培德、何香凝、陈果夫、邵力子等，并在何香凝家里开过一次会。<sup>[285]</sup>

不过这一“左派核心”还缺少当时广州政治中一个重要团体，即作为孙中山亲戚的宋氏家族。不久孔祥熙夫人宋蔼龄第一次请蒋介石夫妇吃饭，陈洁如多年后仍记得蒋对此大感兴奋，表现得非常激动，盖其“从未想到”能有机会与这样的名流共餐，真是“妙得难以置信”。蒋告诉陈，“这些年来我与领袖[孙中山]的关系一直不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密切”，现在终有机会接近他的亲属；与宋氏家族的亲近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建立“重大功业的开端”。<sup>[286]</sup>此事若与前引陈公博说蒋组织“左派核心”的聚会共观，则其重要性更高，两次聚会都参与者确有一直“左”倾的何香凝。从陈洁如对当时气候甚热的描述中，可知这次吃饭应在前次“左派核心”的聚会之后。在旁人看来已大权在握的蒋介石尚乏充分的自信，他也相当清楚广州的实际权力核心在哪里。

若把中共及其在国民党中的同情者作为左派，则陈公博所说的“左派核心”加上宋氏家族，恰好是那时广州温和而偏左的中间派。<sup>[287]</sup>可见此时温和而偏左的中间派已隐居主流，中山舰事件后正是这些人出来收拾局势，调解各方。其中谭延闿、朱培德和宋子文三人是那段时间几乎每份关于广东局势的苏俄文件都要提到的人，既说明三人的活跃，也无意中印证了苏俄对二、三军的持续关注。在蒋介石自己的日记中，那段时间他也是不时与谭、宋、朱三人议事。在3月26日蒋又一度辞职出走时，就是宋子文漏夜赶往虎门将蒋挽留。<sup>[288]</sup>这里一个重要的例外是第四军的李济深，他在苏俄文件中仅偶尔被提到，在蒋的记述中更几乎不及李济深，偶尔碰面也只说点场面话，体现出“蒋李交恶”其实余波未息。

不过，上述温和而偏左之人虽已显出结合之势，其思想观念和实际利益等各方面都差距甚大，更群龙无首。正因此，蒋才得以倚靠此派力量分击左右两派，同时将此派逐渐置于其控制之下。周恩来后来总结说，中山舰事件时，鲍罗廷和加伦均离粤，陈独秀也不在，左派除汪精卫外群龙无首，当时各方军政力量皆不欲蒋得势，惟无人牵头，致蒋坐大，并击败左右两方，其权力基础乃得以巩固。<sup>[289]</sup>此说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特别凸显出汪精卫临阵逃避对事态发展的影响。

蒋介石早就感觉到胡汉民、汪精卫等人有着与“旧势力”瓜葛太深和魄力不够等“书生”缺点。事发后汪隐匿不出，蒋即认为“此种不负责任之所为，非当大事者之行径也。无怪总理平生笑其为书生”。<sup>[290]</sup>不过，汪精卫那时也有其困窘之处。索洛维约夫一面指出汪有遇事不够理智的性格弱点，同时也承认，在汪已感觉在蒋介石面前丢脸之时，苏俄向蒋让步更使汪感到受委屈，尤其循蒋之意召回汪竭力要保留的季山嘉使他感觉受了侮辱，故而隐匿不出。<sup>[291]</sup>

汪精卫在3月20日当天曾说，“我在党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sup>[292]</sup>蒋在4月给汪的信中也承认，“一年以来，吾兄对党国之功绩，为总理逝世后之第一人，此不论何人不能否认”。

<sup>[293]</sup>关键在于当时广东政治行为模式已大变，党内的“历史”早已不那么受重视，基本被当下的事功所压倒；不过几个月前，是否积极参与东征决定了杨、刘的命运，是否积极参与讨伐杨、刘更决定了胡汉民、许崇智等几位在党内同样有“地位和历史”之人的退隐。汪本人正是在这讲究事功而轻视党内“地位和历史”的趋势中上升到党政军第一的位置。然若论那段时间的具体事功，汪似不如蒋，其上升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苏俄的支持。一旦苏俄据事功之需而定取舍，失去支持的汪精卫自然也难以仅靠革命“历史”以维持其“地位”。

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期间的作为似乎也不能完全视作个人争权，对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事业来说，蒋确实代表着国民党改组以来相对蓬勃向上的少壮力量，而且是那时位居前列又不具地方色彩的领导人当中唯一的军人。蒋介石并不欣赏的罗加乔夫就看到了蒋的独特之处：“作为同孙逸仙联系最密切的人和作为最有军事素养的人”，他是“指挥北伐的唯一候选人”，故应该“为国民革命运动留住蒋介石”。<sup>[294]</sup>尽管苏俄方面一直注重对二、三、四军的工作，他们仍然清楚，论及与孙中山的关系，谭、朱、李均不能与蒋竞争，而汪、胡则缺乏军事素养。在“革命”主要意味着武装夺取政权时，军事素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参考因素。

鲍罗廷敏锐地观察到，“对蒋介石来说，北伐是他3月20日行动的基础。他指责汪精卫反对北伐”，以此为“汪的主要罪状”。在看见蒋“已把自己的命运同北伐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之后，鲍罗廷也只能一面指出北伐的不易成功，一面表示将给蒋以“一切可能的支持”助其北伐成功。<sup>[295]</sup>1926年初蒋介石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将北伐列为最近就要实施的要事恐怕还可推敲，但这无疑有助于使军事总监变为总司令；更重要的是，一旦战事成为中央政府主要的政略，就必然大大增强军方在决策中的重要性，包括对财权的整体支配。这就牵涉到当时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文武之争，在这方面蒋介石和李济深利益基本一致，故李在事件



中既不支持蒋，也不支持汪精卫。

蒋介石自己就发现，事前并不赞成他对苏俄顾问采取行动的谭、朱、李各军长，在3月22日获悉他对俄顾问及共产党的处理后，“皆赞成余意”。<sup>[296]</sup>这里各军长赞成的大概就包括前述限制党代表权限的内容。其实蒋、李之争仍在继续，蒋对握有军权的“地方主义”也不能不有所让步。他在4月11日呈请设置中央军校副校长，以李济深兼任。同日日记中便“深思广东现局甚难处置，党务军事裂痕已明，右派与共产派两者之间固难调融，土匪与地方主义更难消除，实无善后之策”。<sup>[297]</sup>这里很明确地将“地方主义”作为比左右派分裂更难解决的困难，非常能呈现他内心关注之所在。

不过，蒋至少在文官方面成功地打击了广东的“地方主义”，经过3月的中山舰事件和5月一般认为向右派“妥协”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实际的结果是张静江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同为江浙籍且曾参与西山会议的邵元冲、戴季陶、叶楚傖等参与广州政权的领导工作；与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关系密切的广东人伍朝枢、吴铁城等或被逐或被捕，孙科在表态与这些人分手后才免于放逐的命运（当然也因为他是孙中山之子）。用朱培德的话说，以广东人为主的既存政治“重心”已失。鲍罗廷更明言：“除少数例外，广东人不适合合作革命者；其他省的国民党人只好利用广东的基地，把广东本地人排除在外。”<sup>[298]</sup>

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蒋介石成功地利用中山舰事件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左”倾的汪精卫被驱逐，右倾的胡汉民一度返回广州又失意离去，在逮捕吴铁城驱逐伍朝枢等偏右领导人后，国民党有竞争力的主要领导人都从广州“消失”，蒋的地位明显提高。<sup>[299]</sup>1926年4月，谭延闿致信蒋介石商量军事预算问题，蒋复函说，“本月预算似应确定，请由吾公主持一切，不必事事商量，使弟更不安于心”。但蒋随即“贡献”了三条具体处置意见，虽然他最后又说“未知尊意如何？请与益之、任潮二公核定，弟无不遵照决议”，然前面三条口气相当直接，并无太多商量余地。<sup>[300]</sup>可知蒋此时已大权在握，代理汪精卫的谭延闿宁愿“事事商量”（几天后蒋才于4月16日正式当选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当选为政治委员会主席）。到5月下旬，蒋自己也忍不住说：“我近来听许多同志谬奖说，黄埔军校已成为党的重心。”<sup>[301]</sup>黄埔军校与蒋的个人关联众皆知晓，“近来”二字尤说明问题。

## 5. 结 语

1925年3月孙中山弃世意味着国民党革命事业之孙中山时代的结束，经过一年多“后孙中山时期”的短暂过渡，中山舰事件最重要的后果是开启了蒋介石时代，确立了以孙中山的少壮幕僚和家属为核心的派系在党和政府中的领导地位。不久前获得正式领袖地位的胡、汪转瞬即淡出权力中心是非常重大的代际转折，后来所谓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此时皆开始出现在前台；他们中除蒋介石外皆能说英语，故能与仍处权力核心的鲍罗廷直接交流，孙科和陈友仁以同样原因此时至少与宋、孔一样重要，邓演达则能操德语故可与苏俄顾问中高阶的铁罗尼对话，也是权力核心的成员，凸现了俄国顾问的势力仍相当强大。<sup>[302]</sup>这些皆是孙中山的幕僚和亲戚，绝大部分相当年轻，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他们基本偏左。<sup>[303]</sup>

但蒋介石掌权的道路还不平坦，鲍罗廷观察到，蒋提出“整理党务案”本希望“使军队保持平静，实际结果却适得其反。左派更生气了”，而孙文主义学会则要求蒋采取进一步措施来限制共产党；蒋“成了他们的俘虏”，以“保持军内团结”为由要求军内共产党人退党，以国民党身份工作，于是共产党更怀疑他右倾。蒋介石“每天都向我抱怨，说什么共产党人和左派都不相信他，不相信他是愿意为革命而献身的”。<sup>[304]</sup>其实蒋在与鲍罗廷达成妥协后即以捕吴铁城逐伍朝枢并公开宣言反对西山会议派表明其已再向左转，鲍罗廷的回报是承认蒋所获取的权力并支持北伐。<sup>[305]</sup>

此时新败于湖南的唐生智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外在形势的变化促使北伐进入实施阶段。盖唐部若被消灭，则两广将立刻受到北军威胁；唐如果退入广东或广西，这一新增的“客军”会使当地形势更为复杂。从全国看，北洋军正倾全力攻冯玉祥，在南方的兵力较弱，此时不出兵则冯败后南方亦势孤。尽管广东政局仍不稳定，这些因素致使本可安居广州以巩固其地位的蒋介石做出迅速进兵的决定。如前所述，战事既然成为主要政略，军方在决策中的重要性即大大增强。蒋在6月5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个月后即出任国民党中常会主席，正式确立其领袖地位。

不过，在北伐誓师之初，蒋并未让黄埔军出击，<sup>[306]</sup>而是派出李济深的第四军和广西第七军先行。<sup>[307]</sup>素以不怕死著称的黄埔第一军并未安排在北伐第一线是个相当耐人寻味的现象，它提示着蒋介石一直鼓吹北伐或不过希望借此营造一种引而不发的态势，或并未充分认识到战机已至，仍试图进一步巩固其在广东的领袖地位，然后再定是否北上。这一方略后来证明对蒋相当不利，<sup>[308]</sup>但北伐的最终取胜（尽管并非完胜）表明，“后孙中山时代”政治新陈代谢的结果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是有利的。

原刊《历史研究》2004年2期

## 注 释

[1] 魏益三：《我由反奉到投冯投吴投蒋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我所用的是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合订本），215页。  
[2] 比如1929—1930年间中原大战的主要人物也曾被称为“新军阀”，那次大战动员的人数就远超出这一次的混战，涉及的地域也相当宽广。

[3] 1920年12月24日《申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166页。  
[4] 参见张力云：《从北洋武备学堂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收入河北省和保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以下径引书名），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1—39页。下面关于北洋军事教育的内容也多本此文。  
[5] 陆军小学的设置大体是仿照日本军事教育体制中士官学校前的初级军校，这一点承徐勇教授指教。  
[6] 也有人认为“拔差弁为军官”是袁世凯有意为之，盖其以为“到底不识字的人靠得住”。参见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海天出版社，1937年，收入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以下径引书名），第6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221—222页。  
[7] 据说曹锟1890年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66页），也有人说曹锟早年曾任塾师，而顾维钧则以他的亲身经历婉转印证曹锟是文盲的说法（《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266页）；大概曹所受军事教育不够系统，故本文暂采用“行伍出身”的一般说法。  
[8] 1920年12月29日《申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173页。  
[9]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3页；直系要员白坚武稍后在总结直系失败原因时也表示，他曾闻“陆军学生为直系所排斥不用，出关者相继不绝”。《白坚武日记》，杜春和、耿来金整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1927年8月补录1924年日记，498页。参见张力云：《从北洋武备学堂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4—35页。

[10] 马宝珩：《孙传芳五省联军的形成与消灭》，《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170页。  
[11]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3、6页。并参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影印，第二编，53—54页。按当时军中分新旧两派的似不少，湖南亦同，详后。  
[12] A.B.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年）》，李辉译，三联书店，1982年，55页。  
[13] 于学忠：《我在北洋时期与直系奉系的关系》，《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194页。  
[14] 参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三编，115—132、180—199页。  
[15]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203页。按唐生智不使用这批大炮或许出于保存自己力量的考虑，或许因为进攻武昌的战斗由蒋介石指挥，唐无意配合，当然也不排除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唐氏也并不重视炮兵这一因素。

[16] 《晨报》，1926年3月26日，2版。  
[17] 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张钫即观察到，吴佩孚“有着浓厚的北洋陆军正统观念，一向把张作霖不当作北洋正统”。在这样的正统观念影响下，别人“对他说张作霖如何延用人才，精练军队，他都不相信，说张胡子懂得什么练兵”。张钫：《风雨漫漫四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225页。

[18] 过去北洋体系总体而言对文人取一种相对忍让的态度，但1926年春则出现不顾旧行规则而随意捕杀记者文人学生的明显倾向，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926年3月的“三一八惨案”，详后。

[19]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48、52、55页。

[20] 《申报》1920年8月27日、11月12日，收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95、126页。

[21] Ethel A. Munphy, "Celestial Opera Bouff," Travel Magazine (Floval Park, N. Y.), 40 (April 1923), p. 15.此文出处承林蔚（Arthur N. Waldron）教授指点。

[22] Hsi-sheng Chi（齐锡生），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35-141，此书有中译本，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127—134页。关于第二次直奉战争，并参见：Arthur N. Waldron, From War to Nationalism: China's Turning Point, 1924-192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91-118.

[23]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274页。

[24] 章太炎稍后即指出，“自袁世凯以后，北京久无政纲。财政操于外人之手，国政听于骄帅之言。所谓政府者，即近畿军阀之差遣”。但他也注意到，起初政府也还“微有主权”，后来则黎元洪被逐，曹锟被囚，而段祺瑞被软禁；这些主政者的法律地位虽有真伪之别，其受军人凌犯则同。“是北京之有政府，只为乱人俎上肉耳”（《太炎论时局》，《民国日报》1926年1月21日，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以下仅引书名），中华书局，1979年，下册，846—848页）。故有势力的军人干预政治甚至操纵中央政府是袁世凯之后北洋政象的一个常态，且愈演愈烈，但在军队司令部由军人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这样前所未有的事仍可视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后来军人自己执政，复出现因曹锟释曹锟、拥段祺瑞驱段祺瑞的现象，大致也是逻辑的发展。

[25] 参见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商务印书馆，1926年，其作者增订本收入《近代稗海》，第6辑，293—306页；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编，10—12页。由于段祺瑞是袁世凯之后北洋体系的实际主持人，也有学者认为“皖系军阀在北洋各派军阀中资格最老、势力最大”（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47页）。“资格最老”自然无问题，“势力最大”或主要是从其控制中央带来的综合实力着眼，若以军队特别是当年极重视的“地盘”言，皖系显然一开始就不如直系。虽然西北和东南沿海一些省份之军政领袖被视为皖系，然其真正的嫡系，如所谓“四大金刚”的靳云鹏、徐树铮、曲同丰和傅良佐，除傅良佐短暂据湖南外基本无其“地盘”，且徐、曲二人的主要带兵经历也限于参战军。作为北洋体系的整体领袖，段祺瑞本应具有相当程度的超越性，但一方面他明显感觉到无自身实力则地位不稳固，同时他试图建立自身军事派系的努力也削弱了其作为整体领袖的超脱性，这一难以解决的矛盾只能另文分析，有一点可以肯定，与北洋六镇自然扩展产生的军队相比，“参战军”是后起的新事物；从历史渊源看，两者的正统和边缘地位大致可立。

[26] 关于第二次直奉战争，各家所述颇不一致，文公直的叙述似乎始终至终都是奉军在取胜，参其《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三编，191—199页。来新夏等也持基本相同的看法，参见其《北洋军阀史》，802—811页。丁文江的叙述稍更平实，指出了直军的准备不足和初期作战不利，然承认在冯玉祥倒戈前战局已成胶着状态，参其《民国军事近纪》，321—327页。近年林蔚对战争前期的论述所见又不同，他以为冯玉祥倒戈前直系更具战略优势，参见Waldron, From War to Nationalism: China's Turning Point, 1924-1925, pp. 115-18。林蔚所见不可谓无据，奉方傅良佐的记述是在奉军在热河一线取胜，但在山海关主战场则形势不利（傅良佐：《第二次直奉战争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35—37页）；直方李藻麟的结论是“自十一月上旬起，直、奉两军在山海关战场上基本上打成了对峙局面”（李藻麟：《二次直奉战争中山海关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49页）。且美国军事情报人员的报告也认为直系此时形势占优，若冯玉祥一线进兵则直系可能攻入满洲（引在林蔚书117页）。应该说吴佩孚的战略计划似较高明，后来郭松龄反奉，文公直即认为其“似有与前奉直战争时之直军敷设同一计划”（文公直书第三编，209页）。郭部兵力远逊于直军，且无海军支援，而能一度取得超过直军的胜利，似提示着若无冯玉祥倒戈，吴佩孚取胜的可能性也较大。

[27] 吴虬已注意到北洋“纲纪”不再，“倒戈”已成流行的行为模式这一现象，参其《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284页。

[28] 《晨报》，1927年7月20日，3版。

[29] 九一八后某次蒋介石到北平，各界的欢迎会上有吴佩孚，并请吴佩孚讲话，他即说：“说起来我和蒋委员长可算是志同道合，完全一致。因为我讲的是武力统一，他也接受了武力统一。”魏益三：《我由反奉到投冯投吴投蒋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251页。

[30] 比如，后来实力最强的奉系张作霖虽控制北京，其心目中仍以东北为第一考虑，并不曾摆脱客居的性质。张作霖虽开府于北京，其子张学良则公开表明，张之所以任大元帅而不就总统，“即表示其为临时之位置”。《晨报》，1927年7月20日，2版。北伐时及北伐后的不少军事领袖可以说都曾有“问鼎”的机遇，但他们大多数与张作霖一样仍偏于地方意识，并无太大的“野心”，故往往不能充分利用其所遇到的崛起时机。他们在时势运会所推之时，一度也曾有主持全国之念，但正因其在很多方面缺乏为此而做的准备，因而所措多差。北方的阎锡山、南方的李宗仁都类似。在后孙中山时代的国民党里，两人都是所谓“带艺投师”，代表着非正宗的国民党势力，也都有在国民政府体系内争取“独立”的愿望和努力，并部分取得了成功，但确实少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愿望及为实现此目标的准备。李阎的第一次合作是中原大战，差一点推翻蒋；第二次合作则是40年代后期李任代总统而阎任行政院长，一度真正成为国民政府的主持人。对于后者，过去一般皆从蒋实际并未放权来认识这一“过渡阶段”，故未见深入有力的研究。其实观李阎的实际举措，的确缺乏主持全国事务的气度和能力，毕竟还是没有“问鼎”的准备。

[31] 古籍孙在1924年出版的《甲子内乱始末纪实》中已描述当时情形为“一系之中分为数派，一派之中分为数党；各私其私，无复有国家观念”。该书收入《近代稗海》，第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256页。



[32] 英国外交部远东司长S. P. Waterlow当时也注意到这一现象，参见：William R. Louis, *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 1919-1939*, Oxford: Clarendon, 1971, p. 110.

[33] 许仕廉：《再论武力统一》，《晨报副刊》，1926年5月11日，7版。

[34] 与此相伴随的现象是这些拥有地盘者又相对缺乏自信，故一些基本失去武力也无地盘者反可能受到表面的拥戴，如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冯玉祥拥段祺瑞出山，北伐前孙传芳等要讨奉时竟有十四省共举吴佩孚为总司令。对段、吴二人言乃其一生地位最高的时段，但真正的权力皆不如以前，两人的实际操作能力均有限，尤其涉及被指挥者自身权益的时候就更有限；拥戴者主要是尊其历史形成的名位，希望其更多作“虚君”式的“共主”。

[35] 《中国国民党对于时局宣言》（1925年5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120页。

[36] 张国焘从另一侧面观察到，尽管旧官僚仍“盘据中国政治舞台”，但他们当时已“不是政治上的真正有力成分”。而是军队“把中国的政治夺在手里”，且“一个拥有万数并无战斗力的军官便能在政治舞台上横行”。国焘：《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导》12期（1922年12月6日），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向导周报社汇刊本，98页。

[37] 齐锡生已注意到那段时期地理与军事政治的关系，参见：Ch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pp. 143-49, 中译本，135—140页。

[38]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编，407—428页。关于四川在南北之间的地位，参见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79年，27—29页。

[39] 岑春煊于1924年11月21日和25日两电段祺瑞等，主张以“移军殖边”和“军工筑路”为解决裁兵废督的方式，并明确建议雨亭、焕章“分任东、北两方开拓富源大任”；对吴佩孚则让其实行移兵实边的素志，以“开拓西北”任之。岑春煊致段祺瑞等，1924年11月21日、25日，《申报》，1924年11月23日、26日，均13版。东三省固久为张作霖所据，这一建议很能体现热、察、绥这类边缘地带在解决军政问题中的用处，而“西北”尚可重新布局，也得凸显。

[40] 当时已无兵力的段祺瑞一度想组织一支第三势力，而以阎部为首，参阅锡山档案，台北国史馆藏（以下径引档名），微卷七，548页。

[41] 按阎锡山能确保其地位当然与其无意参与在外在竞争有很大关系，同时其治晋也确有特色。据文公直说，山西是当时全国唯一实行按人口定额之征兵制者，即实行“寓兵于农”的所谓“乡兵制”，每年“向各县征募，同时按年编老兵入后备。军械则与时俱增，储之库中”，故战时能用之兵较多。同时“阎锡山对于军队教育，素极注重”。不仅“以孔教部勒军队，更使全军学生化，所有士兵均须补习国民教育，以二年为期，毕业后，再授以普通科学及军事教育”。若文公直的观察不错，山西是少数真正贯彻实施儒家“教而后战”思想的区域。实际上，阎锡山的“保境安民”政策的的确给山西人带来差不多二十年的和平，这在北洋时期是非常罕见的。参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编，124—128页。关于阎锡山的研究，参见Donald G. Gillin, *Warlord: Yen His-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11-1949*,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曾华璧：《民初时期的阎锡山，民国元年十六年》，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81年，后者使用了前引阎锡山档案，惜所用不多，所论也不详。

[42] 到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班师回京改变中央政府这一新举措后，许多人才领会到驻军京畿的作用，此后各大军阀关于划分实力范围的谈判中，京兆不驻兵成为一个常见的条款。

[43] 参见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James E. Sheridan,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xiang*,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编，96—110页。这段历史的基本轮廓似已清楚，然其中各方面曲折复杂的相互关系，还有不少需深入探索之处，拟另文探讨。

[44] 冯玉祥致段祺瑞电，1924年12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317页。

[45] 参见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44—45页；刘敬忠、王树才：《试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1925—1927年的政治态度》，《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46] 李庆芳（山西驻京代表）电阎锡山，1925年3月22日（本文电报日期均取发报人所署日期，这样更符合一般人的思维习惯，也更能与电文相符合。然因电报为二十四小时发出，半夜发出者电报局已署次日日期，且有时写完并未马上发出，到实发报时日期或也有变，故电报局实发日期或稍异），阎锡山档案，微卷八，623页。按段祺瑞有对刘镇华不利的政令也不完全因冯玉祥的压迫，时在陕西的中央第七师吴新田部大致属皖系，实力虽不足，亦久欲督陕，刘去则利吴也。

[47] 胡景翼电阎锡山，1925年3月5日、1925年3月26日，阎锡山档案，微卷七，1300、1351页。

[48] 阎锡山电温寿泉（山西驻京代表），1925年2月9日、1925年2月16日，阎锡山档案，微卷七，716、764页。

[49] 阎锡山电马骏（晋东盐运使，时驻翼城，常与陕方联络），1925年2月27日，阎锡山档案，微卷七，924页。实际上“中央”即使内心偏向镇嵩军，也不可能明令支持；相反，正如瞿秋白指出的，“照理段氏应当下令讨伐憨玉琨，因为胡景翼是他正式任命的河南督办”。但执政府对这样明确挑战其权威的军事行动却“只说调停”，充分体现其对局势已失驾驭能力。参见双林（瞿秋白）：《胡适之与善后会议》，《向导》106期（1925年3月14日），汇刊本，884页。

[50] 马骏（晋东盐运使）电阎锡山，1925年3月13日，阎锡山档案，微卷七，985页。

[51] 国民二军的新首领是非胡系的岳维峻，与直系的关系尚好，也非民党出身，但他在军内并不具备胡的威信，似也不如胡那样敢作敢为，故其后来使山西及其他方面“可虑”的并非有多少特别进取性的作为，而是其态度的犹疑不定。

[52] 钱桐（孟材）电阎锡山，1925年5月24日，阎锡山档案，微卷八，1645页。

[53] 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59—61页。

[54] 吴佩孚再起，段祺瑞立刻感到威胁，其子段骏良说，虽“杨文恺日前来电谓吴只讨奉，决不反对执政，万勿信挑拨等因。但吴屡次通电均带护宪色彩，此话亦难遽信”。苏体仁、潘连茹电阎锡山，1925年11月3日，阎锡山档案，微卷九，441页。这里所说的“护宪”，指的是曹锟任总统颁布的宪法，从法理上当然针对着段的“临时执政”之正当性。有意思的是，段的支持者吴新田和刘镇华余部柴云升、张治公两师也联名通电参与讨奉：“我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由孙总司令统率首先发动，义旗一举，薄海歌呼；桴鼓之声，万方同应。新田等屯兵秦陇，夙赋同仇，愿竭弩骀，共励凶逆。”吴新田等讨奉通电，1925年10月24日，阎锡山档案，微卷七，1938—1940页。吴新田此举未必代表段祺瑞态度，但多少反映出许多军阀对奉系的不欣赏，一因张作霖出身“胡子”，二因其与日本的关系密切。

[55] 汉口曹步章（倬云）、梁汝舟电阎锡山，1925年11月22日，阎锡山档案，微卷八，1926页。一般多说张作霖因郭松龄反戈而与吴佩孚联合，看来双方的联合要更早也更主动。

[56] 冯玉祥致阎锡山，1925年3月7日，阎锡山档案，转引自曾华璧：《民初时期的阎锡山》，110页。

[57] 温寿泉、苏体仁、潘连茹电阎锡山，1925年11月3日，阎锡山档案，微卷九，421—422页。但当时不久就有“陕县敌军约近一师，刻以山西军务长景梅九名义密印安民布告”（马洪电阎锡山，1925年12月4日，阎锡山档案，微卷七，1964页。按马洪似为茅津县知事，确否待考）；旋有属于国民二军的樊钟秀大举攻晋，而景梅九、樊钟秀亦皆老“民党”，故阎锡山此时对这类历史联系不能有太多的实际考虑。另一方面，尽管国民二、三军的主官皆出身同盟会，理论上应与南方更亲近，但在苏俄眼里（或许也反映部分国民党人的观念），却是比一军更不可靠的部队。莫斯科一度相当担心广东方面北伐可能导致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的军事冲突，驻华武官处的特里福诺夫曾问加拉罕，“一旦广东军队向北推进”，他是否确信国民“第二军和第一军不会进行抵抗”？加拉罕认为，当有着共同的敌人吴佩孚和张作霖时，至少国民一军和广东军队“会找到共同语言并创造一些因素和条件，使他们能够避免发生这样的冲突”。但北伐军与国民二、三军相遇，则“可能发生误会”，也许需要像解除许崇智粤军武装那样将二、三军缴械。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以下径引书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上册，90页。

[58] 按冯玉祥也暗中与孙传芳联络，赞成其反奉，然自己不出兵，参见杨文恺：《孙传芳反奉联奉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104页。

[59]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88—90页。

[60] 参见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360页。

[61]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90、99页。冯玉祥虽支持郭松龄反对其上司，双方的合作却不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实即因打



李此举。这一点冯玉祥自己也承认，他后来也说这次进攻友军是“反友为敌，以私演公，开出了一场莫明其妙的战争”。冯玉祥：《我的生活》（下），441页，转引自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115—116页，关于冯玉祥不援助郭松龄而打李景林，参见同书108—115页。

[62] 郭松龄反奉一事涉及复杂的国际关系，过去一般多注意日本在此次战斗中扮演的角色，其实郭松龄反奉大概也与苏俄有关，据北伐前夕被任命为驻日使馆代办的白思多夫斯基说，远东司长梅尔尼科夫1926年4月告诉他，郭松龄的妻子是哈尔滨贸易学院（俄办？）的学生，加拉罕曾许诺支持郭松龄。后郭军事吃紧时加拉罕要求苏俄出兵齐齐哈尔以逐吴振中（音）回沈阳，得到梅尔尼科夫支持，但政治局怕触怒日本而不批准。张作霖逮捕中东路局长伊万诺夫时，加拉罕又要求苏俄出兵哈尔滨，并得到伏罗希洛夫支持，兵已发至中苏边境，但齐切林在征询了驻日大使意见后，估计日本会立即占领长春并派兵至哈尔滨，政治局乃决定撤军。参见：Grigory Bessedovsky, Revelations of a Soviet Diplomat, Tr., by Mathew Norgate. Reprint ed. Westport, Conn.: Hyperion Press, 1977, pp. 123-24.到1926年5月，驻日大使柯普（Kopp）也告诉白氏，苏俄支持了郭松龄反奉及其与冯玉祥的联合，参见同书，134—135页。

[63] 曹之杰：《冯玉祥部国民军入甘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21—23页。

[64] 孙焕崙电阎锡山，梅焯敏电阎锡山，1925年10月21日，阎锡山档案，微卷七，2452页。

[65] 即使不从战略角度而仅从地盘角度看，由于郭松龄失败后其残部魏益三军转为国民四军，必须有地方安置，冯玉祥反不得不将保定一带让给魏益三部，使原已不够的地盘更加吃紧。且魏部无论在对直对奉的战事中都未必能起实际作用，也未必愿意卖力拼命。

[66] 冯的战略眼光似较其一军部属为高，盖国民军即将面临各路围攻，若此时多顾一军利益，必影响其整体团结，难以共同对敌。退而言之，此时直隶乃众矢之的，直接面临各军之锋矢，能否守得住还是个问题。真能稳据，孙岳也不能不倾其全力，则国民一军很有可能从甘肃入据陕西；若战而不胜，孙岳本曾隶属于直系，似较易解决善后问题，而受损失的也是国民三军。三军的何遂曾说，他和孙岳早就认为直隶、河南皆四战之地，乃各方争夺的焦点，三军实力不足以据之，而“甘肃以西没有一支新式军队”，易于发展，故拟定了向西北发展的计划。但这计划与冯玉祥自己的西北计划冲突，盖“冯把甘肃当作他发展势力的地区”，反对三军向西北扩张，而力促孙岳重返直隶。后来国民二、三军皆瓦解，结果使“国民军变作冯玉祥的西北军”。参见何遂：《关于国民军的几段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73—75页。

[67]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109页。并参见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110—114、125—131页。

[68] 据说吴佩孚和张作霖由敌手变为同盟并全力灭冯，即因吴从郭松龄联冯反奉这一“叛乱相寻”现象看出反叛上司已成北洋趋势，乃提出与奉方对反叛者“共张挾伐”。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台北文海出版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8辑），1971年，83页。李剑农也有类似记载，参其《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59年，673页。

[69] 阎锡山电汉口曹步章，1925年12月6日、1925年12月9日，阎锡山电贾济川（镇嵩军师长，时在运城），1925年12月9日，曹步章电阎锡山，1925年12月26日，阎锡山档案，微卷八，1965、1967—1968、1974、2000—2001页。当然，萧虽不欲实际支持作战，大概仍希望吴能离鄂北上，免除其对湖北的辖制，故其对吴之北向作战，恐怕是取一种“半肯半不肯”的态度。

[70] 曹步章电阎锡山，1925年12月26日，阎锡山档案，微卷八，2000—2001页。

[71] 李新总编、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2册，434页。

[72] 参见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152—167页。这段时间国民军与直奉晋三方的谈判和文电往来以及直奉晋三方自身的文电往来未必仅限于当时当下的实际利益，更揭示出各“军阀”对实际政治军事及更一般的政治军事“规则”的一些常规认知，还可深入挖掘，特别是两方文电中对第三方的描述（因“第三方”随时在转换中，可资对比处极多），非常有提示性。

[73] 张之江等通电，1926年3月20日，原载《国闻周报》，收入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以下径引书名），武汉出版社，1990年，第5卷，345页。

[74] 阎锡山电吴佩孚，1926年4月13日、4月14日，阎锡山档案，微卷十一，0323、0334页。按一旦国民军与直系或奉系和解，则热河、直隶、河南皆将归奉、直，山西靠近察、绥和陕西的地盘很可能成为各方与国民军妥协的筹码，晋阎大概也了解这一可能，故如此积极也。

[75] 钱桐电阎锡山，1926年5月4日，阎锡山档案，微卷十一，2206页。按钱氏的报告中也说到“直方甚不满意”，但此“直方”或齐个人意见，盖吴佩孚正有类似主张，而齐则已无兵力，自多着眼于“政治”也。

[76] 《西北将领之宣言》，《申报》，1926年5月20日，4版。

[77] 苏联方面认为国民军进攻山西有物质利益或地盘方面的动机，因为从战略上言，“向山西进军只会促进中国反动势力的结合”，加拉罕曾千方百计不厌其烦地劝说冯玉祥的外交代表唐悦良，希望能“放弃这次进攻”。但“丧失富饶都城地区的国民军的极其困难的物质状况迫使它不顾各种劝告”仍然进军山西。参见索洛维约夫：《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中国形势的书面报告》，1926年7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330页。按直奉双方皆有主张与国民军妥协的一派，国民军攻晋有可能得到其默许，徐新六1926年6月报告说：“西北军事当有一番表示，终恐仍归于和。大概大同入于西北之手，京绥在握，暂行实做‘西北’二字，对方恐亦只能就此了事。”徐新六致丁文江，1926年6月12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丁文江档案，卷10，件5，承杜正胜所长惠允使用。按此系徐从上海到天津搜集消息后的报告，或者更多反映与孙传芳较接近的主张。

[78] 参见《国闻周报》13卷12—31期关于这段时间战局的综述，收入《北洋军阀》，第5卷，332—345页；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175—181页。

[79] 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185—225页。

[80] 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203—249页；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1008—1015页。

[81] 如冯部的凌勉之和孙桐萱在后来回忆“中原大战”时，对已成国民革命军一部分的冯玉祥部，皆以“西北军”称之。参见凌勉之：《中原大战之前的冯玉祥》、孙桐萱：《韩复榘叛冯投蒋纪略》，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134—140、141—150页。

[82] 《申报》，1922年2月26日、12月21日，收在杨荫杭：《老圃遗文辑》，530、696页。

[83] 民初的中国，列强实际已成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1925年的五卅事件向国人提示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现实存在，本有助于正在中国大力鼓吹反帝的苏俄；但苏俄本身首先也是个外国，当时一般人并不很能区分“反帝”与“排外”的差异，强调反帝很容易使人产生排外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北方舆论对国民党和国民军的联俄予以较前更多的关注。说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281—288页。据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观察，反赤是在1925年春兴起的，他注意到反赤与民族主义的关联：“几个月前由帝国主义者、军阀和部分中国民族主义分子（买办分子、国民党右派和具有沙文主义情绪的青年）发起的大规模反赤色运动现在几乎销声匿迹。”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信》，1926年7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345页。非常有意思的是，具有阶级分析思想武器的维经斯基把“买办分子”算作“中国民族主义分子”的一部分，而一般中国人眼中，买办显然是个最不具民族主义的社群。

[84] 李景林讨冯通电，1925年12月4日，收入《北洋军阀》，第5卷，319—320页。

[85] 《郑孝胥日记》，劳祖德整理，中华书局，1993年，第4册，2075页，李电录在2075—2076页。

[86] 孙岳并对苏俄顾问允诺，“等我们打败了敌人，我们在北京举行一个盛大宴会，庆祝我们的友谊”。而河南督军岳维峻甚至对苏俄顾问说，“等战事结束后，俄国顾问就能够开展工作”。这是单纯的往后推托还是真认为俄国人将来在非军事领域可以有所作为，待考；但他们都不愿张扬其与苏俄的关系，认为这会招致攻击的意则非常明显。参见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71、104—105页。

[87] 《申报》，1926年5月12日，5版。这是该报引东方社电，机构名原译为“赤化讨伐各军联合办事处”，与当时通行中文不顺，故改。按《申报》本身在此前后并无相关报道，疑此机构即使存在，也最多是联络性质，不具有多大的实际作用。

[88] 张作霖通令（大意），1926年1月25日，收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三）》，400页。

[89] 《晨报》，1926年3月26、27日，均2版。按段祺瑞在1925年12月底已被迫改组临时执政府，增设国务院，由国务总理负责国务会议，实际上是一种责任内阁制。而其善后会议系统中有军事善后委员会，王士珍即任职其间，这一委员会也成为这段时间主和的主要推动机关。

[90] 吴佩孚电阎锡山，1926年4月4日支，阎锡山档案，微卷十一，0209页。

[91] 关于这段时间北京政局的演变，胡霖（政之）当时有较仔细的描述，参见政之：《北京政局蛭螭记》，原刊《国闻周报》，收入《北洋军阀》，第5卷，343—368页。

[92] 据说吴佩孚本不赞成曹贿选，吴再起时已被释放的曹有意复位，吴却要求其主动辞职，王士珍即指出，“这个门楼虽然破旧，可

是，一经拆除，再想盖起来就不容易了”（李炳之：《吴佩孚之再起与溃败》，《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168页）。按王有识见，曹锟任总统虽出于贿选，至少名义上是选举出的总统，多少有其象征意义。此后直到北伐统一，北京政府再无总统名目。到1927年6月，张作霖开府北京，任海陆军大元帅。郑孝胥注意到：“宪法、约法皆废除，共和国以今日亡。”（《郑孝胥日记》，第4册，2149页）。

[93] 钱桐电阎锡山，1926年4月28日，阎锡山档案，微卷十一，2149页；李庆芳电阎锡山，1926年4月28日，阎锡山档案，微卷十一，2165页。关于当时的“护法”与“护宪”之争，还有许多可深入探索之处，其中也包括明显的国际影响，法国因金佛郎案、日本因西原借款等案，皆牵涉到实际利益，故不欲倾向直系的政府上台。参见徐新六致丁文江，1926年6月12日，丁文江档案，卷10，件5。

[94] 章太炎致李根源，1926年5月7日，《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864页。

[95] 章太炎致李根源，1925年12月6日，《近代史资料》，总36号（1978年1期），146页。

[96] 《申报》，1926年1月31日，《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849页。

[97] 章太炎致李根源，1925年12月6日，《近代史资料》，总36号（1978年1期），146页。

[98] 《太炎论时局》，《民国日报》1926年1月21日，《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846—848页。按太炎所谓“政府即近畿军阀之差遣”其实是稍晚近的事，至少当在徐世昌被迫退位之后。关于在中华民国名义下可以“割据”一语，部分也可视为太炎的雄辩之辞，实际他后来也劝孙传芳应回避割据之名。

[99] 章太炎致李根源，1926年5月4日，《近代史资料》，总36号，148页。

[100] 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193—204页。

[101] 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新青年》第3号（1926年3月），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2—3页。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此时仍将国民军视为“军阀”的一部分，实际上他对国民军的正式表态是否代表其“衷心”尚持怀疑态度。

[102] 吴佩孚与陈炯明的“联合”究竟到何种程度，还可以深入探讨。陈炯明特别提倡联省自治，而吴佩孚主张武力统一，两人在政治观念上有根本的冲突。陈炯明在1924年5月对吴稚晖说，当时的军事形势，国民党“本来具有与敌对抗之局势及其能力（即反直派大联合，最少限度亦以西南奉浙为主干）。惜孙先生不取，必以广州局面而当之，不独徒劳无成，行且同归于尽。孙先生及其谋者如果觉悟，及今图之，尚未为晚”（陈炯明答吴敬恒书，1924年5月13日，收入陈定炎编：《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年，1157—1158页）。似乎三角同盟事本陈所提出，孙初不赞成，后来才接受。无论如何，陈炯明此时仍提倡“反直派大联合”则不误。

[103] 《中国国民党对于时局宣言》（1925年5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118页。

[104] 从阎锡山档案中的许多文电看，段孙妥协当时似已基本达成，而孙中山逝。其余在京国民党人的威望恐怕对内对外均不足以确保与北方的协议得到落实，其中不少人的个人态度似也更不倾向于和平解决问题。

[105] 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191、214—215页。

[106] 参见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未著出版年，卷二，35页。

[107] 这一格局的形成还受到另外一些因素的影响，例如原来在“西南”中最活跃也最具军事事实力的云南因唐继尧、顾品珍内部争权之战而实力大损；在联省自治运动兴盛而“西南”各省纷纷宣布“自治”时，云南也曾有类似宣告，此虽无实质性的约束力量，多少也使其干预他省事务不那么名正言顺；当然最关键的转折还是1925年的滇桂之战。关于联省自治，参见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台北弘文馆，1986年；胡春惠：《民初的地方意识与联省自治》，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

[108] 所谓“四校”，即清季开办的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拟设四所：一北京清河、二西安、三武昌、四南京，然西安实未办），入民国后各地陆小停办，已办的陆军中学改为陆军军官预备学校，再加上保定军官学校。这“四校”皆清季开始创立的新式军校系统，注意其有意识地区别于各地讲武堂、武备学堂一类军事培训机构而自我认同，其实讲武堂等也是新型的“教而后战”思想的产物。

[109] 参见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政协广西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2—4页；尹承纲：《李宗仁起家经过》，原刊《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收入《新桂系的崛起》（《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上册，18—20页。

[110] 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八十三年奋斗史》（二），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1972年，324—328页。按孙中山重视军校学生的一个例证是，当时广州大总统警卫团的三位营长薛岳、叶挺和张发奎皆四校同学。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三），33页。

[111] 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二），333页；《李宗黄回忆录》（三），36页。

[112]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年）》，190—191页。

[113] 他将新加入的贵州袁祖铭部也算入此派之中。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281页。

[114] 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三），38页。李宗黄注意到，谭延闿的第二军、朱培德的第三军、李福林的第五军和程潜的第六军就较少任命四校同学。这四个军并非北伐主力，战斗力较弱且组织方式也相对偏旧，可知当时北伐军内部的新旧之分也是很明显的。

[115] 参见本书《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

[116] 参见姚大慈：《赵恒惕上台的阴谋和血手》，《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145—156页；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1984年，85—113页；黄士衡：《赵恒惕的省宪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157—164页。

[117] 郭廷以等：《赵恒惕（炎午）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赵恒惕先生档案”，档号58-003-002-001，23页。

[118] 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年，56页。时在湖南任记者的陶菊隐也回忆说，“当时论者认为，谭派军人多为师长或镇守使级”，而“赵派军人多为旅团长级”。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95页。

[119] 沈云龙等：《龚浩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第7期（1996年6月），89页。

[120] 郭廷以等：《赵恒惕（炎午）先生访问纪录》，《赵恒惕先生档案》，24—25页。

[121] 本段与下段，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58—59页；沈云龙等：《龚浩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第7期，89—91、103页。

[122] 按唐生智后来投入国民党仍主张“佛化革命”，其军队号称“大慈大悲军队”，有“佛化省政府”、“佛化省党部”之说，曾引起教育会和通俗报馆等机构的反弹，此事尚未见专门研究，可参见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59—62页；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1983年重印三卷本，卷三，1589页；《晨报》，1927年7月15日3版，10月18日6版，12月20日6版，12月27日6版，1928年2月24日6版。

[123] 沈云龙等：《龚浩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第7期，91页。

[124] 这一宣传大致是成功的，《申报》1926年3月5日9版一篇署名铜驼的广州通信（2月24日）就说叶琪是唐生智的代表。陶菊隐即说当时“我们在长沙所闻，叶琪确系唐生智的秘密代表”。参其《记者生活三十年》，108页注二。但叶琪的访问和所谓梧州会谈都比李宗仁所述更为复杂，后面还会论及。

[125]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276—284、290—292页。李宗仁并说，复起于湖北的吴佩孚对唐生智讨赵也持默许态度。以蒋百里与唐的特殊关系，当时又任职吴之总部，应能撮合此事。关于唐生智秘派代表至粤，见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重印本，620页。

[126] 《赵恒惕出走前之湘局》（3月10日长沙通信），《申报》，1926年3月15日，9版；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109—113页。不过，蔡和森则认为，国民党提出废除省宪的口号不但没有帮助唐生智，反而可能将唐“推向反动派方面”。参见蔡和森：《在远东书记处1926年4月27日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4月2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230页。

[127] 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66—70页；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292—295页。关于白崇禧、陈铭枢在长沙的活动，参见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4年，1—9页；《各公团欢迎陈、白两代表盛况》，《大公报》（长沙），1926年3月29日，6版。

[128] 本段与下两段，参见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165—272页；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1—63页；尹承纲等人的多篇回忆文章，收入《新桂系纪实》，上册，18—132页；郭廷以等：《胡宗铎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第7期，63—68页；莫济杰、陈福霖主编：《新桂系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卷，35—105页；Diana Lary,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43-63; Donald S. Sutton,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The Yunnan Army, 1905-25,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0, pp.284-85.



[129] 蒋介石在1925年4月27日即认为，由粤入桂与唐继尧作战的滇军范石生部将“全军覆没。唐可能取胜。范军残部有的将投诚唐继尧，有的将四处逃散。李、黄二将军的队伍，其命运也是如此，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士兵有的将解甲归田，有的将加入土匪群”。加伦：《广东战事随笔（1924年12月—1925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以下径引书名），670页。

[130]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35—37、49—50页；陈雄：《新桂系形成时期亲历忆述》，《新桂系纪实》，上册，95—96页。

[131] 尽管黄绍竑已在1924年11月亲赴广州参加国民党，苏俄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在1925年初仍视其为军阀，他的军事报告说，“广西东部为两个军阀所瓜分，一个在西江以东，一个在西江以西，双方对广州都持友好中立态度”。这“两个军阀”即是李宗仁和黄绍竑。加伦：《军事政治形势》，1925年1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636页。

[132]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278页。

[133]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2—4页；尹承纲：《李宗仁起家经过》，《新桂系纪实》，上册，18—20页。

[134] 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三），37页。

[135] 邓演达致孙中山，1923年7月29日，转引自莫济杰、陈福霖主编：《新桂系史》，第1卷，54页。

[136] 值得注意的是，在1925年4月底广东国民党核心圈子的讨论中，老同盟会员熊克武率领川军入粤被认为是唐继尧图粤的第五纵队。加伦：《广东战事随笔（1924年12月—1925年7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678—679页。

[137]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258—261页；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45—47页；郭廷以等：《胡宗铎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第7期，67—68页；莫济杰、陈福霖主编：《新桂系史》，第1卷，106—113页。鲍罗廷充分肯定了广西军在南征中的作用，他认为如果没有广西援助，“结局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凄惨的”。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141页。

[138]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51—57页；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294—289页。其实党政等“自理”对以党治国的国民政府“法度”至少是同样的挑战，李氏晚年的总结更多反映出其当年失望极深，也伏下“新桂系”后来与中央疏离的潜因。

[139]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62页。

[140] 存留的客军主要是湘军，然后来也均逸出广东，且因与唐生智有约在先，皆未能染指湖南。

[141] 自袁世凯弃世后出现的分裂局面，北伐前大约有两三次真正实现统一的机会，主要因各方面“存异”的实际考量超过了求同的愿望而错失（有时也受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然而统一的社会要求始终存在。从长远看，北伐的进行以及此后的蒋、桂战争和蒋、冯、阎大战恐怕都是袁世凯弃世后为填补中央权势空缺的各军政势力较量的继续。这其间有两个关键性的变化影响了竞争的进程，一是国民党在改组后成为一种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政治力量，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入侵造成外患压倒内忧的大格局。

[142] 《本报宣言》，《向导》1期（1922年9月），汇刊本，1页。

[143] 记者（胡政之）：《国庆辞》，《国闻周报》，1926年10月10日（该刊无统一页码，故不引页码）。

[144] 1920年6月14日、1921年8月25日《申报》，《老圃遗文辑》，17、393页。

[145] 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205—210页。

[146] 过去许多中外研究，尤其是西方的中国研究比较重视国民党的民族主义面相，而说到民族主义时则多想到其因抵御外侮而起的救国观念及卫国运动，但民族主义从来就还有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的一面；自北洋时中国处于实际的分裂局面后，中国民族主义这建构一面的主要反映就是国家的统一。

[147] 《中国国民党对于时局宣言》，1925年5月22日；《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就职宣言》，1925年8月1日，均收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120、141页。

[148] 当时一位热血青年曾广荣看到“中国现时平凭武力以征服敌人，不是以武力扶持正义，以致世道人心只知趋附强权而蔑公理”，乃决定弃医改学军事，希望今后能“以武力扶持正义”，大致体现了社会上对武力正当性的某种期望。参见曾广荣致曾济宽，约1925年秋冬，引在曾济宽：《读过了日本东京寄来一封信后的感想》，《国民革命汇刊》，孙中山学会编，第1卷（1926年1月），98—99页。按曾广荣应为四川人，是郭廷以在河南读中学时的同学，关于曾从日本读士官回来后的经历，参见张朋园等：《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7年，182—186页。

[149] 《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1926年7月4日，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2辑，未著出版机构，1956年，51页。

[150]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公宴上的演讲》，1926年1月4日，节录在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588—589页。

[151] 《蒋总司令就职宣言》，1926年7月9日，《革命文献》第12辑，56页。

[152] 参见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3期。

[153] 参见：Ch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pp.54-6, 95-100, 115, 中译本，49—50、87—92、106页；唐生智事见前，余可参阅《晨报》，1927年5月6日2版，6月15日2版，6月16日3版，7月18日7版，8月7日3版，12月2日3版，1928年1月1日2版。

[154]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9页。按何柱国并非信口开河，北伐时奉军方面确曾提出“爱国主义”，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212页。

[155]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公宴上的演讲》，1926年1月4日，节录在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589页。

[156] 蒋介石：《在湖南省党部欢宴大会讲演》，收入《蒋介石的革命工作》，文砥编，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下册，299页。

[157] 顾维钧后来回忆说，国民党以政治组织支持军事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因素”，极大地决定了北伐的胜利（《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297、303页）。并参见罗志田：《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近代史研究》1999年4期。

[158] 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在1921年告诉胡适，他觉得“中国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羡慕”。胡适以为，“其实中国官吏并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只是他们一来不懂得我们说的什么，二来没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胡适的日记》，1921年6月27日，中华书局，1985年，206页）。此语很能表明几年前的民国政府大体尚秉承着历代朝廷对读书人的“忍让”，与此时直接捕杀的行为方式大不相同。

[159] 该案的直接行为者虽然是段祺瑞的执政府卫队，当时北京的治安却是由冯玉祥部负责的。“中国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当时即提出，“北京现状，完全在冯系军人控制之下”，故“冯系军人对北京治安应负绝对的责任”。该会注意到“在此事发生前一星期，冯系军人张之江曾有‘整顿学风’的通电；所谓‘整顿学风’，实即防止赤化，取締共产的惨修。该电由章士钊转段祺瑞，冯系军人李鸣钟亦表示赞成，愿以军警为后盾，故段氏始有屠杀民众的决心”。参见《中国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宣言》，原载上海《商报》1926年3月25日，收入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以下径引书名），北京出版社，1985年，208—209页。今人刘敬忠、王树才也认为国民军此时“追随段祺瑞政府公开反对群众革命斗争”，对三一八惨案负有一定的责任。参见其《试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1925—1927年的政治态度》，《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105—106页。关于“三一八惨案”，可参见李健民：《北京三一八惨案（民国十五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6期（1987年6月），297—319页。

[160] 《孙传芳、陈陶遗对惨案通电》（1926年3月23日，原载《益世报》，1926年3月26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215—216页。

[161] 徐志摩记：《梁任公对惨案的谈话》（1926年3月30日，原载《晨报》，1926年3月31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221页。按梁启超当时正住院治病，他审慎地指出了其评论和判断是据其听闻而出。

[162]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致全国各公团电》（1926年3月22日，原载《申报》，1926年3月23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214页。

[163] 《国家主义青年团北京部对惨案宣言》（1926年3月28日，原载《国魂周刊》第10期，1926年3月25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



编》，209—210页。

[164] 《孙传芳、陈陶遗对惨案通电》，《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215页。按这一判断与胡适、丁文江等的观念接近，或受丁之影响。

[165] 徐志摩记：《梁任公对惨案的谈话》，《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221页。

[166] 《国家主义青年团北京部对惨案宣言》，《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210页。

[167] 《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1926年3月20日，原载《向导》147期，1926年3月27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143页。

[168] 张彭春：《日程草案》（即其日记，原件藏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所用的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微缩胶卷），1925年6月29日、10月25日、11月30日、12月27日。

[169] 胡适等：《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2期（1922年5月14日），1版；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9页（两刊皆用岳麓书社1999年影印本）。

[170] 说罗志田：《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226—238页。

[171] 沈刚伯：《我所认识到的胡适之先生》，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修订版，第2册，664—665页。

[172] 陈独秀：《革命与武力》（1926年11月），原载《向导》，收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1144页。

[173] 《布勃诺夫使团的总的结论和具体建议》，1926年5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246—247页。

[174] 冯玉祥部对北洋体系的挑战及其引发的大战是北方“分裂”最明显的表征，我们不能据国民党的后见之明把冯玉祥部视为“南方”势力，时人当然已注意到“南北二赤”的共性，然冯部固北洋正宗（其正统性还超过奉系），也一直被作为“北方”之一部分（实际上北方尤其是直系内一直有“收回”冯部的主张）。

[175] 身与北伐的李品仙后来回忆说：“国民革命军誓师之初，虽号称十万之众，实际上不过五六万人。而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竟以前后不过八个月的时间，领有长江以南，真非始料所及。”参见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83页。李氏的话应能代表当时南北多数人的共识，实际上，北洋方面确因不重视南军北伐而错过了战机，文公直认为，吴佩孚在北伐初起时“藐视革命军，轻离其根据地之武汉，率其比较能战之直系旧军北上而攻南口，舍己耘人，其愚孰甚”（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三编，255—256页）。文氏本站在南方立场上写作，无意中却说出了吴氏“舍己耘人”的真相。

[176]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电报》，1926年7月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320—321页。

[177] 孙中山致蒋介石，1924年9月9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301页。

[178] 转引自顾颉、龙秋初：《北伐战争在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页。

[179]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再版，168页。

[180] 勃拉戈达托夫从另一侧面观察到，“所有的人都把北伐看成是缓和广东紧张的经济局势的机会”（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记事》，198页），这仍是一种借北伐以解决其他问题的思路。

[181] 国民党“左派”和“右派”在当时言说中和后来的研究中都是非常习见的标签，不过，在当年苏俄、中共和国民党本身三方的认知中，包括领袖层次在内的“左派”和“右派”的人员构成并不完全相同，而且一直处于波动变化之中。在承认其确实存在的前提下，使用这一术语尚须谨慎。同时还要认识到，那时的“左”和“右”本身就是相对的和多层次的，即使在特定一方的认知中，通常“左派”和“右派”的内部也都还可有进一步的左右之分。

[182] 当然，国共和国民党左右派在意识形态对立基础上的斗争、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之间及其在华的各机构各人员之间，以及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地方组织之间的观念、政策和具体举措的歧异，都还有许多可探讨之处，这些方面较近的研究可参见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

[183] 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讲演》，1925年7月26日，收入《蒋中正先生演说集》，贾伯涛编，上海三民出版部，1925年，100页。

[184]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未著出版年，卷二，35页。

[185] 如1925年云南唐继尧进兵广东，便不仅想在孙中山北上后以副元帅身份入主大元帅府，同时也希望借此解决（征服或收服）在粤之滇军。说详本书：《北伐前南北军政格局的演变，1924—1926》；Donald S. Sutton,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The Yunnan Army, 1905-25*,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0, pp.284-87.

[186] 蒋介石致孙中山，1924年3月2日；蒋介石致廖仲恺，1924年3月14日，均收在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重印本，238、242页。

[187] 蒋介石：《致苏俄党政负责人员书》，1923年8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档号2010.10/4450.01-001-1。

[188] 孙中山：《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孙中山全集》（10），中华书局，1986年，291—299页。

[189] 关于边缘知识分子，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收入其《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236—237页。

[190] 陈独秀当时就注意到，革命阵营内对讨伐杨、刘之战有不少“误解”，在此基础上“发生一个共同的错误见解，即是：五卅惨变起广州政府即应停止内争一致对外”。持此主张者并进而“拿一致对外的理由来非难广州政府讨伐杨、刘”。他解释说，“当外人压迫我们之时，在理论上，我们一致对外是必要的，是应该的；这时不去对外，反以武力对内扩张自己的势力与地盘，当然是万分混账”；但杨、刘等“在内的敌人”却“要勾结外人一致对内”，如果“杨、刘叛军得了胜利，迎来滇唐占据广州，即是英日势力占据了广州，则南方的爱国运动不是根本消灭，便是大受屠杀”；只有平定杨、刘，“国民党政府才能够支配广州，广州才能够变成了与上海同样是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两大重镇”。故此时说“什么‘停止内争一致对外’便是帝国主义奸细的宣传”。这样费尽周折地陈述“攘外必先安内”，恰凸显出“一致对外”口号在那时造成的压力。参见陈独秀：《广州战争之意义》，《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889—891页。

[191] 蒋介石对此有充分而清晰的认识，他在1926年初论联俄的意义说，“现在中国问题，完全是一个世界问题”，故“中国革命完全是世界革命；我们要中国革命成功，一定要联合世界的革命同志，才能打倒世界的帝国主义”。由于“苏俄是世界革命的策源地，亦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点”，故联俄就是“联合世界革命党”。蒋介石：《再论联俄》，1926年1月10日，收入《蒋校长演讲集》，（广州）中央政治军事学校，1927年，13—14页。

[192]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收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以下径引书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上册，108—110页。

[193] 参见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台北弘文馆，1986年；胡春惠：《民初的地方意识与联省自治》，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

[194] 东征能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苏俄军事顾问在整体作战部署方面的指导，孙科在很多年后认为，当年苏俄援助的顾问（咨询参谋）作用超过其军火及货币的物质支援（这是孙科在1966年一次采访中对研究北伐的美国学者朱丹所说，参见：Donald A. Jorda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6, p.302, note 6）。

[195] 本段与下段，参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影印，第三编，233—252页（下段引文在234—235页）；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一，125—292页；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370—425页。

[196] 本段与下段，Sutton,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The Yunnan Army, 1905-25*, pp.285-87.

[197] 本段与下段，加伦：《广东战事随笔（1924年12月—1925年7月）》，收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669—691页。

[198] 过去国民党及受国民党影响的史学叙述多称杨、刘“叛乱”，实际上讨伐杨、刘的决策早在4月初已制定，实在杨、刘有“叛乱阴谋”之前，此役更多可视为革命阵营内部的新陈代谢和权势转移。蒋介石当时说：打倒杨、刘，“岂止为他们把守地盘，把持财政，最要的原

因，他最大的罪恶，还是因为他们联络北方军阀段祺瑞、勾结云南土酋唐继尧，还要与香港政府勾通，甘心做卖国奴，服从香港帝国主义者命令来推翻我们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讲演》，1925年7月26日，收入《蒋中正先生演说集》，100—101页。其实主要是因为杨、刘不听命于新政府，刘震寰也有配合唐继尧夺权之意，再次则确为把守地盘和把持财政。其余两项是今日多数史学论著关于此事的基调，然而香港不过为这些人开会的地点，联段则孙中山比杨、刘有过之而无不及，谈不上多大“罪恶”。

[199] 参见《陆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第14号的各项文件，收入黄季陆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印，1969年，第12册，6549—6748页；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一，298—301页；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429—451页。

[200] 宋希濂：《大革命时期统一广东的斗争》，《文史资料选辑》（我所用的是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合订本）第77辑，96页；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八十三年来奋斗史》（三），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1972年，112页。按李宗黄时任滇军范石生部参谋长，留守广州。因范石生部主力在广西参与对抗唐继尧之战，李部本身未受打击，但李还是在事变后随即避难上海。毛思诚所编书也记载了类似情形，黄埔军本也结红领带，因避恩怨株连乃不得不取消。蒋介石对此甚为愤怒，与宋希濂基本以赞扬的口吻叙述此事态度相当不同，他或许已感觉到广东地方意识同样可以延伸到针对黄埔军。参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451页。

[201] 组建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一系列法令均收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1号（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秘书处编、文官处印；参见陈公博：《苦笑录》，李锬编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年，22—29页；曾庆榴：《广州国民政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135—141页；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一，301—303页。

[202] 陈独秀在解释广州讨平杨、刘之战并非“粤军排斥客军之战争”的“误解”时举例说，这次“参加讨伐杨、刘的，不但有谭延闿所统率的湘军和蒋介石所统率的教导团，并且还有朱培德所统率的滇军，这绝对说不上是什么排斥客军的话”（陈独秀：《广州战争之意义》，1925年7月，原载《向导》，收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889页）。此语实已明确了黄埔军的“客军”性质。

[203] 本段与下段，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108—116页，下段引文在111页。

[204] 尽管廖仲恺亦属粤籍，但他此时更多代表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央”的利益，亦即在“土客矛盾”中站在“客”方一边。

[205] 关于土客矛盾及解决粤军，并参见宋希濂：《大革命时期统一广东的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77辑，98—104页。

[206] 最缺乏“革命”性的李福林部从未得到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信任，从1925年讨伐杨、刘之前开始，长期被列入拟缴械消除的名单之中，然因其实力太有限，每次都因重要性不足而暂予保留，直到北伐仍存在。加伦：《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1925年9月（罗按：据内容看，写作时间应为6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197—202页；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同前书，上册，109页。

[207] 北伐时期粤军出身的名将如邓演达、陈铭枢、张发奎、叶挺、薛岳等在东征时为旅团长级骨干，然皆未见于丁文江叙述到1924年底的《广东军事纪》（收入《近代稗海》，第6辑，431—458页）。

[208] 关于中山舰事件，参见《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1—5月，《民国档案》1998年4期，7—10页；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617—658页；周恩来：《关于1924至1926年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112—124页；包惠僧：《中山舰事件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40—53页；陈公博：《苦笑录》，57—78页；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年，489—526页。相关专题论文有Tien-wei Wu（吴天威），"Chiang Kai-shek's March Twentieth Coup D'etat of 1926",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7(May 1968), pp.585-602；蒋永敬：《三月二十日事件之研究》，《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4年，159—184页；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2期；裴京汉：《中山舰事件的真相和汪精卫出洋的原因》，《民国研究》第4辑（1998年6月）；余敏玲：《蒋介石与联俄政策之再思》，《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4期（2000年12月）；杨奎松：《走向“三·二〇”之路》，《历史研究》2002年6期；相关著作较多，主要有：Leang-Li Tang,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E.P.Dutton, 1930, pp. 241-49; Harold R.Iss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91-6; Chung-gi Kwei, The Kuomintang-Communist Struggle in China, 1922-1949,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0, pp.37-42.

[209] 黄埔军其实也是地域色彩不明显的“客军”，这意味着其走出广东的潜在必要性；稍后包括黄埔军在内的所有“客军”皆参与北伐，先后离开广东寻求发展，多少也受到上述土客矛盾的影响。且黄埔军和粤军之间的“土客矛盾”一直延续下去，1927年中共发动的广州起义在国民党内被认为是“粤方委员”支持张发奎所致，此后1930年蒋介石在南京扣留李济深解除其兵权，终造成李济深在1933年末联合粤籍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以及1936年陈济棠反蒋的两广事件，多少都与此相关。这一矛盾直到抗战爆发才在外患的压力下缓解，但日渐边缘化的粤军那不平之气仍未熄灭，可参见第四军纪实编纂委员会：《第四军纪实》，广州怀远文化事业服务社，1949年。

[210]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晨报》和《时报》的报道相对近真，《申报》的则参差不齐。当年沪报的外埠通讯员各色人等都有，有的确实能获悉当地内情，有的不过据道听途说以为谋生之计，且某地通讯员未必即驻当地，如驻汉口者即可能兼顾湖南、四川（参见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1984年，27—28页），故所报消息未必准确。如《申报》一位署名铜驼的虽专言广东事，其人似乎并不在广州，语多隔膜，参见《广州政局骤变之内幕》（铜驼3月21日通信），《申报》，1926年3月28日，7版；《广州事变之经过与内幕》（铜驼3月25日通信），《申报》，1926年3月31日，9—10版。但道听途说亦不妨其时有所得，至少可告诉我们当时传言如何，这也同样重要。同时，《申报》也有一些通讯员的报道大致准确，基本经得起今后见之明的检验。

[211] 沈雁冰回忆说，毛泽东在中山舰事件后主张对蒋持强硬态度，其依据之一即第二至第五军“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李济深与蒋还有宿怨”。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2版，上册，342页。从毛思诚所编蒋介石年谱摘录的蒋日记看，蒋对李济深其人印象相当不佳：1926年2月21日，与李济深谈两广统一事，“客去，惆怅殊甚。既而曰：‘人惟在于自强。安乐难共，乃人情之常，吾何怪彼哉’”（按次日李济深就被正式任命为参谋总长，这次很可能谈及此事）。同年4月4日，“黄绍竑、李济深来辞行。公谓：用人难，察言尤难。天下惟狡诈人不可用，察狡诈人之言更难，吾为之惧”。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620—621、642页。按此句原稿为“天下惟狡诈人不可用，听狡诈人之言更宜注意，否则末有不为所败者，吾为此惧”。则原稿对李之猜忌更加明显，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以下径引书名，按本书是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的稿本，以下凡内容相同者仍引正式出版本），档案出版社，1992年，559页。

[212] 蒋介石：《黄埔同学会成立纪念训话》，1926年6月27日，收入《蒋校长演讲集》，123—124页。

[213] 陈洁如在其回忆录中有多次提及蒋的快速窜升以及他人的敌视态度，参见：Chen Che-yu, "My Memoirs," collected in the Chang Hsin-hai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p.259-60（按259页有加页，即290b-c，实为3页），278-79，294-96。这一回忆录有中译本，名为《我做了七年蒋介石夫人——陈洁如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6年，相应内容在167、179、191—193页）。该书“出版说明”称此书是从得自陈洁如女儿的英文原本全文译出，然前面的中文书名却很可能是译者妄加，中译本的内容与我所用的英文本偶有不甚同处，不排除是另一文本，但有些几乎可肯定是有意的（也许是善意的）修改，如回忆录中将邓演达和徐谦误记为黄埔学生（pp.258-59），中译本将students译为“助手”，并将young men径译为“人”而略去“年轻”二字（中译本165页），译者大概是希望这样更接近“历史真相”，却反使“回忆”本身异化了。

[214] 罗加乔夫稍后认为，“把从军队手中接管的整个财政机关移交和集中到财政部手里”这一措施受到商界的欢迎，并以对广州政府“给予全面的支持”作为回报。罗加乔夫：《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1926年4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235页。但此举显然使新获“财权”的李济深等军人极为不满。

[215] 鲍罗廷后来发现，蒋介石削弱党代表在军队中的地位得到军官的支持，因为“指挥官一直讨厌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和一切其他‘人手’”，他们对蒋介石的行动感到“非常高兴”。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281—282页。

[216] 又如实行军民分治，很可能就反映先后主持广州市政的伍朝枢和孙科支持之意，仍与蒋无关。所有这些矛盾参见执中：《粤省蒋李交恶之因果》，《晨报》，1926年3月25日（3月12日稿）；执中：《蒋李交恶与粤局》，《晨报》，1926年3月28日（3月15日稿）；维岳：《广州市风云之一瞥》，《时报》，1926年3月30日，1版。《广州民国日报》的社论也指出，在军政、民政、财政统一等“革命之形势进展”下，“失败军人和无聊政客”等反革命派深感不幸，乃制造蒋李交恶的谣言以“挑拨离间”。献声：《可哂之无意识的谣言》，《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10日，2版。可知上述矛盾的主要渊源正是军、政、财的“统一”。



[217] 维岳：《粤省最近之政局》，《时报》，1926年3月8日，1版。

[218] 罗加乔夫：《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233—234页。按参谋团改组时撤换了过去直接担任长官的俄人，蒋介石将此作为他主导的一项措施记录在案（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619页），但从蒋、李竞争看实际获利的是李济深。在中俄关系方面，由于俄人在很大程度上仍以顾问身份掌握着总部各部门，苏俄方面对此无强烈反应。并参见执中：《粤军界四头争雄》，《晨报》，1926年3月18日（3月4日稿），5版。

[219] 《粤省北伐声中之暗潮》，《申报》，1926年3月16日（木庵3月9日通信），6版。

[220] 《申报》，1926年3月3日（约2月24日通信），9版。

[221] 蒋介石对其辞职未得到他所期望的关注和反应耿耿于怀，且辞职后身份尴尬，倘不管事非其所愿，继续管事又似乎不那么名正言顺。他在3月9日即发现，“吾辞职已认我军事处置失其自动能力，而陷于被动地位者”（《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9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7页）。稍后在其1926年4月9日致汪精卫函中，再次指责汪对其辞职“滞迟延搁，既不批准，使弟不能辞责引退；而又留中不发，使弟又不能负责整理。卒之军纪废弛，整顿无方，以致三月二十日之事，一发而不可收拾”。蒋介石致汪精卫（稿），1926年4月9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041，卷号85。

[222] 本段与下段，参见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617—621页；《申报》，1926年3月3日（约2月24日通信），9版；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79—81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励委员会，1966年，488页。

[223] 关于两广统一议决事项，参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令”第124号（1926年3月19日），收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27号，23—25页。

[224] 关于王懋功与何应钦相关而不稳等说法，可参见《时报》1926年3月12日“本馆专电”之香港3月9日电，1版；维岳：《广州市风云之一瞥》，《时报》，1926年3月30日，1版；《晨报》，1926年3月11、12、13、17日，均2版，3月28日（执中3月15日稿），5版；《王懋功解职后之东江问题》（3月10日铜驼通信），《申报》，1926年3月20日，9版。

[225] 蒋介石在1926年4月9日致汪精卫函中，举例十项指责汪精卫受季山嘉影响而不能自主，其中两项涉及拉拢王懋功叛蒋，一是预留第七军军长一缺以为报酬，一是更改军事委员会决议的经费预算，从黄埔军校经费中减去三万元而拨给第二师，当蒋提出质问时汪则顾左右而言他。蒋介石致汪精卫（稿），1926年4月9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041，卷号85。稍后在对第一军党代表的演说中，蒋又不指名地重复了这两项指责。参见蒋介石：《关于中山舰案对全体党代表演说词》，1926年4月20日，收入《蒋介石先生最近之言论》，北京民社，1926年，20—22页。

[226] 王懋功致张静江，1926年3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360页。

[227] 鲍罗廷即注意到孙文主义学会在第二师中力量甚大，与一些团、营长相关。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140页。王懋功自己也说，孙文主义学会曾劝说他入会，王未允，该会“继则散布非学会份子不能指挥第二师之言”，与其极为对立。参见王懋功致张静江，1926年3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358—360页。

[228]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621—622页。

[229] 李仲公：《我所知道的何应钦》，《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208页。

[230] 按据蒋日记，他在3月19日确曾“准备回汕休养”，半路上想到“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容身无地”，又决定回去采取镇压行动（《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19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8页）。这说明蒋介石大致信任何应钦，但在路上想到“容身无地”而折返，仍有些耐人寻味。

[231] 勃拉戈达托夫考察国民二军河南军校时发现，学员们进行军事训练所依据的规章还是辛亥革命前制定的，“很明显，这些规章都是从日俄战争期间的日本规章翻译过来的，因此，它们没有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A.B.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年）》，李辉译，三联书店，1982年，83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中国军校训练的确特别受日本影响，而日本基本未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而也就缺少直接的“经验”，更多是间接获得欧洲新的军事观念。恰好中国此后较多依赖自身的军校，于是连间接的新军事观念也接受较少。遍观当年苏俄军事顾问的回忆录，一个最显著的观点即中国军队的训练和作战方式基本仍受日本过去的影响，在战术上已落后于欧洲；相反，在改造沙俄旧军队基础上组建的苏联红军则充分吸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型战术，故苏俄顾问所带来的训练和作战方式的的确更“先进”。

[232] 鲍罗廷1926年2月说，放逐胡汉民和许崇智后，广州政权的首领是“始终最忠诚最积极的汪精卫、明确表示自己是国民党左派信徒，甚至可以说是极左派信徒的蒋介石和湘军将领谭延闿”。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116页；关于鲍罗廷把李济深说成是吴铁城，参见同一文件，113、141页。按鲍罗廷等对蒋的认知不能说是“受蒙蔽”，蒋那时思想上确实“左”倾，1926年3月初，当邓演达表示中国革命的结果是“本党必归于乌有，而以共产派起而代之；吾军惟有领导青年左倾，共图国民革命之成”时，蒋“亦以其判断之有所见”（《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4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7页）。另外，当时为争取苏俄信任（其潜在因素当然包括俄援），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革命性”方面竞争渐成常态。苏俄的穆辛即担心“极左倾向不仅可能在中国共产党中存在，而且也可能在国民党左派的某些人士中存在”，后者实际上“多多少少已有表现”。他观察到，“国民党左派首领经常热衷于玩弄左的和极左的革命词藻，似乎试图以此来表明自己在‘革命性’上超过中国共产党”。穆辛：《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1926年4月2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213页。其实岂止国民党左派如此，一般认知中的“右派”胡汉民在莫斯科主动提出让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更是显例。

[233] 可以认为鲍罗廷在1926年初的北上（原拟回国述职，后因中山舰事件返回广东）是为季山嘉所迫，后者在1926年1月自称近来与鲍罗廷“很少争吵，因为他在我的强大攻势下认输了，基本不再干预我的工作”。但他仍以为鲍罗廷能力已尽，“以后会跟不上事态和形势的发展”，主张将其撤换。古比雪夫（季山嘉）：《给叶戈罗夫的信》，1926年1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15—16页。而鲍罗廷自己则拟回国寻求支持，他强调，尽管当时的实际工作的确以军事为主，但还是应该有“一个人全部工作负责”。他在行前明确对汪精卫保证，谁是苏俄在粤领导这个问题会在一个月后得到比较确定的解决。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142—144页。按苏俄在粤顾问的内斗牵涉至为宽广，非本文所能详述。它首先与苏联驻华使馆中加拉罕与武官处之间的分歧有关，再往上则更涉及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对于中国局势的观念歧异。大体而言，尽管加拉罕和鲍罗廷也有不少矛盾，他们仍共同代表着一个从“世界革命”即国际角度思考中国问题的取向，其一个代表性的表述即加拉罕指出的，当土耳其的凯末尔枪杀共产党人时，苏联仍对其提供物质援助，因为凯末尔正在反帝；也应该以同一思路来处理中国问题（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69—70页）。根据这一思路，广东不如北方重要，国民革命军不如国民军重要。这一取向为苏共中央派出的布勃诺夫使团首肯（虽然布勃诺夫尽量采纳了从使馆武官处到驻粤军事顾问团的主张），也大致得到斯大林的支持。这是莫斯科一再反对广东北伐的重要出发点，因为北伐非常可能导致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的军事冲突，而在打败国民军后又可能妨碍苏联正与张作霖进行的谈判（这可以从前书整个“第一部分”的一系列文件中看出，参见13—297页）。关于莫斯科反对北伐，并参见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74—78页。

[234] 过去俄援基本为黄埔军所垄断，蒋介石明显不愿他军多得。斯切潘诺夫曾说季山嘉负责时苏俄曾秘密帮助云南、广西，并保守秘密不令蒋介石知，然终为蒋所悉，并以此责备季山嘉反对北伐。按此若指杨、刘，时间稍早，且与其他文献所述冲突，疑翻译有误，大概是指对朱培德军等帮助较多，待考。参见斯切潘诺夫：《关于三二〇事件后广东情况的报告》，1926年4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国民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上册，157页。

[235] 《王懋功解职后之东江问题》（铜驼3月10日通信），《申报》，1926年3月20日，9版；《晨报》，1926年3月12日、3月17日，均2版。

[236] 最近一次是在他的回忆录中，参见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52页。

[237] 献声：《可哂之无意识的谣言》（社论），《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10日，2版，相关报道在3版，李之通电全文载该报1926年3月15日3版。并参见《晨报》，1926年3月11、12、13、17日，均2版，3月28日（执中3月15日稿），5版；《粤省军界暗潮续闻》（木



庵3月11日通信)、《粤省军界暗潮又趋和缓》(毅庐3月15日通信及铜驼未署日期之通信)、《申报》,1926年3月18、21日,均9版。陈铭枢可能叛李之事又是那时南北皆流行“叛上”行为模式的一例,不论陈是否有意,当事人及解读时局者多会有此想。此事当时流传较广,俄人勃拉戈达托夫也提到蒋介石试图拉拢“右派”陈铭枢。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190页。

[238] 部分由于“世界革命”直接表现在广东一隅,当时广东政治的“国际化”已深入不少人的思维之中。从蒋介石在那段时间的日记、演讲以及他人对蒋的观察可以看到,他相当关注法国大革命和不久前的土耳其革命,不时借助这两次外国革命的现象对比和思考中国正在进行的革命,详另文。

[239]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8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9页。

[240] 《蒋介石年谱初稿》,540—541页。据当时任海军民生舰舰长的舒宗谔说,该舰在中山舰事件前确曾受命到黄埔将大宗苏俄援助的军械(计三八式步枪一万枝和俄式重机枪二百挺)搬运上舰,蒋介石亲往察看,并指示无其本人命令不得交给任何人。这大概即此前蒋与邓演达所议之事。参见覃异之:《记舒宗谔等谈中山舰事件》,《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54—55页。

[241]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7日、5日、10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7—8页。

[242] 曾庆榴是少数持不同看法者,他认为“这类传单不可能是中共方面散发的”。参见其《广州国民政府》,343—344页。

[243] 王懋功在1926年3月给张静江的信中说,孙文主义学会曾拟鼓动军人武装游行,反对国民党二大选出不少中共党人,同时“广州市内发现倒蒋口号”。时东征刚结束,蒋尚未回到广州,王以师长兼代卫戍司令部事,乃奉蒋、汪命采取“严重制裁之手段,解此危难”(王懋功致张静江,1926年3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358—359页)。从王信看,此“倒蒋口号”当然是指责蒋“左”倾,大致应出自孙文主义学会方面。按孙文主义学会在中山舰事件前活动确实非常积极,尤其在第二师中力量甚大,但该学会起初未必具有反共性质,与其对立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最初也不是纯“左派”组织。当时情形相当复杂,以黄埔学生为主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本是面向驻粤各军的讲武堂学生,原来所针对的大概是“四校同学会”那样的组织(后来成立的黄埔同学会也因实际停办的四校同学会试图复起而不得不解散),蒋介石自己最初也很支持,后来黄埔生中又有孙文主义学会产生,鲍罗廷说其一个主要领导人(编者注说可能是贺衷寒)曾八次申请加入共产党,皆遭拒绝。鲍罗廷向中共询问原因,也没有获得令他满意的答复。他认为“这是个错误。如果让他加入共产党,他会对这个学会产生另一种影响,然而他却被拒之门外”。可知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之间演变成左右冲突有一个过程。参见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6—8页;曾扩情:《黄埔同学会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69、182页;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140页。

[244]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10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8页。

[245]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282页。

[246] Jorda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 p.40.又朱丹相当看重省港罢工在国共关系中的作用,他认为中共视罢工委员会为基地以与国民党争,故这是中山舰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pp.35-39)。此说或无意中受索克思影响,后者认为十万有组织、有政治理念并被中共领导的工人已成为广东具有控制性的政治力量,中共常利用此力量来操纵广州政府(George E. Sokolsky, Tinder Box of Asia,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32, pp.334-35)。但目前所见中共领导人关于此事件的论述,似未将省港罢工放到这样重要的地位,后之革命史家亦然。

[247] 对蒋来说威胁更大的恐怕仍是各军不稳的传闻,主要的当然是李济深部的敌视传单,同时也包括李福林和吴铁城等粤军拟以武力支持反赤,以及广西李、黄屯兵梧州阴助李济深等(参见前引京沪粤各报的通讯);与作为“北方人”的黄埔军相比,所有这些军队都带有本土性,这样的一致性在“土客矛盾”尖锐化时更会得到凸显。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黄埔军内部的“统一”就更为急迫了。

[248] 陈公博:《苦笑录》,77—78页。按邹鲁之说的核心是关于蒋介石访俄事,此事现有蒋介石日记及其致汪精卫书等众多材料,可证明邹说不确,至少漏洞颇多。但中山舰事件前右派相当活跃,而且预见到大变在即,确有些踪迹。据说已成为“西山会议派”的前共产党沈定一在事前就告诉陈望道,“广州不出十日,必有大变”。柳亚子据此判断广州“反动派的阴谋,是和上海通气气的”。柳亚子致柳无忌,1926年4月1日,《柳亚子家书》,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近代文献部编,岳麓书社,1997年,373页。

[249] 《广州市之弭谣办法》(铜驼3月18日通信),《申报》,1926年3月26日,9版;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275页。偏左的柳亚子在事发后就希望“蒋此次如能彻底觉悟,把反动派乘机解决一下,倒是‘未知非福’”。柳亚子致柳无忌,1926年4月1日,《柳亚子家书》,372—373页。

[250]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8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9页。关于“利用教育长陷害”一事尚不清楚,既存研究中中山舰事件各家对此也语焉不详,待考。

[251] 蒋介石致汪精卫(稿),1926年4月9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041,卷号85。不知蒋介石是否熟知苏联对凯末尔的政策是即使杀共产党人也要支持,若已知,则其所谓正可检验苏俄是否对中国也如此;若不知,则他实在是“歪打正着”,后来的发展表明,苏俄对中国革命采取的是同样政策。

[252] 杨奎松:《蒋介石从“三·二〇”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2年6—7期连载,我看到的是作者的原稿,谨向杨先生致谢。

[253] 特别值得提请注意的是前引杨天石、裴京汉和杨奎松的研究。

[254] 陈洁如说事前陈璧君多次打电话确有其事,使蒋介石感到有阴谋。Chen Che-yu, "My Memoirs," pp. 300-301; 中译本,193—195页。而陈公博的叙述提示着陈璧君确有嫌疑,因为汪精卫虽然身体不好,但3月18日晚还表示不会请假休息,次日却因陈璧君不肯放其出门而不再办公。这正是事件的前一日,即汪的突然不出门还在蒋采取行动之前,多少让人怀疑。后来蒋介石明确对陈公博说汪精卫那次是要谋害他,陈不久“将此事面质汪先生,汪先生愕然了半天,只能答:‘公博,你信不信?’”如果这是汪的全部回答,似不能像陈自己那样理解为“极力否认”。参见陈公博:《苦笑录》,58—59、72—73页。

[255] 尽管陈公博试图暗示蒋介石策划和“发动”了中山舰事件,他所举出的依据并不能证明其假说。参见陈公博:《苦笑录》,73—76页。

[256] Chen Che-yu, "My Memoirs," pp.278-79; 中译本,179页。并参见前引京沪各报的通讯报道。实际上关于海军的纠葛还有超出左右之争的复杂因素,它牵涉到黄埔系统这一陆军试图控制海军的努力以及久已自成系统的海军对此的抵御,这些问题只能今后再详考了。

[257] 《广州政局急变之内幕》(3月23日港讯),《申报》,1926年3月30日,9版。

[258] 《广州事变之经过与内幕》(毅庐3月21、23、25日通信),《申报》,1926年3月31日,9版。按毅庐明确了李之龙是在睡梦中被捕,可知消息来源相当可靠。

[259] 维岳:《广州市风云之一瞥》,《时报》,1926年3月30日,1版。有意思的是当时各报刊载关于中山舰事件之内容甚众,独此一篇被全文收入《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五年)》(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委会编,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8年,247—249页)之中。按此文所说党军各部矫令行事也非全然无据,蒋介石自己就承认,“军队不出动则已,如一出动即不能事事制止,必有自由及不轨之行也,以后戒之”。《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1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8页。

[260]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2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8页。

[261] 两人后均释放也说明中山舰事件偶发的可能性甚大,即使真有“阴谋”或“预谋”,不论出自哪一方,应都不在海军和中山舰这一层次。

[262] 蒋在1924年国共合作之初就对孙中山进言:“吾党自去岁以来,不可谓非新旧过渡之时期,然无论将来新势力扩张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杀此旧日之系统。何况新势力尚未扩张,且其成败犹在不可知之数,岂能置旧日系统于不顾乎?”蒋介石致孙中山,1924年3月2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235—236页。

[263]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1日、4月10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8、9页;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282页。按蒋介石稍后对汪精卫说,黄埔出身之军官对共产党行为固多不满意,“谓其有杀共产党之心,则弟保其绝无之事。盖一般军官皆知革命战线之不能撤[264]散,与其杀共产党,不如谓其自杀也”。参见蒋介石致汪精卫(稿),1926年4月9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041,卷号85。这话在那时不能认为是虚伪,蒋确实希望黄埔学生能超越于国共之上,以收鱼与熊掌兼得之效,他后来要黄埔军中的共产党员退党而以国民党左派身份继续效力就是这一愿望的体现;但早已不满的共产党方面决不会接受这一方式,尽管蒋与中共的合作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双方的矛盾却不能不以决裂告终。

[265] 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3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168—172页。按这里所说的参谋部原书译为“司令部”、军需部原书译为“后勤部”，据内容看应是军事委员会的参谋部和军需部。类似的观点也见于布勃诺夫：《给鲍罗廷的信》，1926年3月27日，同前书，186—187页；苏俄内部相反的观点则见于拉兹贡：《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1926年4月25日，同前书，222—225页。关于布勃诺夫使团对事件的看法，并参见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72—376页。

[266] 除季山嘉等的过火行为外，俄方承认的“错误”还包括在黄埔军校讲授马列主义而不讲授三民主义。这些行为造成的“满腔怒火被国民党右派所利用，蒋介石这时就成了他们的客观工具”。索洛维约夫：《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中国形势的书面报告》，1926年7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332页。类似的见解也见于穆辛在关于中共在广州任务的提纲，参见穆辛：《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同前书，210页。

[267] 索洛维约夫：《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3月2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177—179页。索洛维约夫的意见得到布勃诺夫使团的确认了，参见布勃诺夫：《给鲍罗廷的信》，1926年3月27日，同前书，188页。

[268] Sokolsky, *Tinder Box of Asia*, Garden City, p. 336.

[269] 张国焘：《我的回忆》，512—515页。按物质援助的确是任何国民党政权之所必需，不过以此为基础的关系，其延续性也视双方在供需上的相互满足而定，一旦鲍罗廷的钱不足国民党所需或其找到足以取代的财源，这样的关系便未必能持久。

[270] Vera V. Vishnyakova-Akimova, *Two Years in Revolutionary China, 1925-1927*, tr. by Steven I. Levin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220.

[271] 据伴随胡汉民的朱和中回忆，莫斯科最初打算将胡汉民召回苏联，是鲍罗廷决定将其带回广州。但胡汉民在广州日子并不好过，观望月余，其外交部长职也被陈友仁代理，遂于5月11日避走香港。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78年，373—378页。

[272] 柳亚子当时分析说：“报上又载胡归代汪的谣言，其实此时的汉民，比精卫还要左些（旅俄华人创办的《前进报》，屡有胡言论发表）。反动派又想拥胡制汪，这是梦想而已。”柳亚子致柳无忌，1926年4月1日，《柳亚子家书》，373页。

[273]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2月27日、3月22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7、8页。陈洁如则说，事发后俄方曾有人来问蒋介石此举是针对汪精卫还是针对苏俄，蒋介石答是针对汪精卫。Chen Che-yu, "My Memoirs," pp. 302-303, 中译本，195—196页。

[274]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464页。

[275] 蒋介石致廖仲恺，1924年3月14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244页。

[276] Lewis S. Gannett, "Looking at America in China," *The Survey*, L (May 1926), pp. 181-82. 根氏后来成为名记者，当时虽尚未成大名，已初具影响。他与蒋的谈话发表在颇有影响的《概览》杂志1926年5月的东西方专号上，自然不会不引起美国国务院有关人员的重视（实际上此文正收在美国外交文件中）。据蒋介石自己的记载，他在1926年1月7日曾接见美国记者，谈约两小时，“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基督教之虚伪”（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594页），或即指此次见面。

[277] 参见：Jenkins to Kellogg, Mar. 27, Apr. 7, May 19, May 25, 1926,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10-1929", 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 No.329, (hereafter as SDF, including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10-1929", 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 No.339) 893.00/7358,/7400,/7469,/7473; MacMurray to Kellogg, May 4, 1926, SDF 893.00/7439. 此后的几个月中，精琦士对蒋介石的观感仍维持摇摆不定的状态。

[278] Jenkins to MacMurray, June 11, 1926, SDF 893.00/7522.

[279] Hallett Abend, *My life in China, 1926-1941*,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3, p.20.

[280] 杨汝楫：《奉告东省同胞》，《现代评论》，3卷56期（1926年1月2日），19页。

[281] 维岳：《粤省最近之政局》，《时报》，1926年3月8日，1版；执中：《粤战未起前之局面》，《晨报》，1926年3月16日（3月1日稿），5版。两则报道内容相近，后者较详。

[282]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464—465、468页。

[283] 本段与下段，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讲演》，1925年7月26日，收入《蒋中正先生演说集》，99—112页。

[284] 到国民党占领长江流域大部之后，一方面其控制地域的广阔使得苏俄物质援助显得数量渐少因而也就不那么重要（同时国民党也开始从中国金融中心上海以各种方式直接摄取钱财），另一方面列强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竟相做出亲南方的政策转变，致使实际层面的“帝国主义威胁”大大减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派系乃能决定与苏俄以及中共决裂。详另文，一些初步的讨论参见罗志田：《北伐前期美国政府对中国国民革命的认知与对策》，《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6期。

[285] 陈公博：《苦笑录》，66页。按邵力子似与鲍罗廷同时于4月29日抵粤，则此会召开应在此后。

[286] Chen Che-yu, "My Memoirs," pp. 305-18, 引文在pp. 305-06; 中译本，197—208页。

[287] 在穆辛当时的分类中，就视蒋介石为一方，而汪精卫、谭延闿、朱培德和宋子文为另一方。他虽认为双方的关系已破裂，但仍将两者皆看作“国民党左派”，主张“客观地把蒋介石看作是革命运动方面的一个重要力量”，以团结包括汪、蒋在内的整个左派。穆辛：《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210—211页。但穆辛认知中双方关系的“破裂”显然有误，破裂的只是蒋、汪关系，蒋成功地维持了与其余诸位的合作关系。

[288]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6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8—9页。

[289] 周恩来：《关于1924至1926年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119—121页。

[290]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31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9页。反之，蒋自己早在1924年尚未得势时就表示，他“虽不能料敌如神，决胜千里；然而进战退守，应变致方，自以为有一日之长。断不致临时纷乱，以陷危境”。参见蒋介石致孙中山，1924年3月2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235页。

[291] 索洛维约夫：《给加拉罕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178页。并参见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后》，《历史研究》1992年5期。

[292] 陈公博：《苦笑录》，60页。

[293] 但蒋同时又指出汪的“优柔寡断”使其“大权旁落，竟使事事陷于被动地位”。蒋介石致汪精卫，1926年4月9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041，卷号85。

[294] 罗加乔夫：《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234页。

[295] 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1926年8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369页。

[296]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2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8页。据蒋日记，谭延闿在3月20日明确对他的举动不以为然，蒋则认为这是其“书生浅见”。《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0日，同前刊前页。

[297]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4月11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9页。毛思诚所编书改为“广东现局，右派与共产两者之间显树敌帜，土匪与地方主义常伏暗礁，深用焦虑”。《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645页。

[298] 邵元冲等的回到中央是蒋介石和鲍罗廷妥协的后果之一，当部受命担任国民党青年部长、戴受任中山大学校长时，大多数真正的国民党左派试图抵制，而多数共产党人则因略知情而先有了思想准备。参见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272—278页。按本段所说广东，原件均译为广州，疑为误译，径改。又孙科一度被派往浙江联络孙传芳，蒋介石告诉未及与闻此事的谭延闿，此事“是弟提议，彼即赞成，并催其速行”（蒋介石致谭延闿，1926年4月10日，蒋中正档案，2010.10/4450.01-001-6），但在驱逐伍朝枢后得以继任其遗下的广州市长。

[299] 关于蒋介石这段时间的作为，还可参阅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后》，《历史研究》1992年5期；杨奎松：《蒋介石从“三·二〇”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2年6—7期。

[300] 蒋介石致谭延闿，1926年4月11日，蒋中正档案，2010.10/4450.01-001-7。

[301] 蒋介石：《中执委会闭会演词》，1926年5月22日，收入《蒋校长演讲集》，81页。

[302] 李宗仁于1926年5月到广州，仍发现那里崇俄风气仍甚，“俄国顾问们在广州真被敬若神明，尤其是鲍罗廷的公馆，大家都以一进为荣。一般干部如能和鲍某有片语交谈或同席共餐，都引为殊荣”（《李宗仁回忆录》，322页）。李宗仁的观察相当敏锐，实际上这个权力核心本身也是一个不随意开放的社交圈子，得以参与其中确实有助于政治竞争力的上升，参见前引陈洁如所述宋霭龄第一次请蒋介石夫妇吃饭使蒋大感兴奋事。

[303] 相对而言，这些人中只有孙科通常被认为是右派，然孙科多次主持广州市政，在民、财两权的“统一”方面主要是站在中央政府一边。而且，在所谓右派之粤籍人士中，向有以孙科为首的“太子派”和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之分，两者势同水火。“太子派”的聚会地是当时广州有名的南堤俱乐部，胡汉民派不敢入内，而廖仲恺和宋子文倒是常客。可知少壮的“太子派”本相对亲近左派。参见赖泽涵：《孙科与广州市的现代化》，收入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第7辑，97—98页。

[304]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282页。

[305] 美国人John M. Roots在1926年夏天曾访问广州，会见了不少国民党要人，也见到了鲍罗廷。他于是年秋在英国告诉胡适：鲍罗廷“极有见地，极有勇气；广州人士谈及他，无不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他并转述鲍罗廷的话说，蒋是一个好革命家（《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1926年10月14日，原书未标页）。可知到中山舰事件又数月后，蒋、鲍之间至少维持着尚可的工作关系。

[306] 第一军的一二两师作为总预备队留在蒋身边，这既增强了蒋的安全感，也削弱了军长何应钦直辖的力量。何应钦只能率领第一军余部驻守其潮汕地盘，同时防备可能来自福建方面的攻击；后因北伐出乎意料地顺利，在整体格局激变后改为向福建、浙江方向主动进攻，是为北伐的东征军。参见《东路军北伐作战纪实》，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81年，10—15页。

[307] 据李宗仁的回忆，第四军先出兵是在他鼓动下由李济深主动提出的，而其动员李济深的言辞相当值得玩味：“第四军乃广东的主人翁，主人且自告奋勇，出省效命疆场，驻粤其他友军系属客人地位，实无不参加北伐而在广东恋栈的道理。”李济深听了不禁“脱口而出，连声说赞成此一办法”（《李宗仁回忆录》，310页）。这一分析的思想基础正是广东的“土客矛盾”，主人出省乃是迫使客军离粤的先发制人手段，很能体现一些时人的心态和思路。

[308] 蒋大约未曾预料到湖南作战取胜会那样神速，故长沙攻克时他的总司令部尚滞留广州未发。待蒋急趋长沙时，则发现唐生智已在那里巩固自己的势力。身为总司令的蒋，不久即被迫放弃胜算在握的湖北战役的指挥权，不得不领偏师去进攻江西实力更强的孙传芳部。



外 编

条约体系的演进

# 帝国主义在中国：条约体系的文化认知

董必武在四十多年前提出，应该“去找一下‘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什么时候出现于中国论坛？那些用‘帝国主义’这个名词的人，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是否和我党的了解相同呢？”他的结论是倾向于否定的。<sup>[1]</sup>近代中国人对“帝国主义”认知的进程其实相当复杂，<sup>[2]</sup>可惜董必武的睿见未曾得到学界的关注，他提出的课题似乎也未见进行。实际上，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侵略这一曾经论述较多的议题，近年也相对淡出了。

回顾起来，至少在中国大陆，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的传统强项在经济层面，而文化层面相对薄弱。<sup>[3]</sup>且过去的研究明显侧重于实施侵略一方，而相对忽视侵略行为实施的场域以及侵略在当地的实施（通常在述及特定的“反帝”活动时才提到被侵略地区）。然而，不论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取向还是区域研究领域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取向，<sup>[4]</sup>都提示着应当更注意被侵略区域的当地因素。同时，任何侵略至少是两个或更多落在特定地域上的文化、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冲突，在重视这些体系所在空间因素的基础上，还要从时间视角去认识其多元互动的过程本身。

“帝国主义侵略”不仅是一个现象或状态，它更是一个充满变异的动态过程。具体到近代中国，“帝国主义侵略”不仅涉及负面还是正面“评价”的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其带来了什么、造成了什么及引发了什么的问题，对与此进程相关的丰富史事，我们迄今了解仍然不足，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认识。本文主要立足于帝国主义侵略所及的中国当地条件，更多从文化视角考察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形成及其发生作用的进程，特别侧重北伐前十年外力与内争在中国这一场域的纠结互动及其发展演化，简析这段时间中外格局的变与不变，大致形成一个中外关系的认识框架。

我想说明的是，这一认识框架并非固定的，而是发展中的，即其本身可能随时间以及特定场景的更易而波动。我所做的不是像许多社会科学那样先确立一项相对抽象的“理论”，然后以“事实”来验证（test）这一理论；本文注重历时性因素，既借助认识框架以考察不同时期的具体史事，也注意具体史事对认识框架的作用，即在史事影响下认识框架自身的确立、修改或发展。简言之，具体史事和认识框架始终处于互动之中。

## 1. 帝国主义间接控制：条约体系的文化解读

近代西潮东侵，中国士大夫多以为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迄今仍常被引用的名言当然不甚符合史实，却反映出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即不少中国士人逐渐认识到入侵的西人并不十分想亡中国，却立意要亡中国人的“天下”。<sup>[5]</sup>用今日的话说，这个“天下”就是中国文化；西方入侵者的目的主要不是变中国为殖民地，而是要在文化上征服中国，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习惯，以全面控制中国。<sup>[6]</sup>

从根本上言，帝国主义侵略国与被侵略国之间最关键的实质问题是对被侵略地区的全面控制。只要能达到实际的控制，是否直接掠夺领土是次要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侵略，但具体的侵略方式则千差万别。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悠久、中国朝野对外国入侵的持续有效抵制，<sup>[7]</sup>再加上入侵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相互竞争造成的均势，这些因素迫使列强逐渐认识到全面的领土掠夺既不合算也不可能。故其退而采取一种不那么直接的侵略方式，即以条约体系巩固其非正式的间接控制，<sup>[8]</sup>同时寄希望于文化渗透，<sup>[9]</sup>以为长久的经济利益铺路。

近代中外条约基本是武力威胁的结果，故所谓“间接控制”并未改变其帝国主义性质。而条约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具体的条文上，首先就体现在其主要反映战胜者的意志这一基本精神上。早期的帝国主义研究较多侧重实施侵略的一方，但恐怕更多是被侵略地的现实条件，而未必是侵略者的主观意愿，制约甚或决定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和特性。如罗宾逊（Ronald Robinson）所说，“有多少被侵略的地方，就有多少种歧异不同的帝国主义”。<sup>[10]</sup>

从入侵者视角看，在中国实施“间接控制”是依据实际情形最可行也是效益最高的取径。在被侵略方面，中国除一些割地和少量租界外，领土基本得以保持完整；不平等条约固然侵犯了部分中国主权，但基本的主权仍在中国人手中。若返回当时人的认知，我们今日注重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类近代传入的西方观念对晚清中国人似不十分要紧，他们更看重的恐怕是基本的纲常礼教和政治体制这一“国体”仍依其旧。<sup>[11]</sup>这个重要因素的意义是多重的：

帝国主义侵略所至，总要争夺被侵略国的文化控制权，一般是以贬低、打压甚至清洗等方式破除本土文化。在中国，因为没有直接的领土占据，不存在像殖民地那样的直接政治统治，西方也就不能像在殖民地那样直接地破除中国的本土文化，只能采取间接的渗透方式来获取文化控制；这就更需要不仅在物质上，且更多在文化上表现其优越性，以建立文化权势。故对文化控制的竞争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西人对此是有备而来，并有着特别针对中国纲常礼教的持续努力。<sup>[12]</sup>

另一方面，恰因上述因素的影响，中国士人对西方文化的仇视和抵制通常较殖民地人为轻。国体的持续和领土主权的基本完整，应该是士人确信中学可以为体的根本基础。由于不存在殖民地政府的直接压迫

和文化清洗，中国士人在面对西方压力时显然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更多的选择自由，同时也更能去主动接受和采纳外来的思想资源。故中国士人学习西方的愿望和实际行动都远比殖民地人要主动得多。<sup>[13]</sup>更由于中国士人未能充分认识到对文化控制的竞争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轻视了文化竞争的严重性，有些人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而日渐主动地破除自身的传统，实际成为西方打压中国文化的工具而不自觉。

再者，正是通过条约体系所建构的间接控制，外国在华存在（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既体现着一种外在的压迫，其本身又已内化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这一点越来越为中国人所认识到，清政府史无前例地援引义和团这一民间异端力量来对抗外国势力，部分即因其感到列强对中国内政的干预过分深入。<sup>[14]</sup>稍后一份四川办学纲要注意到：中外“交通既久，几于无事不与外人为缘”。<sup>[15]</sup>当孙中山在美国获悉辛亥革命的消息时，这位革命家不是疾速返国，而是转往英国以寻求可能抑制日本的帮助。詹森（Marius B. Jansen）敏锐地指出，这表明在中国领袖人物的认知中，外国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意义。<sup>[16]</sup>

若从文化视角看条约体系，鸦片战争后中外条约的订立，毋宁是开创了一种中外交涉的“方式”：简言之，即炮舰出条约，而条约代表胜者的意志；所能谈判的，只是反映胜者意志的程度而已。这才是最深层的也是最根本的不平等之处。早年中外谈判中道光帝觉得最不能忍受的，正是这种不平等的方式。<sup>[17]</sup>此后的中外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护、修改以至取消这一方式的长期斗争。然而，不平等的中外交涉方式既然由战争确立，实际上意味着条约的修订或废除多半需要诉诸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后来列强扩张权益的历次修约或订立新约是如此，中国方面亦然。

对清廷而言，每次条约修订，基本是外国利益的增强和中国权益的进一步损失，故其甚少主动提出修约。不过，费正清认为，这主要反映出所有的外中条约并未从根本上打破中国的政教体制，所以清廷既不看重条约，也不认为有必要修约。<sup>[18]</sup>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国朝野皆不断提出修约以回收主权。这表明中国人已逐渐接受西方思维，注重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远胜于往昔的“国体”；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承认条约这一形式的重要性，也试图以西方外交的常规方式来进行修改。<sup>[19]</sup>

但条约体系确立的中外交涉方式即使以西方常规价值观念看也不平等，故中国在谈判桌上的成功极其有限。到中国战场上已在使用飞机的北伐之时，北方首次以废除的方式终结中国与比利时的条约，南方的国民革命军更以武力为基础收回部分租界。或许这就是鸦片战争的历史意义之一：它不仅开启了一个时代，也设定了结束这一时代的方式。

从更深层次言，条约缔结方式和维护方式的不平等确立了西方在东亚外交的双重标准，即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西人可以不按西方自身的价值标准行事。章太炎就注意到，西方这些“始创自由平等于己国之人，即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sup>[20]</sup>只有在坚持欧洲文化优越观的基础上，才可以对“劣等”民族实施不同的准则而不觉违背了自己的价值观念。这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心态。<sup>[21]</sup>如柯亨（Philip D. Curtin）所指出的，对非西方地区采取例外法则（exceptionalism）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差不多所有分支的共相”。<sup>[22]</sup>

张之洞在庚子后对这种帝国主义已有所认识，他看出各国皆“视中华为另一种讨人嫌之异物，不以同类相待；必欲作践之制缚之剥削之，使不得自立为一国而后已”。<sup>[23]</sup>在个人方面，这类心态和行为在中国租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或可说已形成一种“租界行为”或“租界意识”。游历过欧西又久居上海这一租界集中的王韬深有感触地说：“西人在其国中，无不谦恭和蔼，诚实谨愿，循循然奉公守法；及一至中土，即翻然改其所为，竟有前后如出两人者。其周旋晋接也，无不傲慢侈肆；其颐指气使之慨，殊令人不可向迹。”<sup>[24]</sup>

当然，中国方面也并非尽皆关注入侵者那不平等待人的一面，许多人也看到或更看重外来者带入的新思想资源。在文化而非领土征服成为帝国主义者实际推行的取向时，真正文化控制通常都是在本土人士的主动配合下实现的（尽管配合者自己往往并未意识到他们所起的作用，甚或出于相反的动机）。严复便曾注意到所谓“内地西人”对“租界之西法”的主动配合，他说，清季维新督抚如袁世凯、岑春煊等推行的改革，虽“其所行自谓西法”，其实“非西国西法也，乃支那租界之西法。租界西人相聚为法，以束缚华人。袁、岑辈则为内地西人，而以西人之待华人者待其民”。<sup>[25]</sup>

此“租界之西法”的特征一是“束缚华人”，一是“非西国西法”；故这些“租界行为”表现出的“租界意识”，不仅对中国一方有所谓“东方主义”式的偏见，<sup>[26]</sup>其对西方基本价值观念也未必全面体认，实际已形成一套与西方基本价值时相冲突的思维和行为方式。<sup>[27]</sup>这些人虽是西方在中国实际存在的代表，表述着“西方”却又不完全等同于“西方”；<sup>[28]</sup>若以“租界意识”的产生地域看，指导这些西方代表行为的准则甚至可以说是“非西方”的。<sup>[29]</sup>

王韬尝解读“租界行为”说：“彼以为驾驭中国之人，惟势力可行耳，否则不吾畏也。”<sup>[30]</sup>这的确是近代在华外国人一条共享的“常识”，类似“武力是中国人唯一能理解的术语”这样的表述不断重复出现。据米勒（Stuart C. Miller）的研究，许多传教士不仅赞同这一观念，且他们自己在此观念的形成上也起了重要的作用。<sup>[31]</sup>主张学西方的郑观应承认传教士到中国意在“传教济人”，但以“救世之婆心”而造成大量教案，更常借条约和炮舰之“势力”以压官民，则“大失其传教劝善之本心”，也未必合于“上帝之心”。<sup>[32]</sup>



传教士之所以能不顾基督教反暴力的基本准则而在中国认同于炮舰政策，部分因为传教的最终目的正是精神征服，更主要还是其有西方文化优越观的支持，故能公开支持使用武力而不觉于心不安。传教士在意识层面未必都认同帝国主义，不少人来华传教确出于善意，但当中国士人对此好意冷淡甚而抵制时，传教士的文化优越感使其不能接受这样的态度。有传教士以为，中国人视西方为夷狄的作法是公开违背了“爱你的邻居如你本人”这条戒律，西方有义务“说服”中国人走到更加“符合其权利和义务”的方向上来。如果说说服不生效，就必须强制。<sup>[33]</sup>似乎中国人“犯规”在先，西方人也就可以不按其自身“规矩”对待中国人。

<sup>[34]</sup>一旦基督教爱邻如己的准则成为动武的基础，传教士也就走到其教义的对立面了，可知他们有意无意间也分享着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例外法则。另一方面，在后来不少中外冲突中，传教士和构成租界主要成分的商界又常常有着不同的主张；正因部分西人、特别是其文化先锋传教士不完全认同于炮舰政策和不平等条约体系，西方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远比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侵略更成功，其成功的程度基本上与其疏离于炮舰和条约的程度成正比。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方对中国采取了一种“凡可能说服时皆说服，不得已则强制”的方略。<sup>[35]</sup>这当然只是一种日后的理想型诠释模式，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整体“西方”事先就预定有这样清楚的谋略。不同国家不同的人可能根据不同的时势采取不同的对策。很多时候，强制和说服只是偶然地互补，而非事前预谋。

实际上，在华列强之间也有相当激烈的竞争，既为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势力范围，也为含义宽泛的文化“影响”。正是在更深层次的文化层面，潜伏着列强间分裂的隐忧。盖欧洲列强才真正分享着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文明”，不但日本常被排斥在外，就连俄国甚至美国有时也带有不够正统的意味。当罗素

（Bertrand Russell）告诉胡适专制比民主更适合于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农业国时，胡适便感觉到这对其自身的自由主义信仰有些不够“忠恕”。<sup>[36]</sup>实行于英国的制度可能真不一定适合于俄中两国，但罗素的主张仍隐约可见“例外法则”这一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子。<sup>[37]</sup>

几年后，进步主义思想家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将“东方”视为英、法、俄、美四个“西方帝国”纵横捭阖的场域。<sup>[38]</sup>这位著名的帝国主义批判者将社会主义的苏联纳入批判对象，却未包括正挑衅甚或颠覆东方既存政治格局的日本；他所批判的实际是一个作为侵略者的白种西方，而另一边则是作为受害者的黄种东方。日本在日俄战争击败沙俄之后便希望自己成为世界强国俱乐部中的一员，<sup>[39]</sup>但东西文化差异及其伴随的歧视一直妨碍日本被西方强国真正接受，这样一种连批判对象都不计入的“不平等”待遇或许出于善意，却触及到也揭示了日本长期对西方的不满之所在。

在处于中国这一文化悠久的异国时，列强或更容易感到上述潜在的文化隐忧；作为共同的外来者（outsiders），<sup>[40]</sup>它们似较在别处更强调团队精神和相互依赖性。<sup>[41]</sup>这就进一步促成了东亚（时人多遵欧洲习惯称为“远东”）在国际政治中那特殊的“例外”之处：在欧洲处于敌对关系的国家在亚洲却可以联合贷款给中国，这一现象被入江昭（Akira Iriye）称为“世界政治中远东的隔绝”。<sup>[42]</sup>换言之，由于列强和中国这一似乎更明显的“区分”，在欧洲的敌对关系到了亚洲即因此而暂时化解。这还只是出于谋利的主动一面，当条约体系面临中国挑战之时，列强为捍卫这一体系更容易联合在一起。

## 2. 华盛顿会议后中国内争与外力的纠结互动

列强间一个传统的看法是：中国应先实施内政特别是法律改革，维持（西方标准的）“正常”社会秩序，然后才谈得上考虑条约的修订。<sup>[43]</sup>然而，正如前文所引“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所揭示的，入侵的帝国主义本身就是中国秩序紊乱的主要造因之一。<sup>[44]</sup>更关键的是，任何大规模的政治、法律和社会改革必然意味着对既存权势结构的挑战，当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时，复因其依“例外法则”在中国实行双重标准，列强自身也是按西方标准不那么“正常”的中国政治法律秩序的构建者和维护者。在中国实行大规模的全面改革必然要涉及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此时列强是继续扮演改革推动者的角色？还是转换为既存秩序维护者的角色？

进而言之，当列强要求中国实行内部改革时，其依据的“国际准则”源自常规的“西方”；而外国在华存在本身行为的指导原则，又往往是类似租借意识等非常规的“西方”意识形态。帝国主义的非正式方式支撑了东亚国际秩序的“例外”或“特殊”，而隐伏于其间的观念和利益的既存冲突也造成了列强身份的困窘和错位；后者复使不同国家在特定具体场合可以采取未必一致的政策，预示了列强间合作的难以维持。

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国际政治秩序的大转变，列强势力因战局而改变，巴黎和会提供了一个按势力消长来重新划分各国世界地位的机会。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苏联的出现，对世界资本主义体制构成有力的挑战；新俄国虽未参加巴黎和会，却存在于多数与会者的头脑中。当列宁对全世界劳动者描绘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时，威尔逊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两人都提倡民族自决思想这样一种国际秩序的新观念，在不同程度上都反对既存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故有学者认为这意味着帝国主义时代的结束。<sup>[45]</sup>

国际秩序的新观念由威尔逊和列宁来提出，体现出西方范围内正统衰落、边缘兴起的态势，即原处边缘的美国和俄国向原居中央的西欧挑战。<sup>[46]</sup>从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范围言，至少在思想上，说帝国主义时代走向终结大致是不错的。但中国的情形有其特殊之处：正因为以条约体系为表征的帝国主义体制以非正式的间接控制为主，其帝国主义性质相对更隐蔽；更由于西方在中国推行例外法则，西方通行的处事方式并未全用于中国，在华帝国主义一直有其特异之处，故帝国主义在欧洲的“结束”并未迅速触及中国。

相反，尽管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没什么进一步的具体损失，至少在认知的层面，对中国人来说，和会结果提示的是帝国主义更明显的“存在”。在中国人心目中，帝国主义不仅未曾“结束”，实有加剧之势。威尔逊和列宁提出的国际秩序新观念对被侵略各国之人皆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双方也存在对追随者的争夺问题，关键在于谁能真正实行民族自决的思想，或至少推动其实行。<sup>[47]</sup>对中国大众而言，威尔逊正是在这里开始输给列宁。这一转折影响中国思想甚大，<sup>[48]</sup>与本文相关的直接后果是苏俄的反帝主张特别容易为中国人接受。

为解决巴黎和会关于东亚的遗留问题，1921—1922年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国际会议。美国长期提倡的门户开放，包括尊重中国的完整，被正式写入会议达成的系列文件，在法律上成为列强认可的原则；文件也正式否定了在华“势力范围”这种帝国主义行径（但不追溯既往），在法理上使列强不得增强既存势力范围，也不得谋求新势力范围；中国收回了山东的主权并可以赎回胶济铁路的所有权，取消了外国邮政电信，关税虽未自主，但可有提升，列强并同意考察中国司法状况以决定是否取消治外法权。<sup>[49]</sup>

这样的收获在近代中外条约史上可说是前所未有的，在一定程度上对积弱的中国有所保护。以中国当时的国情，取得这样的结果亦属来之不易。但中国在会上将各条约的不平等处尽行提出修改，却大部分未能实现。这就体现出华盛顿会议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列强基本上没有把中国作为东亚国际政治的一个正面因素来考虑，因而也就低估了民国代清以来中国内部革命性政治变动的重要性。

民初的中国局势确实继承了清季混乱多变的特征，其变化的突然和急剧不比前稍减。华盛顿会议一如既往地坚持了中国应先实施内部改革然后才考虑条约修订这一基本见解，其唯一的新意是要求列强予中国以安宁（即不以威胁方式扩充帝国主义权益），以便其实施内政改革。<sup>[50]</sup>

对列强而言，华盛顿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修复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改变的东亚国际关系。过去西方的研究对华盛顿会议形成的列强在华合作的取向强调稍过，实则所谓“华盛顿条约体系”的合作取向一开始就颇有缺陷，到1925年五卅运动后的关税、法权会议期间已基本消失殆尽。应该说，20世纪20年代以中国为场景的列强国际关系是典型的既竞争又合作的状态，而合作更多是在防卫和限制的一面，即每逢中国方面向条约体系挑战时，列强便易合作；<sup>[51]</sup>实际上，不少次列强的“合作”原本旨在遏制列强之一采取“过分”的行动以扩大某一国的势力。<sup>[52]</sup>

同时，“华盛顿条约体系”并未充分体认到外国在华势力构成本身的激变：德国和苏联未曾参与华盛顿会议，这两个大国在整个20年代推行着基本独立的中国政策，对“条约体系”形成了有力挑战。<sup>[53]</sup>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与中国间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已被废除。中德两国在1921年5月以新条约的形式确定了德国放弃原有的条约权利，而中国则予德国以最惠国待遇，使其仍享有他国所具有的利益。没有了治外法权保护，德国人在中国的安全不仅不比他人差，且成功地恢复了不少在一战期间失去的经济利益，复因放弃条约权利而获得中国人的好感，为其后来与国民党建立密切关系打下了基础。<sup>[54]</sup>

战后出现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开始就表示愿意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意识形态和具体作为都使其对条约体系的挑战更明显也更具冲击性。1924年5月中苏两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等文件，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苏联对领事裁判权的放弃和承认与中国订立关税条约时采用平等互让的原则，大大强化了中国与其他列强谈判的立场。此前的中德条约多少是战争的遗产，而中苏条约基本是通过平等的谈判所缔结，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中对中国最有利一次，可以说开启了近代中外关系史上新的一页。<sup>[55]</sup>

这样，一向被激进者视为北洋“太上政府”的外交使团中首次出现一个共产党国家的代表。苏联向中国派驻大使级驻华代表更凸显出这一象征性变化的实际意义：此前各国所派使节皆为公使级，按照外交惯例，在华使节中层级最高者应为外交使团的当然领袖，这就意味着苏联大使将成为驻华外交使团的代表。结果，所谓“东交民巷太上政府”很难再集体行使其惯性权势，<sup>[56]</sup>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的外国在华势力已不复为一个整体，中外关系的格局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奠定了此后南北两府修订中外不平等条约的基础。

中国与德、苏的新条约意味着已经运作多年的在华“条约体系”出现了巨大的缺漏，<sup>[57]</sup>同时也反映出中外关系可调适的余地甚大。德国人在中国的经历说明外国人无须治外法权的保护而能生活得很好，经济上也能获利。<sup>[58]</sup>凭借其建立的平等新关系，苏联可以在中国公开鼓吹和支持反帝运动，<sup>[59]</sup>然其通过中苏条约以及此后的奉俄条约实际保留了几乎所有的具体利益。后者提示出中国方面的修约要求可以是有限的和非常灵活的：中国朝野寻求的是主权，有时甚至可以是象征性的主权，而在具体利益上则可以做出较大的让步。<sup>[60]</sup>

在一定程度上，既然多数列强（日本除外）渐已放弃直接掠夺中国领土的取向，中国获得至少象征性的主权而列强基本维持其实际利益，大致符合以间接控制为主的在华帝国主义秩序。但一向被认为最重实



利的主要帝国主义列强似乎迟迟不能认识到中国修约要求的灵活性，恰揭示出中外交涉方面的文化意义有多么重大。

列强对领土掠夺的放弃使外交谈判的重要性大增，涉及具体利益时，任何列强都不会轻易放弃对其有利的条约权利。然所谓“有利”，包括实际有利和以为有利（imaginary advantages），<sup>[61]</sup>20世纪上半叶中外交涉的大量史实证明，即使是那些早就对外国在华利益不起实际保护作用的条款，列强也不轻言放弃。由于许多条约“利益”已是想像多于实际，中外修约谈判中双方所争的常常不是具体利益的得失，而更多是中外交往应奉行怎样一种“方式”。说到底，这是一种文化竞争。那时的中外谈判常常因一些今日看来极细小的问题而搁置，就因为对谈判双方来说，这些细小问题都有着深远得多的文化含义。

文化因素的影响虽深远却不甚明晰，各国外交更直接受到本国政治体制的约束。在西欧和美国，政治体制比较稳定，但以代议制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对外交有着明显的限制，内部的不同意见强烈影响着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许多时候外交策略的思考其实是在因应国内的党派政治需要。而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日本和中国都多少面临着旧政治体制已去而新政治体制尚未充分确立的状况。<sup>[62]</sup>本来任一大国的内部政治激变都会影响到其所在地区的国际秩序，在东亚，不仅中国和日本都处于不同程度的政治大变动之中，横跨欧亚的苏俄也尚未结束其内部政治秩序的调整，这就大大增强了这一区域国际关系的不稳定因素。

政治体制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动荡程度，动荡的社会反过来又为形成中的政治秩序增添了变数。在这样的社会里，新思想的产生更少限制，其发展有着更广阔的空间，但不同思想观念的竞争也往往更加激烈。更重要的是，超常规和非常规的主张和行为很容易出现，而相关职能机构按常规制定决策和推行其策略反不时被忽视甚至颠覆。

中国的乱相又特别明显，政治和社会的“革命性”（主要指既存规范的失效）超过日、俄两国，甚至不时缺乏一个名副其实的有效中央政府。当时中国各军政力量基本重在内争，其首要目标是扩充自身势力甚至统一全国，与历代中原逐鹿并无大的差别。但是，这一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政治竞争是在与历代大不相同的背景下进行的，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即在于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故即使是纯粹内部的“改朝换代”，任何对既存权势结构的挑战都要涉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实际也构成对条约体系的冲击，致使中国内争和外力的纠结和互动远甚于他国。<sup>[63]</sup>

这样复杂的局势困扰着中国思想界，杜亚泉在1918年已虑及外国势力可能不容中国平静地改革，他在讨论中国新旧势力之争时说，“武人官僚，倚仗旧势力，以斫伐国家生命，惟恐其勿尽”；同时可能“将有外来之势力，加于吾国之上，以绝吾国之生命；不能更有机会，容待吾国发生新势力，以营代偿作用”。<sup>[64]</sup>今日一般视为“保守”的杜氏在五卅学生运动前已观察到“武人官僚”、“旧势力”和“外来势力”的关联及相互支持的一面，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当年中国思想界的确趋向激进。

这也说明，一些中国读书人对那时内争和外力的纠结已有较清晰的认知。陈独秀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已注意到因交通发达而出现的“全球化”趋势：“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sup>[65]</sup>当时的“全球化”程度与今日相比所差甚远，很可能是外国在华势力深入中国权势结构的现象让陈独秀在八十多年前就思考到“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变更与“世界”的关联。

当中共于1922年发出反帝为主旨的“二大宣言”时，<sup>[66]</sup>胡适撰文回应说，民国以来列强对中国的态度有明显改变，列强在清末还想征服统治中国，但日本势力在远东的一再扩充和中国民族的一步步自觉使远东局面大变，不仅“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而且“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故中国人可以不必担心列强的侵略，且“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若国内政局纷乱，列强自然也不会放弃其权益。一句话，内部“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sup>[67]</sup>

胡适的主张相当接近华盛顿会议的精神，但他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因素，即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即使是纯粹内部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的努力，只要含有对既存权势结构挑战之意，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他自己稍后就发现，连谈“全国会议、息兵、宪法”这类具体的“问题”，都“势必引起外人的误解”，<sup>[68]</sup>可见“外人”在中国涉足极深，已全面“介入”到中国权力结构之中。故有人明确指出：“内政与外交，在我国今日实已打成一片，不可复分。”<sup>[69]</sup>

中共方面随即由张国焘发表长文对胡适进行系统反驳，张氏也注意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已由19世纪的武力为主转变为经济为主，后者“既省钱，又省力，还不易引起重大的反感”；但他认为经济侵略比武力侵略更危险，因为列强对中国市场的竞争已造成一种“相互竞争的侵略”。且帝国主义是军阀政治的后台，故“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敌人，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为了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为了中国的独立和自由，非急速打倒他不可”。若不“打倒英美日等国的对华侵略主义，不足以改造国内政治”。<sup>[70]</sup>

不论先反帝还是先实施内政改革，双方的共同点是承认帝国主义侵略方式有所变更，而中国的内政与外国在华存在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双方的分歧更有相当的代表性，体现出中国社会或思想界对“外国在华存在”那双重身份的困惑：胡适等人或者更多看到其作为改革推动者的一面，而从杜亚泉到中共这些人则明显将其视为中国既存秩序的维护者。<sup>[71]</sup>

要求中国先改革内政然后考虑条约修订的“华盛顿会议精神”反映出列强仍更多看到中国的乱相，却未



能仔细观察和认真考虑与此相伴随的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疾速变化，<sup>[72]</sup>特别是中国民族主义那御外和内部整合并存的两面性（许多知识精英及其民众追随者既要求国内政治体制的改革，也愈来愈强烈地希望中国完全掌握自己的主权）。<sup>[73]</sup>中国政府或任何中国政治力量必须先给人以“得道”的形象，然后才能致力于“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并整合离散中的社会秩序。修订不平等条约以恢复中国主权恰是“得道”的最佳方式之一，也渐成必须的步骤。<sup>[74]</sup>

这样，华盛顿会议上中国虽颇有所获，但已不能满足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那些收获因法国以金法朗案迟迟不批准《九国公约》而名至实未归，使中国方面的外交成就感日益淡薄，对列强的不满却与日俱增。<sup>[75]</sup>正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不协调不合作阻碍了华盛顿会议精神的落实，并进一步打击了巴黎和会后已大为削弱的中国“自由主义派”在国内政治上的发言权，此派言论的缺乏说服力当然也就使中外关系方面更为激进的主张得以扩大影响。<sup>[76]</sup>

北伐前夕的中外关系既然处于如此变幻莫测的混乱格局之中，列强间的合作实难以维持，任何外国也很难有多么具体的政策，尤其不可能有预先制定的长远政策。各国只有根据局势的演变及其所面临的新问题，不断调整原有的政策原则。正如帝国主义侵略所及区域限定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式一样，中国局势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这一地区国际关系的走向；<sup>[77]</sup>同时，入侵的帝国主义既是中国秩序紊乱的造因之一，又是中国既存权势的一部分，这样一种内外因素的特殊结合使中国问题不时呈现“国际化”意味，<sup>[78]</sup>两者的关联互动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仍在继续发展。

原刊《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5期，略有增补更易

# 李锦纶使美与中美双方促进南北合作谈判修约的尝试，1927—1928

1927年秋，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派遣政务司长李锦纶（Frank W. Lee）作为政府代表使美。李氏以“非正式”的名义与美国国务院官员频繁会谈，实际开启了国民党与美国政府在华盛顿的官方接触，并推动了一项包括中国南北政府和美国三方共同参与的尝试，试图组成一个南北联合的中国代表团与美国谈判条约修订。这一努力虽然为时不长也未获成功，但仍揭示出当年中国政治、外交和中美关系一些微妙的面相，并标志着美国对华关系的关注重心在北伐取得全面军事胜利之前已出现由北向南的转移。

## 1. 引言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局势以混乱多变为特征，尤以变化的突然和急剧著称。若再将眼光向外扩展，邻近的俄国和日本也处于与中国相类的政治调整阶段，即旧政治体制已去而新政治体制尚未充分确立。三大国的内部政治大变动，虽然程度不同，但同样大大增强了这一区域国际关系的不稳定因素。而中国的乱相又更明显，甚至不时缺乏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央有效政府。在这样的动荡社会里，很容易出现非常规或超常规的主张和行为，而相关职能机构按常规决策和推行策略反时被忽视，甚至被颠覆，故中国政治行为的“革命性”（主要指既存规范的失效）又超过日、俄两国。华盛顿会议后列强对中国“让步”的迟缓，更使中外关系方面偏激进的主张易于为人所接受。<sup>[79]</sup>

要充分理解这段时间的中外关系，就必须将其置于革命性的国内政治斗争这个大语境之中。特别是那时如日中天的中国民族主义兼具御外和内部整合的两面性，任何中国政治力量都希望给人以“得道”的形象，以增强其在内部政治竞争中的正当性。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已成为那时中国政治活动的一个倾向，修订不平等条约以恢复中国主权正是“得道”的最佳方式之一，南北两政府在这方面都不愿落后。另一方面，有些具体的条约修订，特别是华盛顿会议提出的关税提升，对中央或任何区域性的政府都意味着实际的收益，也鼓励了当政各方修约的积极性。

这段时间通常被称为“革命外交”的国民党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与国内权势斗争——包括南北之间的争夺和国民革命事业内部的斗争——纠缠在一起，故国民党的对外决策经常未必从外交利弊的技术层面考虑，而往往受制于内争方面的因素。再加上这段时间国民党的派系斗争极其复杂，各派系的外交取向并不一致；在不同环境下，各派在具体事件中不仅频繁转换立场，有时且转换得非常突然，更使其外交政策相当令人困惑。而北伐期间国民政府外交部并非始终掌握在主要当权派手中，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要明确界定“国民党外交政策”的困难。

如此复杂的当地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式和特性，也制约着这一地区国际关系的走向。面临新的问题和变幻莫测的局势，任何外国除了大的原则外，很难产生什么预先制定的长远政策，反不能不依据在地局势的转变而不断调整其原有的政策，故当时主要列强的对华政策也以多变为特征。不过，从1926年底到1927年初，随着北伐战争那超出一般人预想的胜利，英、日、美等主要列强竞相试图在中国树立一个“开明的形象”，并且都有偏向南方的举措，是那时的一个共相。

除具有上述中外关系的共同特点外，北伐时的中美关系还有一个自身的背景因素，即驻北京使馆与华盛顿的国务院之间长期存在意见分歧。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V. A. MacMurray）从他1925年到任开始，几乎在每一件较大的事件上都不断与国务院发生政策争执。相对而言，身处中国的马慕瑞更多看到当地乱相对美国利益的威胁，他不甚倾向于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要求让步，也不怎么看好国民党一边；而国务卿凯洛格（Frank B. Kellogg）领导下的国务院面临着美国国内对中国的同情舆论和参众两院对行政方面的压力（类似压力在1927年春达到高潮），相对更愿意因应中国内部局势的发展。

1927年3月“南京事件”的爆发使美国内部的压力大减，同年4月的“四·一二事变”及其后的“清党”导致宁汉分裂，使国务院大致形成一种对中国局势的观望政策。1927年秋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内形成“宁汉合流”，胡汉民派的伍朝枢控制了外交部。伍氏对美国的重视显然超过蒋和国民党左派，他正式派政务司长李锦纶使美。李氏在华盛顿与美国政府有过一段频繁的接触，此事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美国方面研究不多，<sup>[80]</sup>中文研究似更薄弱，<sup>[81]</sup>还有进一步考察的余地。

应该说，伍朝枢争取美国友谊的一个目的，或许是加强其本人和胡汉民派在彼时为桂系军人控制的南京政府中的地位；且伍氏之掌权既在此短暂的非常时期，其所作为或只能代表国民党外交的一股支流。但李锦纶此次使美毕竟开启了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在华盛顿的官方接触，并推动了一项中国南北政府和美国三方的共同努力，即尝试组成一个包括中国南北双方的代表团来和美国谈判条约的修订。这一努力虽然为时不长，且可以说是以失败告终，但仍提示出当年中国政治、外交和中美关系一些微妙的面相。

## 2. 李锦纶使美

关于组织一个南北双方的共同代表团来处理中外交涉的尝试早已开始，至少在1926年底，北京政府任命的驻美公使施肇基就告诉凯洛格，他或可能促成一个南北双方的共同机构来谈判关税事宜，而且英国和日本都表示了对此举的支持。<sup>[82]</sup>1927年初，英国公使蓝普森（Miles Lampson）在和梁士诒会见时，梁就说北方正试图与南方的右派结合，即使正式的结合不成功，也还可以“设一南北外交联合会，召集南北要人讨论对外一致”。蓝普森当即代表英政府表态说，“如此会能今日成立，吾人明日即可与之进行磋商”；而“在此会成立之前，可双方同时进行交涉”。<sup>[83]</sup>

但南北联合外交的困难也是明显的：马慕瑞在1927年3月曾向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询问，施肇基是否真能代表统一的中国说话，甚或他这类努力是否能代表北京政府？顾的回答是，施可以反映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但其努力肯定不是北京政府的正式行为。<sup>[84]</sup>在南方，蒋介石控制国民政府之时，不论是作为敌人还是朋友，美国都只有二流地位。马慕瑞在1927年2月正确地认识到，“在中国人的对外关系中，他们更看重英国和日本的作用”。<sup>[85]</sup>

国民党人主动接近美国始于伍朝枢执掌外交部之时。尽管伍氏在1927年4月宁汉分立后就被任命为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5月上任），但在蒋介石控制政府时期，他的权力相当有限。同年8月蒋辞职后，当其他在位的将军们忙于内部权力的竞争和分配时，伍朝枢在国民党内政和外交方面的发言权都有所增强。伍氏或许意识到，他在内阁中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他在对外事务上的成就。由于感觉到美国公使马慕瑞对南京政权的冷淡，伍朝枢开始尝试直接与华盛顿打交道。通过太平洋关系学会（the Pacific Council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主席威尔伯（Ray L. Wilbur）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禄（Paul Monroe）等中间人的帮助，伍朝枢的代表韦瑟（Sidney K. Wei）于9月13日见到了新升任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詹森（Nelson T. Johnson）。到10月间，詹森非正式地会见了南京政府赴美的正式代表李锦纶。<sup>[86]</sup>

作为国民政府在华盛顿的最高外交官，李锦纶与詹森的会见也就开启了南京与华盛顿的非正式官方接触。李锦纶的使命，首先是让美国“了解国民政府的事业”。南京希望美国能了解，其所进行的“事业”与苏俄布尔什维克无关，而是“为实现已牢固植入美国精神中的同样民主理想而奋斗”。其次，他应谋求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承认，法律上或事实上的承认皆可。第三，李锦纶要推动美国与南京政府就全面的条约修订问题进行谈判。他应该竭力说动美国人，如果进行这样的谈判并“推进两国的友谊”，美国将获得“显著的利益”。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南京事件”，李锦纶实际被授权告知美国人，南京愿意承担事件的全部责任。最后，政府也希望李锦纶便中探寻美国参与中国经济建设——其实就是对南京方面提供援助——的可能性。<sup>[87]</sup>

国民党人显然认识到美国政府尚未看好他们，故伍朝枢也指示李锦纶与北京政府任命的驻美公使施肇基合作，组成一个南北联合外交委员会与美国进行谈判。这一精神大致符合美国国务院当时的策略，1927年秋回到华盛顿的马慕瑞在检讨中美关系时，曾主动提出“越过中线”去与一个包括南北双方的中国代表团谈判关税事宜。马慕瑞基本上自己起草了国务院给他的指令，授权他去推动中国方面组成一个这样的联合代表团并与之谈判。<sup>[88]</sup>

考虑到马慕瑞对中国局势的悲观以及他一向不喜欢国民党人，他能提出这一方策既显示了他的职业素养，也表明了他希望与国务卿凯洛格合作的意愿；这甚至可能是他的一个战术，即希望从华盛顿那里赢得对中美谈判的决定权。马慕瑞起草的指令强调，他在谈判中应持坚定的立场；然而在究竟什么是坚定的立场这一点上，他和国务院之间缺乏共识，很快发展成双方的相互不满。无论如何，在李锦纶访美时，伍朝枢关于组成一个南北共同代表团与美国谈判修约的建议的确得到了美国 and 北京两方面的积极回应。

驻美公使施肇基的态度有些微妙，他先前就曾帮助安排南方代表韦瑟与助理国务卿詹森的会面。中国北方报纸关于李锦纶使命的消息先说是来自施肇基的报告，但北京政府外交部随即否认曾就此事与施公使联络，并表示政府“对于此事尚不甚注意”。<sup>[89]</sup>实际上，施肇基此时的确在与李锦纶合作，两人很快成为南北联合外交的推动者。根据美国记者索克思（George E. Sokolsky）的说法，施肇基本人更是联合外交的最主要策动者（索克思当年以熟知中国政治内情而著称）。基本上，北方类似的态度是持续的。后来奉军总参议杨宇霆在寻求与美国军事合作时，也曾表示希望美国能“废弃不平等条约并与中国南北双方谈判新约”。<sup>[90]</sup>

李锦纶和施肇基很快产生出一个以施肇基为首，包括李锦纶和余日章的三人委员会。余日章是上海著名的基督徒，也是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成员；<sup>[91]</sup>他在上海的涉外知识精英社群中十分活跃，而且与宋氏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并未正式参与国民革命事业，相对中立于南北两方。伍朝枢立即批准了三人委员会的成立，并同意任命施肇基兼代表南京政府，对此连李锦纶都感到惊讶。施肇基继而提出北京方面可能还会任命其他一些代表团成员，这意味着北方不仅担任代表团首领，而且可能在其中占据多数席位。伍朝枢再次迅速同意了施肇基的要求，体现了强烈的合作意向。<sup>[92]</sup>

施肇基和李锦纶对国务院说，由于国民党实行清共并与苏联决裂，国民政府非常需要外交支援；而与北方联合开展外交的取向在南京政府内正受到激进分子的严厉批评，他们希望美国能通过公开表示愿意谈判修约，对中国方面的主动行为予以鼓励。詹森的态度比较谨慎，避免做出任何确切的承诺；但凯洛格似乎被施、李二人体现出的南北合作精神所感动，他致电马慕瑞说，如果这个代表团真正联合了南北双方，他愿意兑现自己在一月声明中提出的与中国人谈判的允诺。凯洛格乐观地指出，美国表示出与中国联合代表团谈判的意愿可能带来好些光明的前景：一、导致中国的南北双方进一步接近，为结束中国内战打下基



础（这是李锦纶提供的观点）；二、缓和中国人的排外情绪；三、使那些给国务院施压要求向中国让步的美国人感到满意。<sup>[93]</sup>

几天后，李锦纶报告了组成南北联合代表团的新进展。事情在华盛顿似乎进行得相当顺利。但是马慕瑞立刻提出抗议，认为凯洛格没有向中国人表达清楚：一、谈判仅限于关税事宜；二、“谈判应在中国进行”。马慕瑞强调，这两点都是本质性的要点，后者尤其关系到政府对驻外使节的信任问题（即谈判不在中国进行可能意味着马慕瑞已失去国务院的信任）。在这样的情绪下，当一个北京官员到马慕瑞那里要求核实关于美国将与联合代表团谈判的消息时，马慕瑞消极地告诉他，他获得的消息并不能证实此事，凯洛格不过是愿意“考虑”组成联合代表团的的要求而已。<sup>[94]</sup>

但是，还没等马慕瑞寄出他的抗议，中国的局势已经完全改变了。伍朝枢在获取美国友谊方面的进展似乎未能对他在国内的政治竞争起到多少帮助作用。1928年初，蒋介石在黄郛等相对偏右的所谓“北方国民党”和多少仍偏左的宋子文及宋氏家族成员（宋庆龄除外）的支持下取得内部斗争的胜利而正式复出，伍朝枢被派往美国担任改订条约的特使，而且他还是先从报纸上看到对自己的任命。<sup>[95]</sup>从这一任命可以看出，蒋介石此时仍未特别重视对美关系，且他也不认为在华盛顿的联合代表团能马上收到实效（如果真有迅速获利的可能，蒋显然不会让伍朝枢独享其成）。

虽然伍朝枢被告知他仍担任外交部长，不过暂以郭泰祺代理外交部部务，但这一位置很快落到黄郛手里。一方面，据说黄提出了这一要求作为重新参与蒋政治团体的条件；更重要的是，正在筹划重新北伐的蒋介石需要一个能与日本打交道的外交部长。詹森对伍朝枢新使命的反应是正面的，他告诉李锦纶，如果南京政府派其外长来华盛顿谈判，会被视为具有诚意的表现。但伍朝枢没有接受这一前往华盛顿的任命，他和胡汉民、孙科等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基本是国民党右派，多数是广东人）一起转道前往欧洲。<sup>[96]</sup>

### 3. 国民党内争与中美关系

胡汉民、孙科等广东籍右翼人士的被迫出走，意味着国民党内权力竞争又一个回合的结束。由于广州、武汉时期的国民党左、右翼先后失势，新的南京政府中很快即出现以外交部长黄郛和财政部长宋子文为首的新一轮派系之争。黄郛本人虽未加入国民党，但向被人视为“北方国民党”的核心人物。他多次参加北京内阁，在冯玉祥“北京政变”时曾一度主持内阁，这些在北方活动的经历及其与国民党内“老官僚”的关系有助于建立某种南北之间的工作关系，但在南方那些被索克思称为“有新思想的中国人”眼中，这却是负面的因素。<sup>[97]</sup>

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说，黄、宋之间的竞争是国民党内左右翼斗争的继续，但这次的“右翼”几乎全由新的成员组成，而残存的“左翼”也比以前温和太多。两派之间既是国民革命事业之内的新旧之争，也是留美派和留日派之间的竞争（类似的竞争也存在于全国范围的政治、金融、思想和教育等领域之中）。双方的纠葛异常错综复杂，故虽然宋常被视为“亲美”而黄被认为“亲日”，有时宋子文却会反对某些黄郛参与或支持的中美接近。这样，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及文化竞争与外国对华影响纠结在一起；而这些内部斗争又常常影响、制约甚至决定着外交政策的实施。

黄郛的权力上升意味着国民党内一种强化对日关系以利北伐的取向，这也表明蒋介石此时对美国兴趣仍然不大。此前由伍朝枢推动的南北联合外交自然陷于停顿，新形势很快影响到李锦纶在华盛顿的努力，他的处境变得困难而尴尬。三天前才告诉詹森南北联合代表团的组成已基本完成的李氏，现在不得不重新通报詹森：局势起了变化，任何与北京一起安排联合代表团的任命事宜都变得非常困难了。李锦纶此前曾以为蒋介石宣称继续北伐不过是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现在他只能对詹森说，中美之间修订条约的谈判恐怕不能不延期到北伐军占领北京以后了。李本人会留在华盛顿继续他与国务院的接触，同时等待其新上司的进一步指示。<sup>[98]</sup>

实际上，李锦纶的使命从一开始就不时出现尴尬的局面。当他在华盛顿与美国人讨论组成一个南北双方的联合代表团之时，他却无法隐瞒南方的国民政府内部并不那么团结这一事实。每一次他都向美国人尽量表示自己确信国民政府内既稳定又团结，但他又不能不同时通报自前次谈话以来国民革命事业内部所出现的不稳定和分裂倾向。最令他尴尬的是，作为国民政府代表的李氏，有时甚至不得不向美国人探询南京方面形势的新变化。很快，在他和国务院官员的谈话中，关于条约修订的谈判的内容越来越少，而更多则是交换双方关于中国局势进展的新讯息。<sup>[99]</sup>

蒋介石和黄郛当然了解伍朝枢正与北京方面协作推动某种联合外交，他们也知道由黄郛取代伍朝枢这种人员更易可能导致整个努力的流产，但他们或感觉这方面的损失可以接受，并可通过与日本建立某种工作关系来弥补。另一方面，蒋、黄也并非完全排斥南北联合外交这一模式，尤其当他们正在积极筹备继续北伐却又尚未发动之时。如果南北联合外交可能给他们带来好处，特别是可能对北伐有实际的帮助，新政府也愿意进行尝试。

当时确有这样的机会。先是署理海关总税务司易纨士（Arthur H. F. Edwards）提出了一个南北合作实行关税自主的动议，他表示，如果这样的计划得以实施，南北政府所得的实际税收数额都可以大幅度增加。

这一动议对南北双方都有较大的吸引力，黄郛与北方的个人关系以及许多原北方的外交官员改投入南京外交部，也使得实行某种南北联合外交变得更可能。<sup>[100]</sup>

很快，李锦纶又恢复了与美国人讨论南北联合外交事宜。而施肇基则派出郭秉文代表他到上海与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中国成员探讨如何进一步推动南北联合外交。李锦纶告诉美国人，南京倾向于在华盛顿开展中美谈判，而北京则希望谈判在中国进行。李氏个人更赞同北京的意见，因为这会使一般中国人更了解事态的进展；但他也指出，在中国要找到一个南北双方都能接受的谈判地点是很困难的。可能是考虑了马慕瑞此前的抗议，詹森也认为谈判应在中国进行。<sup>[101]</sup>在中国，马慕瑞明确表态，他“原则上”赞同易纨士关于关税的提议。<sup>[102]</sup>

但易纨士的努力却因卷入了南京方面的内争而最终未获成功。原来易纨士先向外交部长黄郛提出了他的建议，结果这一黄郛推动之事遭到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强烈反对。宋子文宣布，任何国民政府辖区内与关税相关的事宜，他只与上海税务司梅乐和（Frederick W. Maze）打交道。宋子文的立场实际扼杀了易纨士的努力，因为只有在1928年初国民政府内部尚在重新分配权力和调整对北方政策的短暂时间里，才可能接受某种形式的南北联合外交。一旦国民党人的内部纷争有了结果并确定了继续北伐的决策，南京就不可能再接受任何与北方联合的举措了。易纨士只能承认其计划失败，他并为自己选择接触对象的失误付出了职业生涯的代价：几个月后国民政府执掌全国权力时，宋子文任命梅乐和取代易纨士，成为新的海关总税务司。<sup>[103]</sup>

在南京，宋黄之争既限制了黄郛在国民政府中的权力，也减少了蒋介石的回旋余地。蒋与黄的接近不仅招致他妻舅的消极抵制，更一度导致宋子文向新桂系提供财政援助，后者是蒋在国民革命阵营内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当然，只要蒋黄合作以安稳日本的取向奏效，且蒋能成功完成北伐，总体局势还是对蒋、黄有利。但由于不能排除北伐途中与日本冲突的可能性，黄郛也需要与英美达成某种谅解，俾一旦出现中日冲突时或可使日本疏离于主要列强。在他的老朋友福开森（John C. Ferguson）的帮助下，黄郛认识到，与英美解决“南京事件”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sup>[104]</sup>

尽管伍朝枢在1927年秋就向美国方面表示了国民政府愿意解决“南京事件”的意向，国务院或觉察到伍氏在军人控制的南京政权中力量有限，没有表现出多少与他认真进行谈判的兴趣。不过，中英之间关于解决“南京事件”的谈判从1927年以来一直在进行。到1928年春，中英双方都表现出解决问题的更多诚意和更灵活的态度，但在谈判最后阶段，英国公使蓝普森和黄郛达成的协议却未得到伦敦的批准。蓝普森个人认为这一协议是合理的，他不希望长期努力的成果灰飞烟灭，乃致函马慕瑞，敦促他在中英协议的基础上推动中美谈判。马慕瑞抓住了机会，很快与黄郛在上海签署了协议。<sup>[105]</sup>

中美之间就解决“南京事件”迅速达成协议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国民政府正向美国示好，其实这恐怕是个误会。黄郛和南京政府当然需要解决南京事件的悬案，但也仅此而已。马慕瑞在1927年春曾访问长江流域，但他发现，他的长江之行整体上未曾得到国民政府方面特别的重视。马慕瑞曾提议他本人访问南京并出席重开当地美国领事馆的仪式，却未得到南京方面热情回应。他拟议中对南京的访问在最后关头因为某些技术性安排不成功而流产（蒋介石在马慕瑞预计到达前数天离开南京赴前线，据说蒋不在则无法安排美领馆重开所需的军事仪仗队）。其实南京方面的权势争夺是导致这次中美接近失败的重要原因，黄本人在南京政府里的人望并不特别好，蒋的离开进一步削弱了黄的影响。而如果蒋介石真希望培育中美友谊，他完全可以在南京多待几天。<sup>[106]</sup>

美国公使访问南京的提议本来给国民党提供了一个加强与美国关系的良机。实际上，南京方面可以从美国公使的访问中获得很多东西：这可以被宣传为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甚至某种非正式的承认。但这一切南京都主动放弃了。在1927年11月蒋介石与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布里斯托（Mark L. Bristol）海军上将谈话时，他曾提起美国援助甚至派遣顾问的议题，不过那更像是一种礼仪性的善意表示。后者实际不很成功，布里斯托告诉马慕瑞，蒋无论在个性还是在智慧方面都没给他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1928年1月，蒋的参谋长何应钦曾去拜会了布里斯托，但布里斯托试图回访何应钦时却吃了闭门羹。<sup>[107]</sup>

所有这些说明，国民党不过把南京事件的解决视为减缓中外紧张关系的战术运作，达到目的后即不再向前推进。蒋介石对美国人虽客气但仍忽视，且决无依靠华盛顿之意；其他国民党将军也对美国兴趣不大，南京外交的真正中心仍是日本。比较起来，伍朝枢和太平洋关系学会那些有着外国背景的知识精英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更看重美国的作用。当国民政府后来急需美国支持时，正是这些“亲美”因素结合起来促成了国民党与美国关系的接近。<sup>[108]</sup>不过那都是后来的发展，这次伍朝枢采取的政策未必是国民党外交的主流，与蒋介石一派没有什么关系。

## 4. 余论：人物及相关因素

可以看出，1927—1928年间中国的南北双方都曾颇有诚意地尝试了推动南北合作与美国谈判修约的努力，这一努力未获成功的原因较多，主要因为南京方面的发起者在国民革命事业的内部权力竞争中失败，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当权者那时对美国的重视不够，故整个举动未能在国民党内获得持续而有力的



支持；部分也因为李锦纶代表着技术型官员那种政治倾向不甚明显的职业外交风格，而当时国民党推行的更多是一种“革命型”的政治，整个国民政府的管理也尚未形成一种较常规的职业官吏体制。

这一尝试虽然未获成功，但李锦纶访美仍有收获。它开启了南京政府与美国国务院的官方接触，尽管是在“非正式”的名义之下；除了与国务院官员的频繁会谈，生长于美国的李锦纶得以发挥其语言和文化的长处，在华盛顿开展广泛的外交活动，包括游说国会要员和联络各类有影响的民间机构等。整体上，李锦纶访美与中美双方推动谈判修约的努力多少标志着美国对华关系的关注重心由北向南的转移，而且是在北伐取得全面军事胜利之前。

在美国方面，这一努力表明美国政府对华局势的因应比既存研究所述要更积极一些，尤其国务卿凯洛格确有履行其1927年1月声明的意愿。而且，尽管马慕瑞仍不看好国民党人，但正是他本人的提议推动了整个进程，体现出他能压抑自己的个人好恶而推进事业的职业素养。不过，这样的压抑毕竟有些勉强，难以产生积极的动力，有时甚至可能失效。马慕瑞个人的消极态度恐怕也是导致南北联合外交失败的一个因素，下面的一个例子便可说明这一点。

先是马慕瑞在1927年秋曾接到指令，应寻求机会同时与中国各方的代表进行关税事宜的谈判。现存记录未见他立刻与中国的任何方面进行了接触，直到1928年2月，他才首次和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王荫泰谈及此事，而王氏随即被罗文干取代。在同年2月26日与黄郛谈话时，马慕瑞表述了几种中美谈判的可能性：南北政府中任何一个获取全国统一，美国便可以与其谈判；同时美国也可以和一个南北双方的联合代表团谈判。尽管马慕瑞在向国务院的报告中说他表达了美国同时与中国各方谈判的意愿，而黄郛对“他所提出的各种可能均未做出具体回应”。但是在使馆参赞贝库诺（Howard Bucknell）整理的谈话记录中，马慕瑞并未表述美国愿意同时与各方谈判。<sup>[109]</sup>

当然不排除编写这次谈话记录的贝库诺因疏忽而漏记了马慕瑞的谈话要点，而马慕瑞本人在发出报告时也未曾注意到这一疏漏（这在当年美国外交文件中是少见的，且马慕瑞本认为贝库诺“非常机敏”，他自己更一向对措辞极为细心讲究）。另一种可能是中国局势的变化以及他本人和国务院的观念歧异使马慕瑞极为沮丧，这样的长期挫折感无意中损害了他的职业精神。马慕瑞的报告说他与王荫泰的交谈内容与他与黄郛所谈相同，而北京也像南京一样未对南北联合与美谈判、特别是南北各自与美谈判做出任何反应。到1928年4月时，马慕瑞得出结论说，既然南北双方都未对美国的提议作出任何具体回应，与其中任何一方开展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sup>[110]</sup>

然而这正是前述易纳士提议的推动时期，美国同时与南北各方单独谈判可能是当时最容易被南北接受的选择，毕竟关税收入的大幅增加对双方都是实际可见的收益。尤其那时北方掌权者极欲与美方联络，故有可能王荫泰根本不知道还存在这样一种选择。另一方面，不能排除谈话记录有疏漏的一个旁证是，在前引蓝普森和梁士诒的会见中，蓝普森也曾提出在南北联合委员会成立之前，“可双方同时进行交涉”，梁士诒似未做出积极的回应。当时中国外交常受制于内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南北外交部负责人皆频繁更换，而黄郛、王荫泰、梁士诒等都相对较少外交方面的专业训练，若英美方面的表述被外交辞令掩盖而不甚清晰时，他们或未必能像顾维钧等职业外交家那样可以敏锐地抓住机会。

这中间也有一些文化和心态方面的歧异甚至误解。马慕瑞和黄郛之间就曾有些误会，他们在谈判解决南京事件协定的最后一天，仅落实文本的措辞（phraseology）就耗时长达16个小时之久，致使黄家原定的招待晚宴拖到半夜三点后才能开席。从职业外交的角度考虑，马慕瑞对其以这样马拉松式的修辞努力所落实的最后文本似乎颇感得意；但黄郛却将此“小刀细工”的方式视为自“庚子拳匪时代”以来“欧美人心头优越感不能去”，故不能在外交上“迎合中国在大转变时所需要”。<sup>[111]</sup>

这的确是当时中美关系的一个主要矛盾，陈友仁在1926年说：美国关于条约修订政策采“渐进”取向，而中国的实际情形却从根本上是“革命”性的，因而也要求一种“革命性的、亦即根本的解决”，那种一步步调整的“渐进”取向实与中国的政治现实相违背。<sup>[112]</sup>蒋介石同年会见外国记者时也主张以废除而非谈判修订的方式来解决中外条约问题，并明言：“这是一场革命，不能取渐进方法。”<sup>[113]</sup>马慕瑞在大约同时观察到，中国人对不平等条约有两种对立的态度，即“一方主张采取渐进的方式，而另一方主张取革命的方式”。<sup>[114]</sup>

其实当年南北外交都有些倾向非常规的“革命方式”，恐怕更多是马慕瑞自己倾向于渐进一方，且其特别注重外交的技术层面，当然使黄郛觉得他不能“迎合中国在大转变时所需要”。如前所述，政治大转变的时代，行为溢出常轨并不罕见。傅斯年1928年8月给胡适写信说：“改朝换代的时候，有些事实只可以改朝换代观之。不然，废约之论亦非‘君子相’也。”<sup>[115]</sup>民族主义倾向明显的傅斯年显然认为，单方面提出废约虽非“君子相”，在“改朝换代的时候”也可以接受。<sup>[116]</sup>

有意思的是，傅斯年此函是与胡适讨论南京政府改组由庚款构成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董事会一事。基金会的中方董事原先由一些与外国有着各种联系的精英人物组成，最初包括顾维钧和几所著名大学的校长。从1927年起，蔡元培和胡适也成为董事。此时新当权的国民政府将顾维钧、郭秉文等与北方有关的原董事开革，而代之以南方政府可以接受的人选。胡适认为这样以官力处置此事（并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不符合基金会章程脱离政治的基本原则，表示反对，自己也要辞职。但傅斯年则认为当时难有更好的方案，对南京政府不如“维其大体，谅其小节”，仍以继续任职为宜。他甚至以为，国民政府未将长期控制



基金会的美国人孟禄一并去之，“此亦不满人意者”。

孟禄正是本文前面提到的协助南京方面与美国政府接触的美国中间人之一，他在中华基金会中极为活跃，与当时南北双方知识精英皆有广泛接触。因其所掌握的丰富资源，基金会在当时中国学界中颇具影响力，马慕瑞就注意到孟禄“在中国知识界很有影响”。另一方面，作为基金会的美国政府代表，孟禄本应在南北之间保持中立，故美国驻华使馆认为他代表南方进行活动是不合适的。<sup>[117]</sup>实际上，孟禄早有亲南方的举措，他在1927年初夏曾与南京政府的教育行政委员会商议改组基金会的董事会，而南京方面的主持人便是前面提到的韦愨，时任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sup>[118]</sup>

可知中美双方参与、推动上述南北联合外交的人员和机构皆值得关注。另一个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的机构是跨国的太平洋关系学会。如前所述，该学会的中美人士都曾积极参与此事。这一学会曾经集合了相当数量有留学背景的中国知识精英，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思想界和学术界颇有影响力，也不时涉足政治，还可以进一步考察。<sup>[119]</sup>威尔伯和孟禄这些美国人对国民政府赴美人员的协助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些中国知识精英的亲南方态度。或可以说，当国民党人正经历着北伐以来最困难的阶段时，不少中国知识精英已经看好南方在中国权力竞争中的前途。

另一方面，将伍朝枢、李锦纶和韦愨结合在一起的却不是共同的意识形态，更多毋宁是外国读书的经历和地方认同：三人都是广东人，也许可以算是国民党中“广东帮，”（所谓“帮”也只是相对而言，其实只有松散的关联）的成员。其中伍朝枢是国民党右派而韦愨是左派（实际他从1925年起已秘密加入中共），李锦纶则基本是个温和的技术型官僚，政治上或属中派，但与左右派的关系都不错。李、韦二人此前的简单经历如下：

李锦纶（1884—1956）出生在纽约，父亲是广东台山人（据说是华人社团安良堂的主席），母亲是德国人。他在纽约长大，在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完成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教育。1906年，李锦纶回到广东从事教育工作并学习中文，曾任培正中学第一任监督。从1911开始服务于广东外交机构，曾任广东各政府（其时广东政府变更频繁）交涉员，也曾担任孙中山的秘书（1917—1918）、粤海关监督等。1922—1927年，他在上海沪江大学担任政治和历史教授兼副校长，故未曾参与国共合作期间的政治活动。1927年伍朝枢执掌南京政府外交部后，李锦纶被任命为政务司长、外交部参事。<sup>[120]</sup>

韦愨（1896—1976）是广东香山人，早年留英，后赴美，毕业于奥伯林学院，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也曾服务于广东外交界，似乎也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1925—1927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兼任国际司司长（一说曾任欧美司司长），后随军北伐，曾担任国民政府调查南京事件的代表，1927年出任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这也是他在会见詹森时自报的头衔。1925年韦愨由广东籍中共领导人苏兆征介绍秘密加入中共，由于他和苏兆征及国民党左派陈友仁的密切关系，在“清党”中成为整肃的对象。实际上，他之所以出现在美国正是为了逃避整肃，而非由国民政府派往美国。<sup>[121]</sup>

有意思的是，韦愨在国民党“清党”进行了一两个月后仍能代表政府和孟禄洽谈，且其出逃还曾获得“清党”主要发起者之一的蔡元培本人的帮助（蔡是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中的领衔者）；而李锦纶也和苏兆征保持着联系，后来当中共策划广州暴动时，正是李锦纶向韦愨转达了苏兆征要他返回广州的信息。李锦纶和韦愨此时的相关经历说明，意识形态和政治派别之分在当年未必高于一切，有时地方认同会弥合政治的歧异，有时同事之谊也能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至少，在涉及外交时，内部的政治纷争可能暂时退让，这或者是共产党员韦愨到美国后又成为国民党右派伍朝枢之代表的一个因素，也提示出当时南北联合外交在实践层面确有实现的可能性。

原刊《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5期

## 注 释

[1] 董必武：《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主要问题》（1961年），《“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363—364页。

[2] 例如，在清末的一段时间里，不少国人曾视帝国主义为民族主义的“最高阶段”，怀有一种既憎恨又向往的态度。本文所说的“帝国主义”，大致指谓民国以后在中国形成的概念。

[3] 参见王亚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57年；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1—3卷，人民出版社，1985—1993年；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96年7版。在西方，文化冲突和文化误解一直是解释近代中外关系的一个重要取向，特别反映在牵涉到传教的题目上。由于这一趋向通常隐含了西方文化优越的预设，已遭到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的反对。但从文化视角诠释中外关系这一取向基本未在中国生根，不论是从前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冲突说”还是新近得到提倡的“现代化取向”（隐喻着传统与现代的对立），都更侧重经济和政治因素。

[4] 参见：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柯文（Paul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

[5] 顾炎武说：“有亡国与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正始》）

[6] 清季士人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和表述，他们认识到，此前也有异族入侵，然皆在较大程度上接受华夏文化，即昔人所谓“窃学”；但近代入侵的西人则不仅无意“窃学”，根本有“灭学”之图，欲尽可能打压或铲除中国文化。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59—69页。

[7]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悠久一类表述已渐成套话，但在这里的意义非常实际具体，正是这些要素构成了近代中国朝野抵抗外

国入侵的有效性。一般多见中国在近代中外竞争中屡战屡败，或忽视了中国朝野持续抵制外国入侵的效力。正像宋朝虽被蒙元所灭却是世界范围内抵御蒙古入侵时间最长者一样，从世界范围看，美洲、非洲以及亚洲的印度等都大致具有和中国一样的地大物博特点，却未能免于沦为殖民地的处境，足以反证出中国虽屡败而不亡，且失地不甚广，主权基本保持，已是相当有效的抵抗了。从这一视角看，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在抵抗侵略中的作用和效能还可进一步深入探索。

[18] 这里的讨论受到“非正式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这一理论由John A. Gallagher和Ronald Robinson在1953年提出，参见其合作的论文：“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1815-1914,” *Economic Review*, VI (1953), pp. 1-15.关于这一理论的争论，参见：William R. Louis, ed., *Imperialism: The Robinson and Gallagher Controversy*,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1976.后来Robinson自己又有所发展，见其：“The Eccentric Idea of Imperialism, with or without Empire,” in Wolfgang J. Mommsen and Jürgen Osterhammel, eds., *Imperialism and After: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6, pp. 267-89.不过这一理论主要着眼于经济层面，很少涉及文化。

[19] 萨义德 (Edward W. Said) 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指出了文化因素对帝国主义扩张以至构成帝国主义概念那不可缺少的作用。参见其：*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Knopf, 1993 (本书有中文译本《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年)，particularly pp.267-68.

[10] 参见：Ronald Robinson, “The Eccentric Idea of Imperialism,” 引文在p.273；并参见其：“Non-European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Imperialism: Sketch for a Theory of Collaboration,” in R. Owen and B. Sutcliffe, eds.,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 London: Longman, 1972, pp. 117-40. David Fieldhouse从另一取向强调帝国主义行为实际发生作用地区的重要性，参见其：*Economics and Empire 1830-1914*, London: Weidenfield & Nicolson, 1973.

[11] 由于“主权”和“领土完整”等西方观念不过新近才传入，近代中国人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有个过程，时人更看重的恰是今日中外研究皆不那么重视的纲常礼教和国家（政治）体制的维持。晚清政治文献中一个频繁出现却难以精确译成西文的“国体”一词，就很能反映甚至代表中方的主要思虑。今日不少以中文为思想和表述工具者，也甚感难以界定“国体”一词，恐怕即因为这些人的思维和想像能力（或其使用的概念工具）已部分被“西化”了。所以，不仅要“在中国发现历史”，更要移位到具体时段里“在中国之人”的所思所虑所为进行提问，以“发现”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中国的历史”，才可能有所谓“了解之同情”。参见罗志田：《发现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5期。

[12] 从晚清到今日，试图淡化西方入侵之帝国主义性质者每强调西人来华意在“通商”，若以之与掠夺领土并论，这大致不甚差；但叶德辉已指出：“通商之士，一其心以营利，不能分其力以传教。”西人对后者的注重揭示出其目的不仅在于“通商”，而是更远更广泛（叶德辉：《郎园书札·西医论》，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年《郎园全书》版，44页）。并参见：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09-111.

[13] 近代中国与一般殖民地还有一大不同，殖民地的反帝运动往往是留学生领导，很多时候运动的领导中心正在所谓宗主国之内，与帝国主义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直接间接联系；而中国的反帝运动除早期与日本有着较密切的关联、一度中心也在日本（但同时更反中国政权）外，大部分时候是相对“独立”的（其思想资源主要是西方的，但运动本身与西方的联系则少）；在20世纪20年代虽与苏俄有非常直接的联系，但当时苏俄的地位相对特殊：它在中国仍然维持着某些沙俄的帝国主义利益（例如中东路），然其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一般帝国主义国家又有着巨大的差别。

[14] 关于清政府支持民间异端力量，参见罗志田：《异端的正统化：庚子义和团事件表现出的历史转折》，收入其《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年，1—32页。

[15] 《四川奏定致用学堂办法纲要》，《北洋学报》，丙午（1906）年第20册，学界纪要1页。

[16] 詹森：《国际环境》，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297页。

[17] 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

[18] 参见：John K. Fairbank, “The Early Treaty System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in idem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57-75.晚清中国官民当然也有过修约的想法，或以修约为抵御西方进一步要求的权益之计，然基本未成为一项有意识的国策。

[19] 王韬早就指出，治外法权“不行于欧洲，而独行于土耳其、日本与我中国”。他认为这是有“忠君爱国之忱”的“我国官民在所必争”，且“必屡争而不一争”，盖“国家之权系于是也”。具体的争法，则“不必以甲兵，不必以威力，惟在折冲于坛坫之间，雍容于敦槃之会而已。事之成否不必计也，而要在执西律以与之反复辩论，所谓以其矛陷其盾也”。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陈额外权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横排本，73—74页。不过王氏未曾理解到条约的不平等也体现在缔结和修改的方式上，很多时候“执西律以与之反复辩论”未必有效。

[20] 章太炎：《五无论》，《民报》，16号，7页。

[21] A. E. Campbell, “The Paradox of Imperialism: The American Case,” in Mommsen and Osterhammel, eds., *Imperialism and After*, pp. 33-40, particularly pp. 35-36.陈垣已见及此：《资治通鉴》卷286载后汉天福十二年契丹军克相州后，“悉杀城中男子，驱其妇女而北。胡人掷婴儿于空中，举刃接之以以为乐”。陈先生以为，此“非必其生性残忍也。蔑视之甚，故以非人道待之”（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夷夏篇第十六》，科学出版社，1958年，326页）。盖战争之残酷固易导致敌视而影响人的行为，然以杀婴为乐殊过分，那些胡人只有不视汉人为“人”，始可出此“非人”之举。

[22] Philip D. Curtin, “Introduction: Imperialism as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idem, ed., *Imperialis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p. xiii.

[23] 张之洞指出，这也因为中国人在“各国”眼中的形象是“昏陋懦弱，诈滑无用；而又顽固虚骄，狂妄自大，华已夷人，嫉视各国，如醉如梦”。参见张之洞：《致西安鹿尚书电》，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五日，《张文襄公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影印本，第4册，12页。

[24]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传教下》，54页。

[25] 严复：《与熊季廉书》（1903年1月31日），《〈严复集〉补编》，孙应祥、皮后鋒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237页。并参见：Michael H. Hunt,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the American Empire, 1898-1903: A Overview,”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48 (1979), pp. 467-71.

[26] 关于“东方主义”，参见：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27] Cf. Nikki Keddie, “Western Rule versus Western Values: Suggestions for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sian Intellectual History,” *Diogenes*, XXVI (1959), pp. 71-96

[28] 反之，近代来华西人所接触的中国人所表现的或者也非纯正之“中国”，至少在传述中国上层文化方面不够正宗。柳诒徵指出，西人来华所接洽之华人，“或沾毕腐儒，或无赖名士，或鄙俗商贾，或不学教徒”，经由这些人“传译”的中国学术，“最易失真”；但西人却认这些言说“为华人自信之真义”，恐难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柳诒徵：《中国文化西被商榷》（1924年），《柳诒徵史学论文集》，柳曾符、柳定生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25页。

[29] “租界行为”的持续性非常明显，到20世纪20年代，曾留学日本、美国而久居上海的杨荫杭观察到：西人“凡曾受教育者，皆讲求礼仪，言动无所苟”。但其“一旦移居东方，则视人如家。偶不如意，即拳足交下。其意若曰：‘此乃苦力国也。毆一苦力，与毆一人类不同。’于是积习成性，居中国益久，离人道益远。此不特未受教育者为然，即在本国曾受教育者，亦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觉其臭。有西人为余言：凡久客东方者，归时多不为国人所欢迎；以其性情暴戾，异于常人也”（文载《申报》，1923年5月8日，收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742页）。可知租界意识和租界行为确类一“染缸”，久居便被同化；这一同化对西方而言则为异化，故异于西方之“常人”。不过，正如萨义德反复指出的，作为“他人”的殖民地之存在既区别于宗主国的“自我”，却也是构建宗主国“自我”认同的要素（参见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passim）。由此视角考察租界意识和行为的异化于西方常规，可更深入地认识帝国主义的复杂一面。

[30]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传教下》，54页。

[31] 参见：Chinese Repository, III: 9 (Jan. 1835), p.413; VI: 10 (Feb. 1836), p.446; IX: 1 (May 1840), p.2; Stuart C. Miller, “Ends and Means: Missionary Justification of Forc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249-82.

[32] 他说，依基督教本义，即使教士因卫道而受辱，也当“如耶稣所云‘披左颊，转右颊向之可也’。苟能含忍包容，人心自服，又何必力为较量？”但列强对传教事业恰是“合举国之权力以庇之”，结果是“庇之愈甚，而冀传教之广播愈难。何则？传教先贵乎化导，化导在身心，不在乎势力也”。参见郑观应：《传教》（先后两篇），《郑观应集》，夏东元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上册，405—412页。

[33] Chinese Repository, III: 8(Dec.1834), p. 363.



- [34] 关于传教士方面更详细的讨论,参见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6期。
- [35] 这一概括在观念和句式上都受到著名的Gallagher-Robinson formulation的影响,他们曾提出“informal control if possible, formal rule if necessary”一说,参见:Gallagher an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1815-1914," *Economic Review*, VI(1953), p. 13.
- [36] 参见《胡适日记》,1926年10月17日,第4册,394页。
- [37] 罗素稍早曾赞扬胡适那本英文的《先秦名学史》在西方汉学界起着典范转移作用,并说胡适具有像美国教授一样的良好英文表述能力,这恐怕也是褒中略带贬义,多少体现出看不起美国人的传统英国心态。参见罗素为胡适书写的书评,载The Nation (Sept. 23, 1923), 胡适1923年11月4日的日记中剪贴有全文。
- [38] Charles A. Beard, "Introduction," in idem, ed., *Whither Mankind: A Panorama of Mod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29, p. 5.
- [39] 这样一种不平的情绪长期存在于日本是其不断发动战争的一个潜在但不可轻视的因素,参见Marius B. Jansen, *Japan and Its World: Two Centuries of Chan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此书有中译本:《日本及其世界:二百年的转变》,柳立言译,香港商务印书馆,1987年)。
- [40] 关于列强作为“外来者”的一面,参见Rhoads Murphy, *The Outsiders: The Western Experience in India and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不过,西方以及日本卷入中国的程度,特别是其通过条约体系直接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及其在中国经济和文化方面留下的更带永久性的印记,都提示出这些外来者已部分内化成“近代中国”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了,其明显表征之一就是当时中国反对者所持的思想资源基本是西来的。说详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近代史研究》1995年3期。
- [41] 孙中山就特别强调在华帝国主义的“共性”,他认为近代中国的实际地位是低于一般殖民地的“次殖民地”,即“凡是和中国有条约的国家,都是中国的主人”,而中国也就成为“各国的殖民地”。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201页。
- [42] Akira Iriye,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88.
- [43] 这一思维也被正式纳入中外条约之中,较早的表述见于1902年订立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其第12款指出:中国愿意“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各国律例改同一律”;而英国则“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判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即允放弃治外法权(黄月波等编:《中外条约汇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30页)。
- [44] 连一向“温和”的胡适在五卅事件后也说,列强对中国的排外运动“发生最大的恐怖。我试问这恐怖哪里来的?完全由于他们基于不平等的条约,享有特殊的权利而来”。因此,不平等条约就是“一切冲突的祸根”。参见胡适:《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1925年6月),《胡适文集》,第12册,723页。
- [45] 入江昭就认为,华盛顿会议后,以美、英、日三国合作为基础,列强试图在东亚建立一种不那么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国际新秩序,参见: Iriye, *After Imperialism*.
- [46] 当时多数中国人对西方内部这一变化不甚注意,但张奚若看出了战胜者之间的差别,他说:“德、奥之败,谓败于Bolsheviki之公理或威尔逊之公理则可,谓败于英、法、日、意之公理则不可;以英、法、日、意之公理与德、奥之公理无大别也。”参见张奚若致胡适,1919年3月1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年,上册,31—32页。
- [47] 参见: N. Gordon Levin,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美、俄两种民族自主的观念在中国都甚得人心,不过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要讲的是欧洲(理论上当然可放之四海,惟其真正的关怀是欧洲),而列宁的民族自决却更多讲到了亚洲。威尔逊能在巴黎和会放弃支持中国,部分也与其实际关怀所在相关。当时的中国人或未必已在这个层面理解和认识威尔逊的民族自决论,但明确感到他不能实行自己的诺言。
- [48] 说详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70—75页。
- [49] 参见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224—234页;叶遐庵(恭绰)述,俞诚之笔录:《太平洋会议前后中国外交内幕及其与梁士诒之关系》,自印本,香港,1970年,179—277页; Roger Dingmen, *Power in the Pacific: the Origins of Naval Arms Limitation, 1914-192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Thomas Buckle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1921-1922*,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70; Noel H. Pugach, "American Friendship For China and the Shantung Question at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LXIV(June 1977), pp. 67-86.
- [50] Dorothy Borg,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5-1928*, New York: Macmillan, 1947, p. 12.
- [51] 中国方面的挑战包括官方的和民间的、中央的和地方的,以及有意的和无意的,如1923—1924年的广州关余事件对列强而言乃是地方政府的作为,而1923年的“临城事件”则明显不具备挑战条约体系的主观意识,列强处理这两次事件皆颇能合作。
- [52] 与前引入江昭的看法不同,蒲嘉锡(Noel H. Pugach)和孔华润(Warren I. Cohen)等认为华盛顿会议后列强间的合作仍比较有限,且更多体现在相互限制的一面,参见: Noel H. Pugach, "Anglo-American Aircraft Competition and the China Arms Embargo, 1919-1921," *Diplomatic History*, II (Fall 1978), pp. 351-71; Roberta A. Dayer, *Bankers and Diplomats: The Anglo-American Relationship*, Totowa, N. J.: Frank Cass, 1981; Warren I. Cohen, *The Chinese Connection*; Roger S. Greene, Thomas W. Lamont, George E. Sokolsky and *American 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51-70, 97-119.
- [53] 参见: Iriye, *After Imperialism*, pp.20-1; 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John Wiley, 2nd ed., 1980, pp. 105-07.
- [54] 关于中德谈判及德国恢复其在华经济利益,参见: William C.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23-8; Robert T. Pollar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1917-1931*, New York: Macmillan, 1933, pp. 100-04; Iriye, *After Imperialism*, pp.12-13.
- [55] 不过,当年中苏条约的谈判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政治氛围下进行的,苏俄代表加拉罕曾提出以“中国人民”为外交对象这一违背国际外交谈判常规的口号,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从激进到保守的各类中国人士的应和,使本来处境艰难的北洋政府不得不在谈判中让步。参见何艳艳:《“国民外交”背景下的1923—1924年中苏建交谈判》,《近代史研究》2005年4期。
- [56] 例如,五卅事件后的中外交涉中,英、日、法、美、意、比形成一个临时性的“六国集团”共同行动,最能说明原有“外交团”的常规集体行为基本不复存在。关于这个问题的相关研究有吴孟雪:《加拉罕使华与旧外交团的解体——北京政府后期的一场外交角逐》,《近代史研究》1993年2期;黄文德:《北京外交团领衔制度之变迁——兼论加拉罕使华案的影响》,《近代中国》147期(2002年);唐启华:《中俄协议与北京外交团的没落》,《兴大历史学报》14期(2003年)。
- [57] 这一体系的缺陷也包括对华武器禁运的突破,国民党正利用了这一缺陷,先后从俄、德两国获得主要的军事援助。
- [58] 实际上,治外法权对外国人的保护远没有一般认为的那样有效,北伐时期的经历更说明这一条款对外国人的生命财产象征性保护能力都不具备;整个北伐战争期间,唯一在中国活动频繁而又没有人员伤亡的主要列强就是在一次大战后失去了治外法权的德国。
- [59] 当然,列强也会利用意识形态来认识和处理苏俄在华行为,参见Martin Mun-Loong Loh, "American Officials in China, 1923-1927: Their Use of Bolshevism to Explain the Rise of the Kuomintang and Chinese Anti-foreignism,"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4.
- [60] 华盛顿会议关于山东问题的解决已开先例,即日本在政治上从山东退出,但涉及实质性利益的日本势力仍留在山东(中国以为期15年的国库券向日本赎回济胶铁路,在未清偿期间用日本人为车务长、中日各一人作为会计长)。但华盛顿会议上中国的让步是在列强压力下做出,而中苏条约中的让步却是在内部“国民外交”压力下做出,更能说明中国外交的灵活性。
- [61] 杜亚泉即曾指出:事物之“为利为害,虽仍不离乎事实,而常有多少之思考想像存于其间”。杜亚泉:《论思想战》(1915年),《杜亚泉文选》,田建业等编,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165页。本条材料承刘宪阁先生提示。
- [62] 关于日本,参见: Jansen, *Japan and Its World*; Jean-Pierre Lehmann, *The Roots of Modern Japan*, London: Macmillan, 1982; 关于俄国,参见: Hans Rogger, *Russia in the Age of Modernization and Revolution, 1881-1917*, New York: Longman, 1983; Roberta T. Manning,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in Russia: Gentry and Gover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Adam B. Ulam, *The Bolsheviks: 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Triumph of Communism in Russia*, New York: Macmillan, 1965.
- [63] 严复在讨论欧战期间中国内乱日显,而北京政府“号令不出国门”的政局时说,“此局若古昔,经数十百年竞争之后,自有长雄起而为群伦所归命”;但当时局面的不同在于“今世一切牵涉外交,则他日变幻百出”,实难逆料。且此类局面在“中外历史之中,亦无成例”,增强



了时局不可知的一面。参见严复：《与熊纯如书》（1917年5月26日），《严复集》，王栻主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3册，668—669页。

[64] 杜亚泉：《中国之新生命》（1918年），《杜亚泉文选》，324页。

[65]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15日），4页（文页）。

[66]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人民出版社，1979年重排本，3—16页。

[67] 胡适：《国际的中国》，《胡适文存二集》，亚东图书馆，1931年8版，卷三，128a—128i页。

[68] 胡适：《与一涵等四位的信》，《胡适文存二集》，卷三，143页。

[69] 平：《内乱与外患》，原载《市声周刊》4卷2期（1926年1月3日），转载于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5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300页。

[70] 国焘：《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略的危险么？》，《向导》6期（1922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向导周报社汇刊本，45—50页。更详细的讨论参见罗志田：《北伐前数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3年4期。

[71] 这是近代中外交往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西方给中国带来许多可借鉴的新思想资源，但其既然以入侵方式进入中国，就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士人接受这些思想资源。同时，外来者的双重角色也使得在中国的“西方”不能不“分裂”（参见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近代史研究》1995年3期；《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3期）。日本在这中间的地位相对特别：在西方思想资源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日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自身也可以说是新思想资源的提供者；然而在处于社会、政治秩序大调整中的日本国内，主张采取直接领土掠夺政策的一派始终活跃于政界和军界，故日本对以间接控制为表征的在华帝国主义秩序也存在挑战的一面。

[72] 部分可能因为其自身仍处革命后社会、政治秩序的大调整之中，苏俄显然更能领会中国内部激变那突破常规一面的革命性意义，其提出以人民为外交对象的主张非常具有想像力，与那些试图维护既定秩序的西方列强相比，体现出相当充分的“思想解放”。

[73] 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两面性，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史学反思》，收入其《20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104—128页。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实际，本文所说的“民众”和“大众”通常不出城镇的范围，即使在城镇中也更多指的是多少识字且对“国是”保持兴趣的一部分，其实际数量可能不甚大。

[74] 在政治运动中有意地运用民族主义已成为当时中国政治活动的一个倾向，美国驻华使馆中文秘书裴克（Willys R. Peck）稍后观察到，“在政治中引起民众关注的最简易、最保险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排外，所有的中国政治派别都以此策略来“确保民众的支持”。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Peck and Wellesley, Dec. 9, 1926,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States, 1910-1929, 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 No. 341, 893.00/7981.

[75] 加拉罕在1924年就提醒中国：华盛顿会议关于审查治外法权和增加关税等权利，“以法国之反对”，迄今未能实行（加拉罕致王正廷，1924年3月19日，收入薛衡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256页）。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V. A. MacMurray）在1925年也已注意到法国迟迟不批准《九国公约》对列强利益和中外关系的损害（MacMurray to Hughes, Nov. 17, 1925, John V. A. MacMurray Papers, Seeley G. Mudd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

[76] 前述“保守”的杜亚泉与激进的中共观点相近，就极具启发性。一般不视为激进的张君勱就说，巴黎和会后，“我心中大为不平，觉得协商国政治家之所谓正义人道者，皆不过欺人之词；因而想及所谓国际法者，实等于国际的非法”。由于对其所研究的国际法失望，他不久即放弃修习国际政治。参见张君勱：《学术方法上之管见》，《改造》，4卷5号（1922年1月），1页（文页）。张氏自己后来在中苏谈判期间就要求加拉罕本着外交公开的宗旨，将其对中国政府所提出之条件公示于中国国民，国民必能秉公道正义以赞助加拉罕（《晨报》，1923年9月11日，6版）。再后来留学欧洲专习国际法的周鲠生提倡流氓式的“革命外交”（参见周鲠生：《革命的外交》，收入其同名论文集，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1—11页），其潜在造因大概也源于此。

[77] 故当时主要列强的具体对华政策与中国局势颇相类似，也以多变为特征。这方面一些初步的讨论参见罗志田：《北伐前期美国政府对国民革命的认知与对策》，《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6期。

[78] 有时外国的卷入可以到达相当局部的区域，北伐前夕广东的“土客矛盾”即曾因俄、英势力的卷入而国际化，地方因素和国际因素的纠葛使广州政局异常错综复杂，而其解决似也不能不与外国在粤存在相关。参见本书《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

[79] 本段及以下数段，参见本书《帝国主义在中国：条约体系的文化认知》以及罗志田：《北伐前期美国政府对国民革命的认知与对策》，《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6期；《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历史研究》1996年2期。

[80] Warren W. Tozer的未刊博士论文简单提及此事，参见Tozer, "Response to Nationalism and Disunity: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1925-1938,"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regon, 1972, pp. 168-70. Dorothy Borg更早的名著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5-1928 (New York: Macmillan, 1947)也曾论及南北双方合作的尝试，参见pp. 386-92.

[81] 陶文钊先生的《中美关系史（1911—1950）》非常简略地提及此事，然对史事表述不够准确，如书中说“伍朝枢派遣外交部参事李锦纶在美国活动，希望能与国务院建立直接联系。当时，北京政府驻美公使施肇基仍享有正式的外交代表地位，国务院拒绝与李锦纶进行谈判。李锦纶询问詹森，可否由施肇基作为北京和南京双方的代表与美国谈判关税自主问题，也无结果”（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128页），就稍有失真之嫌，详后。

[82]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ze and Kellogg, Dec. 7, 1926, SDF 711.93/105.

[83] 岑学吕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印，1972年，下册，504—505页。

[84] MacMurray conversation with Wellington Koo, in MacMurray to Kellogg, Mar. 24, 1927, SDF 711.93/143.

[85] MacMurray to Grew, Feb. 12, 1927, MacMurray Papers.

[86] Sokolsky to MacMurray, Dec. 1, 1927, MacMurray Papers;《晨报》，1927年9月12日，2版；Wilbur to Kellogg, Aug. 19, 1927, Kellogg to Wilbur, Sept. 13, 1927, memos of conversations between Johnson and Monroe, Sept. 12, 1927, between Johnson and Wei, Sept. 13, 1927, SDF 893.00/9401./9416./9417.

[87] 《伍朝枢致凯洛格》，1927年7月29日；《伍朝枢致施肇基》，1927年7月30日，《伍朝枢给李锦纶的指示》，1927年7月29日，国民政府档案，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18，卷号996（这几份文件皆是英文）。

[88] Memo by MacMurray, Oct. 21, 1927,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1942, hereafter cited as FRUS with year and volume), 1927, II, pp. 363-65.在马慕瑞文件中，还有好几份这一训令的前几稿，可以看到他起草过程中思路的发展及如何斟酌其见解，可以参阅。

[89] 《晨报》，1927年9月27日、29日，均2版。

[90] H. Bucknell,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okolsky and MacMurray, Feb. 25, 1928, MacMurray Papers; H. Powell to Bristol, Feb. 15, 1928, the Mark L. Bristol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memos of conversations between Johnson and Lee, Nov. 17, Nov. 30, Dec. 13, 1927, MacMurray to Kellogg, Jan. 11, 1928, SDF 895.00/9609./9654, 711.93/156./165;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Johnson and the Japanese Ambassador, Jan. 23, 1928, FRUS, 1928, II, pp. 403-05.按索克思曾任孙中山英文秘书，与宋子文和马慕瑞私交甚笃，被认为是当时最了解国民党内幕的外国人。关于索克思与中国的关系，可参见：Warren I. Cohen, The Chinese Connection: Roger S. Greene, Thomas W. Lamont, George E. Sokolsky an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91] 关于余日章和太平洋关系学会，可参见张静：《国民外交的一次尝试——中国代表参与太平洋国际学会之前后》，收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397—421页。

[92]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Johnson and Lee, Dec. 13, 1927, SDF 711.93/156;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Johnson and Lee, Dec. 22, 1927, FRUS, 1927, II, pp. 367-68.

[93] Kellogg to MacMurray, Dec. 18, 1927, FRUS, 1927, II, pp. 366-67.

[94]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Johnson and Lee, Dec. 22, 1927, MacMurray to Kellogg, Dec. 28, 1927, FRUS, 1927, II, 367-68, pp. 368-70.

[95] 伍朝枢致国民政府，1928年1月4日，国民政府档案，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18，卷号1004。按伍朝枢的电报开始即说：“今日沪报载：钧府议决特派外交部长伍朝枢任赴美国改订条约特使，不审确否？”报纸已获悉的消息，被任命的政府现任部长自己却不知悉，不得不向政府核实报纸的消息，充分说明他当时已成局外之人。

[96] Sokolsky to MacMurray, Dec. 1, 1927, H. Bucknell,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okolsky and MacMurray, Feb. 25, 1928, MacMurray Papers;《蒋介石致谭延闿等》，1928年2月13日，《历史档案》1984年2期，66页；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Johnson and Lee, Jan. 5, 1928, FRUS, 1928, II, pp.401—02; Lee to Johnson, Jan. 25, 1928, Paxton to Kellogg, Feb. 24, 1928, SDF 793.00/196./199.按陶文钊先生说，“前任外长伍朝枢被派往美国作为谈判修约的全权代表。但美国政府拒绝与伍朝枢进行正式谈判”（《中美关系史（1911—1950）》，129页）。该书此句无出处，不知何据，可备一说。不过伍朝枢被派时仍是“现任”而非“前任”外长，黄郛上任是2月间的事了。伍氏实际赴美是在济南事变之后，他于5月间主动请缨由欧赴美，得到南京政府批准，那已是在国民政府转变外交重心而黄郛即将下台之时了。其后伍朝枢和李锦纶与美国国务院的接触和谈判不论是否“正式”，却是实际有成效的。参见吴翎君：《美国与中国政治——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1917—1928》，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248—249页。

[97] Cf.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okolsky and MacMurray, Feb. 25, 1928, MacMurray Papers; MacMurray to Kellogg, Jan. 11, 1928, SDF 711.93/165.

[98] Lee to Johnson, Jan. 25, 1928, SDF 793.00/196.

[99] Memos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Johnson and Lee, Nov. 17, Nov. 30, Dec. 13, 1927, SDF 893.00/9609./9654,711.93/156;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Johnson and Lee, Dec. 15, Nelson Johnson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 C.; memos of conversations between Johnson and Lee, Dec. 22, 1927 and Jan. 5, 1928, FRUS, 1927, II, pp.367-68; FRUS, 1928, II, pp. 401-03.

[100] MacMurray to Kellogg, Jan. 11, 1928, SDF 793.00/165; Bucknell,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okolsky and MacMurray, Feb. 25, 1928, MacMurray Papers.

[101]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Johnson and Lee, Jan. 5, 1928, FRUS, 1928, II, pp. 401-03.

[102] MacMurray to Kellogg, Dec. 29, 1927,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Edwards and Perkins, Apr. 12, 1928, FRUS, 1928, II, p.378; Bucknell,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okolsky and MacMurray, Feb. 25, 1928, MacMurray Papers.

[103]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Edwards and Perkins, Apr. 12, 1928, FRUS, 1928, II, pp. 389-90; J. B. Powell to Bristol, Aug. 4, 1928, Bristol Papers.

[104]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MacMurray and Sokolsky, Feb. 25, 1928, memo by J. C. Ferguson, about April, 1928, MacMurray Papers.

[105] 关于伍朝枢的意向，参见：Tozer, "Response to Nationalism," pp. 156-60; Report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Bristol and C. C. Wu, Oct. 18, 1927, Mayer to Bristol, Nov.28, 1927, Bristol Papers.关于马慕瑞和黄郛的谈判，参见沈亦云（黄郛夫人）：《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354—360页；J. C. Ferguson, "The Nanjing Incident of March 24, 1927," memos by Bucknell, Mar. 28, Apr. 9, 1928, MacMurray Papers; MacMurray to Kellogg, Feb. 29, Mar 31, 1928, FRUS, 1928, II, pp. 323-26, 334-35; MacMurray's 1935 memo of "Development Affecting American Policy in the Far East," published with the title How the Peace Was Lost, ed. with introduction by Arthur N. Waldron,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2, p. 96; Borg,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5-1928, pp. 380-85.关于南京事件的解决，参见牛大勇：《对1927年南京事件的再探讨》，《江海学刊》1989年第6期。

[106] Memo of MacMurray's southern trip, Apr. 9, 1928, MacMurray Papers, particularly 12-5; MacMurray to Kellogg, Apr. 9, 1928, SDF 893.00/9859; 沈亦云：《亦云回忆》，354—355页。

[107] Bristol to MacMurray, Dec. 15, 1927, Bristol to Wilbur, Jan. 21, 1928, Bristol Papers.并参见：Bernard D. Cole, Gunboats and Marines: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China, 1925-1928,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83, p. 145.

[108] 参见罗志田：《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历史研究》1996年2期。

[109] MacMurray to Kellogg, Apr. 26, 1928,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Huang and MacMurray, Feb. 26, 1928, FRUS, 1928, II, pp.408-10, 410-12; MacMurray to E. L. Neville, July 31, 1928, MacMurray Papers.

[110] MacMurray to Kellogg, Apr. 26, 1928, FRUS, 1928, II, pp. 408-10.关于马慕瑞对贝库诺的看法，参见：MacMurray to Mayer, Mar. 20, 1929, MacMurray Papers.

[111] Memo of MacMurray-Huang negotiation, Apr.9, 1928, MacMurray Papers; 沈亦云：《亦云回忆》，355页。

[112] 陈的观点见FRUS, 1926, I, pp. 851-52.

[113] 蒋会见合众社记者施瓦茨（Bruno Schwartz）的内容见于Hankow Herald, Nov. 23, 1926,美国驻汉口总领事罗赫德（Frank P. Lockhart）的报告中附有此剪报，见Lockhart to Kellogg, Dec.4, 1926, SDF 893.00/7993; 并参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影印1936年版，910页。

[114] MacMurray to Kellogg, Nov. 19, 1926, FRUS, 1926, I, p. 999.

[115] 本段与下段，傅斯年致胡适，1928年8月13日，收入《胡适日记》，1928年8月7日，第5册，249—250页。

[116] 孟子早有“彼一时，此一时”的名论，他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周朝兴起以来“七百有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如果天欲“平治天下”，则“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傅之所云，或稍得孟子“以其时考之则可”的指谓。

[117] Mayer to Kellogg, Oct. 26, 1927, SDF 893.00/9664; MacMurray to Kellogg, Aug. 5, 1928, FRUS, 1928, II, p. 545.关于中华文教基金会，参见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83年，360—364页；杨翠华：《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1年，1—73页。

[118] 胡适当时曾出席一次双方参加的晚宴，宴会主持人即韦瑟，席间所论多为改组董事会事。参见胡适致蔡元培，1928年8月11日，原信收入《胡适日记》，1928年8月11日，第5册，251—255页。

[119] 参见：John. N. Thomas,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sian Scholars and American Politics,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4; 张静：《中国知识界与第三次太平洋国讨论会》，《近代史研究》2004年1期。

[120] 李锦纶后来长期服务于国民政府外交部，1928—1929年任驻墨西哥公使，并被任命为海牙公断院（今译国际仲裁法庭）公断员。1929—1932年间是其外交生涯的高峰，他担任外交部政务次长，并在1931年秋代理部务，直至陈友仁接任外长。1932年1月，李锦纶辞职，大约是与当时去职的陈友仁同进退。1933—1934年任驻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公使，1934—1943年任驻葡萄牙公使。1943年任外交部顾问，驻美国从事战时宣传。此后似定居美国，直至1956年在纽约逝世。参见：China Weekly Review, LII (Apr. 26, 1930), p.336; China Year Book, 1929-30, ed. by H.G.W. Woodhead, Tianjin: The Tientsin Press, p. 957; 张朋园、沈怀玉编：《国民政府职官年表（1925—1949）》，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7年；刘寿林等编：《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79—1985年。

[121] 本段与下段，参见京声、溪泉编：《新中国名人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355—356页；《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长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辑，19—41页；刘寿林等编：《民国职官年表》；memo of conversations between Johnson and Wei, Sept.13, 1927, SDF 893.00/9417.韦瑟后来主要从事教育工作，1949年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务。

## 作者简介

---

罗志田，1952年生，四川大学历史系77级毕业，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历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1995）、《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1998）、《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1999）、《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2001）、《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2001）、《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2003）、《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文化与学术》（2003）、《近代中国史学十论》（2003）等。